

全球化與 資本主義危機

金寶瑜 著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作者簡介--

金寶瑜

畢業於東海大學經濟系

Bryn Mawr College 經濟系博士

Marygrove College (Detroit, Michigan)

榮譽退休教授

曾任東海大學經濟系、世新大學社會發

展研究所客座教授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金寶瑜 著

 巨流圖書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金寶瑜著．-- 初版．-- 臺北市：巨流，2005〔民9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732-221-2（平裝）

1. 國際經濟 2. 資本主義

552.1

94003942

書名：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作者：金寶瑜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唐硯漁、姜道馨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57-732-221-2

2005年5月初版一刷

定價3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序

展望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

金寶瑜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我碰到一位年輕人，他被公司派去美國作短期的手機研發訓練，剛回到台灣。我們談起台灣和世界的經濟，我問他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有什麼看法，他說：「我和我的朋友都會覺得未來的情況會很慘，只是不確定倒底會有多慘」。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因為比起大多數的年輕人來說，他的高科技工作應該有不錯的薪水和穩定看好的前途，為什麼他對未來卻是如此的悲觀？

在這新世紀剛開始的今天，我覺得不論是生活在富有的社會或是貧窮的社會裡的大多數人，越來越感到他們四周的事物在不停的、加速的變化中。他們會感覺到在大環境的變化中，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也會感覺到自己似乎被一股無名的力量驅使著，身不由己的屈服在它之下，對未來發展充滿了無奈的焦慮。

生活在台灣的人雖然在過去也經歷過經濟景氣上下的起伏，但是在景氣低迷一陣過去之後，經濟總是又繁榮了起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子裏，人們總是覺得只要肯打拚生活會越來越富足，不會像今天這樣對未來充滿了疑慮和不安。這十幾年來，許多一向以培植新品種和高生產力自豪的農民被迫轉業，工人因為工廠突然搬走或倒閉而失了業，或是被工廠在技術革新和瘦身中解雇，或是在國有企業私有化時大批裁員中失去工作。失了業的工

人想再找工作是那麼困難，再也不像六〇年代時換個工作那般輕而易舉，尤其是年過五十的人更是如此。如今即使有一份不錯的工作的人，像剛才提到的那位年輕人，也還是不能免去對未來遠景的焦慮，就連在職的和退了休的中小學教師和公務員目前的收入雖然綽綽有餘，卻擔心著他們的未來。年輕人唸大學比以前容易了，但是私立大學的學雜費如此之高，而且大學畢業了能找到什麼樣的工作？甚至就連有碩士、博士學位的人要找一份穩定的理想工作也很不容易。失業的人想開個店做點小生意，但是發現一般的消費市場幾乎都超出飽和了，同業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了，即使全力以赴，維持下去也不容易，昔日開個雜貨店就能不愁吃喝的日子已經不存在了。更有一些已經退了休的人，他們的積蓄在股票狂跌後減少了一半，靠著有限的銀行存款利息過活的人，在利率大幅下降後生活更加困難。

不僅是在台灣，就連在美國如此富有的國家裡，一般人也是同樣的焦慮著他們的未來，他們失去了二次戰後曾經享有的生活上的保障。在戰後的那二十年中，美國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地在提升，極大多數人可以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的苦難日子，早已經被遺忘了。雖然早在六〇年代，美國的工廠就開始遷移到台灣和南韓生產，但是那時還是較小規模的、較零星的，並沒有威脅到製造業工人的就業機會。到了八〇年代，美國南邊鄰國墨西哥和一些中南美國家開放了外來投資，更多的、更大規模的美國工廠就移去那邊生產。近十幾年來，美國的資本則移到東南亞國家，近幾年來，勞動密集的生產業更遷往中國大陸，許多高科技但又勞動密集的產業也移至印度。美國工人在工廠隨時都可能遷移的壓力下，被迫接受了工資和福利的縮減和工作條件的下降。原來穩定的工作職位變成了隨時都可能被

解雇的臨時僱工。臨時工沒有任何休假或健康保險的福利，也沒有退休金。已經退休了的人的退休金在股票暴跌後無法維持生活，只好再重新外出尋找工作，麥當勞如今就僱用了不少低工資的老年人。在如此富有的和醫藥高度發達的國家裡，竟有四千多萬人買不起健康保險，不少人在經歷一場病後便被迫宣佈破產。年輕人為了自己的前途，拼了死命要拿個大學學位，但是美國普及高等教育的時代已成過去，戰後州立大學低廉的學費不斷的上漲，因此除非父母有錢，今天在美國讀大學是越來越困難了。

到了七〇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一大經濟強國，到了八〇年代，日本的經濟在許多產業上都超過了美國和西歐。很多比較落後的國家都羨慕日本在戰後經濟上的成就，希望能模仿它成為第二個日本。但是日本的經濟自從九〇年代初以來，陷入了無能力自拔的長期蕭條期，經過漫長的十四年仍無法恢復。在日本大企業工作的工人，過去享有終身職，他們以廠為家勤奮的工作著，使日本工業的生產效率不斷的提高。如今日本企業的終身職已成了過去式，許多人被迫提早退休，不知如何度過他們的餘年。許多人在八〇年代底房地產氣泡破了之前買的房子，如今價格大幅下降，有時下降超過了一半，但是除了宣佈破產外，每月還必需繼續支付沉重的房屋貸款。

西歐國家在戰後的二十幾年中，推行了「福利國家」制度，這些國家的工人享有比美國還要好的社會福利，除了健康保險、失業補助、退休金等項福利外，工人每年可以享有一個月甚至更長的休假。年輕人上大學不但不用交學費還可以領到生活補助。但是近十幾年來，西歐國家人民的生活一直在不斷的緊縮中。歐洲的企業也在外移，工人和一般公民的收入和福利被一步步的削減，「福利國家」不再。歐洲最大的經濟國——德國，過去十幾

年來的失業率一直停留在 10% 上下。從 1973 年到 1994 年西歐國家總合起來沒有（淨）增加一個新的就業機會（Thurow, 1996: 1）。

自從八〇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的人民的生計不斷地在緊縮，發展落後的國家人民所受到的衝擊就更大了。八〇年代初開始，拉丁美洲國家經歷了十幾年的外債危機，到了九〇年代中它們還沒有從外債的危機中恢復過來，就又被墨西哥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危機所波及。九〇年代中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導致它的人民的生計倒退了三十年。之後，亞洲的金融危機也緊接著爆發了。在亞洲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的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在這些國家裡貨幣貶值、物價暴漲、金融系統崩潰、銀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小資本（甚至本地的大資本）的經營破產。勞動人民本來在一切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經受到高度的剝削，危機之後，更是民不聊生。

Paul Krugman 對這次的危機這樣說：

在過去的兩年中，世界上七個國家的經濟（這七個國家的經濟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四分之一，有六億六千萬人口）經歷了一場與經濟大恐慌極為相似的經濟蕭條。這一次與過去一樣，在晴朗的天空中危機突然襲擊，跟上次一樣在許多有權威的評論家還在預測繁榮將持續的時候，危機已經在擴張中，這次跟經濟大恐慌時一樣，傳統的經濟處方不但證明無效，甚至會起反作用。任何有歷史感的人在現代的社會中看到這樣的現實都會怕得脊椎骨發冷。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1999)

1997年夏天從亞洲開始的經濟危機向外蔓延，到了1998年8月俄羅斯的經濟也崩盤了，同年的8月到9月巴西的經濟也跟著崩潰，到了次年的上半年，巴西的經濟再度陷入危機，並擴延到土耳其。九〇年代末的危機並沒有隨著二十世紀終了而消失。到二十一世紀初，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陷入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經濟危機更導致政治危機，哥倫比亞、祕魯鎮壓不了游擊隊的反叛戰爭。阿根廷從2001年底到2002年春，換了四個總統。委內瑞拉合法當選的總統Hugo Chavez雖然抵擋了在美國支持下的右派顛覆他的政變，今天Chavez的政權也還不知道是否能夠穩定。

印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出版的《印度經濟學》的第三十五期，對危機和由危機帶給人民的災難有這樣的報導：

金融危機所導致的災害與戰爭所造成的災害不相上下，有很多的國家在受到危機的襲擊後，生活水平倒退了幾十年，若是拿俄羅斯作例子，人民的生活水平倒退了一個世紀（在九〇年代時，俄羅斯的男性預期生命只有五十七歲）。在東歐國家和前蘇聯國家中，幾乎沒有國家在九〇年代末的國民所得是高過1989年的，俄羅斯在九〇年代末的國民所得只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二，摩達維亞（Moldave）和烏克蘭在九〇年代末的國民總所得僅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一。在亞洲危機時，泰國的失業率上升了三倍，南韓上升了四倍，印尼則是上升了十倍。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現今世界上有45%的人生活在每日少於兩元美金的貧窮日子裡，而且在九〇年代裡，

世界貧窮人口在不斷的增加。在今天的世界裡有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失業或不能充分就業。1993年全世界的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所得超過了最低的57%人口的所得，而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所得超過最低的85%人口的所得。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p.5)

為什麼近年來世界上各國人民的生活產生了這樣大的變化？是「全球化」帶來的嗎？那「全球化」是什麼？這個已經被濫用了的詞代表什麼？生活在台灣和其它國家的人為什麼如此的焦慮與不安？與「全球化」有關聯嗎？

世界在過去這些年中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我們應該如何去瞭解這樣的變化？應該如何去分析變化的原因？這就是許多人所關心的問題，也是我這幾年來不斷思考的問題。希望能對這個問題找到解答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動機。我不認為我個人有能力可以對這麼重大的問題找到完整的答案，這本書的內容偏重於經濟的分析，其它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意識型態上都無法顧及。但是我認為政治、文化、和意識型態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樣的說法倒不是因為個人背景而來的偏見。

這本書是從前面所提到這二十多年來世界的巨大變化來做分析和解說，希望因為它的出版來引起我們大家對這樣的變化的討論，從討論中再深入的去瞭解、去分析。

目錄

序 展望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	金寶瑜 i
第一章 導論	001
第一節 對「全球化」的詮釋	002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全球化」的動力	009
第三節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的蔓延與轉嫁	016
第四節 本書的章節	028
第二章 經濟大恐慌與國家的政治干預	031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生產設備產能過剩	033
第二節 經濟大恐慌與古典經濟學派	041
第三節 羅斯福的新政政策與資本主義重整	043
第四節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與政策	047
第三章 戰後前二十年資本主義大國的重建與繁榮	059
第一節 剩餘生產設備的銷毀與戰後的重建	060
第二節 由美國國內市場的擴張所帶來的新投資機會	065
第三節 日本戰後發展與剩餘產能	072
第四節 資本主義大國的繁榮與「福利國家」	076
第五節 三〇年代改革對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085

第四章	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089
	第一節 戰後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體系	090
	第二節 戰後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體系	100
	第三節 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107
第五章	戰後前二十年落後國家的發展	111
	第一節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的經驗	113
	第二節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與 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ies)	119
	第三節 對依賴理論的批判	122
	第四節 台灣與南韓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經驗	129
	第五節 台灣與南韓模式發展的代價	135
第六章	七〇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與「全球化」	139
	第一節 剩餘生產設備問題再度明顯化	140
	第二節 戰後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從癱瘓到解體	144
	第三節 歐洲美元膨脹、石油加價與危機加深	151
	第四節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危機的延緩	156
	第五節 凱恩斯政策失效與新自由主義改革	161
✓ 第七章	「全球化」下金融資本膨脹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169
	第一節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與外債劇增	172
	第二節 美國外債擴張與金融信貸膨脹之間的關係	179
	第三節 金融自由化改革與金融資本膨脹	183
	第四節 金融資本膨脹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192

✓ 第八章	八〇年代後資本主義危機加深與「全球化」	197
	第一節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第三世界外債	198
	第二節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貿易組織與條約	207
	第三節 資本主義深化危機與「全球化」	218
✓ 第九章	「全球化」與九〇年代後危機的蔓延與災害的轉嫁	221
	第一節 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222
	第二節 九〇年代初日本開始的經濟危機	228
	第三節 九〇年代中的墨西哥經濟危機	232
	第四節 九〇年代末的亞洲經濟危機	234
	第五節 二十一世紀初的危機加深	247
第十章	在危機轉嫁中落後國家發展的困境	251
	第一節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破產	253
	第二節 當今用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國家的困境	262
	第三節 中國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也將同樣面臨困境	275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危機與「全球化」	
	——總結過去展望未來	289
	第一節 「全球化」帶來了什麼？	291
	第二節 「全球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	295
	第三節 「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	298
	第四節 落後國家人民解放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301
附錄		
	附錄一 美國在貿易上的單方制裁	309

附錄二	世界貿易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相異之處	313
附錄三	對國際收支帳目的解說	319
附錄四	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世界農業的衝擊 以及對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的剝削	323
附錄五	台灣電子業發展問題	毛遠誠 339
附錄六	評《全球化陷阱》與《碰撞》	346

參考書目		361
------	--	-----

第一章

導論

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就是美國在世界上佔優勢統治地位的另一個名字。

Henry Kissinger

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Dublin）的 Trinity College 的演講

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對當今「全球化」這個熱門的話題提出與主流論述不同的分析，希望從這樣的分析中去瞭解「全球化」對世界上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全球化」是一個被誤用的和濫用的詞，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借用這個詞，來對它作我們自己的詮釋。主流的學者和媒體用「全球化」來解釋他們要說的話，我們則可以借用「全球化」來說明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和這樣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推動這樣發展背後的動力。雖然是同樣一個詞，但是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分析，也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在這導論中要說明下列四點：第一，我們如何詮釋「全球化」；第二，我們如何分析推展「全球化」的動力；第三，資本主義危機如何在「全球化」中蔓延，與國際壟斷資本如何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最後對本書的章節加以說明。

第一節 對「全球化」的詮釋

前面提過「全球化」是一個被誤用的和濫用的名詞。一般人在使用「全球化」這個詞時，常常是根據自己的需要給予某種特定的意義，所以「全球化」並沒有一個普遍被公認的定義。「全球化」常被用來形容商品在世界各地的流通，像在台灣可以買到美國牌的牙膏和香皂，可以吃麥當勞的漢堡和喝星巴克（Starbucks）的咖啡。「全球化」也常被用來形容資本的流動，像台商關閉了台灣的工廠，把資本拿去中國大陸投資，或外資進入台灣股市購買台灣的股票。「全球化」也會被用來形容在噴氣機時代人們橫跨世界各大洲的旅行，和在高科技的發展下資訊信息的快速流通，學界的人也談西風壓倒東風的「全球化」文化等等，這些「全球化」的用法是形容一個或一種片面的和孤立的現象。

在經濟學中，「全球化」常被定義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或投資關係等。這些經濟關係常被認為是一種量的關係，因此可以用一些數字，像絕對的或相對於國民總生產的貿易額或跨國投資額，來表示「全球化」程度的大小，或是比較不同時期「全球化」的增減，因此，會得出近年來「全球化」的程度在增加，但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全球化」的程度相比較則不相上下的結論（瞿宛文，2003: 7）。

贊成和擁護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和政客們也用「全球化」來推銷他們的一套論述。¹他

1. 華盛頓共識最早是由 John Williamson 在 1990 年時提出來的。當時 Williamson 是指以華盛頓為總部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對拉丁美洲國

在現實世界中理論有問題：國家之間不平等

們用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利益貿易理論（comparative advantage）來說明「自由貿易」有利於所有國家，而落後國家只有在「自由貿易」中來參與世界分工，才能取得經濟成長。因此落後國家應該本著它們自身的利益，取消一切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並且要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便應付「全球化」的新情勢。這樣的論述為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找到了合理性。華盛頓共識不僅只是論述而已，它是近年來由美國、歐盟和日本所控制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 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的政策的主要內容。這些金融貿易組織對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有很大的貢獻。而近年來反「全球化」運動所反對的，也是這一套根據華盛頓共識來制定的具體政策。

即使對這一套由華盛頓共識所導出的「全球化」政策批評的人，像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他所寫的《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這本書裡，也並不真正反對這套政策。史迪格里茲雖然指出近年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和加深了世界的經濟危機，而且也指出在經濟危機爆發中，發展落後國家受到的傷害最大，因此帶來了近年來反「全球化」的運動，但是他並不反對由華盛頓共識而來的基本論述。他同意落後國家必須要參與「全球化」才能發展他們的經濟，他只是認為在「全球化」具體政策中，自由化（特別是金融的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應該根據個別情形有所調整。史迪格里茲對 IMF 的批評重點在政策執行上的

家所實行的政策。這些政策就是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所談到的結構性調整條例中的政策內容。此後，華盛頓共識就被用來代表新自由主義中對待落後國家政策的最低的共同點。

失誤和偏差，而不是質疑政策的本身。

「全球化」看起來好像是中立的名詞，但是它的後面卻隱藏著很強烈的意識形態，像上面談到的華盛頓共識就是在推行有利於壟斷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有關「全球化」的主流論述中，幾乎一致認為「全球化」顯示了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威力，代表資本主義的全勝，因此，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一定要屈服在資本主義的規律之下，除此之外，別無它路。這樣的論點是要說明資本主義全勝是所謂「全球化」勢在必行的原因，因此，落後國家人民只有服從它，不能反對它。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危機才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從七〇年代初之後，世界的生產設備與市場總需求相對的過剩再度明顯化，世界資本主義開始了戰後的危機，國民生產和所得增長速度減慢。在先進國家中，因為生產設備已經過剩，因此資本進入生產領域就越來越困難，剩餘的資本無處可去，資本積累就不能順利進行。經濟危機更帶來金融的危機，早在六〇年代時，以美元為基礎的固定匯率就發生動搖，到了七〇年代初，由國際貨幣基金維持的固定匯率因為美國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金而解體。之後，國際信貸（international credit or international liquidity）的數額因為不再受約束而大量擴張，信貸的擴張（credit expansion）更進一步帶來了從七〇年代初開始到今天的一連串的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又更加深了經濟危機。這一點將在導論的第二節、第七章和其它章節中做詳細的說明和解釋。

經過了幾年的過度時期，到了八〇年代初，為了紓解資本積累的危機，美英統治階級帶頭，在政治上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國內的改革中，國家帶頭來協助資本向勞動階級進攻。在國際方面的改革中，壟斷資本的基地所在國，利用國

際金融貿易組織來改變戰後前一時期的資本積累的策略，猛力地和快速地向全世界擴張。因此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就是壟斷資本要為剩餘的資本在世界各地找出路，為剩餘的商品找市場，以便紓解資本積累的危機的新策略。到了八〇年代中後，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更加嚴重，由壟斷資本推動的「全球化」的氣勢就更加兇猛。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而且危機所造成的災害也就轉嫁到落後國家和先進國家的勞動人民的肩上，由他們來承擔。這一點將在導論的後面和書的各章中做詳細的討論和解釋。

什麼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壟斷資本在七〇年代經濟危機中發展出來的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在過去三十年中，這個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在全世界進行著。「全球化」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包括了下面幾個部分的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構成了資本積累的機制。在這個整體中的幾個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著的，而是彼此互相關聯著。

第一，「全球化」的一個主要部分是世界上 500 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這 500 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有 441 家是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跨國公司。在這三個地區內，60% 的貿易和投資是由這 441 家跨國公司進行的。世界上的 80% 以上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和一半以上的貿易是由這 500 家跨國公司完成的。這些大型的跨國公司支配著世界上的自然資源，決定在哪裡投資、生產和銷售，他們控制既存的技術和新的技術的發展，策劃公司內（常常是國與國之間）的資金和經理人的調動，決定資本的兼併，以及策劃如何影響他們投資、生產、銷售所在地，和

資源供給地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

第二，「全球化」的第二個主要部分是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三個經濟強國，以及由美國帶頭，歐盟和日本隨後所策劃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與這個政策相配合的意識形態。這個新自由主義政策從八〇年代開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推行，政策中包括取消和放鬆對資本的管制，將原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將許多原屬於公共範疇的、非營業性的活動營業化和私有化，並且將勞動市場彈性化。

第三，大型的跨國公司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的協助，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如 IMF 及 WTO 等等）以及多邊或雙邊貿易和投資條約〔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 NAFTA）〕在全世界範圍來推行上面所指的新自由主義，以便利於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擴張。

第四，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意識形態各方面的霸權。美國在這幾方面的霸權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解體，和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發展是相互關聯著的。

第五，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作為資本代理人的統治階級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也是「全球化」中重要的一部分。這些國家的執政者改變了他們前一時期與工會和平共處的策略，著手將戰後前期的「福利國家」措施解體。建立起各種對付勞動階級的設施，其中包括取消或修改與勞工相關的法律，以便打擊和限制工會的力量，因此減低了工人階級集體與資本抗爭的力量。用財政政策的稅收和支出來重新分配社會的所得和財富，使得財富向少數富人手中集中，並削減或取消社會福利，增加軍事開支。

第六，在絕大多數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內，全力支持「全

球化」的統治階級。到了八〇年代，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雖然仍存在著矛盾，但是他們之間利益上的一致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這個資產階級看到自己實力的弱小，知道自己無力抵抗國際壟斷資本所推展的「全球化」，也瞭解「全球化」是符合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深恐趕不上「全球化」的列車，因此在焦慮中，發出了「全球化」是不可抵擋的趨勢這樣無奈呼聲。他們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中，參與對本國勞動階級加重的剝削，和對本國土地與資源加速的搜刮，他們因此可以在剩餘中分到一部分。這個階級所制定的政策，其中包括貿易政策、財政上的稅收和支出政策、貨幣和匯率政策、勞工政策、自然資源和環境政策、交通、運輸、通訊和其他基本建設政策，教育政策等等，都是為了更好的配合「全球化」。他們為了配合「全球化」也常常不得已要取消對本國資本的保護。

在這個包含著六個部分的「全球化」整體中，國際壟斷資本建立了它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積累的機制。在經濟危機爆發時，國際壟斷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國家來負擔。「全球化」的整體是一個系統。「全球化」不僅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存在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在「全球化」中，有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三個資本主義的主軸國家（或政治實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和其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所謂新興工業國，像南韓與台灣，和其它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只從這樣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不能瞭解「全球化」的整體。因此，要瞭解「全球化」必須將階級的關係包括進去。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係，和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係，當前這樣的「全球化」的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而從七〇年代開始的資本主義危機不但沒有減輕，而且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更到本世紀初，只有越來越嚴重。對壟斷資本來說，「全球化」在短期內可以暫時紓解資本積累的危機，但是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而且危機的蔓延更將由危機所造成的主要災害轉嫁到落後國家的人民身上，由他們來負擔。從長期來看，「全球化」不但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危機，而且危機更會繼續深化。在危機深化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抗中當前這種形式的「全球化」的進展發生可能受到阻礙，壟斷資本也可能要再度改變它們資本積累的策略。

由壟斷資本和支持它們的各列強（尤其是列強之首美國）所發動的「全球化」的力量是非常龐大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美國擁有可以將全世界毀滅的軍事武器，但是在用大量毀滅性的武器佔領伊拉克一年多之後，並不能征服伊拉克人民。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跨國銀行擁有大量的資金，它們可以隨意收買落後國家任何一家銀行，但是如果落後國家的人民能聯合起來拒絕支付他們已經償還了多過原來借款額幾倍的外債時，不但這些大型的跨國銀行一點辦法也沒有，而且會因為這些銀行的破產而引起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危機。不管世界上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有多龐大，這些經濟對落後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是極度的依賴的，只要落後國家人民聯合起來將石油加價，這些龐大的經濟就會進入蕭條。只要落後國家的農民拒絕種咖啡，跨國公司的大經理們早上就醒不過來。

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談世界體系時，他籠統的談資本主義五百年漫長的歷史。華勒斯坦雖然也認為現今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一個轉折期，但是他對世界資本主義

1945-1971 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生產設備摧毀(第三章)
1970s 凱恩斯
1980s 新自由主義
福利國家
第一章 導論 009

如何達到這個轉折期並沒有深入的分析，而且資本主義到底往哪裡轉折也是完全不確定。因此，我們很難從華勒斯坦的論述和分析中找到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對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人們來說，華勒斯坦的論述和分析也不能供給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和著力點。

這本書裡所分析的「全球化」是指世界資本主義在過去近三十年中具體的發展。「全球化」是七〇年代危機時，壟斷資本所建立起來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因此，在對「全球化」的分析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這裡不但要分析資本主義如何從戰後二十多年繁榮而進入了七〇年代的危機，而且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在七〇年代後不斷加深的原因，以及在二十一世紀的未來危機將繼續深化的必然性。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全球化」的動力

世界資本主義從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和大戰後二十幾年空前的繁榮，到七〇年代初一共有四十年的時光。到了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了戰後第一次危機，危機中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加深。壟斷資本在危機中面臨資本積累的困境，因此，他們改變了在戰後前一時期資本積累的策略，開始了「全球化」。

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三〇年代進入前所未有過的大規模的危機，在經濟大恐慌最嚴重的幾年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國民總生產減半，新投資停止，幾乎有一半的勞動人口失業。大量的農業品因為工業生產蕭條（像紡織業蕭條不能購買棉花），和失業

的人買不起食物，而過剩的農產品降價，使得農民破產。這次經濟危機來自前一時期長期的繁榮，從十九世紀後期，資本主義經過了幾次重要的技術革新和大量的資本投資：像電的發明和電氣化、煉鋼技術和鋼鐵大規模的生產、火車運輸和鐵路的建設及汽車大規模的生產等等。除了這些新的技術發明之外，生產性的投資更因為貨幣發行量和信貸的大量擴張（money and credit expansion）而得實現。而信貸的大量擴張又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幣值脫離了金本位，因此各國的貨幣量不必再受黃金存量的限制。這一點在第二章中會再做說明。

在經濟大恐慌之前的幾十年中，經濟雖然有上下的景氣波動，但是總生產維持了向上增長的趨勢。由於長期經濟成長和大量投資的結果，到了二十世紀的二〇年代，生產設備的產能與社會總需求相比較，大量過剩。在生產設備高度過剩的情況下，新的投資無法進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入了長達十餘年的經濟危機，並由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

在經濟大恐慌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萎縮，商品賣不出去，所以它們盡量要將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同時為了保護本國市場，這些國家各自設置高關稅來抵制進口。很顯然地，在各國相互競爭抵制進口時，世界貿易先是大量減少，然後則到了幾乎停頓的狀態。資本主義大國並且組成不同的貿易集團，在同一個貿易集團內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上的優待，來抵制其它的貿易集團的國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除了因關稅上的抵制而減少外，更因為在脫離金本位之後，各國的貨幣不再與黃金維持固定的比價，在本國市場低落而急於要促進出口的壓力下，各國爭相將自己的貨幣貶值，而造成了匯率經常變動的混亂。危機進一步惡化，各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加深，並上升到政治矛盾，和

導致軍事上的矛盾，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爆發。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餘年中，美國和歐洲國家有很大的一批企業破產，在這些年中，新的投資很少，有些年的新投資甚至抵不過生產設備折舊的部分（也就是說淨投資是負的），因此有一批多餘的生產設備被銷毀了。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物資都用於與戰爭相關的生產中，沒有多餘可以投向生產設備的更新，再加上在大戰中，西歐國家和日本所有的工業生產設備都被戰爭摧毀了。因此在經濟大恐慌時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在這十六年中（1929-1945）完全地、徹底地被毀滅了。戰時飛機的襲擊也炸毀了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中的海港和道路等基本建設。在資本主義大國中，美國是唯一沒有遭受到戰爭災害的國家，但是它的生產設備因為多年沒有足夠的投資來翻新，所以大部分都已經老舊，因此存在著大規模的新投資機會。再加上西歐國家和日本的重建要依靠美國的出口，美國對歐洲馬歇爾計畫的援助和對日本的經濟援助，都給美國資本帶來極好的投資機會。

我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能夠維持二十多年繁榮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因是：大戰後資本主義大國內存在著大量的新投資機會。除此之外，資本主義大國在國內靈活的運用凱恩斯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戰後的前二十年中，資本採用了與勞工和平共處的策略，以此來促進工人階級工資和福利的增加，並且建立起「福利國家」中的許多設施，以便維持經濟成長率，使得資本積累得以順利進行。在經濟繁榮中，資本主義大國建立起了國際上彼此之間合作的機制。戰後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各國之間的固定匯率，關稅貿易總協降低了各國的進口關稅，這兩個重要的金融貿易組織促進了商品貿易的通暢和資本的流動，更有助於經濟的成長。

但是到了六〇年代後半，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生產設備不但已經恢復到戰前，而且超過了戰前的產能。美國的生產設備也在大量新投資下，完成了更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新的生產設備的效率比起戰前要高很多。到了六〇年代底，世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生產設備相對於社會總需求過剩的問題又再度明顯化。從下面所列的數據中可以看出來，到了七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年成長率（除去通貨膨脹因素）開始下降，到了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經濟成長率更持續下降（Thurow, 1996: 2）。

六〇年代：5.0%

七〇年代：3.6%

八〇年代：2.8%

九〇年代：2.0%

到了六〇年代底，當新投資因為生產設備的產能再度過剩而緩慢下來的同時，由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固定匯率也產生問題。戰後的固定匯率是靠美元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與黃金維持一定比價而固定下來的，但是如果只靠黃金做為貿易和投資交易的媒介，貿易量和投資量就要受到黃金數量的限制。在戰爭結束到1971年的這二十多年中，因為美國是戰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第一強國，而且大戰結束時，它擁有世界黃金儲藏量的70%。美國承諾美元可以隨時兌換黃金，各國因此同意用美元作為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媒介，也用美元做為它們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在這一段日子內，美國國外的美元因為它的對外投資和其它原因不斷的增加，美國境外美元增加一方面有助於貿易和投資的增長，但是另一方面也註定了這樣的發展無法長期繼續維持下

去。因為到了五〇年代末，美國境外的美元數額就已經超過了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美國國外的美元越多，其它國家就越懷疑它們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是否可以繼續兌換成黃金，在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之後，1971年，美國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固定匯率也就因此而解體。

資本主義的危機更因為石油出口國家在1973-1974年和1978年將石油兩次加價而變得更嚴重。七〇年代中期以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在高失業的蕭條中，物價持續上升，即所謂經濟發生了滯脹現象（見本書14頁），滯脹的現象是在這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八〇年代初，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將利率提到歷史上最高之後，抑止了物價上漲，但是失業率上升到8%以上，達到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後最高的失業率，在有些老的工業城中，失業率更高達20%。這時美國的汽車業進入戰後最嚴重的危機，1982年初，美國三大汽車公司關閉了二十家汽車工廠，解雇了三十五萬工人。從七〇年代起，西歐國家的經濟長期陷入停滯的高失業的情況，從1973年到1994年，西歐國家沒有多出一個新的就業機會（Thurow, 1996: 1）。

當美國與西歐國家七〇年代初經濟進入危機時，日本的經濟仍然維持較高的成長率，到1974年日本的成長率也開始下降。在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日本在工業貿易上，與美國和西歐國家等保持長期的順差。但是從九〇年代初開始，日本陷入了自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最持久的危機。日本國內存在著與它本國市場總需求相比較，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的產能，即使在出口不斷增加下，生產設備還是不能充分利用，因此新的投資除了投向國外，就無處可去，資本積累極為困難。日本的危機持續了十四年之久，2003年日本經濟成長率稍為提高，大部分還

是來自出口的增加；2004年日本的經濟又是負成長。

到了七〇年初，美國和西歐的經濟進入戰後的危機，它們的執政者認識到，在戰後前一時期它們用「福利國家」政策來達成資本積累已經成了過去，在危機下這樣的策略已經無法適合資本積累的要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對這時候物價上漲和經濟成長停滯同時出現的現象（即滯脹，stagflation，後面第六章將進一步討論）的新問題也無法應付。國際貨幣基金在戰後設立起來的固定匯率促進了戰後二十多年貿易和資本的流通，但是固定匯率在1971年美國宣佈停止境外美元兌換黃金後在1973年解體。關稅貿易總協在戰後用削減關稅促進了貿易的成長，但是當生產設備再次過剩後，市場競爭轉為激烈，資本主義大國各自設立起非關稅壁壘來阻擋進口，貿易流通增長的速度緩慢下來，貿易增長率的緩慢更增加了經濟成長的困難。但是在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之後，國際貿易和投資又有了新的發展，這個發展對延緩危機來說像是一劑強心針。這一點將在下面繼續討論。

為了解決資本積累的問題，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們必須要在政治上作調整。經過幾年過渡時期，他們開始對前一時期政策進行修正。八〇年代開始時，由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階級領導重整戰後前一時期的經濟政策，從美、英開始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改革。

1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1980年，美國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西方戰後到那時為止最保守的政治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企圖一步步收回工人階級在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福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公民在基本生活上的保障，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們一上台就用一連串的立法來

把前一時期對人民較有利的政策一一推翻。1980年美國雷根當選總統後，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一方面以削減聯邦政府的規模為藉口，大幅度削減稅收，將收入高的家庭的邊際稅率從70%降到28%，並且在削減國家的福利支出的同時，大量增加軍事支出。1981-1982年，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會的會員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作法，為美國各大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在柴契爾任內，英國政府同樣的削減社會福利，將國有企業私有化。1984-1985年時柴契爾鎮壓了英國礦工的大規模的罷工，礦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所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一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來。

在國際方面，壟斷資本的積累策略配合了它們國內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積極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推展到世界各地。在「全球化」中，壟斷資本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的協助，利用並改造既存的金融貿易組織來打開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市場。上面所提到的華盛頓共識即是跨國公司（包括跨國銀行）的壟斷資本，和美國、歐盟、及日本之間的共識，再將它們之間的共識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在它之前的關稅貿易總協）等金融貿易組織來執行。而近些年來對符合華盛頓共識意識型態的宣傳只不過是為了掩蓋壟斷資本在全世界的掠奪和侵佔，為他們的野蠻行為用一層美麗的外衣加以裝飾一番而已。

第三節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的蔓延與轉嫁

在固定匯率解體後，美元大幅貶值。美元脫離了與黃金的固定關係之後，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影響。一方面波動的匯率有礙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對貿易有負面的影響。另一方面，美元與黃金脫離關係之後，美國境外的美元快速的擴張，也就是說美國可以不必再顧慮它國外的美元會太多，而引發國外的美元會一再要求兌換黃金，從而減少它的黃金存量。換句話說，就是自從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之後，美國國外美元的數額不再受到美國的黃金存量的限制。從短期來看，取消美元在境外擴張的限制有助於七〇年代世界總需求相對於生產不足的問題，因為美國可以不必顧慮它的貿易赤字而繼續擴大進口，赤字部分只要用美元（美國印的紙鈔）來支付就行。美國擴大進口為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台灣、南韓和其他對美國貿易出超的國家）的產品提供了銷售的市場，暫時紓解了因世界市場需求不足而加重了緩慢的經濟成長。但是也造成過去三十年不斷產生金融危機和危機擴大的原因，所以美元信貸擴張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在短期是正面的，但是從過去三十年來看，這樣的發展不但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更會將危機導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美國的貿易赤字從七〇年代開始到八〇年代繼續擴大，在九〇年代初稍縮減後，到九〇年代後期再度擴大。到今天美國貿易赤字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加。2003年美國的貿易赤字高達五千億美元，2004年則更高，達近六千億美元。美國六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就是世界上其它國家六千億美元的順差，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的順差使得它們可以維持經濟的成長。換句話

來說，如果沒有美國的貿易逆差，這些國家就不可能維持當前的經濟成長。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不僅是美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根源是出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相對於總需求必然要過剩。這個問題相當複雜，要徹底瞭解它的嚴重性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在書中的第六章到第十章（特別是第七章）中還要做詳細的解說。我認為除非對這問題做深入的探討，我們很難徹底瞭解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更不用談如何去預測資本主義的未來。

八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在談資本主義過去三十年的危機時，我們必須要將七〇年代後美國國外美元不斷的繼續擴張作為背景。美國境外美元的擴張來自它的貿易赤字，美國的貿易赤字支持了貿易出超國家的生產，但是美國境外美元的增加又成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危機在生產和貿易的不平衡中，以金融做為媒介，藉「全球化」內的機制向世界各地擴張。

八〇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第三世界外債的形式爆發，受外債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集中在拉丁美洲，但也波及到南韓與波蘭等國。主流經濟學家在談八〇年代落後國家的外債危機時，很少去追究這次危機的真正原因。他們如果提到外債危機的原因，多半會說是因為落後國家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所引起的。有些經濟發展學家也會將外債危機的責任推到這些國家的執政者，說他們沒有執政能力，不能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外匯資源。但是這些對這次危機的解釋都是表面的，因為他們沒有將這次的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從七〇年代開始的危

機結合起來作分析。

事實上，要瞭解八〇年代落後國家的外債危機，我們還得去分析從七〇年代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前面說過七〇年代初時，資本主義因為生產設備的產能相對於社會總需求過剩，因此新的投資無處可去，資本積累發生困難。在這之上，石油出口國家又將石油兩次加價，石油加價後更進一步縮減了全世界商品的總需求，因為本來可以用來進口商品的外匯，在石油加價後就必須用更多的外匯來支付石油進口，因此造成外匯短缺。而石油出口國家的情況則正好相反，他們的外匯收入和外匯儲備猛升，大量多餘的外匯無處可去，就直接存進歐洲的跨國銀行，成為這些銀行的歐洲美元存款（參見第六章）。這些跨國銀行的美元存款從七〇年代初時因為美國境外美元增加而擴大，這時更增加了石油出口國家的美元存款。平日這些跨國銀行都靠跨國公司這些主顧借款，但是這時跨國公司因為生產設備已經過剩而投資萎縮，因此沒有借款的需要。跨國銀行在存款大量增加但是貸款停滯的情況下，受到利潤下降的壓力，急於增加貸款。

這時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落後國家正急需外匯，原因之一是它們需要更多的外匯來進口提高了價格的石油。第二個原因是它們的原物料出口因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的萎縮而導致價格和出口量下降，所以外匯收入減少。第三個原因是世界糧食價格上漲，因此它們需要更多的外匯進口糧食（參見附錄四）。跨國銀行趁此機會用低利率來吸引發展落後國家借外債。因為當時物價上漲率高，所以實質利率（利率減去物價上漲率）不但低而且是負數。

大量美元從石油進口國家（多半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到石油出口國家，再由石油出口國家存入跨國銀行，跨國銀行再將

美元借給需要外匯的落後國家，這些國家再用借來的美元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糧食和其它工業產品，美元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兜了個大圈又回到原地，這就叫石油美元再循環（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石油美元再循環也包括石油出口國家用大量美元收入來購買美國公債和雇用美國公司來擴建基本建設。石油美元再循環暫時紓解了和延緩了世界資本主義七〇年代非常嚴重的危機，減少了世界對商品總需求因石油突然漲價而進一步縮減的壓力，但是石油美元再循環並不可能解決危機，只是將危機延後而已，結果是到了八〇年代被延緩的危機以更大規模爆發。

到七〇年代末和八〇年代初時，美國因為國內通貨膨脹失控而導致美元貶值的壓力。1980年，Paul A. Volcker 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Volcker 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利率隨貨幣流通量緊縮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美國利率上漲使得它境外的美元被調回國，隨著引起了世界金融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提高了已經貸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的利率。

到了八〇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因利率上長而使外債的負擔更為沈重。以巴西為例，歐洲美元的貸款利率每上漲1%，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Kuczynski, 1982-83: 353）。而只在兩三年內，歐洲美元利率上漲了10%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如何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債負擔。從1979年到1982年之間（利率上長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從兩千三百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2年8月，墨西哥宣佈它付不出當月的本金和利息，危機就開始了。

在利率高漲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債快速增加。第三世界的外

債總額中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商業銀行（包括美國銀行在歐洲的分行），其它貸款來自德國和日本及其它歐洲國家的商業銀行，以及世界金融組織。到了八〇年代初，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許多商業銀行就會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會引起更大一批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銀行破產，這時以美國為主的全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Volcker, 1992: 198）。

到了八〇年代中之後，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利用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用基金的名譽貸款給拉丁美洲國家，這些國家拿到貸款後就把錢還給跨國銀行，解救了跨國銀行破產的危機。國際貨幣基金就藉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會，一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家，其戰後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下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國際貨幣基金用結構性調整措施來迫使這些欠債國進行自由化、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對外來投資的限制、削減關稅、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私有化後的企業中有很多被外資廉價收買，在整個危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大國完成了它們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

資本主義大國在危機中將世界經濟重整，將危機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國家。在 Susan George 所寫的《債的武器》（*The Debt Boomerang*）中我們可以看到落後國家對危機災害的負擔。她在書中說：「從 1982 年到 1990 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一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九千兩百七十億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八年中，資本從落後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四千一百八十億美元。以 1948 年幣值來計算，這個資本的淨轉移相等於六個當年

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到了 1990 年在支付了八年這麼大數額的本金和利息後，落後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 1982 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61%」（Susan George, 1992 xv-xvi）。

從八〇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中，我們可以瞭解危機如何從先進國家蔓延到發展落後國家。八〇年代的發展也清楚的顯示了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並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落後國家，由落後國家的人民來承擔。

「全球化」與九〇年代至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壟斷資本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家和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援助，將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從拉丁美洲推向世界各地。關稅貿易總協在 1986 年開始了第八回合（烏拉圭）的談判，1994 年底達成協議，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擴大了國與國之間經濟關係，它所牽涉的範圍從貿易關係擴張到投資和其它經濟關係（參見第八章與附錄二）。1989 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成立了，APEC 的成立就是為了便於美、日資本向亞洲和其它太平洋國家擴張。1993 年 APEC 在西雅圖開大會後，它就更有步驟的做為推進亞洲自由化和私有化，它對協助壟斷資本打開亞洲太平洋國家的市場和經濟做出很大的貢獻（參見第八章）。

墨西哥在八〇年代中以後，進一步加深了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1993 年底它與美國和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1994 年 1 月 1 日開始生效。美國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經濟進一步納入了它的經濟勢力範圍之內（參見第八章）。

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從八〇年代初外債危機開始後，到九〇年代初的十年中完全沒有發展，這十年常被（包括主流媒體）稱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the lost decade）。1994年12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一週年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西半球高峰會議開幕時致辭說：「所謂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現今已經是模糊的記憶了。這些年來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在柯林頓宣佈這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僅僅九天之後，墨西哥就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Naim, 1995: 49）。

1999年3月華爾街日報頭版以——「墨西哥模式值得這麼大的痛苦嗎？」為題做了以下的報導：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之後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與美國的貿易額增加了一倍，從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但是對大多數的墨西哥人來說，貿易增加的數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值之後，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了39%。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發展報告說，墨西哥極端貧窮的人從危機前每七人中一個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佔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是危機後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西哥上一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毀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華爾街日報，1999年3月8日，A-1）。

九〇年代後期資本主義危機蔓延與加深

墨西哥的危機尚未終了，1997年夏天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

就在亞洲爆發了。一般主流經濟學家分析這次危機時，多半是將危機的原因歸罪到東南亞國家的金融系統不夠健全，說這些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曖昧關係有礙經濟發展等等。這樣的分析就跟主流經濟學家對八〇年代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分析是一樣的，他們只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而不把在亞洲發生的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連貫起來做分析。事實上，1997年夏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全球化」下蔓延到亞洲。在世界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情況下，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帝國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機進一步深化中，以帝國為基地的壟斷資本必須要找新的出路。於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推展「全球化」，為資本積累尋找新的機會。

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在亞洲爆發的直接原因，還是起源於前一段世界資本主義內的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包括美國與其它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而這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又與世界生產設備過剩有直接的關聯（參見第七章）。日本在七〇年代底和八〇年代初，就隱藏著嚴重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這時，一方面，日本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要維持經濟成長就必須增加出口，另一方面，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爭執因為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但得不到解決，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到了1985年，美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各大國為了挽救美國貿易逆差的危機，它們的財政部長在紐約開會，並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廣場協議中決定由各大國的中央銀行合作，將美元貶值和將日幣與馬克升值，以便刺激美國的出口和減少它的進口。

八〇年代中美元貶值後，暫時減少了美國貿易逆差，但是日

幣的升值，使得日本跨國公司必須不斷將出口商品降價來維持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就大幅降低了日本資本從出口中所獲得的利潤。在此同時，日本因過去多年與美國貿易順差而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日本政府為了協助它的資本家就利用外匯儲存來放鬆銀根，實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日本銀行大量增加貸款，過多的貸款引起了八〇年代後期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同時狂飆，日本的經濟像個吹起來的大氣泡。到了九〇年代初，這個大氣泡破了，日本的經濟就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今天還沒有真正的恢復。

八〇年代中時，日本國內的投資因為它的生產設備相對於本國市場大量過剩，而且用出口來解決生產過剩也因為美國對從日本進口的抵制和日幣的升值而更困難。1985年日幣對美元升值後，日本的資本家到美國、東亞、和東南亞投資都很上算，因為像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南韓、和菲律賓等國的貨幣都盯緊美元，所以日幣對美元升值，也相對於這些國家的貨幣升值。²再加上日本必須要為它的大量的美元外匯找出路，對外投資成了唯一的選擇。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資本，特別看重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在八〇年代中之前，日本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尚不多。從八〇年代中開始，情況大為改變，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大量增加，從九〇年代初到1997年危機開始時，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僅直接投資，就高達一千億美元，日本約有四、五百家跨國公司在東南亞設廠（Gilpin, 2002: 270）。隨著日本的跨國資本的大量投資，它們就把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從日本擴張到亞洲其它地區（這一段的發展在第九章中特做詳細的敘述與分析）。

2. 台灣除外，在1985年和1987年之間台幣對美元升值40%。

美國在亞洲的投資遠遠落在日本之後，但是在八〇年代裡，美國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合比前十年增加了 71.5%，而且除了直接投資外，還有股票、債券和房地產的投資。除了日本和美國資本之外，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從 1995 年到 1997 年的兩年之間，到亞洲投資的外國資本增加了一倍。

從八〇年代中到九〇年代，日本將生產移向亞太國家，日本政府這時用經濟援助來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侵略這些國家所造成它們對日本的惡劣印象。1991 年和 1992 年的兩年中，日本政府對這個地區的六個國家的經濟援助達四十五億美元。美國與日本相比顯得遜色，美國只對兩個國家援助三千多萬美元。日本政府的援助又給日本資本增加了投資的機會。

東南亞的國家從八〇年代中開始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了進入亞洲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時這些國家放鬆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由，不受限制。但為了保持與美元固定匯率，這些國家提高了本國的利率，提高外資貸款和債券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引外資。報酬既高風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勵外資繼續流入。

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一段時間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和這三年來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大陸）都是如此。這裡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由大量外資進入所帶的短期國民總生產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續吸引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加上樂觀，就得出了一九二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一類毫無根據的預測。但是在這一片樂觀的背後就隱藏著危

機。

在 1997 年前流入的外資除了直接投資外，就是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金融投資。到了八〇年代底和九〇年代初，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投資中，很大部分都屬投機性的投資。這時美國的各種互惠基金（mutual funds）來到東南亞新興起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 30% 到 35%，這樣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只可能從投機中獲得。

投機使得股票與房地產的氣泡越吹越大，到了 1997 年 8 月時，這個大氣泡就爆炸了。泰國的泰銖首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而被迫貶值，連帶引起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及到台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較少，受的傷害也較輕。

在這次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到了 1998 年秋，一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機已經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更進一步向世界各地擴散，而且有繼續擴張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趨勢。

在這危機燒上眉頭的時刻，資本主義帝國的領導人必須策劃解救的對策。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大國用大幅擴充信用並藉助國際貨幣基金來融資給俄羅斯。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等國都先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同時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件。在亞洲國家所簽定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它們所接受的條件要比八〇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所接受的條件更為苛刻（參見第九章）。

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改革規定這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使利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利率上漲後，使得更多的當地的小資本，因為不能負荷沉重的債務而被迫破產，甚至連與官僚勾結的大資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依改革措施中新定的破產法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更多的國營企業被迫私有化，和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受到了日本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波及，在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情況下，它們採用了用外來投資來發展出口以帶動經濟成長，在短期內大量的新投資必然會加快經濟成長的速度。危機之後它們只有承擔這樣發展所帶來的後果。1997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奇蹟」的神話，也揭穿了落後國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就能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來發展他們經濟的謊言。亞洲危機的始末應該成為要想藉出口來促進經濟成長國家的借鏡。

到了九〇年代亞洲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後，八〇年代中以來每年大筆流入的外資停止了，而且大筆本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撤走。這些國家在極短時間內失去大量外匯存底，只好向國際貨幣基金借債。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的制裁（這一點會在第九章中繼續討論）。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亞洲的危機尚未恢復，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又再度經歷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也引發了一些國家的政治危機。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世界上這麼多的國家好像不斷地經過自然災害的浩劫，或是像遭遇了瘟疫般的襲擊。它們的人民在痛苦的日子中掙扎著。

從導論開始貫徹在這本書的各章節中，都是要說明「全球化」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危機中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中壟斷資本向世界各地擴張暫時舒解了它的積累困境，但是「全球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以也不可能剷除危機的原因。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危機不斷的蔓延和深化，而且今後的危機將會更加嚴重，因此，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要想發展資本主義必將一再遭受到危機的衝擊，他們的人民會被迫承受危機帶來的災害。

第四節 本書的章節

在這篇導論的開始時說到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對「全球化」提出與主流不同的分析，並且要從這樣的分析中去瞭解「全球化」對世界上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所產生的影響。在這一章的第一節中我提出了對「全球化」的詮釋，我認為「全球化」是過去二十多年中壟斷資本在資本主義危機中新的資本積累策略，這個在全世界進行的新的資本積累策略有六個彼此互相關聯的部分，而「全球化」是由這六個部分所形成的一個整體。在導論的第二節中我提出了資本主義危機正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因此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就成了這本書的極重要的部分。這本書的前一部分花了很多的篇幅來分析資本主義危機，因為我認為瞭解資本主義危機對分析「全球化」是完全必要的。

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必須要從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談起，資本主義從經濟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資本主義走出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經歷戰後二十多年

的繁榮，到七〇年代初又再度進入危機，離三〇年代共有四十年的時光。我認為除非我們能對這一段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有較深入的瞭解，我們將很難去分析七〇年代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也不能認識現今和未來資本主義危機將會繼續的必然性。對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的分析，不但要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也要解釋三〇年代經濟危機的特殊原因，還要談到在危機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統治階級的對策，這是繼導論後第二章的內容。

資本主義在戰爭中走出了經濟大恐慌，在戰後二十多年的繁榮有它一定的原因和歷史背景，第三章分析戰後繁榮發展的國內原因，第四章分析戰後繁榮發展的國際原因。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中也解釋了戰後二十多年經濟的繁榮，乃是七〇年代後危機再次出現的原因。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我盡量做了較簡單的論述，避免用很多經濟學的術語。但是對一般讀者來說可能還得有一點耐心，多花一些心思來瞭解這一部分。

第五章談論了在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繁榮期間落後國家發展的經驗。在這一段發展中，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中很多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也有少數國家（地區）採用品出口來帶動經濟的成長。總的來說，採取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的落後國家在戰後的前二十年經濟都得到一定的成長。但是進口替代的發展到了七〇年代初後，因為世界資本危機的衝擊而有了徹底的改變，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策略也碰到困難。在導論開始時說明了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要對「全球化」提出與主流不同的分析，這個分析包括了「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發展的影響。事實上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它們的發展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是我最關心的課題，也可以說它是要提出對「全球化」與主流不同分析的原因。如果我們要瞭解「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發展的影響

響，就必須對這些國家在八〇年代前的發展作探討，這就是第五章的內容。

第六章分析資本主義到了七〇年代初進入危機的原因及其後的發展，並且解釋在危機中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因為前一時期的政治對策失效所面對的僵局。第六章並分析「全球化」的政策如何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之內實現。第七章中進一步分析近年來金融資本的膨脹，以及金融資本膨脹與美國在過去二十年中貿易逆差和外債劇增之間的關係。美國貿易逆差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問題，它和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是密切關聯著。第七章也分析了美國的外債如何導致全世界金融信貸的增加，而且在金融信貸不斷的擴大下更進一步引起了生產設備的擴張和金融市場及房地產的投機。

第八章分析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如何在八〇年代以第三世界外債的形式在拉丁美洲爆發，並且分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如何利用國際貨幣基金將危機的災害轉嫁給落後國家，也分析了金融貿易組織和協定在「全球化」中的功能。第九章分析了在「全球化」下，資本主義危機到了九〇年代進一步蔓延，和危機進一步加深。第十章分析在「全球化」下落後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所面對的困境。最後一章對書中所討論的議題做總結並展望未來。

除了這十一章之外，尚有六篇附錄：附錄一討論美國近年來在貿易上所採用的單方制裁手段；附錄二討論世界貿易組織和關稅貿易總協之相異處；附錄三對國際收支帳目做解說；附錄四是1997年7月在菲律賓世界農業大會上發表的〈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世界農業的衝擊以及對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的剝削〉由陳信行翻譯成中文；附錄五是毛遠城所著的〈台灣電子業發展問題〉；附錄六是評《全球化陷阱》與《碰撞》兩本書。

第二章

經濟大恐慌與國家的政治干預

不斷的廢除老的、舊的，是進步的標誌。

汽車王朝亨利·福特二世

世界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末，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經濟大恐慌。到了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從這次危機中走了出來。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繁榮，到了七〇年代初又進入了危機，這個期間共有四十多年的時光。這本書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我認為這樣的分析還得追溯到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那次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全世界性的，也是到那時為止，和自那時之後，資本主義最嚴重的、最深的、規模最大的、和最持久的危機。

在這次危機中，世界資本主義到了全盤崩潰的邊緣，世界經濟受到空前的傷害。到了三〇年代初，以美國為例，它的工業生產減半、近一半的勞動人口失業、三分之一的銀行倒閉、股票市場崩盤。在此同時，因為工業蕭條所以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沒有市場，加上失業的工人買不起食物，農產品生產相對於需求大量過剩，農產品價格大幅下降，農民破產，他們的土地被銀行收回而失去了活路，被逼得到處流浪。¹在美國的各大城市裡，失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排著長隊只是為喝一碗施捨的稀湯。在

寒冷的冬天，街上睡滿了被房東趕出來的無家可歸的窮人，許多失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死於飢寒交迫之中。汽車工業城底特律估計每七小時就有一個人餓死。

我認為重新去認識經濟大恐慌的歷史，不但有助於我們認識那次危機發生的原因，而且可以瞭解世界資本主義各大國家的執政者當時針對危機所做的改革，這些改革是他們針對經濟危機所做的政治上的調整。這些改革增強了國家對資本的管制，以及對整體經濟的管理，也就是國家一方面用法律對資本加以限制，像對銀行和股票市場的限制；另一方面國家對經濟作直接的干預，像對農產品產量和價格的干預。在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執政者們面臨了他們本身的存亡問題，所以他們所做的改革是非常深刻和徹底的。到了1936年凱恩斯（John M. Keynes）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出版後，他為國家直接參與經濟的管理建立了理論的根據。凱恩斯的政策到了戰後才全面付諸實行，直到八〇年代前主流經濟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在經濟大恐慌中的政治上的改革，以及戰後國家能夠善用凱恩斯政策是戰後資本主義繁榮的原因。他們也認為國家直接參與經濟管理使得資本主義產生了徹底的改變，因此像三〇年代那樣的大規模經濟危機將不會再發生。

到了戰後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危機再度明顯化後，八〇年代時，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執政者在政治上又做了一次改革。有趣的是這次的改革卻是要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政策

1.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 John Steinbeck 所寫的小說《憤怒的葡萄》（*Grape of Wrath*），就是描寫這些到處流浪農民的生活和他們的鬥爭。

的核心就是取消國家對資本的管制，和減少國家對總體經濟的直接干預。那麼到底是增強還是減少國家對資本的管制和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才是對付危機有效的政策呢？在七〇年代資本主義再度進入危機後，凱恩斯對整體經濟干預的政策是否仍然適用？更基本的問題是：不管是三〇年代的改革，還是八〇年代的改革，它們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而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又是什麼？經過了七〇年代的發展後，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具體發展有了更好的掌握，應該更有能力來對三〇年代的改革政策作分析。這樣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八〇年代以來的改革。

這一章先從說明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來瞭解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再分析資本主義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發展而導致經濟大恐慌的歷史背景，以及在經濟危機中執政者所做的改革，並分析這些改革所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生產設備產能過剩

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會有經濟景氣上下波動的循環。在經濟蕭條時，經過一段時間，幾個月或是一年，甚至兩年，等到商店能用降價除清存貨，它們就可以再向批發商進貨，批發商就可以向製造商進貨，使得原來停工的工廠可以又重新開工，雇回工人，工人有了工作之後，就可以開始消費，景氣也就跟著活絡起來；更重要的是在經濟蕭條時，許多小的企業往往都會支撐不了而倒閉，經營不下去的企業中，有一部分會被大企業收購，另外的在破產之後，機器就被拿來當廢鐵變賣。因此經過一段的蕭條

日子，一部分生產設備會被銷毀（要看蕭條時間的長短，如果時間較長，相當大的一部分生產設備會被銷毀）。

被銷毀的生產設備不但是屬於生產規模比較小的，而且是生產技術比較落後的企業。在經濟蕭條中淘汰了小的、弱的、技術落後的企業，留下來大的、強的、技術先進的企業。等蕭條過去，因為一部分生產設備被銷毀，而解決了當時的產能過剩的問題，大的企業就可以增加投資，進一步採用新技術而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這樣良性的循環中，不斷的除舊更新的發展生產力。所以汽車大王亨利二世才說：「將老的、舊的銷毀是進步的標誌」。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循環中，經濟蕭條部分正是重建與擴大生產之前的一個必要的過程。因此銷毀或毀滅（destruction），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只有在生產設備的產能銷毀後，才可能有新的投資，重建才能開始。著名的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認為這樣對生產設備的銷毀是具有創造性的（creative destruction）。

資本主義在這樣的循環過程中，還有金融信貸的因素。資本家首先要購買生產設備、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不管資本家多麼有錢，他荷包裡的錢總是不夠用來做生產性的投資，因此要維持生產和要擴大生產，資本家必須要向銀行借貸，或者是用企業的名義發行股票或債券，因此信貸（也就是信用，credit）是資本主義運轉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資本主義生產如果沒有信貸增長的配合是不可能擴大的。而信貸的擴張和緊縮又與景氣的好壞互相關聯著，在景氣好時，企業的利潤上升，銀行的信貸寬鬆。景氣壞時，企業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銀行怕貸款不能歸還，所以不肯再貸新款，甚至把原本的貸款收回。在這時一般企業，特別是規模小的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常常因為被銀行逼債而導致破

產。所以信貸的寬鬆或緊縮可以使經濟上下波動的幅度加大。經濟景氣越好，信貸越寬鬆，使得生產可以更加擴充。景氣越壞，信貸越縮緊，連帶就會迫使更多的企業破產。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有時金融也可以扮演主動的角色，也就是說，由金融的擴張而引起生產的擴張，或是因金融的緊縮而引起生產的降低。

在這本書中所說的經濟危機不是指經濟短期的上下循環（cyclical）而是指長期的經濟停滯（secular）。資本主義在上世紀二〇年代末進入危機，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從危機中走出來。之後，資本主義經過了在戰後二十多年的繁榮，到了七〇年代初又進入了戰後的危機。既使在戰後的二十多年的繁榮中，還是有景氣上下的波動，即所謂經濟循環。我們可以將這樣在長期的繁榮中的經濟蕭條（recession）看成像上面所說的必要的調整，而這樣的調整是有助於經濟從蕭條中復甦（recovery）。在三〇年代的長期經濟危機中也會有景氣上下的波動，同樣的日本從九〇年代初進入了長期的經濟停滯，在這長達十四年的危機中，日本的國民總生產在有些年中也有正成長。

資本主義短期的調節性的經濟循環比較容易瞭解，但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會陷入長期的經濟停滯呢？換句話來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會產生危機的原因是什麼？有關資本主義的危機理論有很多人承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去做研究，但是要將這些解釋危機理論去做整理和分析則是這本書無法做到的。一來因為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二來是因為這不是寫這本書的目的。但是我認為還是可以根據我粗淺的瞭解做非常簡短的說明。

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來自資本主義內涵（inherent）而不是來自外部（external）的這個樣的想法應該是可以同意的。據我的瞭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矛盾是危機不可避

免的原因。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生產資料為私人所有，但是生產是社會性的。資本之成為資本有它一定的屬性，那就是資本只有在進入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剝削關係中，資本才能獲取剩餘價值。但是如果生產或擴大再生產出來的商品不能賣出去，剩餘價值就不能實現成利潤，資本就不能增值，就產生資本積累的困難。資本積累的困難如果經過短期調整而不能解決的話，資本主義就會進入危機。

這樣的解釋還是不能說明資本主義下危機的必然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認為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直到危機到來之前，資本家看不到市場的限制（或者他們看到但必須忽視這個限制）而繼續的投資來擴張生產設備。在生產設備的擴張中，資本家繼續研發更能增加勞動效率的技術，更進一步投資於節省勞動力的自動化的機器，以便解雇更多的勞工。因此，在危機到來之前，生產設備的擴張並不會因為到那時已經逐漸飽和的市場而緩慢下來。直等到生產設備的產能大量超過了市場的需求，投資必須要停止，或者到了東西積壓的太多賣不出去，資金無法周轉，企業必須要破產，大批企業破產時危機就開始了（Simon Clarke, 1994: 17-19）。

每當一個新的產品上市時，這個產品的市場都會加倍的增長或以數倍甚至十倍或數十倍的速度增長，新的投資不斷的投入這個新產業，直到這個產業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達到飽和甚至超過了飽和，但是投資還是不能停止。十九世紀末到經濟大恐慌開始的一段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到了上世紀二〇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大國都存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在這一章和後面幾章的分析中我就用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為經濟危機發生時的現象，產能過剩的程度也就是危機輕重的指標。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繼英國之後，得到快速的發展。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英、美、德、日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得到蓬勃的發展。在這幾十年中，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雖然因為生產過剩而經歷了調整性的蕭條，但是它們的國民生產和所得持續了長期的增長，資本因此得以順利的積累。但在這個持續成長的過程中，也就醞釀了從 1929 到 1941 年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

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的二〇年代，資本主義在工業生產上有許多技術的創新和新的產品，技術的創新和新的產品帶來了新的投資機會。電的發明取代了用水力和蒸汽來啟動機器，因此大量的資本投入新的機器設備。鐵路的發明和建造有同樣的效果。而且新的機器和鐵路的鐵軌、火車的車頭和車廂都需要鋼鐵，又再進一步推動了鋼鐵業的技術革新和新的投資。二十世紀初，從汽車發明到大規模生產，僅在十幾年之內，幾十家汽車公司就從平地上建了起來，速度之快是極為驚人的。汽車業的發展也更進一步帶動了鋼鐵業，也帶動了橡膠業、煉油業、公路的修建等。

二十世紀初工業的擴張又與銀行信用的擴張相關聯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金本位，在金本位下，貨幣的流通量和銀行的信貸受一國的黃金儲存量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資本主義歐洲大國一方面靠國家大量舉債來支付戰爭的經費，另一方面用黃金向美國購買戰爭所需要的物資，它們最後不得不放棄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在金本位之後，國家的貨幣和信貸要靠中央銀行來限制。但是靠黃金儲存量的限制和靠中央銀行的限制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在後面幾章中還要作說明。這裡要說明的一點是資本主義在上個世紀二〇年代的擴張與世界主要

資本主義國家信貸的擴張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在 Richard Duncan 所寫的《美元的危機》(*The Dollar Crisis*) 中，他說明了美國因為對歐洲出口的增加使得國內黃金的儲存量增加，因此可以在 1914 年到 1920 年之間的信貸加倍。信貸的擴張也就引起了生產的擴張。他認為金融信貸的增加是生產性投資快速增加的原因。在這七年內，美國工業生產性的機器設備產量增加了 205%，若包括所有的生產性的設備在內，它的總和增加了 275%。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金融信貸的擴張和由新投資而增加的生產設備的產能之間的關係 (Duncan, 2003: 57)。

這裡用美國汽車業的發展來看汽車如何在大規模生產開始後僅十幾年的功夫就面臨到市場飽和。美國的汽車業發展從二十世紀初開始，1908 年福特汽車公司開始生產 T 模型的汽車時，還是小規模的用大量手工操作的生產。但是福特從開始就致力於以降低成本和車價來擴大汽車的消費市場。1908 年時，福特只賣了一萬輛 T 模型汽車 (Rae, 1985: 34)。1914 年，福特為了增加生產效率，在底特律城附近的 Highland Park 建了新廠採用了流水線的方式生產。新的生產技術使生產能夠精確化和標準化，是流水線的生產的先決條件。在資方的控制下，流水線的操作生產不但可以持續不斷，而且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增加了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勞動效率 (Rae, 1985: 35)。汽車的生產成本不但因為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下降，而且流水線的生產減少了在資方生產中對工資較高的技術工人的依賴，原來技術工人的工作被工資低的非技術工人取代，就更進一步降低了成本。生產成本下降使得汽車可以降價銷售，也因此擴大了汽車的市場需求和生產規模。汽車的生產就在技術革新、生產效率提高、汽車降價、汽車市場擴張、生產規模擴大、新投資和更新的技術的發展中快速增

長。T 模型汽車的生產在六年之內，就從一萬輛增加到二十五萬輛。

福特汽車公司是二十世紀初大規模生產（mass production）的代表。福特從一開始就著眼於發展世界市場，除了在加拿大設廠外，1911 年和 1913 年，分別在英國和法國建了汽車裝備廠，其後福特汽車更將生產擴張到其它歐洲國家。二〇年代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追隨在福特之後，也進入歐洲市場；福特則進一步擴建到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南非、亞洲（印度、馬來亞、日本）和澳洲；三〇年代時，福特也在蘇聯投資設立了兩家工廠（Rae, 1985: 69–70）。

到了二〇年代中，美國汽車大規模的生產，更進一步降低了汽車的價格，一部 T 模型的汽車只賣兩百九十美元（Rae, 1985: 59）。再加上低價的汽油，和剛設立起來的消費者分期付款的辦法，更加鼓勵了汽車的銷售。美國政府也在全國各地修建適合汽車行走的公路。到了 1929 年時，美國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有私人汽車（Rae, 1985: 59）。到這時美國國內汽車的市場已經擴充到了頂峰，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已經大量超過汽車的總需求。² 福特公司為了與通用公司競爭，推出新的 A 模型汽車，但是這時許多福特汽車的零售代理商已經因為汽車賣不出去而倒閉。美國汽車的總銷售量從 1929 年的五百五十萬輛降到 1932 年的一百五十萬輛（Rae, 1985: 74）。在大小公司和銀行破產、大批工人失業、工資下降、農業蕭條、大多數人連維持生活都很困難的情

2. 雖然汽車的價格不到三百元，但是工人的收入一年才一千多美元，大多數的工人都買不起汽車，工人都坐公車去上工。八〇年代來福特在墨西哥的工廠的停車場停了管理階層的高級轎車和工人坐的大公車。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也一樣。

況下，當然也更談不上購買汽車。1932年福特將他最大的紅河汽車廠（在Dearborn的River Rouge）停產，解雇了工人。在這前後，已經有許多小汽車公司倒閉，大批汽車工廠停止生產直接影響到與汽車相關的產業。在紅河廠停止生產後，福特、通用和其他汽車公司的大量生產設備都停止了生產，閒置在旁。

如果只是一個或兩個產業有閒置的剩餘產能，問題尚不會很嚴重，如果所有的產業都存在著剩餘的產能，那麼問題就大了。到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時，在美國和世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中，各種工業產業都存在著大量的剩餘產能，農業生產也大量過剩，經濟大恐慌就從金融危機的爆發開始了。

從生產危機到金融危機

前面已經討論過生產與金融之間的關係，這裡再對生產危機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加以說明。瞭解了生產危機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將有助於我們瞭解羅斯福的新政改革，和戰後七〇年代初開始的經濟危機。上面談過資本主義在短期的經濟循環中，過剩的生產設備，要經過一段蕭條時期，將剩餘的生產設備產能銷毀後才能再重新開始投資。在經濟蕭條開始時，企業所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就得先將勞工解雇，工人沒有工作不是企業主的問題，但是問題再嚴重下去，企業就可能付不出欠債，企業所欠的本金和利息長久不能按時償還，企業就要被迫破產。

在1929年之前，小型企業早就開始破產，接著大型企業也跟著破產，這已經顯示出大量的剩餘產能問題不是經過短期的經濟蕭條就可以解決。大批企業不斷的破產，他們向銀行借的債就不能還，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是它們的資產，當許多企業不能還債

時，銀行也必然要倒閉。企業破產後，它的股票也就成了廢紙。除了這些生產性危機會引起金融危機外，還有投機的因素，到了二〇年代中股票價格不斷上升時，股票投機就開始了。這時不只是有餘錢的個人參與股票投機，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像銀行也被股票價格幾個月就翻一翻的獲暴利機會所吸引，把錢不斷地投入股票。股票市場的大氣泡吹起來後，氣泡要破是必然的，只是時間而已。而且氣泡越大，氣泡爆了之後的殘局也就越難收拾。到了1929年美國股票崩盤，金融危機就開始了。在1930年到1933年之間，美國平均每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在經濟大恐慌中美國的銀行中三分之一破產。這是到那時為止，美國所經歷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金融危機又與生產的危機相互關聯著。

第二節 經濟大恐慌與古典經濟學派

在經濟大恐慌之前，當經濟進入蕭條時，資本家賺不到錢，工人失業，國家不採取相應的對策。當時經濟學派主流的古典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蕭條有自動的調節能力。在經濟衰退時，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家和商人就會自動向低調價，使價格下降而把積存商品賣出去。工人失業就會自動調低工資，直到工資低到資本家願意增雇工人，而使失業消失。古典經濟學認為利率決定於儲蓄和投資，而經濟蕭條的原因之一是投資不足，他們認為在投資不足時，利率會因儲蓄增加（也就是消費減低）和投資減少而降低。利率下降會給資本家增加投資誘因，投資的增加將會導致經濟的復原。

因此古典學派認為價格、工資、和利率這三個受供求決定的

變數會使經濟再度回到平衡。但是這個過程要經過一段時間，經濟重新恢復到平衡需要幾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古典學派認為經濟蕭條時是經濟不平衡，而市場力量可以使它恢復平衡。古典學派理論認為平衡是常態，不平衡是暫時的，因此從不平衡必然會再回到平衡，只是時間問題。在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前，除了非主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會不時出現危機外，對主流的古典學派來說，經濟會有上下的起伏，當經濟下降而達不到平衡時，市場的力量可以使它重新恢復平衡，所以對古典學派來說經濟循環或危機不是一個議題。他們信任市場調節的能力，不主張國家干涉經濟。

經濟大恐慌從 1929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全面開始才結束。大戰開始之後，資本主義大國的軍火和軍用物資的生產使得本來閒置的生產設備得以充分利用，失業的勞動人口重新獲得就業機會，這才結束了這次持久性的經濟大恐慌。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不但是到那時為止影響最深和波及最廣的經濟危機，也是第一次不靠政治力量積極地和直接地干涉，不能恢復起來的經濟危機。經過了經濟大恐慌，人們不再相信古典學派所講的經濟會自己恢復的分析。其實，說不定再過二十年，等所有多餘的生產設備都銷毀之後，投資又將開始。但是以當時政治的情勢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人沒飯吃就要造反了，美國共產黨組織了失業的工人進行反失業、反飢餓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經發生動搖。這時美國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提出他上台後將要做的改革，他在 1932 年大選中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為美國總統。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二年中，因為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新的投資幾乎停止，因此資本積累無法進行。在這次經濟危機之前，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國家也沒有直接參與對經濟的干預，而經濟

是靠市場自身的調節而恢復的。但是在這次大恐慌久久不能結束時，國家不得不用政治的力量對經濟直接加以干涉。

第三節 羅斯福的新政政策與資本主義重整

羅斯福總統在 1932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次年就職後，他就趕忙經由國會通過一系列干預經濟的新政政策（New Deal）。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政策是資產階級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用政治力量通過政策所做的各種調整。新政政策致力於調節生產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和用法律對資本作各種的限制。

新政中有一些項目是通過立法來縮減生產。當時工業生產已經因為企業大批破產或停產而大幅下降，無需再靠國家來調整。農業生產方面，1933 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來減少生產。政府大規模銷毀了已經種好的棉花，並將幾十萬頭小豬活埋。這樣做是用減少產量的辦法，來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在經濟大恐慌時，農產品生產大量過剩，農產品價格降到不夠農民的生產成本，因此農民不能繼續生產。但是即使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再低，城市裡失業的工人還是買不起。另外使用農產品的工業（像紡織業）蕭條，即使棉花的價格再低銷售量還是不會增加。因此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問題沒有辦法靠市場價格的調節而解決。市場的調節要通過一個調整的過程，在生產過多時，一些農民會破產，這樣生產就會減少。在景氣比較恢復後，工人找到工作有了收入，也就會有購買力，因此需求會增加。但是在經濟大恐慌時的供求失調是極嚴重的，而且不是只限於農業的，因此沒有辦法可以單靠市場調節而

得到解決（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的問題到今天也還是要靠政府來解決）。所以羅斯福新政用政治的力量來減少生產，以便解決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民無法生活的問題。

除了限制生產之外，新政政策也用國家力量來增加市場需求。聯邦政府設置了一些給失業人安排就業的設施，其中包括由政府出錢雇人去做一般謀利企業不願做的事，譬如到鄉村去保護自然環境，將鄉村電氣化等。年輕人沒有工作生活得不到解決，政府安排他們去農村工作，除了管他們吃住外，並發給他們少量的工資，這些人就把拿到的錢寄回家去供他們的家人生活。政府也出錢去修建一些較大的工程，像水壩、公路一類的公共工程。聯邦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還拿錢去發展一些藝術和戲劇的活動，使這些找不到工作的藝人有收入和購買力。

羅斯福瞭解貧富不均均是市場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經濟大恐慌前的幾十年，產業工人（特別是佔工人中大多數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沒有隨著大規模生產而增加，因此工人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購買在大規模生產下生產出來的大批商品。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工作關係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也稱瓦哥納法案 Wagner Act）。這個法案承認工人組織工會的合法性。羅斯福是個明智的、有遠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他看到美國工會運動早已在各產業中展開，尤其在經濟大恐慌中，失業的工人在反失業、反飢餓的鬥爭中組織了起來。羅斯福認識到工會運動是一股阻擋不住的力量，因此推出這項法案在國會中通過。國家工作關係法案通過後，削減了資本家抵制組織工會的力量，許多產業工會相繼成立。羅斯福一方面看到工人階級與資本之間的鬥爭會繼續，也看到如果能將這鬥爭引入到法律範圍內進行，將有利於統治階級。他也看到工會可以代表工人爭取

工資和福利，因此可提高市場需求，有助於經濟從危機中復甦。羅斯福瞭解美國在二〇年代經濟發展到了頂峰時，社會的所得與財富兩極分化。他看到極端的貧富懸殊，不但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增加了社會的不安，也無助於經濟的復甦。羅斯福更藉助於加強使用累進所得稅來減低貧富之間的差距，以便利於總消費的擴張。

在貨幣和金融政策上，羅斯福首先取消金本位，以便使貨幣流通量擴張不受黃金儲存量的限制。他認識到只有在貨幣量與黃金脫勾之後，才有可能由中央銀行來調節貨幣流通量。之後，他就著手整頓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在 1929 年股票市場崩盤後，一般人對股票市場和銀行失去信心，他們爭先恐後地要取出他們在銀行的存款，銀行不能兌現，只好停止營業或宣佈破產。從 1930 年到 1933 年中，每一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1933 年羅斯福著手對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進行改革。他首先宣佈將所有銀行停止營業。銀行停業後，必須經過審核程序，審核不合格的銀行必須破產，只有通過審核的銀行才被准許重新開業。重新開業的銀行由國家保證他們的支付能力。1933 年又通過緊急銀行法案，這法案賦予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即美國的中央銀行）更大調整貨幣政策權力。在一般商業銀行發生困難時，聯邦準備銀行可以用貸款來支持他們。接著又通過國會立法，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稱 FDIC）來保證銀行存款安全。這些由國家對金融機構管制和支持的政策使一般人對銀行恢復了信心，使銀行恢復了正常存款和借貸的功能。

三〇年代的經濟危機雖然不是因為股票市場崩盤而引起的，但是 1929 年股票市場因瘋狂投機價格飛飆之後而崩盤，使金融

市場陷入嚴重的危機。所以在羅斯福新政中股票市場的改革也是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在改革中國家用法律來限制金融資本的投機，並設立了國家證券委員會（Federal Stock Exchange Commission）。用國家的力量對股票投機加以限制並對金融市場加以管制。譬如，股票價格可以在崩盤之前大幅上漲的原因之一，是買股票的人只需要支付股票價格的一部分，其餘部分則由銀行貸款。所以一個人用一萬元可能可以買五萬元或更多的股票，自己付一萬，其餘四萬用股票作抵押向銀行借。這種情況在股票漲價時沒有問題，但是在股票跌價時，只要跌幅接近 20% 時，銀行就要逼債了。持有股票的負債者不得不將股票出售，大家一起出售股票就一定不會不停的往下跌。羅斯福新政中，國家對這樣的貸款加以限制。

新政中對金融和銀行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是將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分開。在經濟大恐慌中，許多銀行倒閉是因為他們所持有的產業公司股票跌價而引起的。1933 年通過的 Glass-Steagall Act 禁止銀行擁有股票，原因是避免銀行的安全受到股票波動的影響。因為商業銀行的支票存款就同現鈔一樣是貨幣，若是銀行不穩定，人們將對他們所持的支票存款（也就是貨幣）失去信心，將會造成經濟的混亂和社會的不安。

上面花了很多篇幅來敘述新政中的金融改革，但是這些對金融危機預防的措施在八〇年代之後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下被放鬆和取消了。在本書的第七章中可以看到這種對銀行的限制到了九〇年代末時已經被取消了，有關近年來美國取消金融管制和與其相關聯的問題在後面還要作詳細的討論。

從三〇年代資本主義陷入最深和最久的危機時開始，資產階級的總代表——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就開始積極的用政治的

力量來協助資本積累。羅斯福的新政政策可以說是戰後資本積累的策略代表。同樣的，到了七〇年代初，當資本主義陷入了戰後第一次危機時，由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柴契爾帶頭又換了另一套協助資本積累的新策略，那就是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協助壟斷資本「全球化」的新積累的策略。

v.s. Max 生產面 (生產過剩)

第四節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與政策

↳ 需求面 (政府創造有效需求)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是在經濟大恐慌時提出的，但是他的經濟政策則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具體付諸實行。上面曾提過資本主義到了經濟大恐慌時，經濟已經無法依靠市場機制的自行調整而恢復正常運作。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就是說明這個事實，他並根據這個理論提出了調整經濟的對策，因此凱恩斯對挽救資本主義做出很大的貢獻。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各資本主義大國執政者看出這個政策有助於當時的資本積累，他們全面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並將他的政策付諸實行。

這裡討論凱恩斯的理論與政策有幾種意義：第一是要說明到了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須要由政治的干涉來解決，凱恩斯的政策就是對經濟做政治干涉的政策。第二是在我們瞭解凱恩斯的政策後，可以探討凱恩斯的政策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就是本章一開始提到的戰後的資本主義是否因為實行凱恩斯政策而產生了質變。第三是為了評價在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再度進入危機後，凱恩斯政策是否對經濟的恢復仍然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像對凱恩斯政策在九〇年代日本使用功效的評價。

1936年當全世界經濟仍然陷於嚴重的危機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著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出版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了對古典經濟學派的批判，他的理論分析了危機的原因，並提出應付經濟危機的政策。

理論部分

凱恩斯認為到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進入壟斷階段，因此它的市場調節機制已經失去在競爭階段時對經濟危機所能產生的自我調節的能力。從1929年經濟大恐慌開始到1936年他的通論出版時，已經過了七年的時間，但經濟並沒有像古典經濟學家所說的靠市場力量恢復起來。古典學派認為可依賴的價格、工資、和利率的市場調節機制已經失靈。所以在經濟大恐慌時，雖然價格和工資大幅下降，但商品仍然賣不出去。工人的工資不斷下降，但是工人還是繼續失業。利率下降和大批企業破產，但是因為存在著大批剩餘的生產設備情況下，利率即使再低也不能提起資本家投資的興趣。面對經濟長期陷入因總需求不足而無法繼續生產的危機，凱恩斯提出了他的有關危機的理論。

凱恩斯在他的書中提出對古典學派批判，以及論述他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新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但會發生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這樣的矛盾也不能藉市場的調節而得到解決。他不同意古典學派所說的經濟蕭條（不充分就業）是一種不平衡狀態，而經濟會由自身的調節從不平衡再恢復到平衡（充分就業）。他認為經濟蕭條也是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經濟可以長期停留在這個蕭條狀態中，而經濟本身並沒有可

以自蕭條中走出來的機制。凱恩斯解釋經濟蕭條的原因是相對於市場總供給來說，總需求不足，只要需求不足，商品就賣不出去生產就必須停頓。市場機制並沒有能力可以解決因總需求不足，而多餘出來的生產設備和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口。而只要多餘的生產設備仍然存在，資本家就不會投資。他有力地反駁了古典學派，並且解釋了市場缺少從蕭條平衡中走出來的機制。

凱恩斯把社會總支出（需求）分為三部分（暫時不管出口部分）：購買消費品的支出（需求），購買生產設備的支出（需求），和國家財政的支出（需求）。這三項總支出不一定等於社會充分就業下的總生產。往往支出總合是少於充分就業下的社會總生產。如果我們暫且不管國家財政的支出（因為那時國家財政的收入和財政的支出基本上是平衡的，也就是說收入與支出彼此抵消），既使工人的工資都用來買消費品，資本家的收入也不可能全部用做消費，他們收入中一部分會變成儲蓄。這部分儲蓄如果放著不用的話，或者不全部用來投資，就會發生總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總需求上有一個缺口（demand gap，相等於儲蓄大過投資部分），這個缺口就使得生產的總合不能全部賣出。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社會的儲蓄會被資本家拿去購買生產設備，作為生產設備的支出就又回到流通領域變成總需求的一部分。但是這部分做為購買生產設備的投資支出不一定會實現的，要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和利率的高低而定。如果沒有好的投資機會，或者因為利率太高而減少投資的淨盈餘，這部分支出就不會實現，或者只會部分實現，也就是說投資小於儲蓄。這樣的話，總需求相對總生產來說還是有一個缺口。

直到經濟大恐慌開始之前，在資本主義主流學派中還沒有人對古典學派論點提出質疑和修正。到了三〇年代初，經濟陷於極

端蕭條，一點也沒有復甦的跡象。此時古典學派理論失去對經濟現象解釋的能力。凱恩斯書的出版對古典學派提出了挑戰，凱恩斯不認為市場有調節的能力可以使經濟從蕭條的平衡中走出來。

經濟有了總需求缺口，就會使生產出來的東西有一部分賣不出去，這時資本家就會減少生產和解雇工人，工人失業後，他們消費支出會隨著減少，那就會使總需求更進一步降低。因此就成了跟前面所說的良性循環相反的惡性循環。凱恩斯不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內在機制可以幫助經濟復原。凱恩斯也不認為商品價格、工資、和利率可以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矛盾。而且，他也不認為利率高低是由儲蓄和投資來決定。凱恩斯的貨幣理論提出利率並不是像古典學派所說的決定於儲蓄和投資，他認為利率是決定於貨幣的供給和貨幣的需求。

根據他的經濟危機的理論，凱恩斯提出了相對應的政策，凱恩斯的政策又可分為國內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政策。

國內經濟政策

凱恩斯認為到了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已經不再有內在的自我調節能力，他提出了解救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政策。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面，他認為國家可以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矛盾。

在財政政策方面，凱恩斯認為既然國家財政支出是總支出的一部分，國家就可以擴大它的支出（像增加公共建設支出或者發給失業工人生活上的補助），以便補足因投資不足而造成的總支出的缺口，或者國家也可以用減稅的方法來鼓勵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減少企業的稅收可以刺激企業投資，或減少所得稅可以鼓

勵一般家庭多購買消費品。因此，凱恩斯要國家放棄經濟大恐慌之前必須平衡財政收支的一貫作法。事實上，根據凱恩斯理論，國家在經濟衰退時應該刻意用赤字支出來補足總支出不足的部分，以便使經濟恢復，這就是凱恩斯所提倡的財政政策。

凱恩斯認為中央銀行也可以用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用貨幣供給量的增減來調節利率，用利率間接來影響經濟。在經濟不景氣時，中央銀行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調低利率，低利率可能增加企業用借款來投資的誘因，有可能刺激企業投資於生產設備，也可能鼓勵消費者增加消費品（特別是像汽車或其他耐久性消費品需要用貸款來買）的需求，這就是凱恩斯的貨幣政策。不過與財政政策相比較，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是比較消極的和被動的。因為低利率只能給資本家投資的誘因，或鼓勵消費者多買東西，但是卻無法強制他們一定要增加支出，而財政政策是更直接的，國家可以按需求不足的缺口，用國家支出來補足。

另外，凱恩斯也從另一方面提出貨幣政策的侷限性。凱恩斯所說的貨幣的需求是來自人們都需要在手邊有些隨時都可以用的現金或者（與現金差不多的）支票存款。但是如果儲蓄的利率高的話，一般人就會考慮多放點錢在銀行的儲蓄帳戶裡，手邊少留一點現金（或少存一點在隨時都可以用的支票帳戶裡）。所以貨幣的需求與利率成反比，因此中央銀行可以用增加貨幣供給量來將利率調低。但是當利率低到一個程度以後，像降到 1% 或更低，人們就不再在乎因為手邊多留點現金而損失的利息了。到了這時，中央銀行即使再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也不再下降。凱恩斯稱這種現象為 liquidity trap。

羅斯福並不是拜讀了凱恩斯的理論，才開始實行他的新政策，他的新政在他就職不久就開始了，凱恩斯的書在那之後幾年

才出版。羅斯福是看到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威脅到資產階級的存亡，必須要用全力來拯救。凱恩斯當然是贊成羅斯福的新政政策，他只是認為羅斯福做的還不夠，所以到了1941年美國參戰的前夕，美國的失業率仍然接近10%。

拜然和思惟茲（Paul Baran and Paul A. Sweezy）是美國的兩位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用一些數字來說明羅斯福新政並沒有能使美國經濟復甦的原因。以1966年貨幣值來計算，美國國家支出從1929年的一百零二億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億美元，增加70%。而國民所得在同一時期，從一千零四十四億美元降到九百一十一億美元。失業率從3.2%，增加到17.2%（Baran and Sweezy, 1966: 160）。倒是二次大戰鉅額軍事支出使國家支出從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億美元，增加到1941年的一千零三十一億美元，接近1939年的六倍。失業從17.2%降低到1.2%（Baran and Sweezy, 1966: 161）。拜然和思惟茲認為羅斯福新政支出增加幅度太小，不足以刺激經濟恢復。

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資產階級的學界或政界人物都看到大量的國家支出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其實不管是什麼原因使國家增加開支，只要開支來得大，就能解決問題。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經濟在國家計畫統籌下，極為有效率的將荒廢和閒置的生產設備充分利用來生產軍事武器，也生產了戰時美國國內以及援外的民生物資。頓時之間，失業消失了。美國南方農村的剩餘人口又開始向北方的工業大城移民，就好像二十世紀初的大好日子又重新到來一樣。

凱恩斯的理論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證實。從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時代開始，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像早期在經濟不景氣時，經由企業破產而銷毀了多餘的生產設備，以此來紓解生產與

需求之間的矛盾。因此古典學派認為經濟會自己恢復，不需要國家直接干涉，也成了過去。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他所提出的經濟政策是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的產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大量的軍事支出使荒廢了的生產設備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大量的失業人口充分就業。大戰結束後，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论與政策就從旁枝變成了主流。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與政策在經濟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下壽終正寢了。當時又有誰能預料，到了八〇年代，這具殭屍的魂卻又被招了回來呢？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一套政策不就是借古典學派的屍體還魂嗎？為什麼曾經大紅大紫過的凱恩斯政策卻又從資產階級經濟主流中消失了呢？這些在後面幾章中再做討論。

國際經濟政策

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歐美資本主義大國因為國內市場飽和，它們的資本家在世界市場上展開極強烈的競爭。之後，更進而演變到了惡性的競爭地步。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市場而抵制進口。它們一方面用進口限額和提高進口關稅，以便抵制外國商品進入本國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們相爭將本國的貨幣貶值，以便降低出口價格，藉此來增加出口。這樣的作法都是因為本國市場需求不足，使得大量閒置著的生產設備不能充分利用，而生產下降更帶來了嚴重的失業問題。1930年美國通過的 Smoot-Hawley Act 將進口關稅提到歷史新高。歐洲各國也爭相將進口關稅提高，也就更使世界貿易進入激烈的爭奪戰。但這樣的作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在貨幣相爭的貶值中造成了匯率的一片紊亂，阻礙了貿易正常進行。各國用進口限額與關稅壁

壘來阻止進口。這些作法使得所有國家的出口都發生困難，以致導致貿易幾乎停頓。據統計，全世界貿易總額在這期間下降了三分之二（Zeiler, 1992: 3）。商品貿易的停滯，更進一步加深了經濟危機。同時，市場的競爭又促使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形成不同的貿易集團，集團內部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優惠，以便抵制集團外國家的競爭。集團之間的經濟利益衝突逐漸上升為政治與軍事的衝突，第二次大戰從而爆發。

凱恩斯在國際經濟政策上就是為了解決並預防像經濟大恐慌時國與國的貿易衝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就提出英國與法國不應該要戰敗的德國支付重大的賠償費。凱恩斯瞭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大國之間的經濟是互相關聯的，如果德國要支付賠償，它必須要盡量增加輸出和減少輸入，這樣就會減少英國和法國對德國的輸出。英國和法國當政者那時沒有採納凱恩斯的減免德國賠償的建議，後來歷史的發展證明凱恩斯是正確的。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後，經濟上遭受了很大的困難，經濟上的困難跟後來希特勒用法西斯的狹隘民族主義來號召民眾，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相關聯的。

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和他的國際經濟政策是相關聯的，他看到經濟大恐慌時各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互不相讓，反而使得貿易停頓，世界經濟因此陷入更深的危機中。他因此認為戰後的經濟繁榮與穩定必須要建立在各資本主義大國的合作上。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包括了上面解釋過的貨幣政策，他的貨幣政策的核心就是中央銀行可以控制貨幣的流通量，使貨幣的流通量適合經濟成長的需要。貨幣的流通量如果太充沛的話，可能造成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上漲，如果貨幣流通量相對於經濟成長上的需要不足時，就可能造成經濟蕭條。因此中央銀行要知道如何

適當的調節貨幣流通量。與此同理，凱恩斯看到國際貿易所依賴的交換媒介也需要有一定的彈性。

從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1870-1914），世界各國的幣制是金本位。它們國內的貨幣流通量是由國家的黃金儲備來決定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也是用黃金做為交換的媒介和計算單位。在金本位下，貿易量要受黃金量的限制。在金本位下，各國的中央銀行將本國貨幣的幣值與黃金設立一個不變的匯率，並且允許黃金可以自由進口和出口，然後中央銀行就不作干預，由市場去調節。

在金本位下，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要維持固定的匯率。譬如，在某一國內，中央銀行維持一兩黃金相等於一百元的匯率。如果這個國家在貿易上出超，它收到的黃金會大過於它支出的黃金，因此它國內的黃金儲備就會增加。隨著黃金儲備增加，國內的貨幣發行量也會增加。在其它的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國的物價會因為貨幣流通量的增加而上升。因為中央銀行維持固定匯率，所以出口價格（以黃金和外幣計）也會上升，而出口價格上升，將不利於出口。另一方面，進口價格（以本國貨幣計）則會相對的比較便宜。在本國物價上升之後，本來一百元可以買到的東西，現在要賣一百一十元。但是用黃金買的進口商品價格卻是不變，因此與本國商品相比較，進口價格此時會較低，因此鼓勵進口。從出口因為價格上升而減少，進口因為價格下降而增加，而重新達到貿易上的平衡。在金本位下，各國的中央根據本國的黃金儲備來發行貨幣，並維持本國貨幣與黃金的固定匯率，各國之間貿易不平衡就可以從國與國之間黃金的自由流動，和各國之內物價的變動調整過來，因此不會有長期的、持久的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存在。

但是在金本位下，一方面，本國的貨幣供給和物價要受黃金儲備數量的影響，如果黃金儲備不變，貨幣流通量也不變，物價就會穩定。在黃金儲備因貿易上的順差或逆差而增加或減少時，物價也就會有上下的波動。不僅如此，如果一個國家在貿易上有大量的逆差，這個國家的黃金必須要大量流出，相連帶的是本國貨幣供給量大量縮減，就因此會導致本國的經濟蕭條，直到經濟蕭條到一個程度，物價下跌到一個程度，才能在貿易上再取得平衡，和本國的經濟再度恢復。因此貿易上的不平衡會引起本國經濟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的總額也要受黃金的總數量的限制，國際貿易只有在黃金總數額增加時才有可能擴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的國家就用發行紙鈔來支付軍事支出，金本位制也就崩潰了。前面已經說過到了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各國都相爭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因此固定匯率沒有辦法維持。

凱恩斯看到經濟大恐慌時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所造成的損害，他深深瞭解國際貿易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他因此認為戰後資本主義大國的恢復與重建必須要建立在彼此之間合作的基礎上。他也瞭解金本位制度要靠本國經濟上的調整來達到貿易的平衡，和金本位對貿易擴張上的限制。凱恩斯因此提出了為資本主義戰後恢復繁榮的國際經濟政策。他所提的政策並非憑空從腦子裡想出來的，而是在他總結了幾十年資本主義發展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案。

在國內的經濟政策中，凱恩斯已經建立了貨幣的發行量要與黃金脫勾的理論，他的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根據本國經濟上的需要來調節貨幣發行量的多少，藉此來調節利率的高低。凱恩斯認為在國際間也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只是需要創造一個世界性

的貨幣和一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世界性貨幣量的多少可以由這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決定，不必再受黃金的限制，這就是凱恩斯所策劃出來的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

凱恩斯認識到在這個新的制度下，一個國家還是會有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在這個新制度下，當一個國家的貿易發生逆差時，它將不必再經過像金本位下國內經濟的調整。但是這個國家還是得要支付貿易的逆差，如果它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不夠支付，它可以向世界的中央銀行借款，等到貿易出超時，有了外匯儲備時再歸還。

凱恩斯所構想的國際經濟政策在戰後部分實現了。他理論中的世界中央銀行就是 1944 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在準備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時，他提出用 Bancor 做為世界貨幣，但是被美國的代表否決了。在新的國際金融體制下，美元變成了世界貨幣。這些發展對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將在第四章中作解釋和說明。

這一章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在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也談到羅斯福新政的實施穩定了經濟危機中美國的社會。羅斯福的新政並沒有能把美國從經濟大恐慌中救了出來，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需求才使美國重新恢復生產和就業。這一章也分析了在經濟大恐慌中，因為經濟久久不能復原而使古典經濟學的理论失信於人，並且討論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他的國內與國際經濟政策。凱恩斯的政策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被所有資本主義的執政者付諸實行，他的國內與國外經濟政策對戰後經濟繁榮的影響是正面的，但是也同時製造出別的問題。這些將在第六章中做解釋和說明。

第三章

戰後前二十年資本主義大國的重建與繁榮

從 1945 年到 1946 年的幾次經罷工所達成的協議，就成了戰後相當長一段日子裡工會與資方彼此互相對待的模式。一方面工會證明了雖然資方心不甘情不願，但是它們有力量來為工人爭取到相當可觀的工資調升。另一方面，大企業也證明它們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資後將它們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在價格提高後，資方不但補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資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漲。

Steve Babson, *Working Detroit*

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繁榮。這二十多年的發展，使得在經濟大恐慌時，對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垂死階段的預測失信於人。在這經濟繁榮的期間，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實施了凱恩斯的經濟政策，維持了經濟穩定的成長，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很多。戰後這一段日子的繁榮使得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的結構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成了過去。因此，如果我們要瞭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危機的必然性，則有必要去認識這一段歷史，去瞭解資本主義能夠持續二十多年繁榮的原因。這一段日子裡在經濟穩定成長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設立了一套社會福利制度，這套福利制度給予一般公民生活上基本的

保障。這些保障雖然在過去二十年來，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政策解體，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段日子證明了資本主義是可以經過改革，而變得不那麼殘酷，有可能成為一個有人性的完美制度。更有人對「福利國家」中的階級融合留戀不已，誤認只要有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顧及所有階級的利益。這一章就以這一段歷史對這些問題做解釋。

第一節 剩餘生產設備的銷毀與戰後的重建

為什麼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二十多年的時光資本主義可以在美國、西歐和日本快速發展？為什麼這些國家不但從經濟大恐慌和世界大戰中恢復起來，而且能在經濟繁榮中，達到充分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提高？主流經濟學家中的凱恩斯學派，把這二十多年的發展歸功於這些國家的政府靈活應用了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他們說凱恩斯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減輕了也縮短了經濟蕭條。他們也將這一段的繁榮歸功於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在戰後得以付諸實現。因為在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下，各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商品和資本得以通暢流動，也就進一步助長了經濟的繁榮。但是資本主義戰後的經濟繁榮倒底是不是凱恩斯經濟政策實施的成功？如果凱恩斯的經濟政策有如此大的力量和效果，那麼為什麼到了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再一次陷入危機時，再到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後，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和蔓延後，凱恩斯的政策卻不管用了呢？當我們瞭解戰後這二十年的歷史後，我們就可以對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做出正確的評估。

我認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經過二十年的繁榮的最重

要原因是戰後這一段日子不存在著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世界資本主義所有的剩餘生產設備在十一年的經濟大恐慌，和五年的世界大戰中都被完全的、徹底的銷毀了。因此，所有的各產業都待發展，都存在著極好的新投資機會，資本在沒有剩餘產能的憂慮下，快速的進入生產，使得經濟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成長和擴張。

經濟大恐慌與戰爭銷毀剩餘生產設備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餘年中，美國和歐洲國家有很大的一批企業破產，並且在這些年中，新的投資很少，有些年新投資甚至不足更換被廢除了的舊的生產設備。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物資都用於與戰爭相關的生產中，沒有多餘的物資可以投向生產設備的更新。在大戰中，西歐國家和日本所有的工業生產設備都被戰爭摧毀了。戰時飛機的襲擊更炸毀了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中的海港和道路等基本建設。在資本主義大國中，美國是唯一沒有遭受到戰爭災害的國家，但是它的生產設備因為多年沒有足夠的投資來翻新，所以大部分都已經老舊。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西歐一些國家、日本和美國的大量軍事支出解決了經濟大恐慌時的生產過剩問題，曾經閒置的生產設備在戰爭中得以充分利用。大量的人力資源都被徵調去作戰。沒有參加戰爭的人也在忙著支援戰爭的生產，更要有許多人不斷的被徵召去替換死亡的和受傷的士兵，人力只有不夠，沒有失業問題。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各大國的軍事支出大量減少，但是美國、西歐各國和後來的日本經濟繼續維持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繁榮。為什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從戰時政府的大量軍事支

出，縮減到平時的財政支出，卻能保持如此久的繁榮？

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得以充分的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這二十年中沒有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問題。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從經濟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十六年中，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不但沒有增加新的生產設備。而且在戰爭中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生產設備被銷毀了，美國的生產設備因為長久沒有新的投資而陳舊了，因此解決了在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中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大戰結束後，西歐國家和日本不但在戰爭中被銷毀的機器廠房有待重建，而且許多道路、橋樑、海港都待整修。美國也急待更新它的生產設備。這些都給資本提供了新投資的機會，使得資本積累得以順利進行。

歐洲與日本戰後重建供給美國的投資機會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管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急於從戰爭的廢墟中重建它們的經濟。西歐各國和日本不僅要重建它們的重工業，它們也要重建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同時這些國家也必須要重建在戰爭中被摧毀的基本建設。

在西歐各國的重建中美國給予它們大量的援助。美國援助西歐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高達一百四十億美元，是美國到那時為止對外最龐大的經濟援助。這筆援助使西歐國家得到它們所需的外匯，可以用來從美國進口它們在重建中所需要的物資和它們所急需的民生物資。美國的出口也因此隨著歐洲的重建而大量增加，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經濟。馬歇爾計畫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援助歐洲重建它們的基本建設，因此幫助美國擴大對歐洲的出口，而且美國的營造建築公司因為馬歇爾計畫也接下了許多大

筆的重建歐洲的生意。

到了五〇年代底六〇年代初，西歐的幾個資本主義大國不但恢復了生產，而且因為新的投資和新的技術使它們的產能超過了戰前。在這個重建的過程中，美國和歐洲資本在新投資機會下順利的迅速積累。

到了五〇年代底，日本戰後生產不但完全恢復而且超過了戰前。日本戰後的重建與它從美國獲得大量經濟支援和美國對日本的經濟政策有密切的關係。從 1946 年到 1952 年，美國對日本的援助總共達二十一億美元。在美國佔據日本時，它對日本的政策上是對日本經濟加以限制，算是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處罰。但是到冷戰開始時，這種情況就完全改變了。美國將日本納入「自由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環，鼓勵日本在經濟上取得自立。在韓戰時，日本成為美國在太平洋中一個重要的物資供給地。

美國前聯邦儲備銀行理事會長 Paul Volcker 和日本的前財政部長 Toyoo Gyohten 合著的一本書：《財富的轉變》（*Changing Fortunes*）於 1992 年出版，在書中他們特別談到美國經濟援助對日本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韓戰開始時，美國之前對日本的二十一億美元的龐大經濟援助到了尾期，在韓戰期間以及韓戰結束後的幾年中（1951–1955）日本又從美國得到三十五億美元的援助（Paul Volcker and Toyoo Gyohten, 1992: 49）。除了直接經濟援助外，日本還從美國取得貸款，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給日本四億零五百萬美元，做為給日本向美國購買農產品和飛機等之用（Paul Volcker and Toyoo Gyohten, 1992: 54）；因此美國對日本的援助與它對歐洲的援助對它本國的經濟同樣的產生了刺激的作用。1952 年，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1952 年到 1957 年之間，日本又從基金借了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1961 年時，日本又再向

基金借了三億五千萬美元；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再向三個美國商業銀行借了兩億美元。Volcker 和 Gyohten 認為外來（主要來自美國）的資本對日本戰後經濟快速發展有直接關係。日本在發展戰後經濟時，各種產業都急待投資，也就是說各產業都存在著很好的投資機會，美國對日本的援助不但幫助了日本的發展，也增加了美國對日本的出口，進一步刺激了它本國的生產和投資。

美國對日本在經濟上的援助是與日本在美蘇冷戰中所處的地位分不開的。在美蘇的冷戰中，美國在亞洲需要有日本這個政治上的夥伴。因此，美國對日本實行了有利於日本獨立發展的經濟政策，其中包括美國的經濟援助和鼓勵日本發展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在國際市場上美國不積極與日本競爭，也就是說，日本可以用保護貿易政策來建設它的幾個具有關鍵性的工業。在戰爭剛結束的幾年中，日本的貿易上還有很大逆差，失業率很高，工業基礎薄弱。從 1947 年開始，日本被允許恢復正常貿易之後，日本採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用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來促進日本製造業的發展。五〇年代初時，日本製造業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直到五〇年底，日本在貿易上都還存在著逆差。

美國在戰後的前十幾年中，能夠對日本實行這樣的扶植性的經濟政策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當時世界尚不存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廣大的市場。到了七〇年代時，世界生產設備的產能開始過剩後，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就有很大的轉變。到了八〇年代世界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時，在各資本主義大國激烈的市場爭奪之下，美國對本國市場開始了帶有攻擊性的防衛，它用各種辦法來打擊日本對美國貿易上的出超（參見附錄一）。到了蘇聯解體之後，冷戰的威脅沒有了，美國就不再需要日本這個夥伴的支持。因此在政治上美國對日本特殊待遇

的原因也就不存在了。日本經過戰後前一階段的發展，建立起以它為中心的帝國勢力範圍，並且要繼續擴張它的勢力，美國就只有在各方面進一步抵制日本的發展。

第二節 由美國國內市場的擴張所帶來的新投資機會

美國在大戰中沒有受到任何破壞，它的工業生產反而因為戰爭物資需求而大量增加，使得在經濟大恐慌時多餘的生產設備和剩餘的勞動人口得到充分的利用。在二次大戰中，美國在經濟大恐慌中荒廢著的消費品生產設備被改為生產軍用品。汽車廠被改造用來生產大砲、坦克、和飛機。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政府的大量軍事支出刺激了生產，美國政府用國家的力量來計畫和調節戰時生產，並對物價和工資實行管制。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戰時的軍用品生產設備很快的又回到消費品的生產，但是這些生產設備都已經陳舊，因為從 1929 年到 1945 年的十六年中，新的投資量非常少，因此 1945 年時，各個產業都存在著為了更新設備的新投資機會。同時美國人民在戰爭中因為就業機會多，又沒有耐久性的消費品可買（因為重要工業都轉移生產軍用品），再加上政府在大戰中鼓勵購買國家的戰爭公債來增加儲蓄，所以工人和中層收入家庭都有一些儲蓄，這些積存購買力也是後來消費品的市場擴張的基礎。

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中心從歐洲移向美國。美國經濟的好或壞，對全世界都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美國在戰後的經濟繁榮除了因為更新設備的新投資

機會之外，更因為戰後兩個工業大規模的擴張，一個是汽車工業，另一個是軍事工業。這兩個工業的擴張更帶動了與它們相關聯的工業，它們對戰後美國經濟的繁榮有很大的貢獻。

都市郊區化與汽車工業

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在經濟大恐慌時多餘的汽車生產設備轉換成軍事生產。大戰結束後美國的汽車工廠又很快的恢復生產民用汽車。在生產恢復中，新投資進入生產，生產規模擴張，產量增加很快。美國的汽車生產不但佔據了全世界市場，而且福特和通用這兩家公司在其它國家的汽車生產中，也佔很重要地位。到 1950 年時，在大戰結束僅僅五年後，世界汽車生產總合為一千零五十萬輛，比經濟大恐慌前生產最高峰增加了一倍。在全世界的汽車生產中，美國佔 80%。五〇年代初，美國汽車進口僅佔它國內市場的 0.5% (Rae, 1985: 119)。在大戰剛結束後的十年中，美國在經濟上獨稱一霸，沒有其它國家可以同它競爭，汽車業當然也不例外。

五〇年代之後美國汽車業的發展與它的都市郊區化有密切的關聯。都市郊區化是指都市的工業、人口、商業、和學校等從市區搬移到城市周圍的郊區。如果沒有都市郊區化的發展，汽車業繼續擴張將會受到銷售量的限制而發生困難。美國的都市郊區化不但帶動了汽車業也帶動了公路的修建和建築業。汽車業大規模的擴張又帶動了鋼鐵業、機械業、石油業、橡膠業、玻璃等工業，因此製造了更多的新投資機會。大量購買汽車也帶動了汽車零售業、汽車維修業和保險等服務業。到了六〇年代，美國就業人口中，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與汽車業有關的行業中工作。

公路的修建和建築業的擴張又帶動了鋼鐵、水泥等各種建材。因此，大規模的郊區化給經濟創造了新投資和就業的機會。

美國戰後都市郊區化是在它的聯邦政府的幾項政策下完成的。一項是聯邦政府修建公路，美國跨州公路（Interstate Highway）的建設是戰後一項極重要的刺激經濟的政府措施。美國戰後汽車業的發展和美國城市郊區的建設都跟美國戰後聯邦政府修建貫通各州之間的公路有密切的關係。1956年美國國會通過跨州公路法案（Interstate Highway Act），這個法案核准聯邦政府用汽油稅和公路使用費來修建通達各州的公路。當時興建這個自南到北從東到西的跨州公路系統是以軍事上的需要為理由的；在修建跨州公路的幾年中，在全國各州都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這個長達五萬哩的跨州公路系統完工後，使得各州之間的交通和商品的運輸通暢，降低了商品運輸的成本，同時也便利了原來在城市內的工業搬移去郊區。

另一項聯邦政府的政策：保證廉價石油的供給。而美國能維持廉價的石油是因為它從石油生產國家進口大量的廉價石油，這又跟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和軍事上佔有絕對的、優勢的霸權地位分不開。美國用它的霸權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干涉中東石油生產國家，以便保證廉價石油的供給；美國對伊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干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53年伊朗的總理墨罕墨德·莫塞帝（Mohamad Mosadegh）將伊朗的石油所有權國有化，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失去了它們在伊朗的油田，美國出兵把莫塞帝趕下台，迎回伊朗的夏王朝（SHAH），美國全力支持 Mohammed Reza Shah 這個大獨裁。夏保障了美、英的石油利益。他在美國的保護下，對伊朗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殘殺；從1953年直到1979年夏被推翻的二十多年中，美國賣給伊朗一百八十億美元

的武器。¹

再一項聯邦政府的政策就是聯邦政府對購買新房屋的補貼。在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有不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and 政治學家開始憂慮，他們擔心美國經濟一旦從戰時生產恢復到平時生產，政府的軍事支出縮減後，是否又會產生像經濟大恐慌時生產過剩的問題。他們也憂慮大批在外面作戰的士兵回來以後的就業問題。為解決退伍軍人失業問題，美國政府通過退伍軍人法案（American Government Issue Bill of Rights，簡稱 GI Bill）。這個法案給退伍軍人各種福利，其中包括購買房屋的優利貸款，和大學學費減免等。退伍軍人法案中的學費減免是美國大戰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房屋的優利貸款使得退伍軍人有能力購買房屋，促成都市郊區化的進展，也從而帶動了整個建築業的繁榮，又給戰後資本積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機會。

除了上例的幾項政策外，美國戰後的交通政策除了大量修建公路外，就是刻意的不去發展公共交通。美國政府在大汽車公司、大石油公司、建築業和一切與汽車業相關的產業的影響下，它的交通政策不但不協助公共交通的發展，就是連戰前建立起來的市內公共交通也加速的被淘汰，以便有利於汽車業的發展。因此，美國大多數城市和郊區都缺少公共交通，到哪裡都要藉助私人汽車。

美國高速度工業化是從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八十多年中完成的。工業化的初期運輸主要是靠水運，後來靠鐵

1. 這一段歷史見 Moaddel, Mansoor, State-Centered vs. Class-Centered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ase of U. S. and British Participation in the 1953 Coup Against Premier Mosaddeq in Ir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mmer 1989, vol 24, no.2, 3-23.

路，所以在工業化中，美國的工業都集中在位於水運和鐵路運輸要道的城市裡。美國的幾個大工業城都是在這一段日子興建的。

到了六〇年代，跨州公路修建完畢後，公路運輸取代了水運和鐵路，工廠也就因此陸續不斷的移向郊區。郊區的土地價格低，新的公路便利了郊區的運輸；新工廠的興建又給投資提供了大好機會，隨著工廠的移遷，工人和一般小市民（除了黑人被歧視不准搬入新建的白人社區外）也搬到郊區；這樣大規模的遷移又刺激了住宅、辦公室、學校、新成立的地方政府、購物中心、飯館、戲院和其它商店等的興建，因此從公路的興建進一步帶動了建築業、營造業，更進一步刺激了新投資。購買新屋也增加了房地產業和房屋保險業的生意。美國都市郊區化使得它的城市在戰後幾十年中完全改觀。美國戰後公路的修建和郊區的發展又再進一步刺激了汽車業。在戰後這一段日子裡，因為沒有公共交通，郊區和市區的居民不論是去工作或是去購物都要依靠汽車為交通工具，私人汽車從奢侈品變成必須品；美國的汽車年生產從1930年的三百四十萬輛（戰前的最高產量）增加到1965年的一千一百餘輛，是1930年時的三倍（Rae, 1985: 180-181）。

美國戰後都市郊區化擴大了國內市場的需求，這裡要指出的是像這樣因為郊區化而來的汽車業和建築業的擴張，和這兩個產業擴張所帶來的繁榮是不可能不斷地以同速度持續下去的。不管汽車對一個家庭多麼重要，一個家庭從沒有汽車到擁有一輛汽車，再到擁有兩輛汽車或三輛，但不可能繼續增加下去；汽車的需求也就會從成倍的增加，到非常緩慢的增加。在第六章中，我們將可以看出在汽車市場需求的增加速度減慢時（不是需求減少，只是增加的速度減慢），汽車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就又重新出現。同樣的道理，都市郊區化擴張到市區的幾十哩以外後，就

必須會要停止，而不可能無止境的擴張。我們若只從都市郊區化這一項發展來看，就不難瞭解為什麼美國戰後的經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快速的發展起來，又為什麼這樣的發展在二十年後速度就會減慢下來。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於其它國家。

在這二十年中，美國有過幾次短期的經濟蕭條，短期的經濟蕭條可以在凱恩斯的擴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下得到緩和。但是我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戰後的繁榮是靠凱恩斯的政策刺激起來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了七〇年代初，戰後的各種大量的新投資機會不再存在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也就無法使經濟恢復。這一點後面和第六章中還要再談到。

軍火工業

美國的軍火工業對它戰後的繁榮有獨特的貢獻。美國總統艾森豪在 1961 年他去職的前幾天發表了一篇演說，在這篇演說裡他談到在韓戰後美國第一次有了永久性的軍火工業；他說在那之前，美國戰時所用的武器都是由平時的一般工業來製造的。就像前面所說的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汽車和其它生產耐久消費品的工業在戰時改成生產飛機、坦克和大炮。他說以美國戰後在世界上的地位來說，有一個永久性的軍火工業是有必要的（艾森豪所說的「必要的」是指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已經開始了），但是他提醒國人說：「這個軍火工業目前已經相當的龐大，美國每年用在軍火上的開支已經與它所有營利公司的淨所得相等」。艾森豪在這篇演說中第一個提出軍事和工業的結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這個用辭。他並警告這個龐大的軍事和工業的結合體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對國家產生負面的影響。艾森豪這樣一個軍人背景

的資產階級領導者有如此的智慧和遠見在他之後的美國總統中就少見了。²

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的軍事開支僅佔國民總生產的 1%，到了 1960 年代美國每年的軍事支出已經高升到國民總生產的 10%，這是個不得了的龐大數字。果然不出艾森豪所料，美國的軍火工業在政治上的影響隨著它的軍事國防預算而增加。美國的軍火工業、五角大廈的國防部、及國會中的國防預算委員會形成了一個利益謀合的鐵三角。退了伍的將軍和退休的國會參眾議員被軍火公司請去做它們的顧問，這些顧問不斷的向國會遊說來增加國防預算。在這個鐵三角中彼此牽連的關係中將美國的國防預算不斷的擴大，影響著美國戰後的軍事和外交政策。

在冷戰中美國的軍備與蘇聯競爭，但是在「自由世界」中美國佔有獨霸的地位，在軍火工業上它不會受到德國或日本的競爭，而且軍火的生產與一般商品生產不同；一般商品的生產總是要和使用價值掛鉤，即使是沒有什麼使用價值的商品，也得要創造出一種想像的使用價值出來。像今天的廣告業可以推銷「感覺」，「感覺」是看不見，也摸不到的主觀的東西，但是廣告就可以讓人產生非要買這個商品的「感覺」藉著它來推銷商品。軍火工業的生產不需要有市場需求，只需要國家的國防預算，就可以盡量生產，不怕賣不出去，而且還可以出口，若是生產的太多，打仗和出口後，也還有多餘，過一段日子以後，就可以用武器技術已經過時為理由將它廢掉，甚至廢掉了的過時軍火還是可以出口，就像最近美國一定要台灣買它過了時的軍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 這裡只單獨的就這一件事來看，並沒有對艾森豪褒獎的意思。在艾森豪任內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橫行是美國歷史上黑暗的年代。

美國這位有智慧的艾森豪總統卻沒有看到軍火工業對美國戰後經濟繁榮的貢獻。軍火工業不像其它工業它不存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它不必發愁它的產品沒有市場的問題。只要國會批准了預算就行了，在預算中用 cost-plus 來保證了軍火生產公司的利潤。而且美國所有武器的生產最終的價格都是超過預算的好幾倍，因此保證了 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Boeing Company、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 等大軍火公司的高額利潤。另外軍火工業藉助於國家支持的龐大研究經費來從事研發，又給美國的電腦工業帶來先進的技術，這樣大規模的研發是其它國家無法相比的，是美國在這方面技術領先的主要原因。美國的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對它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的貢獻是艾森豪在 1961 年時很難想像和預料的。

第三節 日本戰後發展與剩餘產能

日本政府在戰後用進口關稅、進口限額和限制外資來保護它本國的工業發展。並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植它本國資本的成長。這樣的政策使日本在工業生產上和技術發展上都獲得很大成果。在保護貿易之下，日本建立起它的鋼鐵、石化、汽車、人造纖維和電子等基礎工業。到五〇年代底，也就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後，日本的出口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1950 年時，日本紡織品出口還佔總出口的 50%，機械器材出口僅佔總出口的 10%。二十年之後，紡織品在總出口中的比重降到 12%，機械器材出口則上升到 46%。1959 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第一次取得順差。1960 年時，日本政府開始取消貿易和外匯管制（Volcker and

Gyohten, 1992: 50–51)。到 1963 年 8 月時，日本取消很多項進口限額，使日本進口的自由化的程度達到 92%，也就是說日本戰後經過了近二十年的保護貿易政策後，才將貿易自由化，並逐步開放它的國內市場；到 1964 年時，日本取消了經常帳上的管制，日元可以自由兌換，並且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正式成為已發展國家中的一員（Volcker and Gyohten, 1992: 56）。

在貿易上，日本政府除了除了保護它工業的發展外，它也採取保護本國農業生產的政策。雖然日本的農業在整個經濟中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但日本在大戰結束之後，還有 40% 的勞動人口從事農業生產。在保護貿易下，日本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提高了農民的收入。農民收入的增加，擴充了對國內工業產品的市場需求。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本經濟快速發展，資本積累順利進行。

到六〇年代中時，資本主義大國的生產設備再度過剩明顯化，它們之間的市場競爭加劇，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來越嚴重，由國際貨幣基金維持的固定匯率已經非常不穩定；在此時日本在貿易上仍然維持順差，因此日本的貿易順差開始變成國際貿易上和金融上的一個重要爭議。六〇年代中時，日本外匯存底還都只在二十億美元以下，只相等於它兩個半月進口額，到六〇年代底，由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定匯率開始解體時，日本已經是一個工業強國。

從這戰後的歷史看來，就像前面所說的，美國從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中對日本的經濟政策除了政治上的考慮外，主要也是因為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大國內尚不存在著大量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這種情況到了六〇年代底就開始改變了；因此日本戰後經

濟的發展除了因為它在十九世紀明治維新後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日本在戰前就已經有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之外，就是它和美國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的關係，以及大戰後前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的大環境。

日本在美國援助之下，用國家的力量來策劃它的工業發展策略。日本通商產業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代表國內資本的總體利益，在它的指導下日本制定發展工業的計畫。在經濟發展中，國家直接參與的範圍包括：通商產業省首先決定一個時期內優先發展的產業，然後在資本上和在技術上給予私人資本各方面的援助。除了國家的援助外，日本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有緊密的結合。資本雄厚的大銀行可以支持設立在它們之下的大型公司。一般來說，當一個企業進入新產業或發展新產品的一段日子內，不但不能獲得利潤，而且很多時候還會虧損。因此，在這一段日子內，政府和銀行給予企業的長期融資支持就很重要。日本為了在技術上取得獨立發展，它的政府協助私人企業從國外購買新技術的專利權，再將技術轉讓給私人公司。日本政府對外來投資採取嚴格限制的政策來保護本國資本，它對外來投資的核准是根據此項投資是否有利於它本國長期發展來決定的。

在國家的協助下，日本從發展輕工業開始再進一步發展重工業，之後再發展高科技的工業。日本認識到它本國的市場過小，如果它只靠本國市場則不能獲得由大規模生產所達成降低成本的有利條件（economies of scale）。要大規模生產它必須能將產品出口，因此，日本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從一開始就以與美歐各國資本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為目標。

到了五〇年代中，日本輕工業的發展就已經很有成果，這時

在紡織業生產上美國已經受到日本的挑戰。1956年時，美國為了要保護它的紡織業就開始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但是這時美國所施的壓力與七〇年代之後相比算是很輕微的。當年美國國會通過一條法律，授權給總統使他可以主動用談判方式來限制紡織產品的進口。1957年時，在美國要求談判之前，日本就先趕快自動限制此後五年對美國出口的紡織品（Keesing and Wolf, 1980: 15; Yoffie, 1981: 575）。

日本在戰後僅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它的工業就趕上甚至超過美、歐，這是二十世紀用進口替代策略發展資本主義最成功的例子。日本的經濟在1953年到1973年間每年上漲8%，但是戰後日本成功的發展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相當大的麻煩，我們可以從日本的成功中觀察到幾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

我們看到與美、歐相比，日本是個較後發展起來的經濟強國。就像前面所說的，日本在策劃產業的發展時，就以它的產業能在世界市場上與美歐國家的產業競爭為目標。因此，它在生產技術上、在產品設計上、在生產成本上、在生產規模上的各種決定都以這個大目標為準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產品的質量要好、生產技術要高、成本要低；為了成本低，一方面生產的規模要大，另一方面勞動報酬要低。日本工人的工資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以生產效率來計，比美國和西歐國家都要低，再加上國家鼓勵儲蓄的政策，所以國民儲蓄率高，國民儲蓄率高是經濟發展中的好事，但是在生產力快速下，低工資和高儲蓄就造成供需之間嚴重的不平衡。

因此日本戰後的發展雖然是個成功的例子，但是對整個資本主義來說，就使得七〇年代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日本國內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它必須得將商品出口；到了七〇

年代中以後，在全世界產能都過剩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就必須要抵制日本的出口。日本戰後的發展正是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矛盾。日本、美國、和歐洲的壟斷資本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時，就必須要再進一步提高技術，再進一步擴張生產規模，也就使生產設備的產能更加過剩。日本的資本家與美歐的資本家相比，更為勤奮，更為盡職，他們所製造的產能過剩的問題也更大。

日本能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用進口替代發展資本主義成功是因為它當時具備了內在的和外在的特殊條件，內在的條件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就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在的條件是日本在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體系中，佔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就是上面所說的美國從五〇年代冷戰開始後，它需要在亞洲有一個能與它合作且又能由它控制的政治夥伴，在這個前提下，美國不但容納而且鼓勵日本發展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美國不但允許日本在貿易上的保護政策，並且給日本很多經濟援助；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時，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大國尚不存在嚴重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而日本成功的、快速的發展使得自六〇年代後世界性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

第四節 資本主義大國的繁榮與「福利國家」

凱恩斯政策與「福利國家」

二次大戰是英、美、法等資產階級國家打著爭民權、爭民主、反納粹極權的旗號而得勝的。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了五千萬人，也摧毀了大量的生產設備，但是也對戰後的新世界次序起了

催生的作用。戰後中國的革命成功，十幾個前殖民地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取得獨立，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和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和許多非洲國家。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堅定的要從列強的控制中獨立。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是世界反極權和反壓迫鬥爭的繼續。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歐洲在大戰剛結束時，一般人民中間存在著相當強烈的反美的情緒，他們羨慕東歐國家人民在生活上所享有的保障，也就是因此，西歐國家的民主社會黨才受到選民的支持。英國的工黨首先在 1945 年的選舉中得勝，這都表示出人們不要再回到戰前經濟大恐慌時代毫無保障的生活。「福利國家」是在這樣的大形勢下統治階級的政治響應。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執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他們看到戰時國家大量支出使經濟得以復甦，從經濟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中取得教訓，認識到國家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的重要性。上面討論過，雖然在戰爭結束後的前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的繁榮主要不是靠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但是國家靈活的應用凱恩斯政策，對縮短和減輕經濟循環中的蕭條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有助於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的積累，在順利積累中，資本進一步擴大和集中，並且向外擴張；以美國為基地的大型企業首先大規模向外擴張，繼它們之後，以歐洲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企業也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後向外擴張。

從大戰結束直到六〇年代底的二十多年中，西歐各國的國民所得的實質年成長率一直都維持在 3% 以上。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效率在新建的生產設備下增長很快。在經濟快速成長下，西歐國家可以達成充分就業；在充分就業下，工資上升，勞動人

口生活水平提高。在西歐國家和美國，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國家進入了社會福利的領域。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的領域，像早在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化時，最殘酷無情的社會中，也都有所謂貧窮法（Poor Law）之類的救濟。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要增值必須要能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私人資本家在經濟蕭條時，可以將工人解雇，但是失業的工人還是得有一條活路；同時人若真活不下去，就要起以來造反，社會也就不可能安定。在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美國的社會到了革命的邊緣，是羅斯福新政對資本做了一些必要的限制，對勞工給予一定的保障，才挽救了資本主義。

在戰後這一段時期，國家設立起許多有利於大眾的社會福利，所以被稱為「福利國家」，也有人把這樣「福利國家」的設施看成一種資本積累方式，並命名為「福特式（Fordism）的資本積累」。這些人認為這種資本積累的方式代表著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時，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可以達成一種獨特的組合，使資本、國家、和工會聯合來協調生產，並且與消費相配合，在這個組合下便利資本積累順利地進行（Harrey, 1990: 第八章）。贊成這樣的資本積累方式的政治家，主要是歐洲的民主社會黨和美國的民主黨的成員。他們認為這樣的積累方式可以避免資本主義重新回到經濟大恐慌時供給超過需求，而產生的嚴重的不平衡，進而導致生產必須停頓，資本積累必須終止。³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常常懷念戰後前二十多年的一段日子，他們看到在國家的干涉和參與下，資本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在「福利國家」的政策下，人們可以免去自由市場中最殘酷

3. 有關福特主義與後福特主義在台灣的討論見：趙剛，2001: 54-70。

的鞭策，資本在國家管制下不能為所欲為，人民生活上的一般基本的需要得到了保障；因此，殘酷的資本主義終於有了它仁慈的一面（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

我們有必要去瞭解戰後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不管是「福利國家」或是「福特式的資本積累」都不只是存在於空想的或只是概念的範疇，而是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福利國家」曾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改革可以遵循的一個模式，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瞭解為什麼「福利國家」在戰後的一段時間內有可能實現，但是到了七〇年代初之後，資本主義危機再度出現時，這種形式的資本積累就不能再繼續。在此之後，美國和西歐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經過了全面重整。當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戰後危機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裡，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上都起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將在第六章中加以說明。

「福利國家」、政治鬥爭、與資本積累

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的二十年中，表面看來在美國和西歐出現了一片繁榮的社會，沒有被注意到的是在五〇年代的美國，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正在進行著，美國的左派在這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最殘酷的浩劫。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因為即使在戰後的繁榮和安定的背後卻隱著激烈的階級鬥爭。只有對階級鬥爭進一步瞭解，我們才能看清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

在大戰的幾年中，美國的工會接受了政府的凍結工資和不罷工的規定來支持戰爭。戰爭結束後，美國的工會領袖看到英國工黨的勝利，也重整旗鼓準備用新的策略來爭取戰後生產恢復成果

中的一份。1945年，美國汽車工會（UAW）提出工會在戰後對經濟繁榮將會做出積極的貢獻。汽車工會的主席 Richard Frankenstein 認為社會購買力一定要隨著生產的增加而擴大，否則生產出來的商品沒有足夠的市場，又要回到大恐慌時代生產過剩的問題。他認為資方一定要提高工人的工資，但是他指出如果在提高工資的同時，汽車公司將汽車加價，工人還是沒有足夠的購買力來買汽車。Frankenstein 代表汽車工會要求資方將工資增加 30%，但不許汽車公司將汽車加價的要求，這時美國商務部部長 Henry Wallace（當年羅斯福政府內閣中的勞工部長），亦站在工人這邊說汽車公司即使將工人的工資增加 25%，同時維持汽車價格不變，也還可以賺得利潤。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美國全國各地大批工人為了爭取工資和解決許多不合理的工廠規則而參加了罷工。僅在當年 9 月和 10 月兩個月中，底特律城就有八萬五千人罷工，到了當年 11 月時，汽車工會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談判破裂，汽車工會的二十二萬五千會員在 80% 的贊成票中通過罷工；除了汽車工人罷工外，電氣工人、屠宰廠的工人、和鋼鐵工人也跟著罷工。到了次年 1 月，罷工人數增加到一百六十萬人；在 1946 年中，又有煤礦工人、鐵路工人、教師、公共事業工人和市政府工人總共四百五十萬工人罷工，達到美國歷史上罷工人數的最高點。這些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來補償他們在大戰中所作的犧牲，以及戰後因物價上漲而導致的實質工資下降（Babson, 1984: 128-129）。

汽車工會工人的罷工堅持了一百十三天，到 1946 年 3 月才結束。汽車工會與通用汽車公司達成協議，工會原來要求每小時工資增加一角九分半，並且要求汽車不漲價。在談判中，資方認為工資可以在商談中決定，但是汽車加價與否的決定是屬於資方

管理的權力範圍，工會無權過問。談判僵持了很久，在這期間，許多罷工的工人生活發生困難，有不少工人因為付不出房屋貸款，而接到銀行即將把房屋收回的通知，也有好些人因為欠交水電費而被停水、斷電。在這樣工會會員生活上的壓力下，工會只好與資方達成協議。工會與通用公司所簽的合同中，工資每小時增加一角八分，合同中就不再提汽車加價與否的事。罷工結束兩個月後，通用就將車價提高⁴（Babson, 1984: 130）。

美國工運歷史學家 Steve Babson 對這次的罷工和所達成的協議有這樣的評價，他說：「從 1945 年到 1946 年的幾次罷工所達成的協議，就成了戰後相當長一段日子工會與資方彼此互相對待的模式。一方面工會證明了雖然資方心不甘情不願，但是他們有力量來為工人爭取到相當可觀的工資的增加；另一方面，大企業也證明它們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資後將它們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提高。在價格提高後，資方不但補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資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漲」（Babson, 1984: 130）。

Babson 還說在戰後的十年中即使物價不斷上漲，汽車的需求還是不斷的增加。在汽車生產不斷的擴張中利潤跟著上升。在戰後的十年中，通用公司的利潤遙遙領先，每年投資的利潤率高達 125%。在這經濟繁榮的十年中，底特律汽車工人的生活改善很多，他們的實質工資比十年前增加了 40%。除了工資增加外，工會工人的福利也增加了很多，其中包括退休金、醫藥保險、人壽保險、傷殘保險、每年可享有的病假和年假也不斷的增加。另外，在後來的合同中又加入了失業補貼金，除國家的失業救濟金外，工人可享有長達一年的失業補助，使他們在失業時，

4. 通用汽車公司將車價每輛提高八十美元。

每月的失業救濟金和失業的補助金的總合相等於工資的 95%。在由工會代表與資方集體的談判中，工人的工作環境也有改善。在工會工人的福利和工資不斷上漲中，工人提高了消費，消費的提高又進一步幫助了戰後的繁榮。

但是 Babson 也說在這戰後的十年中，失業和貧窮並沒有消失，像在 1958 年經濟蕭條時，全國失業率接近 7%，底特律的失業率高達 17%。在美國北部城市裡的貧民區和在南部的農村中的許多人長年都沒有工作，過著貧困的生活（Babson, 1984: 131-133）。

1946 年，美國的共和黨在十六年後，再一次控制國會，反共的保守派開始了一連串的立法來打擊新政時期留下來的比較有進步性的立法。麥卡錫和尼克森在 1945 年到 1957 年間，利用國會非美國活動委員會的名義展開了對左派大規模的政治清算和鎮壓。他們打擊工會的領袖、教師、公務員、進步的知識分子，甚至有進步思想的好萊塢製片人。這個非美國活動委員會沒有證據的把許多進步人士打擊成顛覆分子，使得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失去工作。這些人的朋友被迫與他們劃清界線，使他們不但在經濟上發生困難，而且在精神上也飽受折磨，在孤立的生活中奮鬥掙扎。

1945 年到 1946 年間罷工的規模之大，超出美國資產階級執政者的意料，因此他們趕忙籌劃對策。通用汽車工人罷工剛結束一個星期，杜魯門總統就提出一個對付未來罷工的提案。這個提案要求國會給總統制止罷工的權力，在工人不肯結束罷工時，總統有權將徵召罷工的工人並送到軍隊去。雖然這個提案後來沒有送去國會，但 1947 年時，國會通過一個專門對付工會的勞工法叫 Taft-Hartley Act。這個法案被杜魯門否決之後，國會以三分

之二多數票通過。Taft-Hartley Act 中規定所有同情罷工工人而採取的支持罷工的行動全屬非法（其中包括支持罷工的示威和抵制非工會工人生產的商品）。不僅如此，在這條法律下，州政府可以各自通過法律來反對工人組織工會。美國當政者認識到美國共產黨在工會運動中的影響力，所以這條新勞工法還規定所有在工會有職位的人必須要宣誓他們不是共產黨的黨員。這樣的規定是為了要剷除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力。

二十世紀初，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這時的工會運動是以組織非技術的產業工人為主。從一開始，美國共產黨就是組織產業工人工會的主要推動力量。在各產業工人工會成立時，它們的領導人中很多都是共產黨員。各產業工人工會組成它們的總工會（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簡稱 CIO）。CIO 在政治主張上要比技術工人工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簡稱 AFL）要進步，也比較能從工人階級長遠利益著眼。在經濟大恐慌時，共產黨組織了失業工人，領導他們做政治鬥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在 Taft-Hartley Act 和麥卡錫用非美國活動委員會的配合下，美國的左派受了嚴重的政治打擊。工會開除了一百萬在工會有職位的共產黨員，清除了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從此之後，CIO 的各種做法就越來越與 AFL 難有區別。之後，AFL 與 CIO 合併，美國工會停止了在體制之外的政治鬥爭。在體制內工人沒有政黨，在政治上，工會依附在民主黨之下。在選舉中工會為民主黨爭選票，民主黨則支持較有利於工會的立法做為交換。

這樣的發展與後來工會支持美國對外侵略戰爭，包括工會對美國的韓國與越南的侵略戰爭，以及工會支持美國在國外的一切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美國總工會並與中央情報調查局

合作來滲透和顛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會運動。此後，美國工會停止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鬥爭，全心致力於爭取工會會員的經濟利益，不去考慮工會會員以外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工人工資和福利的增加的確有助於美國戰後國內市場的擴張和經濟的成長，說明了福特主義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隨著工資的上漲，資本也就進一步加速提高自動化的生產技術，減少工會的會員。工會的力量也就從五〇年代後逐漸式微，隨著自動化的改革和製造業在整個經濟中比例的下降，工會人數總額不斷下降。到了八〇年代時，美國工會已經喪失了抵擋來自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力量的攻擊。

在美國戰後的二十多年中，工人的生活確有很大的改善，這樣的改善也有助於經濟的繁榮。但是一方面這樣的改善並不是來自資本家的恩惠。在這些年中，美國的國民所得和財產的分配比較平均，但這並不是資產階級國家站在中立的立場主持公正的結果。就像上面所說的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瞭解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美國戰後的繁榮和安定的背後隱藏著激烈的階級鬥爭，而「福利國家」政策是階級鬥爭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工資和福利的上漲威脅到資本的利潤，到了七〇年代因生產設備再度過剩而使競爭更為激烈後，資本必須要考慮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

資產階級國家的基本任務是協助資本順利進行積累。它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有利於資本進行積累的相應政策。經濟大恐慌時的羅斯福新政，戰後前期的「福利國家」政策，和八〇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都是當時資本積累的特殊需要與社會階級鬥爭的產物。「福利國家」的政策並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國家的基本任務。資產階級國家可以靈活的從「福利國家」的政策轉變到新自由主義政策，是響應了新情勢的需要。

第五節 三〇年代改革對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對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在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戰後第一次危機時，主流經濟學界一般都認為戰後的經濟結構經過了徹底的改變，因此像經濟大恐慌時那麼大規模的、那麼深的、和那麼持久的危機不會再發生。這樣的說法正確嗎？到底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政策對戰後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什麼影響？資本主義的結構發生了什麼變化？三〇年代的改革有沒有解決第二章開頭所講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二次大戰之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在經濟景氣稍差時，國家就用增加財政支出和減少稅收的財政政策來擴張社會總需求。中央銀行也會用增加貨幣供給量來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和降低利率，以便刺激投資。由凱恩斯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政治上的干預，使得戰後循環性的經濟蕭條幅度要比沒有政治干預來得小，蕭條的時間也較短。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因為政治上的干預，而使得循環性的經濟蕭條沒有能發展到底。第二章中曾解釋過在資本主義的運轉中，週期性的經濟蕭條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積極作用的。因為在蕭條中一部分剩餘產能會被銷毀，給未來的新投資創造了機會。但是當國家用凱恩斯的經濟政策進行干預時，使得經濟蕭條不能發展到底，也就是說蕭條的程度不夠深，時間也不夠長，因此破產的企業就要比沒有干預來得少。許多企業可以勉強撐過難關，等到景氣稍好後又可以重新恢復經營了。如果在每一次經濟蕭條時，政府都用政策來干預，許多剩餘的產能都沒有能在每幾

年一次的蕭條中經過較徹底的大清除，剩餘的產能就會堆積起來而且越堆越多，問題也就越嚴重，到了一定程度，就非要大清理一番才行。因此，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雖然對經濟有正面的幫助，但是也有它的後遺症。

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對戰後的影響也是非常的大，他所提出的國際貨幣雖然沒有被採納，但是他還是同意了用國際貨幣基金做世界的中央銀行，用美元做為世界貨幣。凱恩斯沒有能預見1973年固定匯率解體，和在那之後到今天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的混亂和經濟的危機。今天我們要瞭解壟斷資本「全球化」背後的動力，我們就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有深入的瞭解。七〇年代初，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後，資本主義所經歷的危機將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詳細談到。

羅斯福的新政證明了：工人聯合起來組織工會，用集體的力量跟資本家談判，對資本主義整體來說不是件壞事。對各別資本家來說，成本雖然提高了，但是工人在工會的限制下不會動不動就要罷工。在沒有工會的時候，資本家無法控制工人不定期的罷工（wild cat strike）所造成的生產上的損失。在資本家與工會每幾年就訂一次合同中，工會為工人爭取提高工資，但資本家保有在工資上升後將產品價格上漲的權力。對資本主義整體來說工人階級較高的工資可以增加消費的支出，在社會的生產力發展下，大量增加了商品供給，工資的增長有助於社會總生產與社會總需求之間的平衡。像汽車雖然在二十世紀初開始生產，但是一個普通的汽車工人，要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買得起汽車。羅斯福新政下的福利制度，也增加了經濟穩定的因素。像失業救濟金就被認為是自動的穩定因子（automatic stabilizer 或 build-in stabilizer），原因是失業救濟已經通過立法變成法律了，工人一

但失業馬上可以申請失業救濟，工人領到的失業救濟金雖然沒有工作時的工資那麼高，但是總要比經濟大恐慌時完全沒有收入要好得多。有收入就有消費，經濟也就不會不停的向下跌。

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在二次大戰後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但是到了七〇年代危機開始後，這些政策對壟斷資本的積累失去了功效。這個經過將在第六章中討論。

這一章從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國和日本）戰後的經濟繁榮的原因談起。雖然戰後繁榮的原因有好幾個，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在二次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各大國中不存在著剩餘的產能。之後，談到美國和西歐在經濟繁榮中所建立起「福利國家」的背後發展，並以美國為例說明了在戰後前一時期的繁榮中仍然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並說明在這階級鬥爭中國家所扮演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角色。在這二十多年中「福利國家」和凱恩斯政策都有助於經濟繁榮，但是它們卻不是繁榮的原因。

第四章

戰後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

美元做爲世界的主要外匯儲備已經有六十年了，美元做爲世界的外匯儲備被給美國帶來很大的好處，美國用它自己的貨幣來支付進口並可以享受低利借款。

The passing of the buck? 《經濟學人》2004年12月

在第二章中談過在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大國因為要應付國內生產過剩的危機，他們用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進口限額來抵制外貨，保護本國市場。他們在關稅和限額之外，也爭相將自己的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抵制進口和鼓勵出口都是為了解決本國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這些保護本國市場的措施不但不能對解決危機有所任何幫助，反而會因各國貨幣之間匯率的不穩定，和過高的關稅而造成國與國之間商品貿易的一片紊亂。這種為了爭奪市場所導致的惡性競爭，使全世界貿易的停滯，更進一步加深了危機，也更激化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

資本主義大國的統治階級從大恐慌的經驗中，認識到惡性競爭的破壞性。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他們就趕忙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新次序做籌備。先在1944年建立起以美國爲首的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這個金融體系是以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為基礎，但是跟凱恩斯所提出來國際經濟結構並不盡相同。

在 1947 年資本主義大國又成立了關稅貿易總協定，關稅貿易總協定用削減關稅來促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通暢。這兩個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成立，建立起一套戰後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相互對待的機制。這個機制構成了戰後與國內「福利國家」相配合的資本積累的策略。這個資本積累的策略一直維持到了七〇年代初，這時資本主義進入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也產生了重大的改變。經過幾年的調整後，到了八〇年代演變成自那時開始到今天的「全球化」。

第一節 戰後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體系

在戰後前一時期，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體系開始於 1944 年國際貨幣基金的成立，到 1971 年美國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金時結束，共二十多年的時間。這個金融體系如何幫助大戰後前二十年資本主義的繁榮？它為什麼能夠有二十多年成功的發展？又為什麼在七〇年代初解體？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成立的背景

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是戰後資本主義國際金融組織中最重要的一對。在這兩個組織中，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主，世界銀行為輔，所以下面的分析也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主。

凱恩斯是國際貨基金主要策劃人之一，凱恩斯所提出的資本主義戰後的調整中，國內和國際經濟政策之間密切相關聯著，而且相互輔助。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採納了凱恩斯政策代表著前

一時期的自由放任的、國家不加干涉和調節的資本主義已經不能再繼續，經濟的發展必須要藉助於政治力量來調節。在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中，戰後資本主義大國用國際間的協定和組織來對個別國家加以約束，建立起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彼此合作的機制，避免再次回到三〇年代大恐慌時，因為互相抵制而導致危機的惡化。

1944年，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美、英、法等資本主義大國就在美國的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開國際金融會議。在會議上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IMF）和世界復興發展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IBRD）又簡稱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次會議是以聯合國的名譽召集的，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隸屬在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之下。經濟社會理事會是協調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事宜，它與安全理事會平行，安全理事會則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事宜。

國際貨幣基金與固定匯率（1944-1971）

國際貨基金在1944年成立時，有四十四個會員國。國際貨幣基金在成立時的主要功能是維持固定匯率。參加貨幣基金的會員國希望避免再度發生經濟大恐慌時各國相爭將自己貨幣貶值，而導致貨幣兌換率混亂，進而妨礙國與國之間貿易的進行。

在國際貨幣基金規定下，每一個會員國在入會時都分配到一個存款的配額，配額的大小是根據一個國家的國民所得來決定。在五〇年代初時，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也被允許參加貨幣基

金。那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配額佔總配額的 57.6%，其中美國佔 19.3%，英國佔 6.7%，西德佔 5.8%，法國佔 4.8%，日本佔 4.6%。貨幣基金的政策是由會員國投票來定，各國所投的票份量又是根據存款配額的多少決定。因此不像聯合國的一國一票。因為少數資本主義大國擁有半數以上的投票權，這樣的規定使得國際貨幣基金政策的決定權，從一開始就被少數的幾個資本主義大國所控制，而且根據基金的規定重要決策要 85% 的票數才能通過，而美國佔有近 20% 的投票權，這個規定就保障了美國所獨有的否決權；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的設計就是一個保障少數大國權益的組織，而且只有美國掌有否決權（Korner, 1986: 43）。

在聯合國的憲章中規定國家不分大小，每一個國家都保障有一票的投票權。雖然在安全理事會內的永久會員有否決權，但是在大會中聯合國的這種一國一票的制度，使資本主義大國在其中取得控制權比較困難。在過去幾十年中，雖然在名譽上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都隸屬於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但是在政策制定和實際操作上，聯合國早已無權過問。美歐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中持有大多數股份，因此控制了這兩個組織的決定權。到今天不但聯合國無權過問任何有關這兩個機構的政策和決定，在這兩個機構每年開年會時，聯合國的總秘書長都不准出席致詞（Dasgupta, 1998: 73）。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在協助國際資本運轉中有互為輔助的功能。國際貨幣基金在會員國的外匯短缺時給予貸款，他的貸款屬於短期。而世界銀行的貸款則是為了支援某個項目基本建設，因此屬於長期貸款。落後和弱小國家如果要向世界銀行借款，必須先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一切規章約

束。第三世界國家需要向世界銀行借款時，世界銀行就藉著貸款來直接影響借債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譬如跨國資本要在一個國家開採礦石，世界銀行就借錢給這個國家來修建港口，因此便利礦石的輸出。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一個扮黑臉，另一個扮白臉。從表面看來，世界銀行好像是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的機構，而國際貨幣基金好像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制裁的機構，但是用這樣的標準來區分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的目的和宗旨是一致的。

國際貨幣基金建立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由美元與其它貨幣之間的固定比例來維持固定匯率，美元由美國擔保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美元也就代替了黃金，而變成了世界貨幣。在布列敦森林會議中，英國的代表凱恩斯和美國的代表 Harry Dexter White 對未來國際貿易流通中支付的媒介有不同的意見。在會議中，凱恩斯提出為了保障貿易的擴張不受交易支付媒介數量的限制（像在第二章中解釋過的，金本位下貿易額就得受黃金量大小的限制），基金應該創出一種新的國際貨幣，凱恩斯將他所構想的國際貨幣命名為 Bancor。他認為這種國際貨幣的數量可隨貿易量的大小來調整，就像國內的貨幣流通量可以由中央銀行隨著經濟的情況來調整一樣。美國代表 White 同意凱恩斯對世界貿易中需要有一個被所有國家共認的交易媒介的這個構想，但是他認為大可不必再創一種新貨幣，美元即可當作國際貨幣來使用。戰後的大英帝國的經濟實力大不如前，而美國在大戰中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因戰爭物資需求的增加而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大英帝國沒落，英鎊失去了過去的地位，就是連英國這位經濟學的祖師爺的意見也變得沒分量。美國就在這次會議中用它新取得的霸權地位來影響會議所做的決定

IMF 外匯缺少時短期借貸
IBRD 長期借貸、經濟成長(前身WB)
094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WTO 促進世界貿易、減關稅(前身GATT)

(Wachtel, 1986: 48, 51)。因此美元就變成了世界通用的貨幣。

只有在瞭解美元如何在戰後變成了世界貨幣，以及戰後的固定匯率是如何維持之後，我們才能認識戰後的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體系，和這個系統在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時如何發生變化，並且更進一步瞭解這個體系的變化與現今經濟危機之間的相互關係。這裡先說明在國際貨幣基金下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及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系。

國際貨幣基金、美元、與固定匯率

貨幣基金制定了一套維持固定匯率的規則，固定匯率的制定是由美元與黃金維持一個固定的比率，當時美國將一兩黃金定價為三十五美元。每一個會員國的貨幣的價格也都與黃金維持一定的比率，由此來決定各國貨幣之間交換的比率，就是匯率。這個匯率一旦決定下來就不能隨意更改，如果因為貿易不平衡有必要更改時，必須要得到基金的特殊許可，否則每個會員國都必須維持它的貨幣與美元之間匯率上下不超過 1% 的波動。如果某一國的貨幣升值超過 1% 時，這個國家必須拋售它本國的貨幣使它降值，但如果一國的貨幣貶值超過 1% 時，這國必須用它的外匯儲備買回本國貨幣，使本國貨幣的貶值不超過 1% 的限度。

為了預防會員國的外匯儲備會因為貿易的入超而不足，以致無法用外幣來買回本國貨幣以維持本國貨幣貶值不超過 1%，貨幣基金規定每個會員國在入會時，要先將相當於它配額的 25% 的黃金存入基金，配額的另外 75%，可用它本國貨幣存入基金。如果哪一個會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可先借用它所存入的黃金，再不夠時，可向基金要求貸款。向基金貸款除了要付利

息外還有其它的條件，這些條件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重大。特別是到了八〇年代之後，國際貨幣基金對落後國家所採取的制裁跟壟斷資本「全球化」之間有很深的關係，後面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會繼續加以說明和討論。

美元變成國際貨幣除了因為美國是戰後第一強國之外，還因為在大戰剛結束時，它擁有全世界黃金儲存總量的 70%。美國向其它國家承諾：任何國家的中央銀行都可以隨時將它所持有的美元以三十五美元向美國兌換一兩黃金。美國對它貨幣用黃金來保證，也是當時各國逐漸用美元代替黃金來做貿易交易的媒介和外匯儲備的重要原因。美元的價值經由與黃金的交換比率固定下來，而且又可以隨時兌換成黃金，它就取代黃金而成了國際貿易中主要的交易媒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用美元做為支付和記帳單位，美元也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中的主要部分。因此，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固定匯率下變成世界貨幣。這個固定匯率的體系是靠美元來維繫著，而美元的背後又由黃金來支持，因此被稱為金匯兌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

美元變成世界貨幣和戰後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資本在全世界各地大規模擴展投資有不可分的關係。美國的資本家攜帶著他們國家的貨幣（美元）就可以在大多數國家投資建廠，他們也可以用美元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債券，取得他們對其它國家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¹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 1971 年美國跨國公司在全世界所累積的直接投資佔總額的 52%，比直接投資佔第二位的英國高出很多，英國只佔 14%，法國佔 5%，德國佔 4.4%，日本更少，只佔 2.7%。當年全世界最大的二十五家跨國公司除四

1. 美國企業投資所流到各地的美元就成了國際貿易中的交易媒介和中央銀行內的外匯儲備。

家之外，皆屬美國所有（United Nations, 1973: 130）。美國直接投資總合的數額從 1946 年的七十億美元，增加到 1973 年的一千億美元，是 1946 年的十四倍以上。到七〇年代初，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年產值達兩千億美元（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74: 5）。對外投資等於在國外置產，投資之後每年有各種收入，直接投資就有利潤和專利權使用費的收入，股票投資有股息和股票增值的收入。如果是對外貸款或購買外國債券，則有利息收入。到了六〇年代初，美國的這幾項收入在它國際收支經常帳中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對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的說明參見附錄三）。

大戰結束不久時，歐洲國家和日本才開始重建，它們的建設物資和民生物資都非常缺乏，需要靠進口來補充，因此為美國開闢了廣大的出口市場。戰後的前十幾年中，美國商品貿易出口大於進口，在經常帳上有大量的順差。美國因進口，和對外投資，以及維持它在海外的軍事基地等開支所流出的美元，很快的又經它的出口而回到美國，因此不存在美國境外美元過多的問題。事實上，流出美國的美元數量還不足供給世界國際貿易的支付用途，直到五〇年代末，都存在著所謂「美元短缺」現象。也就是說在國際間的各種交易上，美國境外的美元做為交易媒介還嫌不足。

戰後美國在國際收支上的資本帳上，一直都因為持續的大量對外投資和經濟外援而存在著逆差。從大戰結束初期直到五〇年代底，經常帳因貿易出超而來的順差補過資本帳的逆差還有餘（參見附錄三）。此後，歐洲國家和日本經濟重建，在十幾年中它們的生產不但早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且由於戰後投資建設起來的新的生產設備生產效率高，在產品的質量和生產成本上往往

比美國更有競爭力。到了五〇年代底，美國的國際收支經常帳中的順差已不足抵消資本帳的逆差。因此，流到美國境外的美元不能靠美國貿易上的出口全部再回到美國。在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中，美元的數額增加，這些美元也不時回到美國換取黃金。1958年時，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已相等於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的總合，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國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國以三十五元換取一兩黃金，美國就將失去所有的黃金儲存。到了六〇年代情況就更加嚴重，美元貶值的壓力在境外美元不斷增加下持續的加強，境外的美元繼續到美國換取黃金，美國的黃金儲存減少，這種情況一直繼續到1971年；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不再接受美元兌換黃金，固定匯率也跟著解體。

以美元作為世界貨幣並不是凱恩斯的原意，用美元作為國家之間貿易的交換媒介和記帳單位，並且用美元與黃金的比例來決定並維持固定匯率，這樣的一個世界金融體系雖然在戰後二十幾年中，維持了貿易的成長，但是美國境外的美元是根據美國的國際收支情況來決定的，而不是像凱恩斯所希望的國際貨幣量應以貿易額大小來加以調整。美國在五〇年代的貿易出超額大過了它的資本輸出，所以流到美國境外的美元數量過少，因此不夠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和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之用。等到美國的貿易與資本流動總額發生逆差，必須要用輸出美元來補足時，美國境外的美元又太多，在美國境外的美元過多時，就受到美元相對黃金貶值的壓力，因此固定匯率維持不下去。在這二十多年中，美元雖然做為世界貨幣來用，但是它的數量大小卻沒有能由一個像國際中央銀行這樣的組織來控制，而是受制於美國的國際收支情況來決定。而美國的國際收支情況又由它的對外投資的數額，它維持國外駐軍的開支，和它與其它國家的貿易差

額來決定。

在戰後前一時期，到美元停止兌換黃金為止，美元做為世界貨幣雖然有上面所指出的各種問題，但是美元做為世界貨幣的金融體系對戰後的經濟有積極的貢獻：一方面是美元做為世界貨幣補助了黃金數量的不足，使得貿易額與投資額不受黃金數量的限制。另一方面，到了六〇年代後，雖然美元不斷的受到貶值的壓力，但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共維持了二十多年。這兩方面都有助於戰後前一時期國際貿易和其它國際間金融的交易量的快速增長，因此對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繁榮有積極的影響。美元做為世界貨幣也給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獨有的特權。

除了上面所提的兩方面之外，更重要的則是在這個金融體系瓦解之前，國際間的交易媒介數額的擴張受到限制。美國國外的美元雖然數目很大，但是不可能無止境的擴張。因為在 1971 年之前，美國必須顧慮到持有它境外美元的國家有將手中美元兌換黃金的可能。所以每當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擴大時，美國就受到美元兌換黃金的壓力，美國在壓力下就必須要做一些調整，使得它的國際收支的赤字不再繼續擴大。但是到了美元不再兌換黃金之後，它在境外美元數額擴張就不再受到限制，在這之後，特別是八〇年代後，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數額之大是驚人的。這樣的發展不但與七〇年代後的資本主義危機是相關聯的，也是互為因果的，而且這樣的發展因為沒有任何機制可以限制，在今後只會繼續惡化，這一點對瞭解危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第七章中將再做解釋和說明。

固定匯率因美國國際收支逆差而產生動搖

到了五〇年代底，美國的國際收支（經常帳加資本帳的總合）的逆差繼續惡化，美國境外的美元快速的增長，因此美元面臨隨時都可能貶值的危機。各國的中央銀行都擔心它們所持有美元外匯儲備會因美元貶值而造成損失。美元是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的主要部分，一旦美元貶值，這些國家將失去很大的一筆外匯。1958年以後，沒有人知道三十五美元兌換一兩黃金還可以維持多久。美國境外堆積起來的美元日益增長，因此增加了美元兌換黃金的壓力，境外美元回到美國兌換黃金的速度加快。1959年到1961年間，就發生了第一次美元擠兌黃金；單單在1959年一年中，美國就失去了它當時黃金儲存量的10%，在五〇年代的十年中，美國的黃金儲存量從1950年時的兩百三十億美元（以三十五美元折合一兩黃金計）下降到五〇年代底的一百八十億美元，下降了22%（Wachtel, 1986: 65）。

美國是貨幣基金中最重要會員，但是美國依仗著它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霸權，可以不遵守貨幣基金的規則。當市場金價在1960年10月上漲到每兩四十美元時，美國做為一個基金的會員國，有責任拋售黃金（或其它外幣）購回美元來維持美元貶值不超過1%，但美國卻依賴其它國家來維護美元不繼續貶值。像德國要避免它的貨幣（馬克）與美元相對升值，就要拋售馬克收購美元，以便維持美元與馬克之間的匯率波動不超過1%。到1961年10月，資本主義大國又被迫聯合起來搶救美元，它們用黃金儲備來購買美元，以便抑制因市場金價上升而造成美元貶值。直到1971年美國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為止，固定匯率經過了多次的波折。這一點在後面第六章中還要再加以解釋。

第二節 戰後資本主義的世界貿易體系

關稅貿易總協定成立的背景

關稅貿易總協定在 1947 年成立，當時大戰剛剛結束，資本主義大國之間達成這項協議，目的是要通過它來降低關稅以便能促進國與國之間的商品貿易的流通和增長。前面談過在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國家用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美國在 1930 年通過 Smoot-Hawley Act 將進口關稅提到歷史新高，同時歐洲各國也相繼將它們的關稅提高。進一步激起了各大國之間的貿易爭奪戰。在貿易爭奪戰中，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形成貿易集團，貿易集團之內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優惠以此來抵制集團外的國家，這樣的抵制使得全世界貿易總額大幅下降，也就更加深了世界的經濟危機和國與國以及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矛盾，從經濟的矛盾提升到政治的衝突，最終導致二次世界大戰。

大戰後成立的關稅貿易總協定主要的目的是用談判來降低進口關稅。關貿總協並用所謂「最惠國」待遇的原則（Most Favored Nations Principle）來達成包含所有參與國家的多邊貿易協定。「最惠國」的定義是如果一國給予另一國家關稅上的優惠，則這個國家必須同時給予其它每一個國家同樣的優惠，不可厚此薄彼（「最惠國」的定義如今已經被美國曲解，它變成了由美國單方面決定哪一個國家可以被例入它的最惠國名單中）；在關貿總協「最惠國」待遇的原則下，會員國必須平等對待所有國家，而最惠國的規定是用來避免再度形成大戰前的貿易集團。

關貿總協成立時，因為有鑑於大戰前各國採用進口限額（import quota）來保護本國市場而產生對貿易流通的阻礙，因此

關貿總協規定參加的會員國家不准用進口限額來阻擋進口。但是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在實際運作時，資本主義大國並不遵守這個規定。

關稅貿易總協八個回合談判

關貿總協在 1947 年成立到 1995 年被世界貿易組織所取代。關貿總協從成立到 1995 年之間，共經過八個回合的談判，這八個回合談判的名稱、日期、和參加國家的數目如下：

回合	地名或人名	年份	參加國家
第一回合	Geneva	1947	23
第二回合	Ancecy	1949	33
第三回合	Turquay	1950	34
第四回合	Geneva	1956	22
第五回合	Dillon	1960-1961	45
第六回合	Kennedy	1962-1967	48
第七回合	Tokyo	1973-1979	99
第八回合	Uruguay	1986-1994	117

關稅貿易總協定從成立到七〇年代初

在關稅貿易總協定前幾個回合的談判中，資本主義大國用協商和談判來降低他們的進口關稅，因此對他們之間貿易的擴張起積極作用。²但是到了第六回合之後，各國之間削減關稅談判的情況就有所改變。到了七〇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發生變化，因

此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

在二次大戰後的前二十幾年中貿易快速的增長，而貿易高速增长又幫助資本主義國家高速度的擴大再生產。因此，使資本積累得以繼續擴大。就像第三章中所討論過的，關貿總協在戰後這二十多年能產生這樣的功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這一段時間內，資本主義大國內還不存在著嚴重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問題。因此，資本主義大國間市場的爭奪尚不很激烈。大戰結束後，美國在工業品的生產上幾乎每一項都遙遙領先，沒有國家可以競爭得過美國。美國從本國利益出發帶頭削減進口關稅，再要求其它國家也削減關稅。戰後的西歐國家和日本也樂意合作，以求得在貿易通暢下發展經濟和資本積累。今天美國有一些主流的經濟學家或政治學家看到目前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對市場的爭奪互不相讓的情況，常會對過去這一段歷史產生無限的懷念，希望各大國間可以再次用談判來達成合作，但問題是在國與國之間矛盾不深時，合作容易，當矛盾深化時，合作就困難了，這一點從七〇年代初以後的發展可以清楚看出。

在關稅貿易總協定中資本主義大國所享受的特殊利益

關稅貿易總協定在不同的回合中包括了不同的談判項目。從關貿總協幾個回合談判的內容中可以看出，關貿總協雖然宣佈了一些基本原則，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是根據原則來處理事務。關

2. 在六〇年代初 GATT 的第五回合談判中（Dillon Round）計畫將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工業品貿易進口稅降低 50%，到 1963-1967 年的第六回合談判中（Kennedy Round）進口關稅再降 33%，在這之後，隨著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增加，關貿總協的注意力就轉向如何減少非關稅貿易的障礙。

貿總協的決定總是從幾個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出發的。有關農產品貿易的談判就是最好的例子，三、四年前台灣和中國為了要參加國際貿易組織，台灣和中國各別與世界貿易組織中的重要國家進行了多次談判，談判中的一個困難就是國際貿易組織所提出的一個重要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參加國際貿易組織就必須逐步取消對本國農產品市場的保護，其中包括削減進口稅、取消進口限額、和逐步取消對農產品的補貼。

但是關稅貿易總協定從一開始直到第八回合談判之前，談判的範圍都不將農產品貿易包括在內。在第八回合的談判中，幾個資本主義大國還在爭執是否將農產品包括在降低關稅和取消補貼的談判範圍之內。到第八回合談判結束世界貿易組織成立時，才規定參加的國家必須逐步開放它們的農產品市場，這些決定都是以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為優先考慮而做的（參見附錄四）。

關貿總協前七回合的談判只限於削減的工業產品貿易的關稅，主要原因是美國和五〇年代後的歐洲存在著農產品生產過剩的問題。美國三〇年代羅斯福新政中的農業政策就是由政府來限制產量，和保證農產品價格來解決生產過剩和農民收入過低的問題。因此如果從一開始關貿總協將降低農產品的進口稅也包括在談判的範圍之內，則會使美國因農產品進口的增加而無法有效的控制供給，也就無法保證它國內農產品的價格。所以關貿總協就根據美國利益來制定了它的第十一條款，這一條款免除農產品被列入削減關稅的範圍。緊接著第十一條款通過之後，美國就違反了關貿總協不准設立進口限額的規定，而設置了乳類的進口限額，美國這樣的作法使關貿總協第一次做出允許其它國家採取報復美國行動的決定。

有關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的問題還要回到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

時這段歷史來看。第二章中談過，美國在經濟大恐慌時，因為農業生產過剩，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生活困難。1933年在羅斯福新政下，國會通過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這條立法主要是由政府來干預農產品市場的價格機制，政府政策中包括限制生產量和通過政府對農產品的收購來提高農產品價格，也就是用提高價格來給農民補貼。在1951年時，這條法經過修正變成美國保護它的農業的法律。在此法中的第二十二條中規定：美國在過去或未來所參加的任何國際協定都不得違反這一條，換句話來說，美國這條由國家所定的農業法駕於任何國際協定之上。

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壓力下，關貿總協只好允許美國在農業貿易上持有這個特殊權力，准許美國根據它保護自己農業的需要來制定他的農業貿易政策。自此之後，美國除了乳類的進口限額外，更設立了棉花、小麥、花生、燕麥等項農產品的進口限額（Johnson, 1974: 50）。除了進口限額外，美國更用出口補貼來鼓勵它的剩餘農產品的出口，在出口商將農產品用低價傾銷到國外後，美國政府再將國內外的差價付給出口商作為補貼。

二次大戰剛結束時，西歐國家是美國農產品出口的主要市場。但是沒過幾年，西歐國家農業生產恢復後，也開始產生農產品過剩的問題。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成立，到1962年共同體內的國家採取了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CAP）。在這個政策下，共同體內的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上彼此關稅優待，但對共同體外的國家則繼美國之後，同樣採取用提高進口關稅、設置進口限額、以及出口補貼來保護歐洲經濟共同體內國家的農產品市場。資本主義大國在彼此競爭之外，也同時根據它們自己的利益而彼

此支持。美國支持歐洲對小麥和乳類的保護，西歐國家則支持美國對大豆和玉米的保護（Friedman, 1993: 35）。上面已經提過，到了六〇年代底，美元因為國際收支上的不平衡，美元受到貶值的危機。到了1971年，美國宣佈停止美元兌換黃金時，它也同時增加了農產品進口限額的項目，這樣為了維護本國的利益不經協商的單方面決定，是美國一貫的做法，只是到了八〇年代時，這樣的作法就更變本加厲（參見附錄一）。

從這裡可以看到，關貿總協從一開始就沒有保持「自由貿易」或「公平貿易」的原則，而是資本主義大國根據它們自身的利益達成它們之間的各種妥協。五〇年代時，美國政府為了支持小麥的價格而收買了大量的小麥，在它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中，曾用小麥做為援助的物資。但是美國用小麥做為對歐洲援助時，它顧慮到不要因為美國小麥的供給而阻礙西歐國家農民恢復小麥生產，所以它不採用低價傾銷的政策。後來美國也同樣用小麥做為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物資，但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美國就不顧因為它的低價小麥傾銷對這些國家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從五〇年代起，美國將小麥運到從來都不吃小麥，而且在糧食上可以自給自足的第三世界國家。結果只在二十年的時光，美國的小麥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第三世界國家當地生產的一些穀物，因而使得這些國家依賴進口的糧食，當援助停止時，它們就成了世界小麥市場上的主要顧客（Friedman, 1993: 38）。

在關稅貿易總協中，資本主義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對付發展落後國家時總是聯合在一起。除了農產品之外，資本主義大國並且聯合起來用進口限額來抵制第三世界國家紡織品的出口。早在1962年，關稅貿易總協就已經設立了對棉紡織品進口的限制。1971年時，美國的人造纖維紡織品的進口比前一年增

加了 80%，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日本、台灣、南韓、和香港同意「自動」限制人造纖維紡織品出口。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簡稱 EC）也在 1975 年時對台灣的人造纖維紡織品設進口限額。

1974 年時，在資本主義大國的壓力下，第三世界紡織品出口國家又分別與資本主義大國簽訂多種纖維品安排（Multi-Fibre Arrangement）。這時資本主義大國抵擋不住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紡織品的競爭，它們因此不顧關貿總協不允許進口限額的規定，單方面決定用進口限額抵制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紡織品的出口。在這個多種纖維品安排下，資本主義大國設立它們從各別第三世界國家進口的各種紡織品的限額，這個安排在開始時，只是資本主義大國用來保護國內的紡織工業的臨時辦法，當時這些大國提出的理由是限額可以給它們國家的紡織業一段緩衝時間來做調整，但是這個所謂臨時的安排並沒有在短期內廢除。

到了七〇年代初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再度明顯化後，不但資本主義大國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它們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因此到了七〇年代初之後，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功能也為了適應這個新的情況而產生了變化。雖然從一開始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內落後國家與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從來就沒有平等可言，在重要的議題上資本主義大國總是聯合起來對付第三世界國家，但是到了七〇年代世界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時，資本主義大國（尤其是美國）所採取的手段比之前任何時候都更具侵略性（參見附錄一）。

第三節 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建立起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貿易體系，在各資本主義大國經濟成長下，這個世界體系促進了他們之間的合作的關係。在這個體系下，美元與黃金維持固定的比率，各國的貨幣也與黃金維持固定的比率，以此來維持各貨幣間的固定匯率，美元成為國際間交易的媒介和記帳單位，美元也成了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美國承諾任何時候持有美元的中央銀行都可以用三十五美元換取一兩黃金。而且美國又是當時最大的經濟強國，並且持有世界黃金儲存量的 70%，所以美元就成了世界貨幣。國際貨幣基金是這個國際金融體系的決策者，而國際貨幣基金又是由幾個資本主義大國所控制，大國中只有美國有否決權，所以基金的決策沒有美國同意是無法通過的。

在這段日子的前十年中，美國在所有的產業中都是遙遙領先，因此除了美國對它本國的農業保護外，它都樂意降低它的進口關稅。美國帶頭削減關稅對它自己有利，其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跟隨在後。因此在七〇年代前，各國的進口稅不斷的下降。在固定匯率和低關稅下，促進了國際貿易與跨國資本的流通，進一步促進經濟成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資本主義世界成了美國一國獨霸的局面，英、德、法、日各國都沒有能力向美國挑戰。美國除了它在經濟上的霸權外，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它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也是一國獨霸。在美國獨霸的局面下，別的國家同意用美元做為世界貨幣。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以會員的身分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約束。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約束下，各國靠買賣美元來維持自己貨幣不超過 1% 的升值或貶值的固定匯率。因此，國際貨幣基金

可以達到維持固定匯率的功效。

在戰後這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的這個體系雖然相當穩定，但是也發生了好幾次金融危機，只是與近年的危機相比較要輕微得多，而且範圍也小得多。固定匯率除了因為美國境外的美元先是過少，後是過多所引起的問題外，也發生了因私人資本的流動而引起的一些國家的國際收支危機，這樣的危機到了這個體系的最後十年，變得比較頻繁起來。

在固定匯率下，國家用買賣外匯來使匯率上下變動維持在1%之間。當美元進入一個國家時要換成本國貨幣，而導致本國貨幣升值，如果要保持固定匯率，則中央銀行就要用本國貨幣來購買美元。反之，如果有資本流出，本國貨幣要換成美元而使本國貨幣貶值，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則要出售美元。在五〇年代時，除了美國之外，其它國家還沒有取消外匯管制，所以私人資本的流動是在國家限制之下進行的。大部分西歐國家到1958年底才取消外匯管制，允許外幣與本國貨幣之間的兌換。日本則是到了1964年才允許外國貨幣和本國貨幣之間的自由兌換。因此，國際間私人資本的流動量在五〇年代時還是很有限的。

跟隨著美國跨國公司到國外投資，歐洲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量也跟著增加，國際間的私人資本的流動量增大。到了六〇年代，私人資本更隨著管制的取消而活躍起來，或者可以說私人資本活躍起來使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管制國際間資本的流動變得困難，因此成為取消管制的理由。當私人資本（美元）進出一個國家數量增大和次數頻繁時，維持固定匯率就比較困難。除了因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本流動外，也有投機資本的流動。在國際貨幣基金的規定下，各國中央銀行要維持固定的匯率，但是在特殊的情

況可以將它本國的貨幣貶值。因此，當一個國家發生國際收支的逆差時，投機的資本就將以這個國家貨幣為單位的資產（像股票、債券）賣掉，等到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後，再買回來，以便從這之間謀利。

在固定匯率下，一個國家如果發生了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投機的資本就可以趁機會介入，投機資本的介入可能在這個國家尚沒有足夠時間來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時，迫使這個國家不得不將它的貨幣貶值而造成危機。像 1964 年英國的貿易發生赤字，投機資本就以英鎊為單位的資產賣出，這種對英鎊的衝擊一直繼續到 1967 年英鎊宣佈貶值為止。到 1969 年，法國的法郎也受到同樣的衝擊。投機資本對一個國家的貨幣所能產生的衝擊與近年相比較是要小多了，但從這些例子，我們不難看出戰後的世界資本體系的內在矛盾。也就是說固定匯率和關稅的減免促進了國際貿易和國際間資本的流動，但是當國家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大部分取消了之後，貿易額和資本流動規模就隨著擴大，這時要維持固定匯率也就越來越困難。

所以早在美國單方面宣佈它不再接受美元兌換黃金之前，這個固定匯率的體系已經發生動搖。除了上面所說的因為投機資本而引起的國際收支危機外，到了五〇年代中之後，西歐國家的經濟早已經復原，並且緊迫在美國之後。到了六〇年代中，日本的經濟也趕上了美、歐。因此到了六〇年代，美國戰後一國獨霸的局面已漸漸不能維持。美國在貿易上的出超不再能繼續支持它在世界各地的投資和維持它在海外軍事基地的費用。六〇年代中之後，美國的貿易更因為它侵略越南戰爭而產生大量的逆差，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元的信心早就開始動搖，美元貶值已經不可避免，只是時間問題。

歸根究底，二次大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能夠維持固定匯率和將關稅不斷的降低，都是因為在這一段日子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不存在著大量剩餘的生產設備的產能，因此國與國之間不必做你死我活的競爭。也就是因為這樣，才可能使國家之間在競爭中達成合作的關係。除了世界上不存在著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這個基本的條件之外，就是在各資本主義大國間，美國在經濟上遙遙領先。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和關稅貿易總協的成功並不是只要將幾個大國湊在一起用談判就可以達成的，這兩個國際金融貿易組織是在戰後這個特殊的客觀環境下，達成了它們輔助戰後經濟繁榮的功能。而這樣的客觀環境是必然會改變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生產設備產能再度過剩，美國逐漸失去他在經濟上一國獨霸的局面，而歷史就正是這樣的發展的。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戰後資本主義大國曾有做過實施凱恩斯國際經濟政策的嘗試。但是美元究竟不是國際貨幣，國際貨幣基金也不可能承擔得起世界中央銀行的功能。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與他的國內經濟政策對戰後這二十多年的繁榮都有積極的影響，但是這一段比較穩定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卻是上面所說的特殊的客觀環境下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凱恩斯政策對戰後的安定繁榮有一定的貢獻，但是這些政策卻不是戰後繁榮的主要原因。戰後前期資本主義的繁榮是因為在這一段日子中，資本沒有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憂慮。到了七〇年代初，世界產能過剩的問題再度明顯化後，凱恩斯國內政策和他的國際政策就失去了它們曾有的效能。

第五章

戰後前二十年落後國家的發展

在本國資本家與帝國資本的競爭中，本國資本家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在受壓迫的國家中本國資本家能扮演進步角色的可能性更降低了。

Elizabeth Dore and John Weeks, "Class Alliance and Struggle in Peru,"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Summer, 1977

所謂出口導向工業化顯然就是台灣國際加工基地化。

劉進慶著《台灣之經濟》

在導論一開始時，我就說明了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要對「全球化」提出與主流不同的分析，這個分析不僅是要對過去二十多年中「全球化」的發展做解說，並且要分析「全球化」所產生的影響。這影響包括了「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發展的影響。事實上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和它們的發展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是我最關心的課題。因此也可以說因為要瞭解落後國家的發展，所以對「全球化」提出了與主流不同的分析。為了分析「全球化」對落後國家的影響，我們則必須分析落後國家在戰後前期的發展，這一章主要的內容就是對這些國家在八〇年代前的發展做探討。

在大戰結束到七〇年代初的一段日子內，除了少數國家（但佔人口的大半）經過革命成功而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外，大多數發展落後的國家選擇了資本主義發展，在發展資本主義的總方向下，其中大多數又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這些落後國家想要模仿十九世紀美國和德國及戰後日本的發展經驗，用限制進口來完成自己國家的工業化；另外有少數幾個國家（或地區）則是採取了用發展出口來帶動經濟的成長，像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在八〇年代進入「全球化」後，採用進口替代策略的國家的經濟全盤破產，這一點將會在第八章中討論和說明。事實上，採取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策略的失敗和「全球化」是一件事物的兩面，「全球化」可以進一步擴張就是因為這些國家放棄了進口替代的發展。換句話來說，只有在採用進口替代發展國家解除了它們對本國經濟的保護後，「全球化」才能夠快速進行。在八〇年代之後，落後國家完全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希望，這時幾乎所有落後國家都將它們的經濟開放，希望用發展出口來帶動本國的經濟成長。

導論中在論述「全球化」時，我說明了今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可能有幾種不同的變化，但是不論今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來說，它們想再去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該是非常困難的。當今有一些學者，當他們看到在「全球化」下，發展落後國家被迫取消各種對本國經濟的保護，有礙這些國家長期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他們因此提出落後國家應該學十九世紀的美國、德國和戰後的日本用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我認為提出這種論說的人必須要去探討戰後實行進口替代發展的經過，和去分析這種策略失敗的原因（參見附錄六中對韓德強的批評）。這一章的第一節討論拉丁美洲國家這一段發展的經驗，第

二節討論與這個發展策略相關的依賴發展理論，第三節提出對依賴發展理論的批判。

在八〇年代的「全球化」開始之前，有少數國家（地區）採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它們的經驗若以國民總生產的增長速度作為衡量標準的話，的確是成功的。所以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在「全球化」後，就成了所有發展落後國家都想要模仿的典範。這時美國學術界的菁英在大肆宣揚華盛頓共識時，就把台灣和南韓說成是最早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例子。但是台灣和南韓的發展並不是依靠自由市場的調節來發展的，它們的發展跟第二章中所談到的日本有相似的地方，它們的發展成績是與國家的策劃、干預和贊助不能分開的；因為這樣的宣傳不符合事實，所以已經受到一些反駁（瞿宛文，2003：第七章）。這一章的第四節將把台灣和南韓的發展放在當時（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去討論。在八〇年代之後，台灣和南韓在「全球化」的壓力下，被迫作了許多改革，這些改革說明了在世界大環境的改變後，不但想要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不可能重覆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就連台灣和南韓也不可能沿著過去的途徑來繼續發展。在第五節中將對台灣南韓這種模式的發展做批判，提出這種模式帶來的經濟成長必須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並說明長期的永續發展與短期的經濟成長是不同的。

第一節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的經驗

大戰結束後，亞洲和非洲許多前殖民地剛剛獲得獨立的國家，以及在十九世紀就爭取到獨立的國家，都急著要發展它們的

經濟，它們希望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自主性，不再依賴它們在殖民時代的宗主國。在戰後這一段日子裡，這些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有追趕前進的決心，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那是跟今天非常不同的一個世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前二十年，世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尚未進入危機，發展落後國家有一段比較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它們這二十年的發展雖然最終失敗，但是對這一段發展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因為這些國家所用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和與這個策略相關的依賴理論，對一些國家，像今天的中國，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參見附錄六）。現今一些談經濟發展的論述對這一段的發展只是稍提一下，但是不做分析，有的論述甚至連提也不提，好像這段歷史從未發生過。在主流的經濟發展論述中對依賴理論的處置好像把它看成是六、七〇年代時曾經時髦過的，但是不知道到什麼時候和為什麼原因拋棄了。但是依賴發展理論中所用的「中心」和「外圍」一類的詞句卻還時常出現，但是這些詞所代表的意思又不是很清楚。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二十多年中，無論是剛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還是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獨立的國家，都希望在經濟上取得獨立的發展，這些國家的執政者非常有信心的認為他們可以擺脫資本主義大國的控制，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私人資本的發展，以便完成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在戰後的二十多年中，許多發展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嘗試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它們的努力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到了八〇年代中以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完全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意願和希望。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此有必要再進一步探討。在以下的討論中，以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發展的具體例子來做說明。

從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初的進口替代發展

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想要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並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早在三〇年代，當世界資本主義面臨經濟危機時，美國和西歐國家在危機中無暇它顧，拉丁美洲國家反而有了它們發展資本主義的機會。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和西歐國家的生產大幅下降，所以這些國家從拉丁美洲國家進口的原物料也跟著急速下降。拉丁美洲國家因為它們的出口大幅下降，因此沒有足夠的外匯來進口工業品。這樣的發展反而給拉丁美洲國家因為它們所需的工業品缺無，而有發展自己的工業的機會。從經濟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十幾年中，拉丁美洲國家發展了自己的紡織業、製鞋業、食品加工業和輕化工業等，初步完成它們的工業化（Burbach and Flynn, 1980: 95-96）。

隨著輕工業的發展又進一步帶動了交通運輸和金融業，也發展了教育和研究的系統。輕工業的發展供給了農業所需要的現代化的生產資料，也逐漸促進農業的生產，在工業和農業發展下，擴大了國內的內需市場。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拉丁美洲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礎，但是這基礎還是相當的薄弱。隨著工業化，拉丁美洲國家內的階級結構也起了變化，本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擴大。由資產階級所組的國家也有一定的力量，這些國家的執政者有很強的意願要繼續採用進口替代策略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在他們的推動下，1948年聯合國在經濟社會理事會之下，設立了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on Latin America，簡稱 ECLA）。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發展拉丁美洲國家和這個區域的資本主義。

進口替代發展的策略主要是用進口關稅或進口限額來保護本

國的工業，就像當年發展落後於英國的美國和德國一樣，美國和德國在工業生產上無法與先進的英國競爭，因此如果對英國的工業品進口不加限制，自己的弱小工業在進口的英國產品競爭下，就不可能發展起來。美國和德國的資本主義就是用保護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等到它們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後再開放進口。戰後的日本也是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來超越美、歐的。

在拉丁美洲，將重要企業國有化是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發展落後國家除了將許多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外，並用國家資本成立了大型的國有企業。因此重要的企業像能源、電信、交通等企業都屬國有。這些國有企業通常都是以低價來供給其它私有企業，虧損部分由國家補貼。私人企業在國家的補貼下享有低價的能源和交通運輸，因此有助於私人資本積累。

將一個私有企業國有化或是將一個國有企業私有化，都是靠著政治力量來改變一個企業的所有制。關於國有化或私有化的決定並不基於現今一般所談的經營效率的問題，私有企業可以有效率或是無效率，國有企業也可以有效率或無效率，不能說私有企業一定有效率或國有企業就一定無效率。像台灣的電信局、鐵路運輸都曾被認為是非常有效率的企業。還有像南韓的國有鋼鐵公司（Pohang Iron and Steel Corporation，簡稱 POSCO）被評價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鋼鐵公司。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還送人去 POSCO 接受培訓（Amsden 1989: 291）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時，美國的一些大型私人公司，像福特汽車公司和 IBM 等，都是非常沒有效率的私有企業。

同時當我們談到效率問題時，我們還必須談到底什麼是效率。譬如一個發展落後國家工業化時需要電力，假設這個國家沒有足夠大的私人資本可以蓋起一個大的發電廠，那麼是等私人資

本發展到一定的規模再來蓋一座（私有的）發電廠呢？還是國家用稅收來蓋一座（國有的）發電廠呢？還是歡迎外資來蓋一座（外資所有）發電廠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第一種選擇顯然不智，而在第二和第三種選擇之間，一些經濟落後和政治受外國控制的國家往往沒有選擇的餘地。像拉丁美洲的國家在二次大戰前和大戰剛結束時，它們的石油生產和金屬和非金屬的礦產都是外資所有。若是只按個別企業來說，一個外資所有的企業可能非常有效率，因為這些接受外資的國家在政治上沒有力量，因此他們的政府對外資企業無法做什麼規定或限制；外資可以付本地工人低工資，將工作時間拉長，給工人很不好的工作環境，和將污染廢料隨意丟棄不作處理。這樣的經營方式都可以降低成本，以及增加這個企業效率。還有新開採的礦山含礦量高也是外資企業有效率的另一個原因。資本主義大國的資本家在發展中國家還常投資於電力、煤氣、鐵路交通這樣的獨佔企業，因為沒有競爭，而當地政府對價格有沒有限制，所以利潤很高。另外不可否認的是外資常常掌有新的技術。

但是對一個想要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來說，只注重個別的外資企業效率的高低，並不見得有利於它整體的發展。因為一方面，外資企業所開採的礦產往往都是運到國外而不是為本國工業所用（石油生產就是最好的例子）。另一方面，高價的電力和高價的交通運輸都不利於本國的資本積累，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還有其它早先已經取得獨立但在政治和經濟仍受資本主義大國控制的國家，都極力要爭取它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這些國家將許多外資企業收歸國有，拉丁美洲和亞洲的許多國有企業都是這樣開始的。在進口替代的發展

策略下，國有企業對整體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此從總體著眼，就不能說這些國有企業沒有效率。

還有必須要指出的是，一般國有企業都常要經過立法過程，對資本有比較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國有企業不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的，它的僱員是給國家工作的，因此在工資和福利上，像工作權、健康保險和退休等都有一定的保障，這些都是國有企業優越的地方。所以一個企業是否有效率，要看效率該如何去衡量。可以單從一個個別企業來看，也可以從這個企業對資本積累的幫助和總體發展來看，也可以從這企業員工的利益來看。當然在許多國家中，國有企業只有其名而已，像在一些國家中，國有企業都是由統治者和他們手下的官僚控制著，這樣的企業就失去了國有的性質。

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下，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能達成穩定的和高速度的經濟成長。以墨西哥為例，在這段日子裡，它的國民生產毛額每年增長 6.8%，年通貨膨脹率維持在 4% 以下，而且墨西哥的披索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墨西哥這段時期的經濟發展常被稱為它的黃金時代。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下，墨西哥除了對進口商品課以關稅外，並且對進口商品的項目和數量加以限制。這樣的政策是用來抵擋外來競爭以便保護本國的工業。在進口限額的政策下，政府規定進口必須要申請執照，政府根據發展的需要來審核申請進口的項目。從 1956 年到 1970 年間，墨西哥需要執照的進口工業品佔總工業品進口的比例從 17.7% 增加到 68.3%。墨西哥也將重要企業國有化以便增強本國資本對外資的抵抗。這樣的發展策略是由國家主導的工業化發展，在國家的計畫和保護下來發展各種重要工業。國家並同時用總體經濟政策來調節經濟，以便保持經濟的穩定（Moreno

and Ross, 1994: 107-143)。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國家用進口替代來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一直到七〇年代底，它們並沒有能在經濟上取得獨立，因此在政治上也就無法得到自主，不成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相比較力量太薄弱，資產階級的薄弱也就等於是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國家力量薄弱。因此在「全球化」開始後，他們經不起國際壟斷資本的攻擊，在外債的壓力下，他們被迫放棄了戰後前一時期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在本書的第八章到第十章中，將再進一步討論和分析大戰後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這一章的下一節先要討論與戰後拉丁美洲國家採取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相關的依賴理論，從第三節所提出的對依賴理論的批判中，也可以認識到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的原因。

第二節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與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ies)

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ies 也可譯為庸屬發展理論)。這個學派主要是研究落後國家 (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 經濟發展的問題。換個角度來說，這個理論是要說明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的原因。在七〇年代時，這個理論曾經盛行一時，而且它常被認為是站在發展落後國家立場為這些國家打抱不平的理論。在今天討論經濟發展和「全球化」時，卻很少再被提起。我認為對這個理論的討論和批判仍然是必要的，因為依賴理論不僅是存在於抽象的層面，它與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也有關聯。進口替代的發展在

拉丁美洲國家實行了二十年之後，完全失敗了。我認為要瞭解失敗的原因可以從認識依賴理論開始。

在討論之前，先要說明依賴理論中又分了好多支派，所以並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所有支派的完整理論，也要說明這裡並沒有要對依賴理論中的各派系之間的相同或相異的地方做比較。雖然依賴理論的各派中有分歧，但是有它們之間的一些共同特性。簡短的說：它們一致認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development）與落後國家的不發展（Underdevelopment）乃是一體的兩面，都是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發展的結果。依賴理論認為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與未發展國家之間的交換關係不平等，他們用這種不平等的關係來解釋前者對後者的剝削。發展落後國家自己不能生產工業品，造成他們對先進國家進口的依賴，落後國家的出口多限於原物料和一些熱帶農產品，而工業產品與原物料的交換比價越來越不利於落後國家。因此從交換中，發達國家從落後國家吸取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從落後國家轉到先進國家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因為失去了剩餘價值，資本不能積累，因此不能發展。

Andre Gunder Frank 是依賴理論中的一個支派，他指出拉丁美洲國家只有在美、英和其它西歐國家發生戰爭時，或者在先進國家因為國內經濟危機無暇它顧時，才稍得喘息的機會，才有可能發展一些以內需為主的工業。Frank 的另一看法也值得一提，他批判當時一些主流派發展理論中的一個論點，這個論點認為落後國家與外來資本接觸愈多的地方（像一些大城市，如巴西的聖保羅等），經濟愈發展，但是跟外來資本接觸較疏遠的窮鄉僻壤，經濟則愈形落後。這樣的說法是要證明外來資本可以給某個

地區帶來發展。法蘭克反對這樣的說法，他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延伸到世界的每一個地區的每一個角落。在拉丁美洲一些最貧窮的地方，像以前產糖勝地西印度群島，和巴西北部的礦區（Minas Gerais）在歷史上都是和歐美資本主義大國接觸最密切的地方。當初帝國征服殖民地就是為了當地豐富的礦產資源，或是為了適合生產糖、咖啡、熱帶水果的氣候和土壤，當這些地區的財富一旦被吸取乾淨，歐美資本主義大國就撤走到別的地方去搜刮，並沒有在當地留下任何發展成果的痕跡，Frank 這樣的看法是跟歷史現實相符合的。

依賴理論的一支派是由巴西的 Fernando H. Cardoso 代表的庸屬性的發展論點，Cardoso 認為落後國家的發展是庸屬在先進國家之下，他認為在庸屬性的發展下，庸屬的國家並不是不發展，但是它們的發展是帶有庸屬性的或是依賴性的。他認為這樣的發展雖然沒有獨立性，但附屬在帝國之下，一個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還是可以發展它的經濟，也就是說雖然弱小國家受強大國家的控制，但卻可以因此得到很多好處（參見王春根、鍾望如）。Cardoso 是巴西的上任總統，這個曾經在過去被認為是個進步的年輕知識分子，最終投降於強大的國際資本和美國的威嚴之下。九〇年代末，在經濟危機中，巴西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和一切附帶的苛刻條件，Cardoso 就要執行由基金所強制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簡稱 SAP）各項對巴西制裁的條款。有些曾經追隨過他的知識分子不免為他的下場感到遺憾，但如果追溯他的思想根源，我們不難發現他從來都認為落後國家可以從國際資本那邊得到這樣或那樣的好處，那麼 Cardoso 從一個尚稱進步的知識分子，一轉身就變成為跨國資本服務的官僚這樣的發展也就不足為怪了。

第三節 對依賴理論的批判

在左派的論述中，對依賴理論有不同的批評，Tom Bottomore 在他所編的馬克思字典裡總結了對這個學派各種批評：依賴發展理論有一個自己跟自己兜圈子的問題，因此很難說明控制和被控制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強國之所以強是因為它對弱國有控制權，因此可以從弱國抽取剩餘價值的話，那麼就很難說明為什麼從開始強國對弱國就有控制權。在總結中，他的另一批評是：此學派對剩餘產品（剩餘價值）的吸取是從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來分析，但是剩餘價值的產生和分配應該包括階級之間的關係。依賴發展理論不講從開始剩餘價值如何產生，只講剩餘價值在交換中如何分配（Bottomore, 1983: 115）。

馬克思主義者對依賴理論學派提出很多的批判（這裡有必要說明，依賴理論學派中也有人自認和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些文章中的討論和批判就是圍繞著拉丁美洲的發展方向問題。因為有關這一學派的討論和批判不是抽象的，而是跟拉丁美洲的實際發展路線的鬥爭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可以從拉丁美洲知識分子思想上的鬥爭中，看出他們所提出的不同的發展方向。其中有幾點，對我們目前要討論落後國家發展的問題有關聯，下面提出來做進一步的討論。在這裡來討論和批判依賴理論，不是要將問題扯遠了，而是要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後，再回頭來分析在戰後前一時期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落後國家是否曾經有發展自主性的資本主義的可能，和探討這樣發展在八〇年代「全球化」開始之後，這些國家放棄了發展自主性的資本主義的原因。

這裡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學術上的研究，而是為了找出依賴理論和落後國家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之間的關係，以及找出依賴

理論中所存在的問題，以便加以批判。所以上面對對依賴理論的分析並沒有將各個派系做比較。在對依賴理論的批評中，也同樣存著不同的著重點，這裡只對批評依賴理論各派都認同的一點提出，這個批評指出依賴理論只在流通領域談剩餘價值的分配，從對剩餘價值的分配（轉移）來談國與國之間的剝削關係，但是要認識剩餘價值的產生和分配必須要瞭解階級之間的關係。依賴理論不講剩餘價值在生產領域中如何產生，只講剩餘價值在國與國之間如何進行分配。

依賴理論在戰後落後國家發展方向上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如果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是因為這些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交換關係上剩餘價值被佔據了，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應該集中在改變它們與列強之間的交換關係上，而不必去分析發展落後國家內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換句話說，按照這樣的分析會得到的結論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中，它們的資本雖然弱小，但是它們可以用國家的力量、用保護本國市場的政策來抵制外來的競爭，它們可以用保護貿易和對外資的限制，來防止剩餘價值外流。從而獨立的發展出有自主性的，而不是依賴性的資本主義。因此，這個學派的理論就成了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因為如果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是不發展的原因，那麼斷絕依賴就應該可以順利發展資本主義。

對依賴理論的批評中，主要都著重批判這個理論對落後國家的社會，不做階級分析。在 Elizabeth Dore 和 John Weeks 的論述中，他們分析了祕魯的社會，在分析中他們對依賴理論提出嚴厲的批評（Dore and Weeks, 1977）。他們分析了祕魯的資產階級中不同的成分，他們說到了七〇年代後半，祕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

關係為主的發展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在這幾十年中，資產階級內的不同成分都想根據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來掌握國家的政權。Dore 和 Weeks 認為對資產階級的內部應該做區分，這個區分是要根據他們在生產中的物質基礎和他們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來決定。他們認為祕魯國內的大商業資本家是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產階級，他們主要是作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市場之間的媒介。資產階級的這一個階層的活動是屬於流通領域，因為他們不在生產領域內，所以他們和外資之間沒有矛盾，事實上他們就是依靠外資而存在的。在祕魯資產階級中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成分，這一階層的資產階級在本國境內從事生產活動，他們包括大型的壟斷資本，也包括比較弱小的資本。這些資本集中在製造業和礦業，其中也包括魚產加工、金屬加工和製糖等業。

Dore 和 Weeks 為民族資產階級跟外資之間在市場競爭上有利益上的矛盾，因此他們可能會有反帝的進步性。但是因為他們在很多方面無法獨立於國際資本，所以他們反帝的一面常常是軟弱的和動搖的，這兩位作者因此認為左派反帝的鬥爭不能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他們從祕魯的發展歷史中，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與外資有利益上的矛盾，會有反帝的可能，但是他們的反帝不可能徹底。他們也看到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只是要解決他們和外資之間的矛盾，但是這個階級就是靠對工農的剝削而存在的，因此他們不可能去解決階級之間剝削的關係，他們所站的階級地位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發動群眾來反對帝國主義。

我同意 Dore 和 Weeks 的分析，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的反帝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在反帝的運動中不但不聯合工人階級和農民，反而鎮壓他們。工人階級和農民不可能在這個鬥爭中得到解放，因此他們的力量也就發揮不出來。¹

不僅如此，就是因為這個資產階級的軟弱所以反帝的運動中就不可能成功，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雖然在戰後曾經要排除外資的影響，但是到目前為止，除了極少數例外，他們都向國際壟斷資本全面投降了。根據他們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發現與外資合作要比與外資對抗有利的多。拉丁美洲國家資產階級放棄了他們對外資的抵制，放棄了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希望，因此也放棄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到了八〇年代時，他們幾乎完全屈服在壟斷資本所策劃的「全球化」之下。這一點在第八章中還會作進一步的分析。除了拉丁美洲之外，其它落後國家資產階級也同樣投降於國際壟斷資本。但是也有好幾個忠心於國家和人民的資產階級的領袖，當他們拒絕與外來資本妥協時，就被代表壟斷資本的帝國用武力給剷除了，像巴拿馬 Omar Torrijos 和厄爾瓜多 Jaime Roldo's 的下場就是兩個例子。

上面談到對依賴理論最主要的批評是它不從階級關係中談剩餘價值的產生，而只在交換中談剩餘價值的分配。我認為我們可以在這一點上對依賴理論做更深入的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是一個剝削的關係，剩餘價值的產生是資本對勞工的剝削而來的。因此，從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價值必須要經過落後國家內的這一層剝削關係（外資或本地資本的剝削）才能完成。也就是說落後國家的國家和它們的資產階級是帝國將一個國家的剩餘價值抽走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沒有這個環節就無法保證整個帝國主義的剝削機制得以完成。

事實上從發展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價值並不只限於外國資本

1. 一個例子就是拉丁美洲 Allian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 (APRA) 所領導的政治運動。這個反帝運動對工人階級和農民強加控制，因此無法發揮反帝的力量 (Dore, et al, ed. 1977: 2-4)。

所賺的利潤和利息，也不只限於要付給外國資本專利權使用的費用等。從落後國家抽走的剩餘價值也包括了本國資本家和統治階級將私人資本運到國外去的部分。據一個估計，落後國家從1973年到1986年間外債增加了一兆美元，其中有兩千萬美元，又從這些國家轉移到國外去避險（Wachtel, 1988: 263）。像菲律賓的大獨裁馬可仕在瑞士銀行存了幾十億美元的存款，而菲律賓的勞動人民卻為了這幾十億美元擔上了沈重的外債，多少年來，本上加利和利上加利總是還不清，與這相同的例子還多得不勝枚舉。

在依賴理論提出之後，在這個理論中的許多用詞，像「中心」和「外圍」（或邊陲）等，在七〇年代時，不但在討論落後國家發展的文獻中流行起來，甚至使得許多人都很自然的用起「中心」和「外圍」一類的辭句來形容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心有權，外圍無權，中心可以支配，外圍只有被支配。「中心」和「外圍」的用詞很適合用來形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殖民時代的宗主國，在殖民地時代它們有全權來支配所屬於它們的殖民地的發展。殖民地的生產是決定於宗主國的需要，宗主國並且將殖民地的所有剩餘的、無償的掠奪走。在殖民地獨立後，雖然前宗主國在政治上已經不能直接控制它們，但是取得獨立後的前殖民地在政治上和在經濟上仍然不能真正獨立自主。而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繼續不斷的從落後國家吸取大量的剩餘。對這樣的現象陳述的是所有站在外圍的，被支配的國家和他們的人民都會同意的。因此我認為如果只把依賴發展看成是描述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存在著中心和外圍的關係，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用依賴理論來指導落後國家為發展而尋找一條可行之路就會發生很大的問題。

依賴理論與資本主義發展

根據依賴理論所導出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雖然戰後前二十年在落後國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來，落後國家想要獨立的發展自主的資本主義的嘗試是完全失敗了，對它們的具體的經驗和失敗的原因在第八章中將再做分析。這裡要談一下為什麼進口替代在一些國家可以成功，像早前的美國和德國，也像戰後的日本。但是孫中山領導中國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發展則是失敗的，拉丁美洲國家在戰後要發展資本主義最終也是失敗的。

進口替代策略本身並不能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成功的發展有自主性的資本主義，是否能成功要看這個國家有沒有發展資本主義內在的和外在的條件，內在的條件中主要就是決定於資產階級是否有力量。拉丁美洲國家在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時，和四〇年代二次世界大戰時，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形成，所以在戰後可以有一段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到了七〇年代，他們國內的資產階級的力量與戰後在美、歐、日發展的壟斷資本的力量比較起來是太微小了。拉丁美洲國家即使藉助於國家的力量，也還是不能抵抗外來的資本，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力量是以資產階級力量的大小來決定的。弱小的資產階級不可能發展出強大的資產階級國家來。

一個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中還有外在的。第二章中曾經談過大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它在戰前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外，它的發展與美國對日本的政策有關，而且日本的發展也與戰後的初期生產設備不存在著剩餘的產能，所以世界市場的競爭尚不劇烈有關。而到了七〇年代以後，拉丁美洲國家前一階段的

發展逐漸解體的原因，除了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與美、歐、日在戰後發展起來的壟斷資本相比較實在太弱小之外，而且到了七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危機，壟斷資本積累發生困難，「全球化」成了資本積累的出路。在世界範圍內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下，壟斷資本侵入落後國家的每一個領域和每一個地盤。而在這時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還不像日本已經可以獨立的站起來了。因此用進口替代來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能否成功要看當時一個國家內在的和外在的客觀條件。

依賴理論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依賴理論的各派作者們並沒有論證是否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質的變化，和是否因為質的變化使得列寧的分析過了時。如果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已經過時了，那麼落後國家要求國家民族解放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理論和新的策略。但是他們並沒有提出列寧所說資本主義帝國分瓜世界已經完畢的反面論證，他們認為落後國家還是可以在資本主義列強中找到一個獨立發展的夾縫。他們也沒有對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內做階級分析，他們看不到落後國家內資產階級的軟弱和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落後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是同樣一件事。他們無根據的強調國家的力量，認為資產階級可以利用國家來抵抗外來的資本。他們看不到一個軟弱的資產階級又如何能創出一個由這個階級所組合的強有力的國家？依賴理論不但沒有幫助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從他們身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反而將他們誤導到一條死胡同裡。從這半個世紀這些國家的發展看來，理論對發展方向的深遠影響，我們也因此瞭解到對理論的認識和批判的重要性。

第四節 台灣與南韓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經驗

台灣和南韓在六〇年代初採取了與進口替代不同的發展策略，他們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這樣的發展是因為它們特殊的歷史背景。到了八〇年代初，其他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進口替代的發展破產後，都想要向台灣和南韓學習，希望用發展出口來加入世界分工，以便帶動經濟成長，但是到了八〇年代時，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所面對的世界次序已經改變了，因此其它國家無法重複台灣和南韓的發展經驗，就連台灣和南韓在這新的世界環境中，也必須做全面調整，不可能繼續它們在八〇年代之前的二十年的發展。這裡因為限於篇幅，許多有關台灣和發展的重要問題都無法做深入的分析，下面分析的著重點在於八〇年代前，台灣和南韓發展所處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國際大環境。

在五〇年代時，台灣和南韓所面對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國際的大環境是很相似地。在美蘇冷戰中，台灣和南韓在美國全球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策略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們受到美國各方面的支持，而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只有在美國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實現。在第三章中談過日本在戰後的經濟發展與日本與美國在政治上的關係有密切的關聯，因為在冷戰中美國在亞洲需要有日本這個政治伙伴，因此美國願意協助日本發展它的經濟，美國不但允許日本獨立發展自己的經濟體系，而且給日本大量的經濟援助。台灣和南韓受到美國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也是因為它們對美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重要。美國為了要對付中國和北韓，它刻意的要將台灣和南韓發展成兩個資本主義的基地。另外台灣和南韓可以發展加工出口也是與美國和日本之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分不開，美國允許日本用台灣和南韓作為加工基地，

來間接增加日本對美國的出口，美國並允許台灣和南韓長期維持對它們在貿易上的出超。

在六〇年代初，台灣和南韓在用發展出口來帶動工業化之前，它們的經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和亞洲其它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有相似的地方。那時在台灣和南韓的經濟中農業仍佔很重要地位，工業化剛剛起步，工業生產仍以民生輕工業為主，像紡織和農產品加工。到了六〇年代初，農業在國民總生產中的比例南韓為 40%，台灣為 30%。農民佔勞動人口的比例，南韓為三分之二，台灣則剛好一半。在出口的結構中南韓和台灣也都是以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為主，這兩大項目的出口佔總出口的大半。

南韓和台灣在發展加工出口之前，在貿易上都有逆差，在一般的情況下，一個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貿易逆差只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一個辦法就是盡量減少進口和增加出口，另外一個辦法就是資本進口。資本進口除了外來投資就是借外債，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中只有很少數能得到外來的經濟援助。所有美國（和後來的日本）的戰後經濟援助都是出於自身的利益，除了政治的原因之外，就是為了協助它們本國的壟斷資本的擴張。美國對台灣和南韓的援助也不例外。

在六〇年代南韓發展加工出口之前，它的進口和出口佔國民總生產分別為 13% 和 3%，因此在國際收支上有很大的逆差。從 1953 年到 1962 年之間，南韓進口的 70% 是靠美國援助來支付的，在這一段日子內美援約佔南韓國民總生產的 4%。美國給南韓的援助的總數額非常龐大，從 1946 年到 1978 年之間，高達六十億美元。六〇年代初，美國急於擺脫南韓這個沉重的擔子，1965 年南韓與日本簽定恢復正常關係的條約後，日本開始負擔起對南韓經濟援助。

台灣進出口貿易到了七〇年代後才達到平衡，從 1951 年到 1965 年間，台灣平均每年接受美國一億美元的援助，總額為十五億美元，在接受美援的期間，美援每年佔國民生產總額在 5% 到 10% 之間，佔固定資本投資 42%。在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初期，有這麼大數額的外援對它們的發展有很重要的貢獻。美援使得台灣和南韓不必從外面借外債，因此不會因為利息的負擔而妨礙了發展，這是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情況很不相同的地方，這一點在第八章中還要再做分析。

美國對台灣和南韓的援助不是沒有條件的。從六〇年代初開始，台灣進行了一連串的自由化改革，因此在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中，台灣是最早經歷自由化改革的。改革的項目有：匯率的改革、降低關稅、對外來投資優惠的改革，其中包括對外來投資稅制上的特殊優惠、對外資的股份不做限制、並允許外資將利潤全部匯回本國。台灣在六〇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中尚沒有達到八〇年代後新自由主義的苛刻要求（參見第十章）。在六〇年代初，南韓也進行了貿易和投資的改革，但是南韓對外資的限制一直都比台灣嚴格。為了便利外來投資，台灣和南韓也先後成立了加工出口區，在加工出口區內，簡化外來投資和貿易的行政手續，並給外資提供建造好的廠房和它的各種服務。

從五〇年代大規模發展起來的跨國公司急於擴張它們在世界各地的投資，但是當時許多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都致力於進口替代的發展。因此，它們對外來投資做各種限制，而台灣和南韓對外資的優待給跨國公司提供了發展的機會。因此如果撇開政治上的原因，台灣和南韓將它們的經濟開放也是換來美國的援助和外來投資的原因。如果在六〇年代初，墨西哥就設置了對外資的各種優待和便利，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就會優先到臨國墨西哥

投資建廠。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區（maquiladoras）是在八〇年代才設立起來的，比台灣晚了二十年。這樣看來台灣是自由化和取消對外資管制的前鋒，因此也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最愛。南韓則對外資的限制較多，到了九〇年代末的亞洲危機後，南韓才被迫進一步取消它對外來資本的限制和對本地資本的保護。

台灣和南韓在六〇年代初開始用發展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從六〇年代初到八〇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在出口大幅增長下，台灣和南韓的國民總生產都維持了很高的成長率，人民的生活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台灣的出口和國民總生產在 1964 年到 1973 年間的年成長率，分別增加 29.7% 和 11.1%，在 1974 年到 1985 年間的出口和國民總生產的年成長率分別為 18.7% 和 7.7%。南韓從 1960 年到 1970 年間，出口和國民總生產的年成長率各為 34.1% 和 6.4%，在 1970 年和 1980 年間，出口和國民總生產的年成長率分別為 23.0% 和 4.7%。

在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關係上，台灣和南韓也很相似，日本將生產組件運到台灣和南韓，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工加工後再出口到美國，所以在台灣和南韓的加工出口發展起來之後，它們對日本的貿易是逆差，它們對美國的貿易是順差，也就是說日本靠台灣和南韓來間接增加對美國貿易的出口。這種貿易關係跟八〇年代中以後日本去東南亞投資是很相似的，日本通過跨國公司在東南亞的投資，用日本的機器設備和組件，在當地加工生產後再出口到美國。在第七章中，我將對美國長期貿易上的逆差所引起的金融信貸膨脹做分析，也將會說明美國貿易上的逆差問題與資本主義戰後生產設備不斷擴張是相互關聯的。在第九章中將分析東南亞國家八〇年代後大量的外來投資與九〇年代末的危機之間的關係。

六〇年代初台灣和南韓的廉價勞工是吸引外來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即使有前面所提的各種改革和對外資的各種優待，如果沒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供給，用外資來發展加工出口還是無法完成的。六〇年代初，台灣的工資是日本的五分之一，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而且在台灣和南韓的農村還有大量的農業剩餘人口做為後補，台灣和南韓都經歷了專制獨裁，使得工人無法通過組織工會來爭取增加工資和改善福利，在低糧價的政策下低工資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在劉進慶等所著的《台灣之經濟》的第二章中，劉進慶對台灣的發展這樣說：「所謂出口導向工業化顯然就是台灣國際加工基地化」（1995: 127）。而，「這種帶有在獨裁統治下進行開發特點的勞動問題，是台灣和韓國所特有的因素，這才是吸引外資的最大誘因，同時也是支撐了出口競爭力的國際比較優勢的基本因素」（1995: 123）。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台灣和南韓低工資的誘因之外，美國跨國企業來台灣投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要逃避它們因工業污染所造成的負擔。美國從六〇年代底開始通過了幾條重要的保護環境的立法，²這些保護環境的立法使得一些高污染的製造業對他們在生產中排出的廢物所造成的污染推卻責任比較困難，而這些高污染企業不願負擔它們應付的社會成本，而遷離本土。

台灣和南韓能夠在短期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更重要原因是兩地勤勞的工人和農民，他們才是經濟成長的生力軍。另外台灣和南韓的執政者在政治的壓力下進行了土地改革對經濟成長很有貢獻。台灣和南韓在經濟上藉助於國有企業來扶助私有資本的發

2. 包括 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 of 1969，1970 年的 The Clean Air Act 和 1977 年的 The Clean Water Act。

展，提高勞動人口的教育水平，設計產業發展的項目，修建交通運輸和通訊的基本建設，和提供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等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但是我認為除了這些有利於發展的條件之外，六〇年代特殊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是台灣和南韓經濟成長的重要原因。

到了七〇年代末當國際大環境開始轉變時，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就遇到困難，不再能繼續延著過去十幾年的發展方式，到了八〇年代它們的出口和經濟成長速度都慢了下來。事實上這些問題也不是突然來到的，像台灣紡織業與成衣業雖然在 1960 年到 1970 年間的出口增加了十二倍，到了 1970 年時出口值達四億七千萬美元，佔出口總額近三分之一。但是早在 1963 年時美國就對台灣出口的棉紡織品設限。之後，台灣發展了人造纖維紡織品。第四章中說過在 1971 年時，美國因為人造纖維紡織品的進口比前一年增加了 80%，美國就對出口國家施加壓力。日本、台灣、南韓、和香港同意「自動」限制人造纖維紡織品出口。1975 年時歐洲共同體國家也對台灣的人造纖維紡織品設進口限額。

美國和歐洲對台灣出口的紡織品的限制說明了依賴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被動性。到了 1985 年，台灣出口的紡織品中有 92.1% 受美國進口限額，有 84% 受歐洲共同體國家的進口限額 (Bello and Rosenfeld, 1990: 244)。八〇年代初後，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1985 年資本主義大國同意協助美元貶值簽定了廣場協定 (Plaza Agreement)，此後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賣出美元和買入日幣及馬克，使美元相對於日幣、馬克成貶值 (參見第九章)。在美國的壓力下台幣也跟著升值，在 1985 年和 1987 年之間台幣升值 40%。在僅兩年的時間內台幣升值的幅度如此

之大，當然給台灣依靠出口的經濟帶來很大的壓力。在 1987 年到 1988 年之間，台灣有四百八十家紡織公司破產。在 1987 年到 1989 的兩年中，台灣有九千家工廠（佔出口製造業的 10%）關門（Bello and Rosenfeld, 1990: 244）。在這關門的廠商中很多都是將生產移到工資更低的地方生產。台灣早期的勞動密集產業，像紡織、成衣、玩具、製鞋等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已經失去競爭力，台灣必須進行「產業升級」。回頭看來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跟台灣當年的發展很相似，但是中國的經濟比台灣要大好多倍，這樣大的經濟要靠出口來帶動，它將遇到的困難一定是更大的。而今天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和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又比八〇年代要嚴重太多了，這些將在第七章到第十章中做說明和分析。

第五節 台灣與南韓模式發展的代價

台灣和南韓的國民生產高速度成長是靠大量加工出口達成的，從六〇年代初開始的二十餘年中，它們的經濟維持了生產高速增長和充分就業，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些年中逐步提高，直到八〇年代後經濟成長的速度緩慢了下來。當今很多國家都以加工出口做為它們的發展模式，這裡要提出即使加工出口的發展能繼續，這樣的經濟成長的模式也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後果。

以台灣為例，在一切為出口的發展下台灣必須要隨時調整它的經濟來適應國際上的變化。當然在這幾十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變化加速，每個國家的經濟都要隨著作調整，但是對大型跨國公司來說，它們所需要做的調整是較主動的，它們根據世界經濟

發展的趨勢來策劃它們較長期的發展策略。在這個策略中它們決定到哪裡去投資設廠，要將生產包給哪個國家，要從哪裡進口，要進口組件還是製成品，要到哪裡去銷售，但是像台灣這樣形態的經濟只能被動的去反應，在被動的反應中台灣在它參與的國際分工中要不停的廢除舊產業和進入新產業，而且這樣被動的反應速度不停的加快，並且能夠反應的空間卻越來越狹小（參考附錄五）。

台灣在不停的調整中將舊的產業廢除，因此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資源，工廠建起來沒有多久，就又被拆毀。六〇年代建起來的加工出口區今天已經沒落，跟著就是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和台南的科學園區，和現今正在興建的台中科學園區。這些工業園區都是為了協助台灣新產業所建蓋起來的，但是也都將會隨著產業的轉變在二十年之間就要沒落的。而在這建起和沒落之間就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資源，這些人力和資源並沒有被計算在出口的成本之中，而是由台灣的勞動人民來承擔。

除了上面所說的人力和資源的浪費之外，就是大量加工出口所帶來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台灣環境污染的嚴重是所有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都可以感覺到的。在台灣年紀過了五十歲的人都可以說出台灣環境在過去四十年中如何惡化。他們會告訴你在他們記憶中原來可以捉到魚的小溪如今已變為一條臭水溝。因為對自然資源過分的剝奪而引起了土壤的流失和山坡的崩塌。為發展石化工業和電子工業所需要的大量用水而建蓋的水庫不但破壞了自然生態，而且使台灣的水源逐漸枯竭。為了供應大量的工業用電，在這樣小面積的土地上建做了三座（第四座仍在興建中）核能發電廠。

這樣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和對環境的污然不是一般工業化的結

果，而是台灣這樣加工出口的發展所造成的。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台灣的紡織業大盛一時，在紡織業發展的最高峰時，台灣生產的紡織品和成衣中有 80% 出口。紡織業是個非常污染的工業，尤其是整染部分，從台灣進口紡織品的國家的消費者不但可以享受廉價的紡織品而且不必負擔污染帶來的災害，但是台灣的這塊土地卻要承受相當於本地紡織品消費五倍的污染物。同樣的，是大量的豬肉出口引起的水稻田的污染。是大量的電腦零件出口而造成最利害毒物對土地和河川的污染。短短的幾年中，因大量出口鰻魚而抽用的地下水使得屏東的某些地區地層下陷。台灣大量加工出口的結果是東西乾乾淨淨的出去，污染物卻「根留台灣」。台灣的土地、河川、空氣和生活在台灣的人如何能承擔得了這麼大量的毒素？短期的繁榮給子孫留下了需要極長期才能將山河恢復原狀的重擔。

用加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對土地和自然資源是掠奪式的摧毀，這樣無情的摧毀使我想到落後國家從過去殖民地時代到今天在自然資源上另一種掠奪式的摧毀，那就是殖民時代的宗主國和今天的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挖取礦石、煤、石油的方式。就像前面 Andre Gunder Frank 所說的在礦石和其它資源枯竭之後，資本就將這塊地放棄了。台灣和其它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所遭遇到的後果也似乎是相同的。因此我認為大量的加工出口雖然帶動了二十年經濟成長，但是往長遠來看，用加工出口所帶動的經濟成長不可能是永續的經濟發展。

這一章就戰後前期經濟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做了分析和解說。第十章將繼續論述它們在八〇年代「全球化」後的發展。

第六章

七〇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與「全球化」

一個寒冷的夜晚，在一個煤礦工人沒生火的小屋裡，工人的小女兒凍得發抖，問她的父親：「好冷，為什麼我們不生個火？」

煤礦工人回答說：

「我們沒有煤了。」

「我們為什麼沒有煤了？」

「因為我被解雇了，所以沒有錢買煤。」

「爸爸，你為什麼被解雇了？」

「因為煤礦公司說煤太多了。」

Bertell Ollman, *How to take an Exam...& Remake the World*, 2001

從大戰結束到七〇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在戰後所建的體系下，維持了二十多年經濟繁榮和貿易通暢，但是到了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很多隱藏著的問題逐漸明顯化，問題中最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越趨嚴重，因此市場競爭更為激烈。這些問題都牽連著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以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無法得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明顯化也就使得戰後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維持不下去。從七〇年代初開始，這個體系開始崩潰。自 1971 年美元不兌換黃金後，固定匯率勉強維持到 1973 年解體。從七〇年開始，關稅貿易總協在戰後前期促進貿

易的功能減弱。到了七〇年代末，資本主義大國中出現了經濟滯脹問題，在戰後資本主義賴以調節經濟的凱恩斯經濟政策在此時面對經濟萎縮和物價上漲同時出現的問題，也失去對經濟治理的效能。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統治階級在面對這樣的困境時，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結束了戰後的「福利國家」，開始了「全球化」的新資本積累策略，這一章就對這一段歷史加以敘述、說明、與分析。

第一節 剩餘生產設備問題再度明顯化

七〇年代初開始，資本主義大國國內的生產設備的產能經過二十幾年的繼續投資再度過剩。因此，為滿足市場的需求的生產量不能充分利用既存的生產設備。生產設備利用率過低，造成了利潤率下降的壓力。為了增加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和新投資能夠繼續，大國之間的市場競爭也跟著激烈起來。西歐國家在戰後的重建完成後，成為美國競爭的強手。尤其是德國，它在大戰前已經是高度發展的工業國。德國在輕工業和重工業上都有很強的基礎，它的機械製造業早以高精確度著名。英國、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各西歐國家都早在十九世紀或更早，就已經確立了它們自己的獨立工業系統，因此在戰爭中雖然工廠被摧毀了，在大量的新投資之下，只需要很短的幾年生產就很快的恢復了，而且新的投資帶來技術的更新，使得生產更加有效率。

戰前的日本雖然也已經發展了資本主義，但是它與美國和西歐國家相比還相差甚遠。第三章說明了，日本戰後的發展與美國的援助有直接的關係，而美國對日本戰後的援助又是因為日本在

美國全球冷戰的戰略中有特殊重要地位。第三章中也說明在戰後，日本以國家為主導，有計畫的發展了它的重要產業，而且日本戰後的工業發展是以它的產品能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為目標，經過了戰後二十年的發展，日本在各工業產業中很快的趕上了美國和西歐國家，第三章中提過日本的經濟在 1953 年到 1973 年間每年平均上漲 8%。但是日本戰後的發展也進一步加深了六〇年代後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造成了（也加重了）八〇年代後各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到了 1973 年後，日本的經濟成長率下降到 4%。到了九〇年代初，日本陷入了資本主義國家戰後從來未有過的最嚴重的危機。因此，到了九〇年代初，日本戰後成功的發展，反而成了它這十幾年來無法走出困境的原因。

從下面表中的鋼鐵和汽車的產量，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後生產比重的改變：

國家 \ 年份	鋼鐵（百萬公噸）			汽車（百萬輛）		
	1950	1960	1973	1950	1960	1973
美國	88	90	136.4	8	7.9	9.7
日本	5	22	119.3	--	0.5	4.5
西歐	50	106	150.0	1.5	5.5	10.4
德國	12	34	49.5	0.3	2	3.6

資料來源：Yann Fitt, Alexandre Faïre and Jean-Pierre Vigier,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148.

以汽車業為例說明世界性的生產設備過剩

大戰之後，世界生產設備如何在短短的二十年間就發展到產能過剩？這裡用汽車業的發展為例子來加以說明。我們不難從對汽車業的分析來推廣到其它產業。到了七〇年代初，幾乎所有的產業都存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而且這樣的產能過剩不是僅限於某幾個國家，而是世界性的。經過了二十年的發展，美國的汽車生產已經不再能一國獨霸，先是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生產的國家，不久日本就趕了上來。第三章曾經提過日本戰後的發展策略是由國家選擇幾個重要企業，然後國家從各方面給予支持，使這些企業得以全力發展。因為汽車業可以帶動其它工業的發展，所以日本政府選定汽車業為待發展的重要企業之一。前面也提過，日本戰後的發展從開始就以與美、歐資本主義大國競爭，和打進它們的市場為目標。

1956年時，日本汽車生產還僅達一萬輛。六〇年代時，日本汽車業的各家公司，重新以達到美、歐水準為目標來設計它們的汽車。在重新設計後，日本的汽車業發展的很快，到了1968年時，日本就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汽車生產國。美國也開始進口日本汽車，1970年時，美國進口汽車已經從五〇年代初幾乎是零，達到了佔本國市場的15%。豐田和日產兩家公司在美國市場中的銷售量僅次於德國大眾汽車，成為第二位和第三位（Rae, 1985: 127）。

到了六〇年代，美國和歐洲的汽車生產增加速度已經緩慢下來，但是日本的生產還是以高速度增加，所以日本汽車在世界總生產中所佔的比例增加。日本這樣的發展也就加深了世界的汽車和其它產業生產設備的過剩問題，因為日本的國內市場並不能吸

納得下它所生產的汽車，多餘的汽車必須要在國外找市場。

到了 1978 年，世界汽車生產達到戰後最高峰，共四千二百五十萬輛，是 1950 年的四倍以上（Rae, 1985: 165）。在第三章中談過，汽車業對美國戰後經濟繁榮的貢獻，而美國汽車業的發展又與美國公路建設、廉價汽油的供給、和郊區化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第三章中也談過這樣的擴張不可能長期的持續下去，因為大規模的公路建設和都市內的工廠以及人口遷移到郊區，都只能發生一次，不可能不斷的重複。而且不管住在郊區的人多麼依賴汽車做為交通工具，每個家庭也只能從沒有汽車到擁有一輛汽車、兩輛汽車，或再多到三輛汽車，但是總不可能無止境的增加下去。增加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後，消費者就只為了淘汰舊車而購買新車，因此汽車的需求增加速度就會緩慢下來，甚至於下降。到了 1978 年，石油出口國家第二次將石油提價時，汽車業進入了戰後到那時為止的最嚴重的危機。

1980 年，世界汽車生產因為市場滯銷，銷售量降到三千八百六十萬輛，與 1978 年相比下降近 10%。美國汽車在世界總產量中所佔的比例更從 1950 年的五分之四下降到 1980 年超過五分之一。在 1978 年和 1980 年之間，美國汽車公司在國內的生產量下降了兩百七十萬輛，在同一時期內，進口車的車輛增加了四十萬輛。1980 年，豐田和日產宣佈來美國建廠，1981 年美國的汽車出售量繼續下降，1982 年初，美國汽車公司關閉了二十家汽車工廠，解雇了三十五萬工人（Rae, 1985: 127）。

從戰後汽車業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推廣到其它產業，像與汽車相關聯的鋼鐵業、橡膠業、煉油業、汽車零售業、汽車修理業、公路的修建等等，或是與汽車並無關聯的其它產業，像其它的耐久的消費品或其它的輕工業或重工業品，都經過了戰後二十

年的擴張，而到了生產設備過剩的階段。當然我們不能靜止的去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一個產業衰落下去之後，會有另一企業發展起來，在戰後發展起來的飛機航空業和電子計算機業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到了八〇年代後，這些戰後發展起來的新企業也同樣發生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所以產能過剩的產業不僅是一個或兩個，也不僅只限於舊的產業，而是所有的產業。而且產能過剩也不是僅限於一個國家，而是所有的資本主義高發展的國家。如果一定要區分，也只是產能過剩程度上的差別而已，有的產能過剩較嚴重，有的國家生產設備過剩比較嚴重。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從六〇年代初開始將一些勞動密集的生產移到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去生產，美國和日本在這些國家（地區）的投資進一步增加了世界生產設備的總產能。從八〇年代初到今天又過了二十年，資本主義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從資本主義大國進一步擴張，隨著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解體和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產能過剩更進一步擴張到全世界。這裡說遠了，這些要到第七章到第九章中再討論。下面先討論到七〇年代時因為生產危機而導致戰後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解體。

第二節 戰後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從癱瘓到解體

六〇年代中後，資本主義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再度明顯後，戰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國際體系陷入癱瘓。七〇年代初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關稅貿易總協促進貿易流通的功能隨著各國紛紛設立起非關稅貿易障礙而逐漸消

失，世界資本主義結束了前一時期各大國之間在競爭下的合作關係。在生產設備的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國民總生產增加緩慢，資本積累發生困難，當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陷入癱瘓時，危機也就因此更加嚴重。

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固定匯率解體

在第四章中已經談過固定匯率因美國貿易逆差引起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而發生動搖，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一方面說明歐洲和日本戰後的發展，使美國的工業生產已經失去戰爭剛結束時的絕對優勢，到了六〇年代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後短暫的商品需求高出供給時期已經過去。就像第四章中所說的，二次大戰對生產設備的摧毀到六〇年代不但已經恢復，而且資本主義大國：美、英、德、法和日本的生產設備遠超過戰前，生產設備的產能相對於需求過剩的矛盾又再次變得明顯，大國之間在市場上的競爭也就跟著激烈起來。

1964年開始，美國的物價上漲率增加，其中部分原因是美國開始擴張它在越南的侵略戰爭，在詹森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在軍事擴張之餘，又增加福利的支出，造成了政府財政上赤字的增長。此時美國的經濟發展到戰後頂峰，失業率很低，在充分就業下，政府的赤字支出不會再使國民總生產增加，只會造成物價上漲。美國國內物價上漲，使得美元的實際購買力與其它貨幣相比下降，但是在固定匯率下，美元相對其它貨幣的官定價格不變，因此美元的實際購買力比它的官定價格要低，也就是說美元的官價高估美元的價值（over-valued）。美元過高的官價使美國的出口更困難，並同時刺激了它的進口。美國進口的增長率超過它的

出口的增長率，進一步加深了它的貿易逆差的問題。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美國前一段的優勢逐漸消失。在 1964 年到 1968 年間，美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 27%，在同一時期德國的工業品出口增加了 50%，法國增加了 38%，加拿大增加了 92%，日本增加了 100%。從 1952 年到 1968 年，美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總出口額的比率從 35% 降到 22% (Johnson, 1974: 225)。

美元的官價過高雖然不利於它出口，但是卻有利於它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因為按照官價美元可以換得多過於它實際價值的其它國家的貨幣。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在六〇年代增加的很快，從六〇年代前半每年平均十八億美元，增加到六〇年代後半每年平均三十三億美元。到 1971 年時，更達到四十四億美元 (Johnson, 1974: 225)。

在第四章中說過，到了 1958 年時，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已相等於它國內的黃金儲存量的總和，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國外的美元都回到美國以三十五元換取一兩黃金，美國就將失去所有的黃金儲存。到了 1959 年，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又打破了戰後的記錄 (除了 1950 年因韓戰引起的高入超外)。美國在國際收支上持續的逆差主要是出自它的經常帳項目 (包括貿易上的順差) 中的順差不能補足過因資本家繼續大量到國外投資，以及它每年要支付在全世界各軍事基地的開支而導致資本帳上的逆差 (對經常帳與資本帳的解釋參見附錄三)。因此，美國在它境外累積的美元持續增加，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從五〇年代末開始持續到六〇年代，這十幾年中，發生了好幾次美元擠兌黃金的危機。

這樣一個完全不穩定的固定匯率體系因為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辦法，又拖延到了六〇年代的後期，這時美國因侵越戰爭的龐大軍事支出，使得它在國際收支經常帳中 (進口超過出口) 也產

生逆差，而且逆差不斷的擴大。美國對歐洲國家每一年在貿易上的逆差，就等於歐洲對美國侵越戰爭在經濟上的支持，因此引起歐洲一些國家的不滿，開始提出反對越南戰爭的輿論。在六〇年代末，法國總統戴高樂更帶頭攻擊美元，擠兌黃金再度開始。這次法國能拿到許多美元是因為美國在南越的軍費和其它支出，被南越官員貪污去了，然後再把他們貪污來的錢存進前殖民宗主國法國銀行的私人帳戶裡，法國拿到這些美元向就美國擠兌黃金。美國黃金儲存量從 1960 年時的一百八十億美元，下降到 1968 年的一百億美元。美國雖然用各方面的威脅來阻止其它持有美元的國家兌換黃金，但是此後，美元與黃金原定價格再也維持不下去（Wachtel, 1986: 76）。

最後到 1971 年時，美元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三十五美元兌換一兩黃金的原定價格。1971 年 8 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美國停止接受美元與黃金的兌換，並且將美國進口商品項目中的一半在原進口稅之上再課加 10% 的臨時進口關稅，同時又增加了農產品進口限額的項目。美國這種完全出於自身利益的單方面決定，使所有國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和所有私人手中所持的美元，都變成不可兌換的和價值不定的紙鈔。此後，在 1971 到 1973 間，資本主義大國用各種辦法來挽救固定匯率而不得成功，終於在 1973 年，國際貨幣基金正式宣佈固定匯率解體。從 1944 年成立，到 1973 年的二十多年中，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固定匯率制度。在固定匯率之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通暢，經濟成長迅速，資本積累順利。到了固定匯率制度解體後，戰後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非關稅貿易障礙的設立

從七〇年代開始，因資本主義大國的生產大量的過剩而引起激烈的市場競爭，各它們之間的貿易爭執也就更加頻繁，特別是美國單方面用強制的手段來保護本國市場，或打開其它國家的市場，引起其它資本主義強國的不滿（參見附錄一）。關稅貿易總協在前一時期對各別國家行為約束的能力也因此而減低。在貿易爭執升級下，用談判來達成協議也就越來越困難。在美、歐、日的市場激烈的競爭下，它們之間貿易上的爭執的範圍不但擴大，而且更加頻繁。

這時資本主義大國除了用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外，它們又設置好幾種非關稅貿易障礙（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NTB's）來阻礙進口和增加出口。非關稅貿易障礙包括進口限額（import quota）、自願限制出口（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自願擴張進口（Voluntary Import Expansion）、和反傾銷（Anti-dumping）等項。

進口限額的最好例子就是第四章中提過的資本主義大國在關貿總協成立之初，所設立的農業的進口限額，和 1962 年時，關稅貿易總協設立了對棉紡織品進口的限制，以及 1974 年的多邊纖維品安排（Multi-Fibre Arrangement）。這些進口限額都是從資本主義大國的利益出發，由它們單方面的決定用設立限額抵制進口。第四章中曾說過這些限額的設立都是違反關貿總稅貿易協定和他所推崇的精神，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關稅貿易總協的決定並不根據什麼原則，而是根據資本主義強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但是總的來說，在戰後前二十年中，用進口限額是比較特殊的例子，到了七〇年代初之後，就變得普遍了。除了 1974 年的

多邊纖維品安排之外，前面也提過在尼克森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金時，他又增加了美國農業中進口限額的項目。

除了進口限額外，自願限制出口是另一種非關稅的貿易障礙。第三章中曾經提過，自願限制出口從五〇代末就開始了，那時美國在紡織業生產上已經受到日本的挑戰，為了要保護它的紡織業，美國在 1956 年開始對日本施加壓力。當年美國國會通過一條法律，授權給總統使他可以主動與外國談判，來限制紡織品的進口。1957 年，日本沒等美國要同它談判，就趕快先自動限制此後五年內紡織品的出口。日本這樣做是在美國的政治的壓力下取得妥協。（Keesing and Wolf, 1980: 15; Yoffie, 1981: 575）。到了 1971 年時，美國的人造纖維紡織品又受到進口的威脅。在美國的政治壓力下，日本、台灣、南韓和香港同意自動限制人造纖維紡織品的出口。到了七〇年代後，美國要求別國用自動限制出口來保護自己的市場的做法更加頻繁起來。八〇年代之後美國更要求別國自願擴張進口，這是美國用政治手段來達成保護本國資本的另一方法（參見附錄一）。

除了上面所說的工業品貿易外，歐洲共同體與美國在農業貿易上也不停的起爭執。歐洲共同體和美國的農業保護政策使得他們的農業生產大量超出它們本地市場的需求，因此必須尋找國外市場。歐洲共同體的農業保護政策使得它的農產品的價格高出世界市場的價格很多。這樣的高價是靠進口限額、出口補貼、和政府收買農產品來維持的。歐洲對農業的保護政策不但削減了美國農產品在歐洲的市場，而且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上，歐洲也和美國直接競爭。歐洲共同體所包括的十二國的農產品的出口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農產品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從 1960 年的 33% 增加到 1985 年的 66%。在 1960 年到 1985 之間，美國向關

貿總協提出對這些歐洲共同體國家的抗議中，80%是有關農業的。資本主義大國在農業貿易上的爭執得不到解決，而且農業補貼對資本主義大國財政上的負擔越來越沉重，這就是資本主義大國將農業貿易列入第八回合貿易談判中的原因。

另外，美國還用反傾銷來抵制進口，美國在競爭不過進口的商品時，就責怪對方國家用低於本國的價格向美國傾銷。凡是遭受到被判定為傾銷的國家的商品就要被美國課加更高的進口稅。但是要判定一個國家出口的商品的價格是否過低，並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而是由美國單方面決定的。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看出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並不完全決定於國家的經濟力量，經濟力量的背後還有政治力量，政治力量的背後是軍事力量，和意識形態的力量。日本在戰後不管經濟上多進步，但是在政治上一直無法從美國獨立出來，在軍事上也是要靠美國保護，所以在貿易爭執中都只好讓步。連日本在與美國貿易爭執時都要讓步，又何況台灣和南韓？

從七〇年代初固定匯率解體後，到八〇年代初，在貿易激烈的競爭中，資本主義大國所設立起來非關稅貿易障礙，這時美國更對其它國家採取了攻擊性的單方面制裁（參見附錄一）。在這樣的環境下，關稅貿易總協逐漸喪失了它過去用多邊協定的機制來促進世界貿易流通的功能，這十幾年的發展顯示了世界資本主義內在的變化。當資本主義大國面臨生產設備極端過剩時，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資本主義大國之間想要像前一時期用協定的方法來達成合作也就更困難。這裡舉這些例子來說明這個事實，提到美國對其它國家施加政治壓力，重點不是要進入各列強之間彼此對峙的關係中來判斷誰是誰非，而是要用它們之間的爭執來說明世界資本主義的積累到了這時發生了問題。美國之所以能夠

單方面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這些國家一方面雖然說明美國的霸權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這些國家非常急迫的需要美國的市場。

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資本主義的體系，經過戰後二十年的發展而陷入癱瘓，使得前一段日子的商品貿易和在國與國之間的資本流動發生了阻礙。這樣的阻礙更增加了資本積累的困難。資本除了要求商品貿易流通外，壟斷資本更有強烈的要求要能在世界各地通行無阻，這已經不是在原有的關稅貿易總協下所設立的貿易體制可以達成的。這就是在 1986 年開始關貿總協第八回合（烏拉圭回合）談判的背景（參見第八章）。

第三節 歐洲美元膨脹、石油加價與危機加深

歐洲美元膨脹

七〇年代初的世界經濟危機，因為石油加價而惡化。在分析這一段歷史之前，我們需要對歐洲美元（Eurodollar）有所瞭解。歐洲美元是美元在歐洲的美國分行或歐洲銀行中的美元存款，這些存款沒有兌換成當地貨幣，而是以美元直接存入這些在銀行的帳戶內。歐洲美元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洲和美國之間貿易額和投資量在戰後大幅增加，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是歐洲美元的主要存款者，這些跨國公司在歐洲有龐大的投資，它們在歐洲的收入為了便利未來的支出，就將美元的收入不兌換成當地的貨幣，而直接存入當地的美國銀行分行或歐洲銀行中。之後，歐洲的跨國公司與美國之間的生意往來擴大，它們也將美元收入直

接存入這些銀行。在六〇年代初時，美國政府因境外美元積存過多，因此受到美元匯回美國要求兌換黃金的壓力。美國政府開始對資本外流加以管制，再加上歐洲較高的利率，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就更為了資金調動的方便和利息的收入，而將更多的美元存入歐洲的銀行而不匯回美國，也就更增加了歐洲美元存款。

對美國銀行在歐洲的分行和歐洲本地的銀行來說，歐洲美元存款既不受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管制，也不受存款所在的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的管制。因此，這些銀行在貸款時，貸款的數額不必受準備金的限制，這是歐洲美元可以在存款和貸款的過程中快速增長的原因。在 1971 年到 1973 年之間，美國境外的美元不能再回到美國換取黃金，也存入歐洲的銀行，在這兩年中歐洲美元的年成長率為 25% (Wachtel, 1986: 92)。因為歐洲美元的貸款不受任何中央銀行儲備金的限制，也不受任何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對它們國內一般銀行的管制，所以被稱為沒有國家的貨幣 (stateless money)。這種沒有國家的貨幣因為沒有國家的管制，可以成倍數的增加，而事實上就是這樣發展的。

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和固定匯率解體後，美元仍然充當世界貨幣，歐洲美元也是世界貨幣。歐洲美元的快速擴張增加了國際間的交易媒介，也直接影響國內貨幣的供給量。一方面，歐洲美元在歐洲作為交易媒介就像增加了歐洲本地的貨幣流通量一樣，區別只是在歐洲美元都是用於大數額的交易。另一方面，美國的銀行可以將它們在歐洲分行的存款用轉帳的方法調回美國，也增加了美國銀行的貸款能力和貨幣流通量。在美國和歐洲之外的國家，歐洲美元也同樣的可以流通。之後，又出現了歐洲國家之外，世界其它國家的美元存款。所以這種沒有國家的、不受管制的貨幣可以跨過國界地跑來跑去，因此使得一個國家對它自己的

貨幣控制的能力就減弱了。

石油加價

1973年10月，美國在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戰爭中支持和援助以色列，引起阿拉伯產油國家的不滿，他們聯合了其它石油輸出國家，用限制石油生產和出口，來提高石油在世界市場的價格。從1973年到次年4月之間，每桶石油的價格從三美元上升到十二美元，上漲了四倍。石油加價就使得本來已經蕭條的世界經濟進入了危機，這次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大國自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1974年主要的世界資本國家都進入經濟蕭條，到1975年除了日本之外，各大國的國民總生產下降更多，美國的國民所得下降4%、西德下降3.5%、法國下降2%，在國民所得下降的同時物價暴漲，在1973年和1974年美國消費者的商品和勞物的零售物價指數上漲5.6%和11.5%、日本為11.8%和21.7%、德國較低為7.1%和7.3%、英國為8.5%和15.2%、法國為7.1%和13.2%、義大利則為10.8%和19.6%。

1979年時受由美國支持的伊朗夏王朝國王（參見第三章）被回教的基本教義派的勢力趕下台，使得石油出口受到阻礙，石油價格第二次上漲，從1978年的十三美元一桶上升到1980年三十二美元一桶。石油是所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最重要的能源，美國、歐洲、日本都依賴進口石油，石油的價格的低與高不但與汽車業的興與衰有密切的關係，而且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其它工業甚至於農業都依靠石油為能源。高油價就會提高生產成本。第三章中曾談過廉價石油對美國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經

濟成長的重要性，石油加價後，引起了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與汽車相關聯的產業危機，因此也更加深了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國）資本積累所面臨的困難。

危機加深、經濟滯脹

前面說過到了七〇年代初，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嚴重了起來，這是主要的問題。但是石油加價卻使得已經存在的危機加深。第一次石油加價之後，資本主義經濟陷入了如上面數字所顯示的經濟蕭條和物價上漲同時發生的一種滯脹的現象（stagflation），而這種現象是在七〇年代前從未發生過的事。在七〇年代之前，在經濟繁榮時，充分就業，物價有上漲的壓力，當經濟蕭條時，則需求不足，因此物價不但不會上漲，也還有可能下降，經濟大恐慌時曾經發生過物價不斷的下降的現象（deflation）。這種在高失業的同時而物價又上漲的現象是個新的經濟問題。

在第一次石油加價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經濟滯脹的新問題。前面說過在六〇年代時，美國因為侵略越南戰爭而帶來財政上和貿易上的赤字，這時經濟已經達到充分就業，在生產不能再增加時，通貨膨脹問題日趨嚴重，物價上漲幅度增大。美國通貨膨脹背後原因很多，而且政府赤字支出到卡特總統當政後並沒有減少，這些都是侵略越南戰爭留下來的後遺症。但是為什麼在經濟蕭條之後，物價上漲卻仍然持續呢？

主流經濟學家對滯脹發生的原因做過一些解釋，其中最通常的解釋是七〇年代之前的物價上漲是來自需求太高（demand-pull inflation），而到了七〇年代時的物價上漲則是來自成本上升過快

(cost-push inflation)；成本中包括石油的加價。這些經濟學家也把物價上漲歸罪於工資太高，也就是說因為成本高而帶來的物價高漲，並不會因為需求不足而緩慢下來，這樣對經濟滯脹的解釋這就給八〇年代雷根總統上台後所推行的「供給面經濟」(supply-side economics)鋪路。「供給面經濟」認為凱恩斯只注意經濟的需求面忽略了經濟的供給面，因此，只有在減低生產成本上下工夫，才能解決物價上漲的問題。

但是一個常被忽略的經濟滯脹的原因就是七〇年代歐洲美元擴充過快，而使得國際支付媒介過於充沛，而這一點又和七〇年代中後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擴大有互為因果的關係。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變成世界貨幣時，各國之間的貿易交易所需的貨幣數額決定於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的大小。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大，美元就因為支付逆差而流向國外，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也就更多，也就增加了國與國之間貿易交易（和外匯儲備）的貨幣供給額。從1944年到1971年間，國際貨幣基金維持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在這一段時期內，美國境外的美元是它每年國際收支逆差累積的總額。美國境外的美元除了私人所持有的之外，其餘就是作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在固定匯率的體系之下，每過一段日子，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過大時，都會發生美元貶值和擠兌黃金的危機，這一點前面已經討論過。因此在固定匯率時期，世界貨幣流通量受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數量的限制，而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數額又受可能發生的擠兌黃金的危機的約束。

到了固定匯率解體後，這兩個限制反而都不存在了。在美國境外的美元可以隨著美國的逆差而增加，美國不必擔心這些美元會回來兌換黃金。除此之外，又加上歐洲美元的增長，歐洲美元的數量不由美國的國際收支的逆差來決定，而是決定於美國銀行

在歐洲分行和歐洲銀行的美元貸款。這些貸款的數額並不受任何中央銀行的限制。上面說過這些銀行的貸款就使得歐洲和美國的貨幣流通量膨脹，因此除了石油價格上漲之外，貨幣流通量和信貸的增加也是引起一般物價上升的原因。

由石油漲價而引起的物價上漲的問題外，石油加價也給本來就蕭條的經濟帶來新的問題。石油加價造成了汽車和其他產業的不景氣，更進一步造成生產成本上升。石油出口國家把它們由石油加價而增加的美元收入存入歐洲的跨國銀行，歐洲美元的存款數額因此而更大幅的增長。也就是說，大筆的美元外匯從石油進口國家流到石油出口國家，因此更削減了石油進口國家購買其它進口商品的能力。石油出口國家將所得美元外匯存入跨國銀行，在銀行不能把錢貸出去之前，石油出口國家的存款就卡死在那邊，這就更加深了資本主義大國商品滯銷的問題，進一步加深經濟危機。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有石油美元再循環這樣的發展，這一點在下面會再做解釋。

第四節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危機的延緩

在石油加價之後，歐洲的跨國銀行接連著收到了石油出口國家的大筆存款。對這些跨國銀行來說，它們必須想辦法將這些新存款貸出去。如果錢貸不出去，這些銀行一方面要支付利息，另一方面卻沒有利息的收入，那就會虧本。在這樣的壓力下，要找到借款的人就變得非常緊急。從世界資本主義的整體來看，在跨國銀行把錢貸出去之前，除了銀行利潤的壓力外，國際間的商品和資本流通也會產生困難。就像上面所說的，如果本來用做支付

國際之間的交易購買力（美元）因為石油加價而流到石油出口國家，石油出口國家把美元存在銀行裡，如果銀行不能用貸款使錢再進入流通，就會引起世界貿易和投資的支付能力（美元）的緊縮，進一步加深當時的危機。

我們可以將這情況比喻成在一個國家內，如果中央銀行將銀根緊縮，投資和消費的支出就會因為支付媒介緊縮而減少，因而導致經濟蕭條。因此如果跨國銀行這時不能將這突然增加的大量存款貸出去，就會引起國際支付媒介短缺的問題。也可以比喻成像金本位時如果做為國際交易的黃金突然大量的消失了，國際間的交易媒介突然減少，就會更進一步加深世界性的經濟蕭條。

但是在七〇年代初時，因為世界經濟已經進入蕭條，跨銀行的經常顧客，美歐和日本的跨國公司，因為普遍積存的生產設備過剩問題而缺少投資的機會和誘力，它們也就不會向這些銀行借錢，因此跨國銀行必須另找貸款的出路。

石油美元再循環和第三世界國家外債

在石油出口國家兩次提高油價（1973-1974 和 1978-1979）之後，第三世界的石油進口的國家發生了嚴重的外匯短缺問題。這些國家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外匯來支付石油進口，同時這些國家在戰後的二十年中開始依賴糧食進口（參見附錄四）。1973-1974 年間，世界小麥價格因為蘇聯小麥歉收而高漲，因此這些國家需要更多的外匯來進口石油和糧食。除此之外，因為世界經濟蕭條而對原物料的需求減少而導致價格下降，第三世界許多國家靠原物料出口為主要外匯的來源，這些國家因此面臨了外匯收入下降困境。在進口所需外匯增加和由出口所得外匯減少的

雙重壓力下，這些國家在國際支付上發生嚴重的外匯短缺的困難。這時它們就正好成了這些跨國銀行的顧客。跨國銀行就用盡各種辦法將錢貸給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在外匯短缺情況之下，跨國銀行又把錢送上門來，而且利息又低，它們就借了大筆的外債。¹

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解決了跨國銀行新增加的存款無處可去的問題，供給了這些銀行牟利的好機會。同時也紓解了資本在流通領域停滯不動的問題，緩和了因為國際支付媒介的緊縮而引起更嚴重的需求不足，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對壟斷資本同樣重要的是，到了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成長緩慢，壟斷資本基地所在國家的資本積累發生困難，因此，必須更進一步到外面去找出路。藉著外債的形式，壟斷資本找到了進入第三世界國家的管道。

壟斷資本進入發展落後國家除了直接投資外還有貸款（包括由落後國家發行債券）等方式。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二十年中，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下，對外國資本直接投資有較嚴格的限制。在與外資合股的公司中，外國股份一般都被限制在 50% 以下，另外，這些國家對從國外貸款也有一定的限制。到了七〇年代初，特別是在石油出口國家將石油提價之後，落後國家在緊需外匯的情況下，除了放寬這些限制外，沒有什麼選擇，世界壟斷資本也就藉這個機會大量進入第三世界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的執政者一方面急須外匯，另一方面它們可能誤認向外國銀行貸款，要比由外資直接控制它們國家的企業要

1. 跨國銀行一方面用獎金和升等的辦法來鼓勵它們的行員向第三世界國家貸款，另一方面則放寬貸款的條件（Wachtel, 1986: 108）。

好。事實上外資進來就是為了賺錢，要賺錢就必須取得控制權。落後國家從外國貸款，其實比外來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問題更為嚴重。因為外來直接投資只有在賺到利潤時，才能將利潤匯回國，但是銀行貸款則一定要按時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而且銀行保有隨時將利率提高的權力。

七〇年代初，在生產設備過剩的情況下，剩餘的資本找不到新投資的去處。在石油加價之後，在 1974 年一年中，石油出口國家總共收到六百八十億美元，這筆外匯收入相等於 1973 年石油出口全年收入的十倍。此後，石油出口國家因石油加價而獲得的美元外匯繼續增加。因此在 1974 年到 1977 年四年之間，石油出口國家國際收支順差總共為一千三百七十三億美元（Wachtel, 1986: 105）。在這樣短的時期內，有這麼大數目的資金轉移，除非這筆資金能再回到流通領域，國際之間支付媒介就必然要發生緊縮的問題，資金的緊縮會使得本來就蕭條的市場更加嚴重起來。

錢不能自己生錢，只有資本才可以增值。因此如果跨國銀行能把石油出口國的存款借給第三世界國家，這些國家用借來的錢，變成生產資本來增值，這些銀行就可以用利息的方式將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抽出去。但是問題是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借錢主要是為了應付外匯短缺，因此大多數的國家並不可能將借來的錢變成生產資本來增值。即使將所借的錢投入生產，也不一定能產生出那麼多剩餘價值來，或者是剩餘價值產生了但不能實現成利潤，或者雖然商品能夠在本地出售后將利潤實現了，但是本地出售的商品只能獲取本地的貨幣，生產出來的商品如果沒有出口市場，就不能換取所需的外匯來支付銀行的利息和償還本金。這就是從國外借債和國內借債最大的區別，國內債是用本國貨幣償還，但

是外債必須用外匯償還。借債國只有在外匯收入超過外匯支出時，才有能力還債，否則他們就只有借更多的債，結果就一定是本上加利，和利上加利，因此越欠越多，外債危機就開始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一個落後國家可以將商品出口，賺來的外匯也不一定會用來還債。出口所得來的外匯歸私人所有，如果私人所賺的外匯兌換成本國貨幣，那麼這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存就會增加。但是這些私人所賺的外匯常常就存在國外的銀行，不匯回國。或者以外幣存在本國銀行，到有危機到來時，就馬上轉帳到國外銀行去。

美元從資本主義大國和一些發展落後國家經支付石油進口到石油出口國家，石油出口國家拿了美元存入跨國銀行，跨國銀行轉個手借給第三世界世界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再用借到的美元來進口石油，和支付從資本主義大國進口的商品。因此大部分美元兜了個大圈子又回到資本主義大國，這整個過程被稱作石油美元再循環。² 石油美元再循環暫時延緩了國際之間支付媒介緊縮的問題，避免了因國際支付媒介緊縮而進一步使危機加深。

從短期來看石油美元再循環使錢活起來，暫時解決了世界資本不流通的問題。這樣的作法短期內可以增加第三世界國家的進口的能力，但是落後國家這樣的購買力是靠借債來的，就跟窮人用信用卡買東西一樣，窮人收入不夠支出，用信用卡買東西暫時增加了購買力，這個新增加的購買力會暫時紓解商品滯銷的問題。但這購買力的增加是靠借債來的，對借債人來說將來還債時，是本上加利，而且還可能是利上加利，因此長期來說發生債

2. 石油美元再循環也應該包括將由石油出口國家用石油出口的美元來買美國公債和請美國公司來建發電廠和其它基本建設，美元經過循環後再回到美國。

務的危機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在借債人不能再繼續借債，或者所借的數額只夠還債時，商品滯銷的問題就會重新再出現。

上面提到石油美元的數額龐大，石油出口國家的順差從1974年到1977年總共有一千七百三十億美元。根據一個估計，第三世界向外國商業銀行的借款總額從1974年底的四百四十億美元，增加到1979年底（第二次石油加價後）的兩千三百三十億美元，相當於五年前的五倍多（Volcker and Gyohten, 1992: 190-191），第三世界外債的快速增長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的結果。藉著石油美元再循環，資本主義大國一方面將危機向後拖延，另一方面將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從八〇年代初開始的第三世界外債危機，就是七〇年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拖延和轉嫁的結果。這一點將在第八章中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第五節 凱恩斯政策失效與新自由主義改革

前面說過七〇年代初後，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出現了一段經濟滯脹（stagflation）的新現象，也就是說在經濟停滯的同時物價上漲。第三章中所談的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只能用來對付經濟蕭條或者是物價上漲。如果物價上升是因為需求過高，也就是說如果在充分就業（像1967-1969年間因越戰的軍事支出而刺激起來的生產的增加）之下的生產還是不足供應需求，那麼執政者可以採取凱恩斯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抑止物價上漲。如果經濟因為需求不足，東西賣不出去而必須減產，使得經濟蕭條，凱恩斯就主張採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便幫助刺激需求。但是在經濟滯脹是高失業和高物

價上升同時發生，凱恩斯經濟學就拿不出應付的政策了。

七〇年代初後，經濟滯脹問題帶給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策執行者很大的困擾。在尼克森被迫辭職後就任的福特總統，當時看到高速物價上漲會對經濟穩定產生威脅時，他就宣佈通貨膨脹是公眾第一大敵，政府必須要全力對付。但是沒過幾個月政府用緊縮政策來打擊通貨膨脹的問題後，失業問題就變得非常嚴重，使得政策決定人顧左就不能顧右，因而不知所措。

到了七〇年代中以後，通貨膨脹不僅是美國的問題，從這一章前面所提供的資料中可以看出也是世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問題。這就是在下面將談到在 1980 年 Volcker 將利率大幅提高，和雷根推出「供給面經濟」的背景。美國利率的提高所造成的影響很大，其中最大的影響之一是使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負擔增加而導致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自從八〇年代開始，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支出創下空前的記錄，每年都在兩千億到兩千五百億美元之間（每四年到五年它的國債就增加一兆美元）。在赤字支出已經如此龐大時，再進一步用擴張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的凱恩斯政策，已不是一條可行之路。

第三章中談到大戰後的前二十年中，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在這一段日子中美國和西歐國家用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調整總體經濟，在經濟迅速成長中，歐美國家實行了「福利國家」政策，美歐的社會在經濟繁榮中維持穩定，資本積累順利進行。到了七〇年初後，這種情況有了改變，這一章前面分析了資本主義戰後第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時美國和西歐的執政者認識到，之前的「福利國家」政策已經無法適合資本積累的要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也無法解決經濟的滯脹。

David Harvey 對這一段的發展做了分析，他認為在戰後前期

在國家主導下資本與工會合作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到這時對資本來說已經過於僵化。像資本與勞工之間的契約雖然保障了工人的生活，但是對資本來說就被綁得很緊，因此資本要求對它鬆綁，並要求將勞動市場彈性化。David Harvey 稱這個新的積累方式為有彈性的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參見 David Harvey，1990：第九章和第十章）。

為了解決資本積累的問題，這些國家必須要在政治上做調整。經過幾年過渡時期，它們開始對前一時期政策進行修正。八〇年代開始時，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階級領導重整前一時期的經濟政策，從美、英開始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1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1980年，美國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戰後到那時為止西方最保守的政治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取消了工人階級在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福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公民基本權力的保護，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們一上台就用一連串的立法來把前一時期對人民較有利的政策一一推翻。1980年美國雷根當選總統後，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首先從以削減聯邦政府赤字支出為藉口，大幅度削減國家的福利支出，並同時大量增加軍事支出。1981-1982年，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會的會員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做法，為美國各大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柴契爾在1984-1985年時，鎮壓了英國大規模的礦工罷工，礦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所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一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來（Solomon 1994, 29-45）。

雷根在競選總統時就提出「供給面經濟」政策，「供給面經濟」是針對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所提出的。凱恩斯假設只要有足夠的需求，供給可以隨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因此經濟問題不會是因為供給發生困難而引起的。在「福利國家」的政策下，工人在工會與資本的協商中可以獲得高工資和高福利，在凱恩斯的理論中，這樣的政策是符合整體經濟利益的，因為高工資可以增加消費，有助於總需求的增長。凱恩斯看到在經濟大恐慌中不是生產的層面發生了問題，事實上根據二〇年代的生產力，許多產業可以再生產出多一倍的產量，但是在沒有足夠的購買力的情況下，這些商品就不可能生產出來。但是到了七〇年代中之後，凱恩斯經濟政策無法解決經濟滯脹的問題，使得決策者無可適從。同樣重要的是實質工資不斷上漲，威脅到企業的利潤，「供給面經濟」派因此提出要解決經濟滯脹必須從與生產相關聯的一些問題著手。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降低生產成本，要降低生產成本一方面要降低原物料的價格和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就要增強企業的經營效率，而這兩方面是相互關聯的。

要降低原物料的價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須要保障在世界各地原物料的供給，包括最重要的能源供給。在七〇年代世界石油兩次加價後，因為美元貶值其實石油價格以實質美元來計算一直在下降。³ 要降低勞動力的成本不但要削減工會在與資方協議中提高工資和福利的能力，也要改變勞動市場的結構，使勞動市場彈性化。而這些與增強企業經營效率是相配合的，使資本可以不受勞動契約的約束，用不斷的技術改革來加強企業的經營效

3. 直到 2004 年秋，石油上漲到五十美元一桶，以實質價格來說還低於 1980 年的石油價格。

率。

雷根的經濟政策可以分為幾個方面：一方面他在 1980 年後，他用削減聯邦政府的稅來刺激經濟，造成了聯邦政府的赤字。另一方面，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聯邦準備銀行（Volcker 為理事會主席）用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並用打擊工會的力量來阻礙工資的增加。雷根並用強大的軍事力量與蘇聯對峙，所以他在聯邦政府減稅的同時增加軍事支出，因此造成聯邦政府前所未有過的財政收支赤字。

「供給面經濟」學派在學術上並沒有獲得很高的地位，但是在政策的執行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個學派為八〇年代後的新自由主義建立了合理性。只有從打擊工會開始，才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而且只有在工會力量削弱之後，在勞動程序上、工廠的制度上，資方才可能不受工會的約束。雖然美國的工會對政治的影響本來就已經在衰退，工會力量在雷根任期內更加的削弱，也就使得工人在政治上比以前更沒有力量，工人階級因此無法抵抗資本的進攻。

「福利國家」解體

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家的支持下，以增加生產效率以便能與日本和歐洲競爭為名，用各種伎倆來抵制工會。像福特和通用等大型跨國公司把原來由它本公司生產的部分外包出去，由另外一些沒有工會的公司來生產。在簽訂承包合同時，這些大公司保有隨時可以調整合同內容的靈活性，這樣的靈活性使得它們可以隨時調整生產，而不必受與工會所簽訂合同的牽制。在承包公司工作的工人沒有工會代表他們，他們的工作都是臨時的，以幾個月為

一期，因此沒有任何保障。當合同工的工人除了工作不穩定外，他們也沒有任何福利，也就是說沒有健康保險、沒有休假、沒有退休金等項福利。他們也沒有工作上的保障，忙起來時一週工作六十小時以上，沒有工作時就閒上幾個月。各大公司的這樣作法不但削減了工會的會員人數，而且分裂了勞工階級。在一個公司做工的人有的是永久工，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工會的會員，有的不是。

美國的資方除了將工作分包出去之外，他們更用將工廠鎖閉來抵制工會。像 1980 年在芝加哥城的威斯康星鋼鐵公司在與工會談判達不成協議時，公司就把三千四百工人鎖在工廠門外（lock out）。這樣把工人鎖在門外不許他們進工廠的例子還有很多，這跟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工人用坐下罷工（sit down strike）佔據工廠來組織工會相對照真是很大的諷刺。美國資產階級能夠如此不顧一切的用鐵腕手段對付工人是壟斷資本「全球化」中的一部分。壟斷資本從資本主義大國擴張到全世界各地是為了解決他的資本積累的困難，而壟斷資本只有在他們獲得了可以隨時調動資本和選擇生產地點時，他們在對付本國的勞動階級時才能施展他們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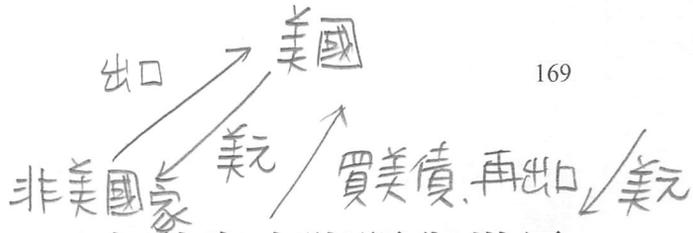
除此之外，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還包括取消對資本的管制，七〇年代時，美國通過了一些保護工人工作環境安全的法律，各大企業提出這些有關工人安全的設施增加了它們的負擔，提高了生產成本，因此加以抵制。另外還有一些保護環境的措施（見第五章註 1）也遭到各大企業以這法律會提高生產成本為理由而來抗拒。

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由美國的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首相兩個保守派帶頭，在國內開始重整經濟次序。雷根和柴契爾開

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但由在他們之後美、英的執政者承繼下來，而且更進一步。八〇年代開始，歷經了九〇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大國的資產階級不曾間斷的向工人階級進攻。

這一章從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危機明顯化開始，談到戰後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從癱瘓到解體，說明在石油加價後危機進一步加深。在危機中歐洲美元膨脹，從石油加價發展到了石油美元再循環。石油美元再循環中延緩了危機，並將危機轉換成外債危機的形式在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爆發（參見第八章）。最後談到在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經濟滯脹中失去對策，從而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在改革中「福利國家」解體。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發展出「全球化」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

第七章

「全球化」下金融資本膨脹與世界
資本主義危機

「以為只要小幅度逐漸縮緊銀根就可以預防九〇年代末吹起來的氣泡的這種想法，幾乎肯定是一種幻想。」

美國聯邦儲蓄銀行理事會會長葛林斯潘，2002年9月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基本原因雖然是生產設備過剩，但是每一次危機爆發時，都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第二章討論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談到了1929年的股票崩盤是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的開始。到了三〇年代初，金融危機更繼續擴大，銀行大批破產。二次大戰後七〇年代初開始的每一次經濟危機也同樣是從金融危機開始。這個過程將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加以討論。這一章先討論七〇年代後，當資本積累發生困難時，金融資本如何急速擴張，並且分析這樣的擴張與生產設備過剩之間的關係，因此可以進一步瞭解金融危機與生產危機之間的互相關聯。除此之外，金融資本的擴張又與「全球化」下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和美國境外美元數量（因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有密切的關係，金融資本的快速擴張也就進一步引起了連續的金融危機，這一章中將這些問題先提出來討論。

七〇年代初後，金融資本不斷膨脹的問題與1973年固定匯率解體有密切關係。從戰後到七〇年代初，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管

制下，固定匯率制度維持了國際間金融的穩定。當時美元是世界貨幣，固定匯率對美國的國際收支有一定的限制力。在固定匯率下美元雖然是世界貨幣，因此它有不一定每年都要平衡國際收支的特權。但是美國卻不能長期繼續它在國際收支上的逆差，因為每當它的境外美元過多時，美元就回到美國要求兌換黃金，因此為了它國內的黃金不繼續流失，美國必須要對它國際收支的逆差有所節制。但是到 1971 年，美國單方面宣佈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之後，美國因國際收支逆差而流到境外的美元不再兌換黃金，因此不再影響到美國的黃金庫存，也就減少了美國對國際收支的逆差必須做節制的壓力。Brentton Woods 的固定匯率制度的解體也是金匯兌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的終止，和資本主義國際金融自由化的開始。

七〇年代中之後，美國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的逆差變為持續性的。到了八〇年代之後，有二十餘年的時間每當美國在貿易上有赤字，美國都是用輸出美元來支付。美國境外的美元就是它的外債，因此自八〇年代以來美國的外債不斷的增加，而且特別是近五年來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它的外債增加的速度加快；美國外債的增加是世界金融信貸擴張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因為美國外債增加而引起的金融資本膨脹外，金融資本的擴張還有其它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全球化」下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但是美國的外債增加與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又與壟斷資本在這三十年來向全世界擴張有不可分的關係。這些都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

世界金融資本快速膨脹又與資本主義二十年來發展不平衡是互相關聯的，這樣不平衡的發展是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未曾發生過的。在不平衡的發展中美國外債加速增加，因此引起了世界

金融資本大量的膨脹。現今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和金融界的專家也都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也都同意這樣的不平衡必須得經過調整，在調整期間，資本主義的世界金融將會發生極大的震盪。只是他們並沒有分析出這樣不平衡發展背後的原因。另外，他們雖然同意目前不平衡的發展需要調整，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尚不能同意這個調整的時間是否已經到來，或是還可以再拖一段日子，他們對在調整時期所產生的影響其嚴重性也有不同的估計。

在這一章的第一節中，我將對過去二十年世界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的發展提出解釋和分析，這裡的分析與主流經濟學家不同的地方是關於產生這樣不平衡發展的原因，我認為這個原因還是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連結在一起的。這樣的不平衡在戰後前期的二十幾年中，當生產設備產能尚未過剩時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不平衡是在七〇年代後才開始，特別是到了八〇年代後才變得嚴重起來。美國的外債增加主要是因為它在貿易上大量的入超，也就是說美國每年用欠外債來彌補它在貿易上的赤字。美國貿易上的入超和日本、亞洲出口國家（特別是近幾年來的中國）、歐洲、和墨西哥等地的出超是一體的兩面。因此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和它的外債快速增加的問題，不只是美國的問題，而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在這一節中也將討論美國外債增加與世界生產過剩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將討論美國外債增加和世界信貸膨脹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將討論在「全球化」下金融自由化改革與金融資本膨脹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美國外債和世界信貸擴張的同時，「全球化」下的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取消了許多對金融資本重要的管制。對金融管制的放鬆更進一步助長了金融資本的擴張，和威脅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在第四節中將分析這樣的發展如何增加了未來危機

爆發時的危險性。

第一節 美國貿易逆差擴大與外債劇增

在第三章中和第四章中已經談過，在二次大戰時，美國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受到戰爭摧毀的國家，戰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那時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在生產上與它競爭，因此美國戰後在貿易上維持了很長一段貿易上的順差。從大戰結束直到五〇年代底的十幾年中，美國貿易上的順差可以足夠支持它在國外的投資和支付它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基地的費用。此後，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恢復與進一步發展，美國失去了它在工業生產上的絕對優勢。到了五〇年代底，美國在貿易上的順差已經不足維持它在國外的投資和維持軍事基地的支出，不足的部分，美國用出口美元來補足。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固定匯率的安排下，美國境外的美元中很大的一部分成為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存，另外商業銀行、公司企業、和私人手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它多餘的美元回到美國兌換黃金，導致美國國內的黃金存量不斷下降，直到 1971 年美國宣佈不再接受美元兌換黃金後，戰後的固定匯率在 1973 年解體，資本主義的國際體系進入戰後另一時期（這一段歷史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已經談過）。

七〇年代美國貿易逆差開始，八〇年代之後擴大

七〇年代開始後，美國的貿易產生了逆差，到七〇年代後期美國貿易的逆差變成為持續性的。美國貿易上的逆差一方面顯示

出，它的生產力與西歐和日本相比較已經相對的減弱，也說明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再度明顯後，各大國之間的競爭變得激烈起來。

從八〇年代起美國的內債和外債快速的增長，這與當時的世界生產設備過剩問題的嚴重化有關，另外，也與雷根在當政期間的財政政策有關。在第六章中已經討論過雷根的經濟政策，和因為他的財政政策而引起聯邦政府的大量赤字，Volcker的緊縮銀根的貨幣政策大幅提高了美國的利率。八〇年代初，美國的實質利率（利率減去物價上漲率）高出歐洲和日本約2%，因此吸引了國外資本流入美國，外資的流入使美元升值，美元升值使得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減弱的問題更加嚴重，也就進一步加重了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

美國的貿易赤字在八〇年代初美元增值後加速擴大，當時在貿易上美國幾乎對所有國家都是逆差，但是它與日本逆差的數額最高。美國貿易的赤字要靠從別的國家輸入資本來維持。僅在幾年之內，美國因貿易赤字所輸入的資本（就是美國的外債）使得它就從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變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從八〇年代開始，除了九〇年代初的兩年之外，美國的貿易赤字和外債持續地快速增加。美國貿易赤字的增長不僅是美國的問題，因為美國的貿易赤字使得許多貿易出超的國家可以用出口來維持它們經濟的成長。如果一個國家必須在貿易上有出超才能維持它的經濟成長，那就說明這個國家相對於本國市場存在著生產設備上的剩餘產能。如果從全世界總的來看，美國的貿易赤字代表著全世界生產過剩。我認為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與瞭解世界資本主義當前所面臨的危機。

在第六章中也討論過在這期間美國與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特

別是日本)以及和南韓與台灣之間在貿易上發生很多爭執,附錄一中補充了美國如何在貿易爭執中採取單方制裁的手段。美國的這些做法一方面說明它用政治上的霸權來達成經濟上的目的,另一方面也表示它的貿易逆差嚴重到非得解決的地步。八〇年代中,美國與其它國家貿易上的不平衡影響到世界經濟的穩定。在導言中提過,1985年資本主義七個大國在紐約市達成廣場協定(Plaza Agreement),在此項協議中,這些國家同意由各國的中央銀行用拋售美元來收購日幣和馬克,以便協助將美元貶值和日幣及馬克的升值。

到了1987年,美國經常帳的赤字達到戰後最高點,共一千六百六十億美元,之後因為美元貶值開始生效(從1984年到1994年美元相對於日幣和馬克,扣除國內物價上漲外,貶值了58%和43%)(Thurow, 1996: 201),美國的經常帳(貿易和投資的收入支出總合)赤字開始下降,到1991年時美國因為經濟蕭條而輸入減少,因此它的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達到多年來第一次平衡,但是到了九〇年代中之後,它的經常帳赤字持續增加,近幾年來增加的速度比九〇年代末期還要快。2001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美國的國際收支中經常帳的逆差分別為三千六百三十億美元、四千兩百二十億美元、四千九百二十億美元、和近六千億美元。

美國的貿易逆差與外債

到了2004年,美國國際經常帳的逆差數額接近六千億美元,也就是在這一年的中,美國用了來自全世界各國近六千億美元的資本。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額與它的國民總生產相比就從

1997 年的 2%，增加到 2000 年的 4%，更增加到 2002 年的 5%，再到 2004 年的 5.7%。這個數字說明了在 2004 年時，美國本國的生產總額少於它本國的消費、投資與政府支出，差額部分佔總生產的 5.7%，這個不足的部分是由進口來補足。美國的逆差佔全世界所有國家順差總數的比例不斷增大，1992 年時這個比例不到 20%，但是到了 2000 年這個比例增加到 64%（*IMF Survey*, 2001 年 3 月 19 日和 6 月 30 日），2004 年時這個比率更升到 75%。因此美國使用了全世界各國因為出超而來的可供投資資本的四分之三。換一個角度來看，在 2004 年的一年中全世界的出超國家的生產超過本國的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的數額，就是它們的儲蓄，這個儲蓄的總額被美國一個國家用去了 75%。

因為美元是世界貨幣，所以當美國發生貿易逆差時，它就用它自己的貨幣（美元）來支付它進口超過出口的差額，因此，美國境外的美元就是它的外債。二十年來，美國僅對日本一國的入超，每年都在五百億美元左右。到了 1997 年的危機後，美國在國際經常帳的逆差數額每一年都比上一年要增大，到了 1999 年，美國入超數額的增長率達到它的國民所得成長率的三倍。據估計現今美國外債總額約三十兆美元，這三十兆美元的外債是過去幾十年累積下來的。而這三十兆外債中的一半以上是過去四年所累積的。這個龐大數字的外債除了在私人手中、商業銀行、和各企業中之外，就是在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2004 年的一年中，美國的外債以天計，每天增加十七億美元，以小時計，每小時增加六千九百萬美元。

從最近一年的發展看來，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更加嚴重了，因為直到九〇年代末，美國的國際收支的經常帳逆差中的大部分

還是由外來的長期直接投資和股票投資來補足。而在過去一年中，歐洲和日本的投資報酬要高過美國，所以自美國流出的投資數額大於流入的數額。因此在從 2003 年中到 2004 年中的一年中，美國國際收支經常帳的逆差大部分（五分之三）都是從外國的中央銀行借來的。而借錢給美國的主要國家是日本、中國、台灣、南韓的中央銀行，美國國家公債的 93% 皆為外國所有（Asian Central Banks Affcting Markets，2005 年 2 月 26 日）。根據一篇最近的報導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美元外匯儲備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增加了一兆美元（也就是說這些中央銀行買進了一兆美元）這篇報導並說這樣快速的增加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在這之前，世界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經過了十年的功夫才增加了一兆美元（《經濟學人》，2004 年 12 月 4-10 日，頁 64）。

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與美國貿易逆差

美國貿易上的逆差不僅是美國的問題，因為它的逆差正說明了其它國家需要一個銷售它們剩餘產品的市場。第二章中說過，日本戰後的發展從開始就是以與美歐競爭為目的，事後看起來，也只有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勝利，才能使日本發展成一個經濟帝國。在這場激烈的競爭中，日本必須要佔據世界市場，使它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中佔更大的比例。就像附錄一中說過的，日本為了爭取半導體的世界市場，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日本也必須要不斷的擴充產能。不僅如此，日本要與美歐競爭也必須要不斷的更新技術，為了技術更新就要不斷的投資新的生產設備，結果就是生產設備不斷的擴張，產量不斷的增加，進一步造成它必須要靠出口來維持它經濟的成長和充分就業，因此，也就必然會受到

美、歐更強烈的抵制。因此美國雖然用舉債來支持它在支出上的擴張，卻給別的國家暫時解決了市場不足的問題。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亞洲出口國家（特別是近幾年來的中國）和歐洲能夠在生產已經大量過剩時還繼續增加生產，就靠了美國這個獅子大張口的進口市場。在亞洲危機中受衝擊最大的幾個國家的經濟到今天也無法完全恢復，它們只有不惜血本爭取出口，寄望由出口的增加來帶動它們的經濟成長，並且用它們貿易上的順差來償還外債。近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中很大一部分也是靠與美國在貿易上的出超而來的，這一點在第十章中還要談到。對美國來說，它靠了從世界各地來的大量廉價進口，使它在 2001 年前的幾年中，雖然經濟超常增長，但是物價仍然可以維持穩定。

從 1980 年到 2000 年的二十年中，美國的進口增加了 400%。美國進口佔全世界出口的比例在這二十年中從 12% 增加到 19% (Duncan, 2003: 176)。美國的出口增加趕不上它的進口增加，因此多年來美國這個龐大進口市場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它借外債來彌補的。2003 年中，美國進口的三分之二是靠出口所得來的外匯支付，另外三分之一是靠借外債。到 2004 年美國的出口僅是它進口的一半。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它的外債不斷的增加，和世界生產過剩，以及各國對美國市場越來越依賴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一件事的兩面。美國的貿易逆差和它的外債數額越大，也就說明世界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越嚴重，也同樣說明需要靠出口來維持它們國民生產增長的國家所面對的困境。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 (Lester C. Thurow) 在他最近寫的好幾本著作中，都強調美國從八〇年代以來在世界經濟中所扮演了「火車頭」的功能，在《資本主義的未來》(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這本書中，他這樣說：「美國經常項目的逆差（1994年為一千四百五十億美元）和日本經常項目的順差（1994年一千三百億美元），是一體的兩面」。他接著解釋說，雖然美日之間的順逆差在1994年只是六百六十億美元，但是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太平洋圈的國家）和日本維持逆差是靠它們與美國的順差來完成的。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只有在與美國維持貿易順差，才能夠與日本維持逆差。在1996年瑟羅（在亞洲危機之前）的《資本主義的未來》出版時，他就說美國從九〇年代中開始已經沒有能力再扮演「火車頭」的功能來帶動世界經濟了，也就是說美國已經無法繼續用借債來不斷的進口以便吸納世界上剩餘的商品（Thurow, 1996: 210）。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美國事實上仍然要做帶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也就是說世界的經濟成長還是要靠美國用借債來維持大量的進口。從上世紀末到今天美國的貿易逆差不但持續，而且更加速擴大。

如果我們瞭解這一點，那麼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八〇年代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圖面。在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全球化」正搞得火熱，也就是當所有發展落後國家都相爭的加入了世界分工的行列，將它們發展的希望都寄託在出口上，把一切投資都集中在能出口的工業上，這也正是世界生產設備產能已經高度過剩的時刻，從那時到現在雖然美國的進口市場還在不斷的擴張，但是這樣的擴張是用借債來維持的。在九〇年代中時，美國商界的企業家唱出「二十一世界是亞洲的世紀」時，也就正是亞洲許多靠出口來發展經濟的國家面臨困難的時候，它們的困難和美國用借外債來維持進口是互相關聯著的，因此九〇年代末危機在亞洲爆發是必然的事。

今天美國商業界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說「二十一世紀中

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經濟」這樣的預測。自九〇年代末以來中國的發展與八〇年代中到九〇年代末東南亞國家的發展非常相似，而現今美國當前的貿易逆差與它的外債積壓所面臨的危機比起十幾年前又嚴重太多了。

我們可以把全世界的剩餘產品想像成一座大山，這座大山是因為世界總生產不停的超過總需求而堆積起來的。假設這座山堆到一個高度就會倒下來，因此在接近這個高度時，如果總需求不增加，生產就必須緩慢下來。我們再假設這時在這座大山旁出現了一個特大號的無底洞，因此所有的剩餘產品都可以丟到這個無底洞裡去。只要可以繼續丟，生產就可以繼續，不但可以繼續，或許還可以加速。假設這個無底洞的口有個看守人，這個人給丟進東西的人一張紙條，紙條上記著丟下去東西價值的數額，只要丟的人可以同意拿著這張紙條作為欠賬的記錄而不要求兌現，他就被允許繼續丟。這個比喻雖然有點怪，但是它說明了今日世界上生產過剩的問題，而美國就是這個無底洞，那張紙條就是美元。世界上大量過剩的生產能夠繼續就是靠著美國的這個龐大的進口市場，美國這個用增加外債來維持的進口市場使資本主義暫時不必立刻縮減生產，暫時逃過了更大規模的危機。在這危機延緩的期間，世界的跨國資本可以繼續謀取利潤，繼續累積它們的資本。

第二節 美國外債擴張與金融信貸膨脹之間的關係

但是一般常識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是為了牟利，因此這個

假想出來的無底洞的故事不可能成立，也就是說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可能把它丟進一個大洞裡就了事，資本家（不論是落後國家的資本家或者是在落後國家生產的跨國公司）將商品出口到美國後必須要能賣，必須要收到錢（美元）。資本家在拿到美元後，可以用它來換取當地的貨幣，拿到當地的貨幣後他們才能支付工資和其它生產費用，剩下來的就是資本家的利潤。

當資本家或出口商用美元換取本地貨幣時，出口國家的中央銀行就用本國貨幣來支付收到的美元，也就是說中央銀行的美元外匯儲備和本國貨幣流通量同時增加。如果一個國家的貿易平衡，則進口的公司或貿易商將會用相同數量的本國貨幣去換取外匯來支付進口。結果是兩項互相抵消，在其它因素不變時，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存和本國的貨幣流通量兩者都不增加或減少。

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出超，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存和這個國家的貨幣流通量都會增加，中央銀行的外匯增加部分等於出超部分，而本國貨幣流通量則會通過借貸而增加的更多。出超國家的中央銀行如果不要它的外匯儲存量和本國的貨幣流通量增加的話，它可以將美元在市場上拋售，拋售美元時可以收回本國貨幣。但是這樣的作法會使美元貶值和本國貨幣升值，而本國貨幣升值對出口不利。特別是要利用出口來增加本國生產的國家，必須要避免本國的貨幣升值，出超國家往往不希望它們的貨幣升值，因此出超國家的中央銀行必須為增加的美元外匯儲備另想辦法。

另外，美元存放在中央銀行沒有收入，近些年來這些與美國貿易上出超的國家的中央銀行，或有錢的私人就用因貿易出超而來的美元收入，到美國去購買美國的公債或私人公司的債券或股票，私人可以用本國貨幣從中央銀行換得美元（中央銀行的美元儲備和本國貨幣供給同時減少），拿到美國去投資。美國靠了外

債來購買世界上多餘的產品，美國所欠的外債再回到美國來買股票和債券。從 1995 年到 2001 年六年之間，美國國內屬於外國所有的股票和債券從三點五兆美元增加到七點八兆美元，六年之間增加了 100% 以上。對美國來說境外美元回到美國來買股票是美國的外債與美國的資產同時減少，回國的美元來買債券則是一種債換成另一種債。

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在 2000 年外國到美國所購買的各種債券、股票和直接投資。

2000 年外國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和直接投資（單位：億美元）

債券市場	2,793
政府公債	897
公司債券	1,831
其他	65
股票	1,938
直接投資	2,877
其它	1,797
總額	8,405

資料來源：Richard Dungan, *The Dollar Crisis*, p.47-48.

美國用美元來支付它在貿易上的逆差，也就是說美國的進口大於出口的差額與它境外的美元外債同時增加，出去的美元再回到美國購買資產的過程中，世界金融信貸增加了，美國的貿易逆差越大，它的外債數額也越大，世界的金融信貸也就跟著增加。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裡就用台灣在 2001 年與美國在貿易上的一百五十億美元

順差作例子來說明。為了顯示這一百五十億美元對台灣的影響，先不去管台灣與日本的逆差，為了計算方便假設每一美元可換三十元台幣，一百五十億美元就相當於四千五百億台幣。在台灣出口的各大公司將美元換成台幣後，除去進口所需美元外匯後，尚有總合四千五百億台幣可以供他們投資。如果台灣沒有對美國一百五十億美元的順差，也就是說如果台灣和美國的貿易是平衡的話，這四千五百億台幣就不存在。

當台灣中央銀行將收到的美元拿到美國去投資的時候，不管是買公司的債券或是買公司的股票，或者是買美國政府的公債，美國的金融市場就因為美國對台灣貿易的入超而多增加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資金，這筆資金若不是因為美國的入超也是不存在的。因此美國對別的國家的入超會增加它本國的信貸的來源，而與它出超的國家也同樣增加它們信貸的來源。美國在貿易上每一年的入超額就用欠下外債來補足，美國每年就用它自己的貨幣（美元）來支付它進口超過出口的差額。對美國出超的國家再用美元來購買美國的公債或私人公司的債券或股票。隨著美國貿易逆差的增加，世界的金融信貸也跟著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越快，美國的外債越欠的多，世界的金融信貸就越加膨脹。

從美國欠外債的這個事實看來，資本並不是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流向發展落後國家。主流經濟學家要我們相信落後國家的發展需要先進國家的資本，在他們的論述中，一再強調如果沒有外來的資本，一個落後國家就不可能發展。但是事實與他們的宣傳剛好相反，全世界資本不斷的流向資本主義強國，特別是流向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強國——美國。美國的高額逆差和進口的增長也同時說明了世界各國，包括日本和歐盟，當然更包括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世界各

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和美國對外國資本的依賴，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在過去的幾年中，在絕對的數額上和相對的數額上都在的增加，這樣不平衡的發展是資本主義過去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也是不可能繼續下去的。美國做為一個最大的經濟帝國，它的貨幣就是世界貨幣，美國卻也是欠外債最多的國家，這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以前在大英帝國下，英鎊做為世界貨幣，要維持英鎊的世界貨幣的地位，英國在貿易上一直保持著出超。

第三節 金融自由化改革與金融資本膨脹

第二章已經講過在經濟大恐慌之後，美國的統治階級看到金融上的危機可以波及整個經濟，因此在羅斯福新政的改革中特地用立法來將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分離。1933年的 Glass-Steagall Act 將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因為投資銀行經營新股票上市的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s，簡稱 IPOs）和其它股票和證券的經營，所以風險較大，而商業銀行的活期支票存款就是貨幣，將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開，是為了保障商業銀行存款的安全，同時也可以阻止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而進一步形成資本的壟斷。同時為了防止像經濟大恐慌時許多人因為怕銀行破產而發生的擠兌，這條立法也設立了國家存款保險（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更為了防止銀行用提高存款者的利率來彼此競爭，因而投入收益高但風險大的資產，這條法律也給銀行存款的利率設了上限，即通過了 Regulation Q 來限制銀行付給存款者的利率。

另外，為了避免金融投機帶來的經濟上的不穩定，國會也通過了立法來設置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和監督，其中保括股票市場交易的規定，並且設立了證券市場委員會（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 SEC）來監督股票市場的交易。除此之外，為了防止少數大型銀行利用全國性的擴張來吞併小銀行，所以在經濟大恐慌之前就有了限制銀行進行跨州兼併的法律，即 1927 年的 McFadden Act。

因此，當我們回頭去看戰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的實施時，我們必須要看到這個政策是與新政時期所制定的對資本管制的立法相配合的。也就是說，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配合了這些管制來調節整體經濟。但是戰後幾十年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不斷的擴張與兼併的結果，使得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再度進行結合。到了八〇年代，美國政府將許多新政時期有關金融的管制鬆綁。1980 年時美國國會通過了 The Depository Institution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簡稱 DIDMCA）。這條法案取消了對存款利率的限制，以及一些其它對金融資本的管制。

在取消金融管制的八〇年代裡銀行破產增加，這是與金融自由化相關聯的。但是美國國會還是不斷的用新的立法來取消原有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到了八〇年代中美國的儲蓄銀行（Saving and Loan Association）接連著大批破產，這些儲蓄銀行破產與 1980 年通過的 DIDMCA 這條法律有關，因為儲蓄銀行在這之前只可以從事房屋貸款，在利息設有上限的環境下，儲蓄銀行的存款與貸款很穩定。在利息上限取消後，這些銀行必須與其它商業銀行競爭，因此儲蓄銀行開始貸款給一般生意，並且從事投機，包括房地產營造的投機。到了八〇年代中，大批儲蓄銀行破產，在破產的過程中，這些銀行的總經理中好多人都撈了大筆不義之

財。他們先貸款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後再宣佈破產，當儲蓄貸款銀行的存款保險已經用完時，美國政府只好拿出納稅者上千億美元來搶救儲蓄貸款銀行，以及賠償在這些銀行存款顧客的損失。

八〇年代除了大批儲蓄銀行破產外，整個金融市場都非常混亂，投資銀行用發行高風險的債券（junk bond）來促使企業進行兼併，高風險的債券要付高利息，好多企業用發行債券的錢來兼併其它公司，但是常會在兼併完成之後，常因利息的負擔太高而破產。買 junk bond 的人明知風險很大，為了高利還是把錢投進去。當時的金融業就像個大賭場，贏的人發大財，輸的人宣佈破產，但是贏的人都是大戶，也有不少 CEOs 因為犯法而入獄，跟二十一世紀初時大批不合法的交易被揭露出來，許多經理被判刑入獄的情形很相像。就連金融界自己也把這一段瘋狂的幾年稱為賭場的社會（casino society）（《美國商業週刊》，1985年9月16日）。1987年10月葛林斯潘剛上任聯邦銀行理事會的主席，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引起了美國和世界金融的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九〇年代美國政府又進一步廢除對銀行的管制。1994年時國會通過允許銀行跨州兼併的立法 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Act 取代了 McFadden Act。在此之後，各大銀行，像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就可以在美國各州進行兼併，成立它們的分行。1999年國會又通過一條法律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來代替 Glass-Steagall Act。這條新法律允許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合併。其實在這之前，很多商業銀行已經在用設立分公司的辦法來做經營股票的生意，這條法律徹底的取消了對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合併的限制。這樣的發展說明了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資本的擴張終於衝破了各種法律的限制，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再度合併，而且到了二十

金控公司
 銀行 股票 保險

世紀末，金融資本的地位越來越重要，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界從越來越模糊到最終消失，這些新的立法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新立法其實都是將已經存在的事實加以合法化而已。

國際金融自由化與金融資本膨脹

當固定匯率在 1973 年解體之後，美元大幅貶值，但是美元繼續被用為世界貿易和投資交易的媒介，美元也仍然作為各中央銀行的主要外匯儲備，所以美元雖然已經停止兌換黃金，但是它還是世界貨幣。上面提過，在七〇年代初後，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美元大量外流。其後，在美國境外除了從美國流出的美元外，還增加了歐洲美元。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經討論過歐洲美元的產生和擴張，在討論中我解釋了歐洲美元是一種沒有國家因此不受任何法律管制的貨幣。這筆不受國家管制的貨幣完全由跨國銀行所控制。到了七〇年代石油加價後，跨國銀行將大筆的歐洲美元貸給第三世界石油進口國家，這一段石油美元再循環的經過在第八章中會再做較詳細的論述。這裡要提的是這筆龐大的不受管制的資金是整個世界金融資本擴張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歐洲美元從七〇年代初在不受任何管制下大量擴張，它從 1973 年的五百億美元擴張到 1987 年的兩兆美元。這麼龐大數目的金融資本可以跨國界的自由流動，石油加價後先流到第三世界石油進口國家，這些國家的外債從 1973 年的一千億美元增加到 1986 年底的一兆美元，是十三年前的十倍。到了 1982 年夏天，外債危機開始時，跨國銀行就將資金從這些國家撤走。這大筆資金回到美國，其中一部分為美國政府在八〇年代的国家赤字融

資，另外部分則成為八〇年代大規模企業兼併資金的來源。
(Wachtel: 1987-1988, 263)

隨著生產設備過剩，資本投入生產也變得更加困難，因此若是想要獲得高利潤，從事整個公司的買賣或是其它方面的投機要比將資本投入生產來得容易。但是要買賣價值數十億，甚至上百億的公司，主要是手中要有可以控制的資金。跨國銀行和跨國公司掌握了大筆資金，它們就進一步去發展利用這些資金來賺錢的生意，也就因此發展出來各式各樣的期貨市場。本來期貨市場的設立是為利用期貨的交易來降低穀物和其它商品買賣的風險，但是到了七〇年代後，大部分的期貨市場買賣都是為了做投機生意。

期貨 → 原本是預防風險

1972 年外匯的期貨市場成立，這是第一家金融性質的期貨市場。1975 年芝加哥的商品期貨交易市場又增加了美國聯邦政府公債的期貨市場，八〇年代初又設置了買賣股票指數的期貨市場。股票市場最原先成立時，是為了私人公司可以將股票上市來融資，或為了要擴張生產來增資，但是到了八〇年代底，在股票指數期貨市場僅成立了幾年之後，股票指數期貨市場的交易額已經超過股票市場的交易額 (Wachtel, 1987-1988, 263)。因此到了八〇年代金融市場的交易大規模的膨脹，股票的交易和股票指數期貨市場的交易跟為了生產而融資的關係越來越遠。

到了八〇年代底九〇年代初時，世界的私人資本（特別是用來投機的短期金融資本）的流動變得非常活躍。除了私人投機資本流動量和頻率都以快速度增加外，因金融資本投機而來的大量數額的貨幣買賣也給國際金融增加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科技發展，使得金融資本轉移速度加快，但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剩餘資本量的增加而導致金融市場的投機。在金

✓
造成國際金融市場波動

融投機中，各種金融的交易額增加了，金融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量也大幅增加。像不同國家貨幣買賣的外匯市場原來是為了國際貿易而成立的，後來也為了國際間投資的需要。到了九〇年代初，外匯市場每天的交易量高達一兆美元以上，在一兆美元的交易中只有 10% 的交易與貿易和投資有關，其餘的交易量都是為了在各貨幣之間價格的波動中獲取收益的投機買賣。現在外匯市場買賣的交易額更大，比九〇年代初又增加了 30%。這還只是外匯市場，尚不包括外匯的期貨市場。外匯市場和外匯期貨市場的交易與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之間的關係也越離越遠。

從七〇年代中後，金融資本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隨著金融自由化和美國外債的增加，和國際間金融投機數額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金融資本的擴張更為加速，金融危機也就隨後而來，從八〇年代開始連續不斷的金融危機正說明這一點。不但如此，在未來因金融危機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危機的可能性更加強了，這一點在下一節和第八、第九章中還會再討論。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現今美國的許多非金融性的大企業（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都從事於金融的借貸活動，像 Stand and Poor 股票指數的五百家公司在 2000 年時，有高達 40% 的利潤來自貸款等金融性的經營。而且這金融性經營利潤的三分之一是來自非金融性（像生產性的企業或批發零售企業）的大企業（華爾街日報，2002 年 6 月 10 日，A-1）。

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市場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許多企業為了擴充市場，用借錢給顧客來招攬生意，像汽車公司用低利貸款來賣車給顧客，像家具公司融資給顧客，使買家具的人可以在一年後或兩年後才開始付貸款，像波音公司要賣飛機就借錢給航空公司等等。雖然借錢給消費者來買耐久性的消費品並不是近

年來才開始的，奇異電子（General Electric，簡稱 GE）早在 1933 年時就用貸款給消費者來買收音機，之後再用分期付款來償還。但是近年來由公司借錢給顧客在規模上和範圍上和以前都有很大的不同。奇異電子現今有奇異電子資本（GE Capital）這個分部，奇異電子資本並不只是貸款給向它買東西的顧客，而是貸款給一般的企業或消費者。

在這篇報導中這樣說：有一家印刷公司快要倒閉了，因為它所欠的款過多，風險過高，所以銀行不肯再借錢給它。這家印刷公司最後找到奇異電子資本，奇異電子資本馬上就批准了一百萬美元的貸款，這家公司就用它的印刷機和房子做抵押。事實上，由奇異電子分出來的奇異電子資本這樣性質的貸款跟銀行貸款沒有什麼區別，奇異電子資本的資產額高達四千兩百二十五億美元，僅次於美國三家最大的銀行的資產額，居第四位（華爾街日報，2002 年 6 月 10 日，A-1）。幾個月前，奇異電子資本才又花了八億五千萬美元收買一家百貨公司的整個信用卡部門，又準備花一千萬美元買俄羅斯一家信用卡公司（華爾街日報，2004 年 8 月 12 日，A-2）。因此奇異電子資本所提供的信用已經與它本公司所銷售的東西沒有關係了。

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因為大批銀行倒閉而引起整個金融系統的崩潰，所以政府通過了很多法律來保證銀行的安全。此後，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受到政府嚴格的管制，主要是為了避免因銀行倒閉而引起連鎖性的金融危機。為了執行管制，政府定期派人來查帳，而且政府還為存款者設立了保險，存款者有了保險就不會在緊急時取出存款，而使銀行無法應付而倒閉。而像奇異電子資本這樣的公司目前在執行銀行的功能，卻不受任何管制。而像奇異電子資本這樣的大公司從事金融經營的還有很多，像波音公

司也有波音資本（Boeing Capital）這個分部，波音資本的貸款總額在 2002 年時是 1999 年時的三倍，共一百億美元。

二十年前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在信貸的供給中佔 40%，到了十年前這個比例下降到 26%，而今天只佔 19%。所以雖然銀行受管制（即使銀行的管制也在弱化中）但是因為它所佔的信貸比例逐漸減少，因此管制對整個金融的影響力也就跟著減弱了。而這些非金融性的公司從事金融性的活動卻完全不受管制，這就使得整個經濟因為這些公司所擔當的風險而且增加了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波音資本借給聯合航空公司十二億美元來購買波音飛機，如今聯合航空公司在破產中重整，如果聯合航空倒閉，波音資本也將會被連累（華爾街日報，2004 年 8 月 12 日，A-2）。

這篇華爾街日報（2002 年 6 月 10 日，A-1）的報導分析了非金融性企業進入貸款的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在一個企業主要的經營部門（像生產部門）的成長緩慢時，進入金融的經營可以較快的增加這個企業的收入，像波音飛機製造部門的成長速度不夠快時，波音資本的快速成長可以用來提高總公司的收入成長率。另一個原因是企業可以用提供優惠貸款來吸引顧客，特別是有很多顧客因為信用不夠好，而申請不到銀行貸款。在這篇報導中一個被採訪的人說：「從九〇年代底到二十一世紀初，一般公司所定的價格並不一定能賺錢，所以做生意以能夠保住它的經營額在市場總額中所佔的比例為主」（華爾街日報，2004 年 8 月 12 日，A-1）。由此可見近些年來，因為剩餘生產設備的問題比之前更為嚴重，市場的競爭變得更為激烈。生產性企業進入金融的經營，一方面有助於年收入額的增長，另一方面有助於銷售它的產品。

前年年底在 Eron 公司的經理們的做證中，Eron 的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做法都被揭露出來，這些做法也脫離不了九〇年代以來的整個經濟和政治環境。可能更重要的是 Eron 這個企業在帳面上的經營額遠遠超過它實際的收入，而它在帳面上的經營額中很大的部分就是它在金融上的經營和操作，另外一部分是它把同樣的東西賣出去，馬上再買回來，因此它假造的交易額就成為公司收入的一部分。譬如說 Eron 賣了一千萬美元的電力給一家公司，第二天再將一千萬美元的電力以同價向這家公司買回來，Eron 在帳面上的收入就增加了因賣電力而來的一千萬美元。事實上不僅是 Eron 這樣作，其它能源買賣公司也用同樣的方法來偽造它們帳面上的收入額，使得不知內情的人以為公司的收入正快速的增加。

美國大批高科技公司 (internet companies) 在九〇年代中期快速的成立，好多家又在短短的幾年之後倒閉了。這一段的發展經過也與金融資本的操作有密切的關係。在過去一家公司的股票上市都要在公司成立了幾年之後，生意經營穩定了，開始有利潤了，投資銀行才考慮將這家公司的股票上市。但是在金融資本膨脹的九〇年代情況就不一樣了。許多 dot com 公司成立後，剛搬進去租的辦公室，包裝的東西和設備的紙箱還沒有打開，銀行就找上門來要將它們的股票上市。在上市的過程中，投資銀行將股票抄熱後馬上脫手，賺了大筆的錢。許多買股票的小戶，包括許多人購買各種不同的股票基金作為退休金 (401K) 也趕快跟著買，這些新上市的股票在極短的時間內上漲好幾倍甚至幾十倍，往往一個剛剛成立的公司，還沒做成什麼生意，它的股票就已經值好幾千萬。這種事是在九〇年代前從來不可能發生的。沒有幾年之後，許多 dot com 公司破產，就是沒有破產的公司的股票也

是一落千丈。這個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大氣泡從吹起來到破滅不到十年的時間，整個過程與金融資本在背後的操縱有絕對的關係。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來美國房屋貸款的擴張與房屋價格上漲的關係。Fannie Mac 和 Freddie. Mac 是兩個政府支持的房屋貸款公司（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簡稱 GSE）。這兩家公司享有政府的低利貸款，再把錢貸給一般銀行（即向銀行買進 *Matsge*）。最近葛林斯潘在美國國會的金融委員會做證時說：「Fannie Mac 和 Freddie. Mac 的貸款數額必須大量削減」。他以為這兩個機構的貸款額應限制在一仟億美元到兩仟億美元之間，但是目前 Fannie Mac 的房屋貸款總額是九仟零五佰億美元（過去十年增長四倍），Freddie. 是六仟五百四十億美元（過去十年增長九倍）（華爾街日報 2005 年 2 月 18 日，A-2），我們可以看出因房屋信貸擴張而引起的房地產的氣泡，和如果這兩家房貸公司出了問題，將帶來房地產的危機。

第四節 金融資本膨脹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

從九〇年代中期開始，在大量外資流向美國的幾年中，引起美元相對於其他主要貨幣升值。美元升值使得美國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更加困難。美元持續上升和美國股票持續上漲，就進一步吸引更多的外資。到了近五年來，美國外債劇增和因此而引起的金融資本膨脹是世界資本主義目前最嚴重的和最緊急的問題，這個問題使近期內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加強了，也使危險性加大了。前面提過美、歐的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也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也會同意目前這樣不平衡的狀況需要調整，只

是他們對這種調整將會對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可能產生的影響沒有一致的看法，有的會認為影響之大可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的則認為資本主義有能力克服在調整中所引起的動盪。但是顯然的這樣不平衡的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到了 2001 年時美國股票開始下跌時，主流經濟學家中有人開始憂慮，他們怕如果外資賣掉股票和債券把資金調回本國時，不但會使股票進一步下跌，也會引起美元大幅度的貶值，和由此造成的世界金融的混亂。到目前為止，雖然美元相對歐元貶值已近 40%，相對日幣已經貶值超過 20%，但是這個隱藏的危機尚未爆發，而這種不平衡的狀況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從不平衡到平衡的調整中，就會引起很大的動盪。

在《美元危機》這本書中，Richard Duncan 對因美國入超而輸出美元所造成的影響有很好的分析，他認為自八〇年代後美國貿易逆差擴大後引起了世界信貸的膨脹，因此而引起世界的危機。他認為八〇年代信貸的膨脹引起了日本經濟泡沫式的增長，和在泡沫爆了以後的經濟危機。他也認為信貸的膨脹與九〇年代後半亞洲的經濟危機有密切的關係。Duncan 並且認為在金融信貸擴張時容易引起投資超常的增長，因此而引起生產設備過剩。

Duncan 這樣說：「在過去三十年中，因美國逆差而導致國際的外匯儲備以極快的速度增加，因此使得世界的信貸可以大量擴張，信貸擴張更引起全世界性生產快速增加。但是在生產增加的同時，世界人口的購買力跟不上去，因此目前存在著世界性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Duncan, 2003: 152）。他又說：「在 1985 年和 1988 年之間，日本的外匯儲備增加接近五倍，從兩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九百七十億美元。緊跟著日本的信貸也以高速度增加，接著就是生產設備投資增加，因此造成生產設備過剩」

(Duncan, 2003: 153)。他認為信貸擴張的結果不只是引起生產設備過剩，信貸過分充沛也引起股票和房地產的投機。Duncan 認為在一些亞洲國家也發生相類似的情況，像泰國到今天生產設備利用率仍不超過 55%，曼谷的空屋率仍在 30% 以上 (Duncan, 2003: 41)。

我同意 Duncan 對因美國外債增加所引起的信貸膨脹的問題，和因為信貸過多而導致生產設備投資過多，但是我不同意 Duncan 把美國的赤字看成是導致這樣發展的一切原因，而不去進一步分析美國貿易為什麼會產生赤字的根本原因。為什麼在戰後前二十年美國沒有貿易赤字的問題？為什麼美國的赤字問題從七〇年代後持續不減？又為什麼到八〇年代才更嚴重起來？到了九〇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紀初變成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就像前面所分析的，美國的貿易逆差並不是突然間發生的。除了美國到了六〇年代逐漸失去它在生產上的絕對優勢外，美國的貿易逆差與世界生產過剩是相關聯著的。美國依賴外來資本來補足它總支出超過總生產部分，這樣的發展與其它出超國家依賴美國市場來維持它們的經濟成長是相關聯的，這是同一回事的兩面。這樣的發展反應了世界資本主義從七〇年代初到今天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且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在近三十年來越來越嚴重。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與美國外債快速的增加互為因果。生產設備產能過剩抑制了生產性的投資，這又和金融資本膨脹和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有不可分的關係。結果就是金融危機在過去二十多年不斷地在世界各地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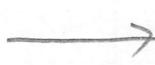
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八〇年代初以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形式爆發，欠外債國家的經濟經過十年後，仍然不得恢復。到八〇年代底，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氣泡爆了以後，到二十一世紀

初，房地產的價格跌了一半，股票跌了四分之三。日本的經濟經過了十四年極嚴重的危機，日本的經濟蕭條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三〇年代以來最深的，而且也是時間拖延最久的，到今天也不能恢復。1987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九〇年代中，墨西哥又再度陷入從所未有過的經濟危機，而且危機蔓延到其它拉丁美洲國家。九〇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亞洲爆發，並蔓延到俄羅斯和巴西。九〇年代中美國大量的資本投向高科技業，由高科技的興旺引起了信貸的膨脹、股票和房地產的投機，直到2000年氣泡爆了之後的兩年中，美國的 dot com 公司一個個破產，隨後世界的通訊業公司也在大量剩餘產能下，一個緊接著一個破產。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的經濟還沒有恢復，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又進入蕭條，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經歷著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

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將對世界資本主義近三十年來的危機做分析，在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資本主義的危機如何推動了「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各種自由化的措施又如何更使危機進一步深化和蔓延。

阿拉伯

石油(→美金)



跨國銀行(歐美)



第三世界

借款 開條件
利息高 (結構調整方案)

拉美國家發展民族工業



IMF借\$

第八章

八〇年代資本主義危機加深與「全球化」

1982年到1990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後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一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九千兩百七十億美元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八年中，資本從落後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淨額是四千一百八十億美元。以1948年幣值來計算相等於六個當年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到了1990年，落後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1982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1%。

Susan George, *The Debt Boomerang*, xv-xvi

導論中談到「全球化」不僅是一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且也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關係。在「全球化」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雙邊與多邊條約將經濟危機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國家，在轉嫁中打擊了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使它們前一階段所實行的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破產，但是災害的承擔者卻是落後國家的人民。在這一章的第一節對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處理落後國家的外債中，它們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當落後國家被

迫承受外債負擔時，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統制階級和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

在處理落後國家外債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危機如何推動「全球化」。並且可以認識到國際貨幣基金這樣的國際金融組織在逼迫落後國家還債時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的協助，這個危機轉嫁的程序不可能完成。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僅只是靠國際貨幣基金，而且他們還靠其它金融貿易組織和各種貿易協定，在這一章的第二節就對這些組織和條約中重要的幾個作介紹。從這一節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瞭解為什麼國際金融貿易組織是「全球化」六個部分中的一個部分。

第一節 石油美元再循環與第三世界外債

在第六章中談過在七〇年代石油出口國家將石油兩次加價後跨國銀行收到大筆來自石油出口國家的存款，跨國銀行轉手將錢貸給第三世界國家。從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失控又再度引起美元貶值的威脅。1980年，Paul A. Volcker 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他上台後實行了由貨幣學派的理論所推演出來的政策，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利率隨銀根緊縮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後最高點，接近 20%。美國利率上漲帶動了世界金融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就提高已經貸給第三世界款項的利率。

到了八〇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因利率上長而使它們的外債負擔非常沉重。以巴西為例，歐洲美元的貸款利率每上漲 1%，

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Kuczynski, 1982-1983: 353）。而只在兩三年內，歐洲美元利率上漲了 10% 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給巴西和其它借了外債的國家帶來如何重的負擔。根據摩根信託保證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的估計：1982 年時，拉丁洲的幾個國家，外債利息負擔以他們的支付外債的能力來說都非常沈重。每年外債利息支付佔（商品與勞務出口）總額的比例如下：厄瓜多爾為 30%，墨西哥為 37%，智利為 40%，阿根廷為 44%，巴西為 45%（World Financial News, 1982 年 10 月）。從 1979 年到 1982 年之間（利率上漲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從兩千三百三十億美元增加到三千六百二十億美元，增加了 55%。到了 1981 年時，波蘭就已經不能支付到期的外債，1982 年 8 月，墨西哥也宣佈它付不出當月應付的本金和利息，隨後其它第三世界欠債國也宣佈不能繼續支付貸款，危機就此開始。

在利率高漲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債快速增加。第三世界所欠的外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商業銀行，其它貸款來自德國和日本及其他歐洲商業銀行，以及世界金融組織。到了八〇年代初，假設拉丁美洲的三個最大債務國一年不付利息的話，美國最大五家銀行的毛利潤就下降 75%。美國九家最大銀行對拉丁美洲國家的貸款，是他們資本額的兩倍，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不但美國最大的九家銀行將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引起更大一批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銀行破產。到了八〇年代初，第三世界欠債國支付利息和本金發生問題時，外債危機開始，這時以美國為主的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Volcker, 1992: 198）。因此八〇年代的這次危機其實並不是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而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顯

示出來，而危機的集中點在跨國銀行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

在這樣緊急的狀況下，帝國的統治階級就趕快與國際貨幣基金聯合起來幫助這些銀行，討回第三世界所欠的債，以避免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崩潰。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趕緊替貨幣基金融資，它們用國家稅收的錢轉帳給基金，成為它們在基金中新增的股份。1983年時，美國總統雷根向國會要求撥款八十四億美元，作為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增資之用。國際貨幣基金就用來自各大國新增加的資金貸款給第三世界欠債國，這些國家再用新借到的錢來還欠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跨國銀行的貸款。因此，美元兜了個大圈子就從美國付稅公民的帳戶轉到大的跨國銀行。有人說，實際上這些錢從來沒有離開紐約市，只是轉了幾次帳而已。從表面上看，基金貸款給第三世界國家好像是援助這些國家，但是實際上是美國的付稅人解救跨國銀行倒閉的危機。當落後國家接受基金貸款時，基金就強制他們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簡稱SAP）中的各項條件。在1983年時，有二十幾個欠債國家與國際貨幣基金簽定了將債務延長償還的同意書，也同時接受了基金的制裁。

國際貨幣基金與結構性調整措施

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整措施對第三世界所干涉的範圍比早年貸款時所簽的協定要更廣。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內容一般包括下面幾項：

- 負債國要將它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減少進口，賺取

外匯，用所得的外匯來還債。

- 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像削減對貧窮人在食物、公共交通和水電上的補貼支出，和公共健保以及教育等項的開支。
- 用節制政府開支來抑制物價上升。
- 提高國營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
- 控制通貨膨脹、縮緊銀根、提高利率、和控制工資上漲。
- 開放外國投資（允許外資擁有 100% 的股份），取消之前對將外資股份限制在 49% 以下的規定。
-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因此可供外資收買，包括外資用債券換股權）。
- 取消政府對外匯和進口管制。

當一個國家接受結構性調整措施之後，它的政府就失去了管理國家經濟的主權，國際貨幣基金不但要干涉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也要干涉它們的貨幣政策。借債國必須要根據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條款來削減政府開支（特別是有關福利性的支出）和提高政府稅收。結構性調整措施規定欠債國要執行縮緊銀根的貨幣政策，以便控制通貨膨脹。並且在措施中要欠債國限制工資上漲。在結構性調整措施下，這些欠債國的經濟徹底的經過了重整。雖然履行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同意書是由欠債國的政府來簽訂，但是真正的負擔卻落在勞動人民的身上。

八〇年代初第三世界進入外債危機後，在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整頓下，這些國家在整整的十年中都陷入了極嚴重的經濟困境。到了九〇年代中，這些國家的經濟才剛有些起色，就又遭到墨西哥危機的波及。墨西哥的危機尚未結束，在亞洲爆發的世界經濟

危機就開始了。

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條款一方面是針對這些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目的是為了解除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制定經濟政策和政治政策的主權，削減這個階級的經濟實力，使得它們不能繼續藉助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和抗衡。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壓力下，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盡力減少進口，並且增加出口，以使用它們出口賺來的外匯還債。拉丁美洲國家雖然經過了三十年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並沒有真正能自力更生。它們的工業生產所需的機器和零件很多都還是依靠進口，沒有外匯進口時，生產就不能繼續。因此到了八〇年代末，結構性調整措施取消了落後國家對本國經濟的保護，落後國家在被迫削減關稅和取消對進口的限制，更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後，也就必須要放棄戰後前一階段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被外資收買之後，國內資本更進一步失去與外資競爭的能力。資本主義大國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結構性調整措施把這些國家保護本地資本的措施解體，以「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義削減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保護他們本國市場的力量。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這個過程中看到國際壟斷資本的強大力量，相比之下認識到自己力量的薄弱，這個階級看到為了他們的利益，甚至於他們本身的存亡，他們都得跟國際壟斷資本合作，取得國際資本的信任。他們放棄了前一時期由他們所領導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積極的加入了「全球化」。

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條款最主要還是針對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當地政府履行這些條款時的真正犧牲者。在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之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只有更加蕭條。在進口受到限制之下，許多工業停止生產，工人大批失業，就是仍然有工作

的工人也受到工資下降和物價上漲的雙重壓力。在經濟重整的過程中，這些國家為了爭取外匯，在世界銀行的督導下，由國家輔助大型商業性現代化的農場，來發展農業出口。在土地集中的過程中農村中的許多小農因此破產，他們在農村中失去謀生的路，只好逃向城市，但是在城市裡也沒有他們能維持最基本生活的條件。本地小資本的經營也因為利率提高而負擔加重，再加上一般人購買力低落，小資本的經營和生存就更加困難，它們常常在重重的困難下被迫破產。

在外債危機的八年中，落後國家不但沒有能得到外來的資本，反而為了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而輸出了大量的資本。根據一個估計在 1982 年到 1990 年之間，落後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一兆三千四百五十億美元，但是落後國家的外債在 1990 年時與 1982 年外債危機開始時相比，不但沒有減少反增了 61% (George, 1992: xv-xvi)。

在外債危機開始後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到了八〇年代中之後，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利用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藉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會，一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家在戰後進口替代發展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完成了它們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八〇年代末，拉丁美洲因為外債所逼，國際貨幣基金迫使它們履行結構性調整措施中債券換股權的條例。債券換股是這樣進行的：當欠債國家實在還不起債時，它們只好將它們的國有企業中的資產換成股票拍賣。外國資本在世界債券市場上用低價買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債券（外債債券售價常是票面價格的一半或更低到僅是票面的 20%），外國資本買了債券再將它拿到拉丁美洲國家，將債券以票面價值換取當地私有化後的企業股票。

這裡用墨西哥做例子說明：假如，一美元相等於十個墨西哥披索，一張票面一百萬美元的墨西哥債券用三十萬美元就可以買到，外國資本家買到這張債券後，拿到墨西哥就可以換成價值一千萬的披索（相當一百萬美元）的墨西哥企業股份。

外國資本就變成這些私有化後企業的股東，它們也就藉著這個機會重新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在八〇年代初，墨西哥還不出欠債時，美國金融大亨們有這麼個說法，他們自問自答的說：「墨西哥有沒有能力還它所欠的一千億美元的債？」、「當然有能力還，墨西哥有石油、有礦山，怎麼會沒有能力還債？」從八〇年代初到今天，第三世界大批的國有資產私有化之後，只要有錢可賺，這些企業的股票不是被外資用債券換走，就是很快的被外資用極低的價格買去。

從 1982 年起墨西哥和其它幾個拉丁美洲國家經歷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危機，它們被跨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逼的走投無路，跨國資本正等待著將這些國家的市場打開，墨西哥的改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到了八〇年代中，墨西哥總統 Miguel de la Madrid 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Madrid 的接班人是他手下的 Carlos Salinas。Salinas 出生於一個很有聲望的政治家庭（被稱為墨西哥的甘乃迪家庭），受教於哈佛大學，他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 Salinas 在 1988 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他繼續和擴大了前任總統的經濟改革。

從八〇年代初到九〇年代初，墨西哥的改革包括將它的企業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從 1982 到 1992，墨西哥將大批國營企業拍賣，在這幾年中，墨西哥的國營企業從一千兩百家降到兩百六十家，這

一千家被私有化的企業佔墨西哥企業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航空公司、旅館、海港、礦產公司、鋼鐵公司、農業企業、飛機場、公路、橋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話電信企業、收音機和電視廣播，更加上肥料、咖啡、煙草專賣等（Leon, 1994: 167-168）。Leon 對墨西哥大量出賣國有企業大為讚揚，把墨西哥總統 Salina 當政時的私有化說成是他任內最偉大的成就。這些企業的私有化中很多都是為了還債而拍賣的，原來國有的企業就是在這樣情況下，完成私有化，國有企業就在債券換股權下轉變為外資企業。

1992 年時，美國的前聯邦準備銀行主席 Volcker 對這一段的發展這樣說：「這些國家的治國哲學，它們的經濟政策，甚至它們的政治體系都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它們從過去幾十年來腐朽和無效率的經營方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不再用高的壁壘來保護它們的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或抵制外資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被拋棄了。它們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關稅和其它進口限制，它們將以前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電話公司，甚至銀行。……現在外國投資者與當地資本合作變得容易多了，外資甚至可以參加屬於敏感性的石油探採和石化工業」（Volcker, 1992: 208-209）。

從 Volcker 的這一段話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國家在改革中所起的變化，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全力支持，沒有它們的支持，改革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樣的順利完成。因為它們對國際壟斷資本的支持，所以國際壟斷資本分給它們一份利益。

在石油加價後的石油美元再循環中，第三世界國家背上了外債，借著外債，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大國的資本進入了欠債國

家，將這些國家的經濟做了全面改革，重新取得對這些國家更加徹底的控制。在長達十多年的危機中，美國再度顯示出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霸權。根據卡普思坦的調查，美國政府不但說服了沙烏地阿拉伯和其它石油出口國家，接受以美元做為支付進口石油的貨幣，並且也說服它們將賣石油所得的一部分美元用來買美國的國家公債。在石油出口國家的一千兩百五十億的投資中，四百八十億美元用來買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公債、股票和長期的直接投資，另外，差不多相同的數額（佔總額的 37%）則存入私人商業銀行（就是石油美元再循環的部分）（Kapstein, 1994: 63）。

1974 年到 1976 之間，因為美元相對於其它貨幣貶值，所以石油的真實價格（以其它貨幣計算）並沒有上漲，反而是下降了。而且石油出口國家所持有的美國國家公債也跟著美元的貶值而降價了。因此，在石油美元再循環的過程中，美國和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資本是主要的受益者（Kapstein, 1994: 63）。我在前面說過，石油美元的再循環延緩了七〇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在這延緩的過程中，國際金融資本繼續獲得高利，到了八〇年代危機爆發了，國際金融資本卻不必負擔損失，它們在帝國的保護下，以國際貨幣基金為中介來將負擔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

資本主義在戰後經過了二十年的蓬勃發展，到了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的危機再一次明顯化。在危機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不再能發揮它們原有的功能（參見第六章）。隨著經濟危機，凱恩斯的一套調節國內的經濟政策也告失效。這樣的發展不是偶然的，為了應付新的情勢，資本主義大國做了相應的調整。前面已經講了資本主義大國在國內的新策略，在國際策略上，資本主義大國盡其所能來協助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而這些被它們所控

制的國際組織就成了它們新策略中的重要工具。

第二節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貿易組織與條約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協定是「全球化」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這一點已經從國際貨幣基金在協助跨國銀行討債中可以看的很清楚。Kapstein 這樣說：「在危機的初期就得出了一個基本的策略，那就是債權國的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國際金融組織緊緊的聯合在一起，所以欠債的國家面對著一個聯合陣線」（Kapstein, 1994: 89）。因此雖然從表面看來，這些國際性的組織和多邊協定，好像是為了促進國與國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中性組織，但是實際上，特別是在七〇年代中以後它們是由壟斷資本和資本主義強國所共同設計的有助壟斷資本「全球化」的手段。這些金融貿易組織在壟斷資本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中扮演不同的，但卻又互相關聯的重要角色。下面將幾個重要的國際組織和條約做簡單介紹。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在第四章中曾經談過這兩個金融組織在戰後成立的經過，也討論過它們在戰後前一時期的功能。到了七〇年代初固定匯率解體後，國際貨幣基金失去它維持固定匯率的功能，到了第三世界外債危機開始後，在跨國銀行向第三世界國家討債中，它又負起新的維護跨國資本的新功能。

從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發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貨幣基金所發揮的功能。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的協助，而避免了因跨國銀行倒閉而擴大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更協助了壟斷資本將危機所產生的災害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由這些國家的人民來承擔。八〇年代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就是七〇年代資本主義危機拖延和轉嫁的結果。這次危機所引起的災害則完全由欠債國的人民來承擔。資本主義大國不但從這些國家抽取大量剩餘價值外（利息和本金的支付），並且再利用國際貨幣基金向這些國家逼債，將結構性調整措施強加在欠債國上，剝奪了這些國家人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主權。

從八〇年代初開始，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面臨著解體的危機，在這次危機中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機器利用他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的控制來拯救跨國銀行。Kapstein 認為如此大規模危機，如果沒有國家參與是不可能解決的。因為商業銀行沒有強制逼迫欠債國還債的機制。只有國家和國際性的組織才能採取強制的手段來逼迫欠債國還債。所以資本主義大國一方面，向第三世界國家宣傳取消一切政府的管制，根據華盛頓共識只有自由的和不受管制的市場才是最有效的生產和分配體制。另一方面，它們卻用強權的國家力量來干涉世界金融市場，以便保護它們的跨國資本。資本主義大國的統治階級很清楚地認識到若不藉助於國家的力量，是不可能挽救這個大規模的危機的。我們應該從這一點來瞭解今天世界上的帝國與國際壟斷資本，以及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的關係。

國家參與的另一個作用是說服跨國銀行繼續貸款給這些欠債國，使它們有繼續償還利息的能力，以便保持貸款不變成呆帳。在 1982 年危機剛開始時，在國家的調解下，跨國商業銀行貸給

欠債國兩百三十億美元的新貸款，但是次年新貸款就降至二十億美元。到 1985 年時，跨國商業銀行貸給欠債國的新貸款總合為三十七億美元，但是欠債國付給這些銀行的本金和利息卻高達兩百二十二億美元。除了為還債而引起的資本外流之外，這些發展落後國家的本地資本也大量向外逃。

從上面談到的可以看出在八〇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對穩定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和協助國際壟斷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積累有很大的貢獻。國際貨幣基金在資本主義面臨危機時，可以將危機拖延及緩和，在危機到臨時，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中的銀行面臨倒閉，整個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用結構性調整措施來逼第三世界欠債國還債，因此挽救了跨國銀行不至於因呆債過多而破產。這樣的作法使資本主義大國可以將危機轉嫁給第三世界國家，迫使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來負擔因世界資本主義危機而帶來的災難。而且經過國際貨幣基金的干涉，危機的範圍可以限制在一個地區內不再繼續擴大，因此避免了資本主義全面崩潰的危險。因此，國際貨幣基金對壟斷資本和資本主義大國有將危機延緩、轉嫁和限制擴大的貢獻。

在這兩個主要的國際金融組織中，國際貨幣基金扮演主要的角色，世界銀行則是在落後國家經濟重整中用貸款來影響他們重整的方向。像跨國公司到某一國去投資為了發展出口的生產，世界銀行就貸款給這個國家修路和修海港，給跨國公司解決運輸不便的問題，但也又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債。

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

到了 1986 年烏拉圭回合的貿易談判開始時，美國在經濟上已經失去戰後一國獨霸的地位，這時在經濟上形成了美國、日本和歐洲共同體三足鼎立的局面。從七〇年代中起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嚴重起來，為了解決它在國際收支上大量的逆差，美國就用自己國家的法律來單方制裁它的競爭對手（參見附錄一），因此引起日本和歐洲共同體普遍的不滿，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進行中它們警告美國說，如果美國繼續不顧關貿總協的規定而一意孤行，貿易談判就不可能順利的進行。這也顯示出八〇年代之後，歐洲共同體和日本在經濟實力上已經可以和美國對抗，它們不再甘心總是屈服在美國的威權之下。

從 1986 年開始，烏拉圭回合談判因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經過了八年的談判，而且在談判中幾次都將中斷。最後終於在 1994 年底達成協議，次年成立了國際貿易組織。國際貿易組織取代了關稅貿易總協，負起了在這個新時期資本積累的新任務。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矛盾雖然越來越深，但是它們也認識到用談判來解決它們之間的爭執的必要，否則發展下去會再度造成三〇年代時無法收拾的局面。關貿總協第八回合談判在 1994 年結束，由 117 個國家簽定，世界貿易組織在 1995 年初成立。

世界貿易組織取代了關稅貿易總協，成為一個永久性的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不但將商品貿易自由化推前一大步，而且更推廣了資本自由流動的範圍，和對外來投資者的保護。在削減關稅方面世界貿易組織不像關稅貿易總協，只限制在工業品上，WTO 不但將農業貿易包括在削減關稅的範圍之內，而且它進一步干涉國家的農業政策，包括不允許國家給予農民補貼。除

此之外，在貿易的範圍上更將服務業包括進去，服務業的範圍很廣，包括金融、保險、醫療、教育和娛樂等項。WTO 也將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包括在內，因為跨國公司掌握了 95% 以上的專利權，資本主義大國為了要保護壟斷資本對科學技術的控制，所以強制落後國家實行與它們相同規定的有關保護專利權的法律。附錄二中對世界貿易組織與關稅貿易總協之間的差別做較詳細的比較。

在協助國際壟斷資本打開落後國家的農業市場和服務業的市場上，以及保護跨國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上，世界貿易組織有很大的貢獻。世界貿易組織做為國際壟斷資本的工具來為它們爭取到在世界資本積累最有利的條件。在壟斷資本的督促和帝國的支持下，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貨幣基金相配合，來為壟斷資本在全世界進行積累開路，並為它們打開發展落後國家的市場，和剷除在落後國家中一切對外來資本的限制與障礙，使國際壟斷資本能更進一步鞏固它們對落後國家經濟上的控制。

從烏拉圭回合談判到世界貿易組織成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貿易上的競爭是靠列強之間經濟和政治的力量，而絕對不是只靠市場。只可惜有一些得了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他們對教科書研讀的很好，但他們往往把頭栽在書本裡，因此看不見現實。他們好像不知道這個世界不是按照書中的這條或那條曲線，或微積分中這個或那個公式來運轉的。他們把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奉為不必待證的真理，並且把自由貿易這種屬於政策層面的問題變成了原則性的教條。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

在世界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情況下，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帝國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機進一步深化中，以帝國為基地的壟斷資本必須要找新的出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尋找新的資本積累的機會。八〇年代中後日本的跨國資本大量來到東南亞，想要建立它在亞洲的經濟勢力範圍，美國也不甘心讓日本的資本佔據亞洲，就用亞洲太平洋的名義把美國包括進去。1989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APEC）成立了，APEC的成立就是為了便於美、日資本向亞洲地區擴張。1993年在西雅圖開大會後，APEC就有步驟的推進亞洲和與太平洋臨界的國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它對打開亞洲太平洋國家的市場和經濟很有貢獻，為九〇年代後大量日本和美國資本繼續來亞洲投資做好準備。

APEC 不像歐盟，因為它並不以將來成立一個政治上的實體為目的，它也不像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貿易協定是給參加協定的國家彼此在關稅上給予優惠，而且將其它國家排除在關稅優待之外。APEC 也不像 WTO，它對會員沒有約束力。¹ 它的主要功能則是為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打前鋒，也就是說在烏拉圭回合的談判還僵持不下時，APEC 的成立有助於將自由化推前一步。APEC 會員國所推行的具體自由化的政策可以做為其它國家的典範。APEC 的 18 個會員國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 40%，這些國家的總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一半，它們的貿易額

1. APEC 的企業諮詢委員會的主席桑默維爾對這一點很不滿意，他認為 APEC 對會員應該有約束力（經濟日報，2004 年 5 月 14 日，頁 6）。

是世界貿易額的 72%。因此，這些國家所推行的自由化對全世界卻會產生相當可觀的影響。

1993 年 APEC 在西雅圖開大會時，與會的各國代表就宣示它們將支持世界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便使得商品、勞務、和資本可以在會員國之間通行無阻。1994 在印尼開會時，APEC 的代表更進一步表示它們推行自由化的決心，並將全盤自由化的限期定為 2010 年。1997 年 APEC 在加拿大的溫哥華開會，開會之前在它之下的企業諮詢委員會先開會，在會中各大跨國公司事先決定它們將要它們國家的代表在 APEC 會中替它們爭取什麼新的特權。

東亞和東南亞各國的執政者就趕緊跟著響應這一股「世界潮流」來改革他們國家的經濟，他們像應聲蟲一樣的在國內宣傳自由化和私有化，他們說一切國家對企業的管制和對本國資本的保護都過時了，只有在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之下才能趕上當時的世界潮流。他們利用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每年一次集會的機會，生怕落人之後爭相的來表示他們對這新自由主義的全力支持和合作。他們向美國和日本宣誓他們要在規定的限期之前，就提早完成自由化和私有化。他們在所提的具體行動計畫中，相爭的表示要提前取消一切對商品和勞務進口的障礙。為了表示歡迎外資，他們供給外資最好的投資條件，大部分國家並進一步取消對資本流動的許多限制，包括對國際帳戶中資本帳的管制，使得外資可以隨意自由進出。

除此之外，這些國家還著手處理一些與貿易和投資相關聯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到烏拉圭回合時才被列入談判的，像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外資進入服務業的問題、和取消農業補貼的問題等。亞洲國家更在技術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基本建設修建提出

方案，這些方案都是為了降低外來投資的成本。APEC 將自由化提前實行並設置多項有利外來投資者的措施，對外來投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吸引了大量外資來到亞洲投資，但因此也就將資本主義大國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擴張到亞洲發展落後的國家來。

APEC 的成立也就是「全球化」六個組合部分中的一個環節，APEC 與亞洲國家積極加入「全球化」有密切的關係。從 APEC 成立到亞洲經濟危機爆發的這一段發展在第九章中再做分析。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在 1993 年年底簽定的一個自由貿易協定，這個貿易協定設立了一個包括這三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在這個自由貿易區內製造的產品（北美製造率的限制隨產品而不同）可以享有關稅上的優待（在協定簽定六年後免稅）。從表面看起來 NAFTA 是為了促進貿易自由，但實際上則是為了保護美國的壟斷資本。因為到了八〇年代，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跨國資本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了，為了利用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歐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也投資到墨西哥去生產，而且目的是將成品銷售到美國。NAFTA 簽定後，美國的壟斷資本就可以保護它們的市場。像汽車的北美製造率當時的規定是 62.5%，只有在北美製造，且製造率在這之上的才能享有關稅優待。因此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可以將它們的汽車組件運到墨西哥去加工再運回來而享有關稅優待，但是歐洲和日本公司則不能（除非它們的汽車有 62.5% 以上是在北美製造的）。

早在八〇年代中時，美國資本在墨西哥危機中就逐步進入墨西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美國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就將許多生產移到墨西哥，但那時墨西哥還沒有將它的市場開放，所以墨西哥就在兩國臨界的地方設置了許多加工出口區（maquiladoras），美國的紡織業、電子業、和汽車等業就移向邊界的加工區去生產。前面已經提過到了八〇年代，墨西哥在外債的逼迫下，將經濟逐步對外資全部開放，並且做了徹底自由化的改革。NAFTA 的簽定使美國可以用國際條約進一步來保障這些改革不會在墨西哥的政權發生變化時而被取消。在 NAFTA 的保證下，美國跨國公司可以將農產品銷售到墨西哥，也可以更自由的利用加拿大的自然資源、和墨西哥的廉價勞工，而且可以避免因為保護環境所增加的成本上的負擔。

前面提過到了八〇年代底墨西哥的重要改革初步完成。這時第三世界外債危機剛平靜下來，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逐漸削減了它們之間的關稅。根據 NAFTA 的協定，到 2010 年時它們之間的關稅將減至零。事實上，這三國之間的貿易中很大一部分是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之內部的交易，像美國汽車公司到加拿大和墨西哥去建廠再將汽車運回美國來賣就是一個例子。加拿大出口中的 30%，墨西哥出口中的 40%，都是來自這些公司，所以減稅的結果只是便宜了它們，更方便了這些公司去加拿大和墨西哥投資。隨著投資的增加，美國的跨國公司也加強了對三國之間的貿易控制。

這個協定雖然名為自由貿易，但是在它的條例中包含了多項有關投資的協定，而這些投資的協定都是為了保護美國的跨國公司。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協定中的第十一章。這第十一章給外來投資的跨國公司所謂國民待遇，也就是說在與投資有關事宜上，外

來資本與本地資本享有平等的待遇。事實上，根據十一章的規定外國公司享有比本國公司更多的優待。第十一條中規定如果因為投資所在地的政府規定而造成外來投資公司的任何損害，外來公司可以控訴這個國家的政府來取得賠償。這第十一章對國際壟斷資本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所談判的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簡稱 MAI）與這十一章中對跨國公司的保護相似，這都是壟斷資本進一步在全世界爭取新的積累地盤的策略。MAI 將在下面談到。

在北美自由貿易協訂第十一章的保護下，美國的一個叫 Ethyl 的公司控告加拿大政府獲得賠償。這家公司在加拿大的分公司生產一種加在汽油裡的防震劑（mmt，三巔基甲基環戊二烯錳）。mmt 對人體健康有害，在美國早已經被禁用。加拿大政府在 1997 年時施令禁止使用 mmt，Ethyl 馬上以它的利潤受損為理由來控告加拿大政府（*Global and Mail*, April 15, 1997）。第二年，加拿大政府敗訴，除了賠償 Ethyl 兩千兩百萬美元之外，還要陪禮道歉並撤回禁令（Barlow, 1998）。在這整個控告和判決的過程中，不按照加拿大的法律程序，而是完全決定於 NAFTA 的判決小組，決定的標準也與加拿大的法律無關，而只是根據 NAFTA 中保護投資者利益的第十一章，也就是說，NAFTA 的第十一章對投資者的保護凌駕於本國法律對人民健康的保護之上。

同樣的，在墨西哥也發生了美國跨國公司利用 NAFTA 的第十一章來要求賠償的例子，美國的一家廢物處理公司 Metalclay 在墨西哥的 Guadalcazar 城購買一塊土地，準備要建一個廢物處理廠，當地居民因為這塊土地已經被高達兩萬噸的毒廢物所污

染，因此他們認為應該要先將毒廢物清理後才建廠；因為居民的抗議，市政府沒有批發建廠的許可而遭這家公司控告，結果賠償了一千五百六十萬美元。在 Metalclay 要建廠之前，一家墨西哥公司也同樣被拒絕建廠許可，因此可見市政府不批准 Metalclay 建廠並不是不平等對待外來投資者。事實上，如果本國公司用本國法律來控告本國政府只可能敗訴，但是 NAFTA 的第十一章保護外來投資者是駕於本國法律之上的。

多邊投資協定

多邊投資協定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會員國從 1995 年 5 月開始談判時，並沒有受到注意，當時就連美國國會的會員都不知道有這麼個談判在進行中。雖然在烏拉圭的談判中，談判的範圍已經從貿易擴展到投資，但是在 WTO 談判中有關投資的條款商談遠不能達到跨國公司所想要的對外來投資者的保護，所以在 1995 年，WTO 剛成立後，OECD 會員國之間就開始了有關投資條約的談判，也就是多邊投資協定（MAI）。

多邊投資協定（MAI）中的幾項重要內容如下：

- 第一，國民待遇：主要是規定接受外來投資的國家必須給予外國公司與本國公司同等待遇。當地政府不可以只給本國企業某種援助而不給外國企業。
- 第二，最惠國待遇：當地政府不許以違反人權為理由來禁止某項外來投資。
- 第三，當地政府不可以要求外來投資一定要完成某種任務，像將生產的一定比例出口一類的要求。當地政府也不

能要求外國企業雇用本地的雇員。

第四，禁止當地政府無償沒收外國資產。

第五，在解決當地政府與外來投資者之間的糾紛時，MAI 允許外來投資者控告當地政府。

這第五點與 NAFTA 的第十一章相似。這一點跟過去 NAFTA 以外的所有的國際間經濟協定都不一樣，過去當發生投資上的爭議時，只有國家可以出面處理，私人公司無權控告有主權的國家。

除了上面幾個主要項目外，MAI 完全沒有對外來投資的責任有任何規定，MAI 完全沒有規定當地的政府可以要求外來投資者合理對待他們的雇員，或者不能污染環境。也就是說外來投資可以享有一切特權，但是沒有任何責任。

MAI 在 OECD 國家之間的談判一直不能達成協議，終於在 2000 年。談判因為它們彼此不能同意下而破裂。其後這些國家就把 MAI 中一些重要條文逐步放入 WTO 中。

第三節 資本主義深化危機與「全球化」

從第六章、第七章和這一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從七〇年代初開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設備過剩問題再度明顯化，壟斷資本遭受到資本積累的困難，壟斷資本基地所在的國家在資本積累困難下進行改革，以便協助壟斷資本籌劃積累的新策略，第七章中特別討論到金融自由化進一步促使金融資本大規模膨脹，而金融資本的膨脹更加深了危機。

資本主義大國國內的改革由美國的雷根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首相帶頭，再推廣到其它國家。資本主義大國一連串的改革都是為了響應壟斷資本的新積累策略，這些改革都是「全球化」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壟斷資本向外擴張的策略和這些國家在國內的改革是彼此配合的，都是為了協助國際壟斷資本建立起新的資本積累策略。國際壟斷資本利用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機會大批進入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外債危機中，大批跨國銀行面臨倒閉的威脅，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到了全面崩潰的邊緣，此時資本主義大國藉助國際貨幣基金的力量來挽救跨國銀行，由國際貨幣基金來替跨國銀行討債。IMF 便藉討債為理由來強迫欠債國家接受結構性調整，在調整中強制這些國家進行全面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將它們的國家完全開放給國際壟斷資本。在外債危機爆發和處理的整個過程中，我們認識到國際金融組織的新功能。

除了 IMF 之外，其它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國際間的多邊與雙邊貿易協定都承擔了為壟斷資本向全世界伸延和擴張中的各種職責。在這一章的第二節中將這些組織和協定中的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幾個拿出來討論。從討論我們可以認識到它們在「全球化」中的重要性，這就是為什麼在導論中把它們看成「全球化」的組成中的一部分。當然這些組織和協定是不可能獨立於資本主義大國而存在的。它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資本主義大國在背後的支持。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協定在「全球化」中有幾點貢獻：第一，它們在資本主義危機爆發時，可以將危機延緩和減輕；第二，它們在危機爆發後，可以強制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有利於壟斷資本的改革；第三，它們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和損失轉嫁給發展落後的國家；第四，它們承擔了宣傳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任務；第

五，它們為「全球化」的下一步作籌劃，像 MAI 就是為壟斷資本排除所有積累的阻礙，來創造壟斷資本擴張的更好條件。

資本主義危機從七〇年代初開始，到八〇年代進一步深化。在八〇年代第三世界外債危機中，國際壟斷資本與資本主義大國藉助了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對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作經濟和政治上的干預。發展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放棄了前一階段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企圖與計畫，本著這個階級自身的利益，積極的加入了「全球化」，成為「全球化」中的一部分，這就是八〇年代底九〇年代初的現實。九〇年代之後，一直到本世紀初，資本主義危機繼續，並且危機蔓延的範圍擴大。下一章將對九〇年代後的發展做分析。

第九章

「全球化」與九〇年代後危機的蔓延與災害的轉嫁

在過去的兩年中，世界上七個國家的經濟（這七個國家的經濟生產佔世界總生產的四分之一，有六億六千萬人口）經歷了一場與經濟大恐慌極為相似的經濟蕭條。這一次與過去一樣，在晴朗的天空中危機突然襲擊，跟上次一樣在許多有權威的評論家還在預測繁榮將持續的時候，危機已經在擴張中，這次跟經濟大恐慌時一樣，傳統的經濟處方不但證明無效，甚至會起反作用。任何有歷史感的人在現代的社會中看到這樣的現實都會怕得脊椎骨發冷。

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1999

世界資本主義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紀初，連續的發生大規模的危機。八〇年代初，資本主義的危機以第三世界國家付不出外債為導火線而爆發，這次的危機幾乎引起整個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崩潰，經過了十年才逐漸平靜下來，但是遭受危機的國家到今天也還沒有復原。八〇年代底，日本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起來，日本的經濟危機從九〇年代初開始，至今仍然處於停滯狀態。九〇年代中墨西哥又發生了它在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這次的危機波及到其它拉丁美洲國家。到了九〇年代末，從亞洲開始的金融危機不但蔓延的範圍比八〇年代

更廣，而且這次的危機並沒有隨著二十世紀終結而消失，而是一直拖延到二十一世紀初。

八〇年代危機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起於第三世界的外債，同樣的，九〇年代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也不是墨西哥和亞洲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夠健全。這幾次嚴重的危機，都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不同的地區爆發出來的。而危機的根本原因來自資本主義內部矛盾，這個內部矛盾是以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現象表現出來。從七〇年代初開始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變得明顯加上金融信貸的擴張，到八〇年代危機爆發，此後危機的聲勢越來越猛，範圍也越來越擴大。

這一章從九〇年代中以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更加嚴重談起，再討論日本九〇年代至今的危機，之後將談到九〇年代中墨西哥的危機，第四節談上世紀末亞洲的危機，最後一節談從九〇年代底擴延到本世紀初的危機。

第一節 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到了九〇年代中以後，世界的危機因為產能的過剩愈加嚴重，因此引起危機進一步深化和擴張。這裡再用汽車為例子來說明世界性產能過剩問題的嚴重性。根據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1997年世界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高達七千萬輛，而汽車總需求約四千七百六十輛（與二十年前相比只多出五百萬輛）。在這之前二十年中，各資本主義強國繼續增建汽車工廠，因此到了1997年時，產能超過市場需求高達32%，也就是說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只有68%；這篇文章中還說，按照當時的發展，到2002

年時，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將增至七千九百萬輛（華爾街日報，1997年8月25日，A-1）。1998年，日本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高達一千四百萬輛，但日本國內市場對新車的需求不到產能的一半。歐洲的汽車生產設備每年增加4%，但市場需求每年只增加1.5%（《經濟學人》，1998年3月21日，頁71）。

在全世界汽車生產設備過剩（市場滯銷）的同時，各大汽車公司卻繼續擴建，這就是在第二章中討論過的資本要進入生產性的投資在危機到來前不受市場已經達到飽合的限制。日本汽車公司豐田和本田繼續在美國和加拿大投資擴建它們在那邊的工廠。在1997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南韓的現代、大宇和三星所生產的汽車遠超過它本國市場的需求，因此必須找國外的市場。從1989年到1991年南韓的汽車生產設備產能增加了17%，到1991年時南韓汽車的年產能增加到兩百二十萬輛，但是它的本國市場卻只能銷售一百四十萬輛，其餘則必須出口。但是因為世界汽車市場已經飽合，所以南韓的出口反而從1988年的五十七萬六千輛下降到1991年的三十二萬輛（Hart-Landsberg, 1993: 252）。南韓汽車公司除了國內生產的部分必須得找出口市場外，它們更到印度、印尼和土耳其設廠。除此之外，歐洲、美國和日本汽車公司也去巴西、墨西哥和中國大陸等地建汽車工廠。僅在巴西一國，除了原在的四家汽車公司：福特、通用、大眾和雷諾都同時擴建之外，更新來了七家汽車公司在巴西建廠。近年來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大汽車公司又紛紛接連著到中國投資建蓋汽車廠。

為什麼汽車生產設備與市場相比已經大量過剩，大汽車公司卻繼續投資擴建或建新廠呢？這些資本家和他們的顧問並不是不瞭解汽車業存在著大規模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他們也都

清楚，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個汽車公司要生存和發展必須要作你死我活的競爭。許多的廠家都可能在市場的爭奪戰中被淘汰，而任何一家公司不願意自己成為被淘汰中的一個，所以就必須拚死命的擴張，這是資本的規律，資本必須能繼續增值否則就要死掉，而按著這個規律的發展就一定會產生更嚴重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因為世界汽車的總銷售量停滯，而產能卻不斷的擴大，產能與市場之間的矛盾只會越來越大。因此，不管個別公司如何採用新的技術、裁減工人、和降低工資來增加生產效率，以便降低生產成本，並且如何用新的車型和大量廣告來吸引顧客增加銷售量，但這樣的作法並不能改變總產能超出市場總需求的基本問題。在總銷售量不再成長或成長緩慢時，一個或幾個汽車公司若是能增加銷售量，其它公司就必須要減少銷售量。

因此不難預見危機遲早是要爆發的，在危機中，一些實力弱的公司競爭不過，這時就只好將產業出賣或宣佈破產，在這個過程中，大的、強的公司兼併小的、弱的公司，造成資本進一步集中和壟斷。在危機中，一部分剩餘的生產設備得以銷毀。在過去十多年中，汽車業資本兼併的例子很多，而且這些資本的兼併多是跨國界的。像日本的日產汽車公司原是一家實力強大的公司，在九〇年代初的日本經濟危機中，日產汽車公司的營業發生問題，財源支持不下去，由法國雷諾融資而成為法日的合資企業。為了佔據更大的市場，德國的賓士汽車公司收購了美國的凱斯萊汽車公司。南韓的幾家汽車公司是花了大量資本發展起來的，在危機中，這幾家公司都面臨債務過高的問題，使得繼續經營非常困難。美國的福特和通用汽車公司看中了這幾家公司，上面提過南韓的汽車公司除了在南韓還在其它幾個國家設立了工廠，因此收購了這些公司有便於福特和通用在這些國家擴充市場。但是十

幾年來這樣的收購和兼併並沒有大量銷毀汽車的生產設備，加上幾家大公司的擴大增建，像過去幾年它們又相爭地到中國投資建廠，因此上世紀末危機開始時存在的過剩產能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在購買力逐漸減弱之下反而更加嚴重。

除了汽車之外，鋼鐵業、化學工業、電子業、製藥業、紡織業、交通（包括飛機製造業和航空業）、零售業、和通訊業（telecommunication）等，當今都存在著大量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在 WorldCom 破產之後，其它通訊業公司，像美國的另一大通訊業公司 Qwest 和德國的 Deutsche Telecom 在經營上都面臨嚴重的問題。二十一世紀初，世界上最大的二十多家通訊業公司中，大部分都面臨破產的危機。這些公司在九〇年代末快速擴張時，借了大筆的債，全世界通訊業的公司總債額達一兆美元。從 2001 年初到 2002 年中，美國通訊業及其相關企業因為營業額下降，已經解雇了五十萬人（《經濟學人》，2002 年 7 月 20-26 日，頁 59）。

在九〇年代中時，美國、西歐國家和日本都對通訊業寄予很大的希望。通訊業是個新的產業，所以有快速成長的潛力。根據《經濟學人》這篇的分析，各國的通訊業對市場的增長都做了過分樂觀的估計，所以造成今天的困境。電子通訊量從 1997 年到 2002 年之間每年增加一倍，但通訊業過分樂觀的預測是每一百天就增加一倍，因此各大公司大量投資來建地下視光電纜（fibre optic cable），而且這些公司估計既然要挖地來埋電纜，埋二十四條和埋兩百四十條的成本不會高過十倍，所以根據當時過分樂觀的預測，當然是埋越多越好。各大公司爭相埋電纜的結果，從 1998 年到 2001 年間，地下視光電纜增加了五倍。不但如此，因為科技的進步，每一條電纜能傳播的信息增加了一百倍，因此傳

播的總能量增加了五百倍。但是在這幾年的發展中，市場的增長是完全沒辦法跟得上產能的擴張。在這篇報導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的主席說這個產業目前面對著一個「完全的和徹底的危機」。世界四大家通訊公司（Qwest, WorldCom, Deutsche Telecom, France Telecom）的股票如以 2000 年 1 月 1 日為 100 點指數，到 2002 年春，這四家的股票都跌到 20 點以下，WorldCom 的股票更跌到接近零（《經濟學人》，2002 年 7 月 20-26 日，頁 59）。

另一篇報導中說在過去兩年中，美國通訊業中，有五十家公司總共有七百億美元的呆債，更有幾十家公司面臨破產的危機，而尚未破產的公司的股票已經跌了 90%。因此，我們可以預料更多家通訊業公司會相繼的破產（《經濟學人》，2002 年 7 月 13-19 日，頁 60）。當然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各業中，通訊業是最壞的，但是近來破產的公司也來自其它行業，像航空業雖然是受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的影響，但航空公司主要問題還是因為產能過剩。根據一個報導，從 1996 年到 2001 年航空業以每年 3% 的成長率在擴張，但是航空業是個所謂成熟的企業，需求只會很緩慢的成長，在 911 事件之前，美國航空業就已經存在著 15% 的剩餘產能，US Air 在 2001 年虧損二十億美元之後，宣佈破產，Delta 和 United 還在破產後重整。其它幾家航空公司都在大量裁員（《經濟學人》，2002 年 8 月 17 日，頁 52）。航空業的問題也影響到飛機製造業，在航空公司債務重整中，這些公司不得不取消它們以前簽訂的購買飛機的合同。此外，在美國布希總統將鋼鐵進口增加關稅之前，鋼鐵業中也有許多公司宣佈破產。好幾年來，製藥公司因為發展不出新藥來，都遭到營業收入無法上升和股票價格低落的問題，據預測世界各國製藥業的困境在最

近的將來都不能解決（華爾街日報，2002年7月16日，C1）。

除了汽車業、通訊業、航空業、製藥業等大企業外，就連日常生活中一般人都熟悉的飲料市場都因為市場已經達到飽和而使得進一步擴張發生困難。我們可以從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市場中的競爭來瞭解當今這個市場情況的一二。這兩家公司是世界汽水業中最大的兩家，但是因為它們都不是新的產品，因此如何維持它們的銷售量不斷的增長，市場不斷的擴張就是經營者最大的挑戰。如果它們一旦停止擴張，就會很快的失去它們的領先地位。為了擴張，可口和百事各自收買了不同的果汁公司和冷飲公司，並且也進入瓶裝飲水的市場。除此之外它們各自藉著快餐店來賣它們的飲料，像百事可樂和 Burger King 及 Taco Bell 是一家公司，麥當勞則銷售可口可樂。

這兩家公司除了每年用大量的廣告做宣傳之外，它們更個別到美國各地的學校兜攬生意。因為據調查一般人對哪種冷飲的喜愛多半決定於他們年輕時喝冷飲的習慣，所以可口和百事認識到要擴充市場，必須得早早從培養年輕人的口味開始。加上近年來美國各層政府的經費縮減，學校經費不足。可口和百事就分別與學校簽訂合同，要校方同意只賣一種汽水，可口或百事在合同中，就給這學校一筆錢做為取得專賣權的報酬，學校就用拿到的錢做為支付一些課外活動（像音樂和體育）的用費。合同簽定後，可口或百事就在該校設起冷飲機，孩子們就大瓶大瓶的灌下含高咖啡因的糖汽水。可口可樂公司從成立到今天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這種用與學校簽合同取得專賣權來擴充市場卻是近幾年來的事，這種作法甚至在二十年前還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

為了擴張經營額和佔據更大的市場，除了上面說的汽水公司用向學校買專賣權來銷售汽水外，我們也看到近年來各家公司為

了要推銷它的產品花上大量的廣告費。除此之外，每一家公司的一種品牌又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口味，像可口可樂就有八、九種不同的口味，以便在超市的架子上盡量多佔位置。這些都不是孤立的現象，像汽車公司為了佔據市場，每一家公司必須要製造各種模型的汽車，要有專門迎合年輕人喜愛的模型，又要有配合中年人穩重成熟口味的模型，既要生產轎車又要生產跑車，要生產豪華車，但也不能放棄低檔汽車的市場，另外還加上卡車和SUV。我們可以把這種想盡各種辦法來佔據市場的現象聯繫到資本必須要向世界各地擴張來看。可口可樂想盡辦法到世界各地去建汽水瓶廠，在貧窮國家的城市裡，最諷刺的現實之一就是，一方面政府沒有錢供給市民清潔的自來水，但是街上的小販卻到處擺攤子賣可口可樂。從這樣拚死活的市場競爭中，我們就不難瞭解不管是可口可樂、麥當勞、或是星巴克咖啡，背後推動它們向全世界各地擴張的動力。

第二節 九〇年代初日本開始的經濟危機

在第七章中提過，到了八〇年代中後，美元相對日幣貶值，日幣升值的結果，使得日本跨國公司必須不斷用降價來維持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就大幅降低了日本資本從出口所獲得的利潤。日本政府為了協助它的資本家就採取了降低利率和擴充貨幣流通量的政策。這時日本的中央銀行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更助長了信貸的擴張，日本商業銀行也因此用過於充沛的資金來大量增加貸款，過多的貸款引起了八〇年代後期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的狂飆使日本的經

濟像個吹起來的大氣泡。到了九〇年代初，這個大氣泡破了，日本的經濟就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日本的銀行堆滿了呆帳，投資意願低，消費者不肯買東西，到了十幾年之後的今天，日本的經濟還是看不出有穩定成長的跡象。當然日本因為金融的危機所導致的經濟危機還並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還是它積累了大量的剩餘產能。因此，從 1991 年到 2002 年的十二年中，有六年生產設備的投資（以實質貨幣計算）卻大量下降（Sakaki Bara, 2003: ix）。這些大量的剩餘產能一定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才能被銷毀。

根據一個分析，到了 2001 年（即從 1989 年日本氣泡爆了十二年後），日本的經濟要比美國 1941 年時的經濟（即 1929 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十二年之後）還要更糟。這個分析認為雖然日本官方所公佈的失業率在 2001 年時僅為 6%，而美國 1941 年的失業率要高出很多。但是以生產量、股票價格、和利潤幾項為指標來衡量，日本在 2001 年時都要比美國在 1941 年時要差。若以十二年總和來比較，日本在經濟上的損傷還比不上美國。但是到了 2002 時日本的經濟離恢復還差得遠（《經濟學人》2002 年 3 月 2 日，頁 72）。這篇文章並沒有提到美國在 1940 年時就開始備戰，到 1941 年美國參戰後，因戰爭所帶來大量的支出才將美國從經濟大恐慌中解救出來（參見第二章）。

我們可以借日本和美國在經濟危機開始以後十二年經驗的比較來說明凱恩斯經濟政策的功能。日本在 1989 年經濟危機開始時，中央政府立即就用增加開支來解救它的經濟，不像當年美國在 1932 年（經濟大恐慌開始三年之後），羅斯福總統就任之後，才開始了一連串的新政立法來整頓經濟。這主要是因為在戰後的二十幾年中，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政者在應用國家財政政策來干

預經濟已經相當熟練。凱恩斯經濟政策的理論也是在他 1936 年出版的書中才見諸世人。在數量上來說，日本在這十二年中的財政支出的增加的規模也要比羅斯福新政時期要大的多。美國在 1941 年時，國家公債淨額僅為國民生產總額的 40%，而日本在 2001 年時，國家的公債淨額接近國民總生產的 70%。日本在經濟危機開始後，中央銀行用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而在經濟大恐慌開始時，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尚沒有一套調節經濟的辦法。就像第二章中所說的，到了 1933 年時美國國會才通過緊急銀行法案，這法案賦予聯邦準備銀行在一般商業銀行發生困難時，可以用貸款來支持它們的權力。

也就是因此，美國在危機爆發之後，大批企業很快的破產，到了 1933 年時生產幾乎下降一半，官方公佈的失業率是每三個勞動人口中就有一個人失業，但真實的失業率則接近於勞動人口的 50%。從 1930 年到 1933 年之間美國每一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因此到了危機開始四年之後羅斯福新政開始時，已經有一大批生產設備被銷毀了。但是日本在危機開始四年之後，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搶救之下，生產有小幅度的恢復。在這期間日本政府盡量扶持經營困難的企業，日本的銀行盡量給企業融資使它們可以逃過破產。加上日本大企業還保有常年以來不大批解雇工人的傳統，因此失業人口沒有在短期內快速增加。這樣發展的結果是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不能在短期內銷毀，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完全沒有解決，因此經濟停滯就只能長期的延續下去。現今日本銀行的呆帳達一百五十兆日幣（約一兆兩千億美元）。這樣大筆的呆帳使得大企業不可能再借錢投資（當然不投資的原因主要是多餘的生產設備），也使得銀行不能再貸款，日本的中央銀行已經將利率降到零，但也刺激不起任何投資的意願。

日本在房地產和股票大幅降價後，一般消費品的價格也在下降，這與美國經濟大恐慌時物價下降是很相似的。物價下降（deflation）比物價上漲給日本當局帶來更大的困擾，因為物價下降更不鼓勵消費或投資的支出。同時物價下降與物價上漲對債務的負擔有相反的影響。物價上漲會減輕債務的負擔，但是物價下降則加重了債務的負擔。就像台灣過去買一棟一百萬的房子，借了五十萬的房屋貸款，過了幾年房子漲價到兩百萬，五十萬的貸款就顯得不多了；而日本的一般住房的房價跌了 60%，商業房地產的價格跌了 80% 以上，可見房主債務負擔的沉重。據估計日本的物價下降可能要到 2006 年才會有轉機。

2002 年 9 月初，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召集了一個國際金融會議，各國的中央銀行現任和前任總裁和政府官員，以及貨幣學專家在堪薩斯城開會。在會中美國聯邦準備銀行的理事長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發表致辭，他說：「以為只要小幅度逐漸縮緊銀根就可以預防九〇年代末吹起來的氣泡的這種想法幾乎肯定的是一種幻想」。代表日本中央銀行的 Yutaka Yamaguchi 同意葛林斯潘的看法，他認為不但在氣泡起來時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辦法預防，就是在氣泡爆了以後，中央銀行也起不了作用。美國的一些金融專家常常責怪日本中央銀行沒有在經濟危機的初期更積極的降低利率，並且說日本中央銀行在政策上的錯誤使得日本的經濟多年不能恢復。但是 Yamaguchi 說即使日本中央銀行在 1991 年或 1994 年時大幅降低利率，最多也不過能提高一年或兩年的短期經濟成長率而已，而對經濟長期全面恢復並不會有幫助（華爾街日報，2002 年 9 月 3 日，A-2）。我同意 Yamaguchi 的分析。

第三節 九〇年代中的墨西哥經濟危機

在第八章中已經論述過當墨西哥付不出它所欠的外債時，國際貨幣基金用結構調整措施替跨國銀行逼債，墨西哥在戰後前一期實行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因此解體。在危機中墨西哥的經濟受到極大的創傷，它的個人平均真實所得從 1981 年外債危機前到 1986 年的五年之間下降 10%，實質工資（除去 70% 的物價上漲外）下降了 30%（Krugman, 1999: 41）。到了八〇年代中後，墨西哥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前面提過在七〇年代時，墨西哥的統治階級中出了一批新貴，這批人都是有錢人和有政治勢力人家的子弟，他們不但受了高等教育而且去過美國留學，到了八〇年代初，他們所學正好為改革所用（Krugman, 1999: 41-42）。八〇年代中墨西哥總統 Miguel de la Madrid 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就像 Volcker 所說的，墨西哥的改革是非常徹底的，它賣掉了大批的國有企業，降低了進口關稅，取消了許多進口管制，也取消了對外資的限制。繼 Madrid 之後 Salinas 當選總統，他上任後重用一批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經濟系畢業生來治理經濟；在這批新人執政下，墨西哥政府完成了改革，Salinas 與美國談判，為簽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做準備（NAFTA 簽定的意義見第八章）。

從 1981 年到 1989 年墨西哥的經濟年成長率為 1.3%，低於它的人口成長率，也就是說以個人平均計算經濟成長率是負數。從 1990 年到 1994 年的四年中，即所謂墨西哥奇蹟的四年，經濟成長率為 2.8%，剛好超過人口成長率。根據墨西哥本國的統計，到了 1994 年，它的經濟還沒有能回到 1981 年的水平

(Krugman, 1999: 50)。1993年12月底，墨西哥與美國和加拿大簽定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4年元旦開始生效，元旦當天Zapatista起義。

1994年12月（北美自由貿易簽訂一週年後）美國柯林頓總統在西半球高峰會議開幕時致辭說：「所謂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今天已經是個模糊的記憶了。這些年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但是僅在柯林頓宣佈這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九天之後，墨西哥就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Naim, 1995: 49）。在危機中，披索貶值、資本外移、通貨膨脹、小農破產、利率上升，許多本國企業因維持不下去而破產，失業人口增加，工資也跟著下降。

在導論中曾經說過，這裡再重覆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這篇報導〈墨西哥模式值得這麼大的痛苦嗎？〉這樣說：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條約簽訂之後，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他與美國的貿易增加了一倍，從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但是對大多數的墨西哥人來說，這些貿易的數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他們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值之後，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了39%。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發展報告說，墨西哥極端貧窮的人從危機前每七人中一個，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墨西哥的工人生活每天在三美元之下的人佔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1996-1999）是危機後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西哥一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毀了，使得今天（1999年）墨西哥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華爾街日報，1999年3月8日，A-1）。

從1982年墨西哥的外債危機開始，在「全球化」下它的統

治階級換了一批受了美國教育和訓練的新貴，在十二年中全力以赴，做了一連串的徹底和深入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把經濟搞得民不聊生，每年大批無法生存的難民冒著生命的危險，跨過國界去美國求生。Carlos Salinas 在任內卻滿飽私囊，之後，為了逃避貪污的責任畏罪遠遠的躲在歐洲。

到了九〇年代中，「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在拉丁美洲實行了十幾年之後，已經完全失信於人，在這整個過程中誰得益、誰受害已經非常清楚。在這時亞洲國家的「全球化」卻正進行地火熱，這些國家的政府和大批的學者正在宣傳「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世界趨勢，只有將它們的經濟開放，並供給外資優越的投資條件，才能吸引外來資本和新技術，也才能在世界市場中爭到一席之地，只有依靠出口才能增加就業，才能發展經濟。

第四節 九〇年代末的亞洲經濟危機

外資大量進入亞洲

到了八〇年代初，在世界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壟斷資本到世界各地找投資新的機會。這時拉丁美洲在還不出外債的困境下，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制裁，因而使得國內經濟大幅度緊縮，也就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到了八〇年代末時，美國的商界卻突然蹦出所謂亞洲奇蹟的說法（當然不是從哪裡跳出來的，而是壟斷資本無處可去，所以非得找個地方安身），日本和美國的資本從八〇年代中起開始投向亞洲。

到東南亞投資的外資中日資佔最重要地位。上面提過，到了

這時日本國內的生產設備經過多年的累積大量過剩，它必須要依賴出口來提高它國內的生產設備的利用率和維持充分就業。但是這時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生產設備過剩問題，美國和歐盟國家對日本用出口來佔據它們的市場非常不滿，因此採取各種方法來抵制日貨。日本的國內市場與美國和歐盟相比過小，不能實現由大規模生產所帶來的經濟效能，因此日本的資本家看到他們在亞洲建立起來一個區域性經濟的重要性。日本看到西歐國家聯合起來形成歐盟以便擴大市場和生產的規模，日本看到在亞洲完全有可能形成一個以它為主的經濟上的聯盟。

在前面曾經提過，到了 1985 年美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這時各大國為了挽救美國貿易逆差的危機，派了他們的財政部長在紐約開會，並達成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廣場協議決定由各大國的中央銀行合作來將美元貶值和將日幣和馬克升值，目的是用美元貶值來增加美國的出口和降低它的進口。各中央銀行同時拋售美元並同時收購日幣和馬克，中央銀行干預的結果使美元從 1984 年到 1994 年美元相對日幣（扣除國內物價上漲外）貶值了 58%。

長年以來日本為了取得更大的市場，在政府的指導下集中發展重要企業及與其相關聯的企業，因此在各方面與美歐展開激烈的競爭。日本的企業投下大量資本來更新技術以便增加生產效率。前面說過日本在七〇年代底到八〇年代初時，它的生產設備就已經過剩，它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比美國和歐盟國家還要嚴重。因此，雖然日本的出口額佔國民總生產的比例不大，但是自八〇年代以來，日本必須要靠商品貿易的出超來維持國內生產設備的充分利用，和勞動人口的充分就業。而日本的商品出超就是美國和歐洲商品貿易的入超，這樣的不平衡就引起各大國之間越

來越嚴重的貿易爭執，美國和歐洲因此加強了對日貨的抵制。

世界關稅貿易總協就是在各列強貿易爭執加劇時開始第八回合（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在 1985 年廣場協定之後日幣升值，因此更增加了日本出口上的困難。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資本必須要解決它國內生產設備與它國內外市場相比大量過剩的問題，因此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到國外去投資就成了一個必然的出路，於是日本也就將它的生產設備過剩問題從它的國內蔓延到亞洲地區的其它國家。

日幣升值與日本的跨國資本對外投資

在 1985 年日幣相對美元升值後，日本的資本家到美國、東亞、和東南亞投資都很上算。因為像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和菲律賓等國的貨幣都盯緊美元，所以日幣對美元升值，也相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升值。以日本為基地的資本，特別看重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在八〇年代中之前，日本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尚不多，日本與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也很低，只限於日本所需要的原物料的進口，從八〇年代中開始，情況大為改變，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的投資大量增加，九〇年代初到 1997 年危機開始時，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只直接投資一項就高達一千億美元，日本約有四、五百家跨國公司在東南亞設廠（Gilpin, 2002: 270）。美國在亞洲的投資遠落在日本之後。但是在八〇年代中，美國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合比前十年還是增加了 71.5%，而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合只增加了 37%（Quinlan and Chandler, 2001: 91）。

從八〇年代（特別是在八〇年代後期日幣升值之後）起，跨

國壟斷資本就從經濟衰退的拉丁美洲國家轉向亞洲國家。除了日資以外，美國和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西歐資本也到東歐，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投資。到了1992年之後，各國資本又回到拉丁美洲收買當地被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和投資到拉丁美洲國家的證券市場。到了九〇年代初，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尚未從八〇年代的危機中恢復過來，1994-1995年，墨西哥又重新陷入了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從1995年到1997之間，外資來到亞洲增加了一倍。

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投資，大部分都是由日本的大型跨國公司在當地設立分公司，日本的跨國公司直接供給這些分公司所需要的資本、機器設備、重要的零件、和技術，這些分公司再將生產分包給當地的公司。日本到東亞和東南亞的投資暫時紓解了它本國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也暫時為它的資本解決了因原料和工資上漲而成本提高的問題。東南亞國家從日本大量進口機器設備和零件，加工後將一部分製成品輸出到日本，更將其它大部分製成品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因此事實上，日本利用這些國家間接出口到美歐，減少了日本與美歐在貿易上因持續順差所受到的壓力。東亞和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貿易保持逆差，他們與美國的貿易保持順差。到了九〇年代初，日本對亞太地區的出口已經超過日本對美國的出口（Gilpin, 2002: 270-271）。

日本在八〇年代利用東南亞為加工基地來間接增加它對美國的出口，這樣的作法和它在六〇年代利用台灣和南韓來增加它的出口是很相似的。在第五章中談過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和它們如何做為跨國公司加工出口的基地而達成二十多年的經濟成長，但是到了八〇年代中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世界的生產設備產能大量過剩，各種產品在世界市場上都已經飽合，正像第七章中

所分析的，美國雖然在仍然維持大量的進口，但是它在貿易上的逆差完全靠借債而來，因此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果然只有十年多的時間，東南亞國家靠日本的投資和技術來發展以出口到美國為主的加工業就進入危機了。

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時，日本將生產移向東南亞國家時，和日本本國的經濟發展一樣，也是受到國家的積極支援。日本的資本家瞭解因為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對這些國家的侵略，使得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日本仍然心懷餘恨，於是日本政府用經濟援助來改善日本與這些國家的關係。在 1991 年和 1992 年兩年中，日本政府對這個地區的六個國家的經濟援助達四十五億美元。美國與日本相比顯得遜色，美國只對兩個國家援助三千多萬美元。這些國家在日本的援助下興建基本建設，因此方便了跨國公司將製品出口。同時日本的廠商也包下了像飛機場、公路、辦公樓、海港等項的建設，日本政府的對外援助給它的資本所創造的投資機會與戰後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給美國資本創造了在歐洲投資的機會很相像。

從上面這一段的發展看來，基本上九〇年代的危機和八〇年代的危機一樣，主要是起於資本主義大國國內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和它們之間不平衡的發展而引起的問題。日本在七〇年代底和八〇年代初，就隱藏著生產設備嚴重的過剩。到了八〇年代中，日本一方面因為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另一方面因為日本與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爭執越來越嚴重，日本的跨國壟斷資本利用日幣升值的機會，把大量資本投向東南亞國家，這也就把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蔓延到亞洲其它地區。落後國家所遭受到的災害主要都是因為它們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危機時，它們就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

給落後國家所造成的。但是為什麼九〇年代的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危機從亞洲開始，而且以金融危機的形式爆發，還是需要加以說明。

東南亞和東亞的國家從八〇年代中開始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剷除了進入亞洲這些國家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時這些國家放鬆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由，不受限制。但為了保持與美元固定匯率，這些國家就必須提高本國的利率，提高外資貸款和債券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引外資。報酬既高風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勵外資繼續流入。外資流入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匯存底，外匯存底數額增大就更保證了外資的安全，外資不斷流入，也就可以維持本國貨幣不貶值。

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一段時間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時也不例外。這裡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由大量外資進入帶來的短期國民總生產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續吸引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上加樂觀，就得出「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的預測。在這一片樂觀的背後就隱藏著危機，因為維持外資高報酬和安心的條件，像高利率、匯率盯緊美元、取消對外匯管制等，也就是經濟不可能穩定發展的原因。

從大量資本在亞洲的流入和流出來看，也就不難瞭解 1997 年之前和之後亞洲經濟大幅度的變動。1996 年時，有九百三十億美元流入亞洲，1997 年時僅有一百三十億美元流入，在同一年有一千零五十億美元流出，也就是說資本的淨流出將近九百億

美元。資本的流出並不完全是外資，本國資本到這緊要關頭也同樣逃走避難。

在 1997 年前流入東南亞的外資中，除了直接投資外就是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金融投資。直接投資要蓋廠房要買設備，因此必然是做較長期的打算。金融投資則是可以隨時來隨時走，而流入亞洲的外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金融資本投資。在剩餘資本要不斷找高報酬出路的壓力下，就必然會引起投機。到了八〇年代底和九〇年代初，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投資中的很大部分都屬投機性的投資。也就是說買股票不是因為公司經營的好可望分紅拿股息，而是因為期待股票漲價可以賣了賺錢，或者買房地產不是為自己住，而是為將來可以賣了賺錢。因此越買就越漲價，結果就像日本一樣漲起了股票和房地產的大氣泡一樣。這時美國的各種互惠基金（Mutual Funds）在東南亞新興起的股票市場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 30% 到 35%，這樣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只可能從投機中獲得。越多人的眼睛瞪著這個高收益率，就越多的人把錢投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氣泡也就越吹越大。因此，氣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到了 1997 年 8 月時，這個大氣泡果然爆炸了。泰國的泰銖最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而被迫貶值，連帶引起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及到台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較少，受的傷害也較輕，但是為了維持人民幣不貶值和搶救香港的金融，中國也花去了大筆外匯。所有受到大規模危機災害的這些國家都是八〇年代來不甘落人之後，趕緊登上了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列車的國家。在這次危機之後，中國越來越依靠外國

資本、技術、和出口市場的發展，中國加入了國際貿易組織後，就更進一步更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近幾年來中國發展更顯示出它也將會與其它發展落後國家一樣，必然得要承受在危機時，由資本主義大國轉嫁過來的災害，這一點在第十章中將進一步討論。

在這次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的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損失。貨幣貶值、物價暴漲、金融系統崩潰、銀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小資本（甚至本地的大資本）經營破產。勞動人民本來在一切為出口的政策下，就已經受到高度的剝削，危機之後，更是民不聊生。根據世界銀行自己的報告，在三年的危機中，世界上生活在絕對貧窮線下（每日一美元）的人，又增加了兩億人。

到了 1998 年秋，一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機已經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國家，更進一步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有繼續擴張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趨勢。1998 年上半年，俄羅斯的股票市場指數下降 60%。同時，俄羅斯面臨不能支付外債和可能由此而引起的盧布再度貶值的危機。如果俄羅斯破產，危機就必然會進一步繼續擴大。

1998 年 10 月，資本主義七大強國的財政部長在華盛頓開會時，有一位部長對記者說：「出席開會人的臉色比參加葬禮的人還要難看」。在這危機燒上眉頭的時刻，這些帝國的領導人必須策劃搶救的對策。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大國用大幅擴充信用並藉助國際貨幣基金來給俄羅斯融資，使俄羅斯逃過了破產的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等國都先後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同時對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件做了承諾（Delhaise, 1998:

199-206)。

在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改革中，這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使利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因此造成更多的當地小資本，因為不能負荷債務下而被迫破產，甚至連與官僚勾結的大資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用改革措施中新制定的破產法來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這些國家中更多的國營企業被迫私有化，也有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在這次的危機中，幾個新的亞洲小老虎（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遭受到致命的打擊，這幾個國家的執政者從八〇年代開始一致認同要向南韓和台灣學習，用加工出口做為發展經濟的策略，它們爭先恐後的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來適合它們在世界資本主義分工中的地位，以便被整合在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之內，但是卻給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苦難。

南韓和台灣這兩個上了年紀的小老虎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南韓幾十年來由國家培養出來的大型資本中，也有好多個經不起打擊而破產，被外資收買。南韓最大 30 家壟斷公司中 16 家破產，2,100 家金融公司中有 600 家破產。台灣在危機剛過時，受的打擊不大，主要是因為台灣沒有外債，所以沒有馬上受到國際壟斷資本和由它所控制的金融貿易組織的制裁，不必被強迫接受結構調整措施，有不少人曾經慶幸台灣躲過了這次的危機。但是兩三年後，在整個世界經濟重整下，台灣也必須做進一步調整，使得它的許多隱藏著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

從亞洲開始的危機爆發蔓延到俄羅斯再蔓延到巴西，國際貨幣基金也就從亞洲到其它各地用貸款做為條件，逼著欠債國接受結構調整措施中的一切條件。泰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硬性規定下，其政府的財政收支必須要保持相當於國民所得 1% 的盈餘，

泰國不得已只好在削減社會福利之上，更將零售稅提高到 50%（華爾街日報，1999 年 2 月 2 日，A1）。國際貨幣基金對其它需要借款的國家也做相似的規定，除了要它們保持財政上的盈餘外，更要欠債國家將國內的利率提高，像印尼就被迫將利率提高到 50%，如此高的利率斷絕了所有當地資本借款的機會。

在對付亞洲的危機時，國際貨幣基金對「受援」國家所提出的條件更為苛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面國際貨幣基金對南韓在結構調整措施中所開出的條件看出來，基金對其它國家，像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所開出的條件也相似。從這些條件中，應該不難看出國際貨幣基金到底是代表誰的利益。國際貨幣基金表面上做為一個中性國際組織的假貌，在這次危機中全部被揭穿了。

亞洲的發展落後國家受到了日本剩餘產能的波及，在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情況下，就必須承受用外來投資來發展加工出口這樣策略所帶來的後果。1997 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經濟奇蹟這樣的神話，也揭穿了落後國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就能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來發展它們經濟的謊言。這次危機之後，這種以出口來帶動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受到極大的挑戰。除了金融投資大進大出所造成的危害以外，這些國家在十年間，用大量資金所建的工廠多屬多餘的設備，當世界經濟進入危機，落後國家的生產就最先受到影響。危機之後，生產出來的商品無處可以銷售，就是血本出口，也在商品滯銷下受到資本主義帝國的抵制，找不到出口市場的只有關閉工廠。但是當初建廠時所借的外債照樣得本上加利償還。

到了九〇年代亞洲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後，八〇年代中以來

每年大筆流入的外資停止了，而且大筆的（外國的和本國的）資本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撤走。這些國家在極短時間內因資本撤離而失去大量外匯存底，只好向國際貨幣基金借債。這一次國際貨幣基金所開出落後國家結構調整措施的條件要比八〇年代時更加苛刻。在南韓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中，南韓政府除了要施行一般的財政上的調整和貨幣的緊縮外，還得再放鬆對外資的限制，並得協助外資收買本國的企業，除此之外南韓政府更要負責加強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便給企業主在雇用勞工時更大的權力。

南韓所接受的結構調整措施除了第八章中所列出的條件之上更加入了以下幾點：

- 協助外國公司收買南韓企業（包括兼并）。
- 修改破產法（以便促使南韓企業破產）。
- 取消利息的上限。
- 1997 年底前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債券的限制。
- 1998 年取消對外資在南韓購買股票的限制。
- 1998 年取消對日本進口的限制。
- 1998 年 1 月取消南韓公司從國外借款的限制。
- 1998 年 1 月開除兩個有問題商業銀行的經理並公佈有關外資收買南韓金融企業的條例。
- 公佈金融改革法案，加強對銀行的監督，並規定公司必須做綜合資產負債報表。
- 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化。¹

（華爾街日報，1997 年 12 月 26 日，A-25）

南韓被迫對外資開放，從 1998 年到 2002 年金大中執政的四年中，外來投資達五百二十億美元，是在這之前三十五年外來投資總額的兩倍（《美國商業週刊》，2002 年 6 月 10 日，頁 58）。

危機蔓延

九〇年代末從亞洲開始的經濟危機不但蔓延到俄羅斯，更再度波及到拉丁美洲。到二十一世紀初，這次的危機並沒有終結，今天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美、歐、日各大帝國和發展落後的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經濟危機仍然持續著。在這次危機之前「受援」國家的人民也同樣受苦受難，不同的是九〇年代之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國際貨幣基金比較有能力把危機限制在一個地區，不致蔓延到全球。這次的情況不大一樣。1998 年 10 月初國際貨幣基金在美國華盛頓開會，這時危機已蔓延到俄羅斯，並且即將蔓延到拉丁美洲，會中各國的經濟首長都拿不出任何對策。在這之前的幾個月中，美國國會因為已經看出國際貨幣基金解救危機的無能，所以不批准美國對基金的增股。

但是此時大批資本開始從巴西撤走，1998 年從 8 月到 9 月的兩個月內，巴西的外匯存底從七百八十三億美元下降到四百七十億美元，下降了 40%，損失了三百億美元（華爾街日報，1998 年 10 月 8 日，A-13）。外國與本國資本外逃主要都是怕巴西的貨幣（real）貶值，趕快逃到資本主義大國去避險。到了巴西的資本外逃擠兌美元開始時，火已燒上眉頭，美國國會也只好

1. 以便給資本更多的便利和自由度。

再撥款給國際貨幣基金，國際貨幣基金隨著轉手借給巴西。巴西在 1998 年 10 月底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四百億美元的貸款和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款。這個措施規定巴西政府必須整頓財政，一方面增稅，另一方面削減福利及對貧困人民的消費補貼，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總合達兩百億到兩百五十億美元之多。國際貨幣基金撥第一筆九十億美元貸款時，巴西還有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加起來一共是五百四十億美元。但是巴西的資本繼續外流，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這五百多億美元幾乎一掃而空。結果到了 1999 年 1 月，巴西的還是得將它的貨幣貶值，在這危機中巴西損失了大量的外匯之外，又增加了數百億美元的外債。

在國際貨幣基金狂妄的和不惜一切的為國際壟斷資本搜刮的同時，在這次的危機中，它能起的穩定作用卻已經在減弱。從 1997 年 8 月泰銖貶值開始，資本主義的危機蔓延至東南亞各國，更波及到南韓。到 1998 年 8 月中俄羅斯付不出貸款後，危機更蔓延到拉丁美洲。在這之後，整個國際資本對第三世界的貸款枯竭，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或公司要發行債券都極為困難，困難的程度可以用發債券的利率高出美國國家債券的利率的差數來衡量（高出美國國家債券利率的差數叫 spread），這個差數從 1998 年 8 月中到 9 月 10 日增加了一倍，升到 17%，其中最高的是委內瑞拉，它用美元發行的國家公債的利率升到高出美國國家公債利率 27%（《經濟學人》1998 年 9 月 19 日，頁 87），換句話說，就是這些國家已經沒有可能從國外取得借款。

第五節 二十一世紀初的危機加深

從 1997 年開始到 2000 年後半的三年中，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一直處於完全不穩定的狀況中，這樣的情況顯然無法長期維持下去。到了 2000 年的第三季，美國的國民所得成長果然緩慢下來。2001 年 3 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美國的經濟在 1993 年後隨著高科技股票的瘋狂上漲而帶來的經濟超常的成長，掀起了所謂跟著資訊科技發展起來的「新經濟永興不衰」的迷思。在科技股票崩盤後的幾年來，經濟萎靡不振，由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編出來的「新經濟」不必遵守資本主義經濟循環規律的故事也就不攻自滅。二十一世紀剛剛開始，世界資本主義即陷入了這三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2001 年的第二季，美國和德國的國民總生產停止增長，日本的國民總生產經過了十二年的停滯，再次進入這十幾年以來的第四次萎縮。這三個資本主義的經濟中心同時進入經濟萎縮是 1973 年以來的第一次。

美國這次危機從開始到 2003 年，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已經將利率調低十二次，在這期間利率從 6.5% 降到 1.5%。低利率雖然對消費支出稍有幫助，使許多人利用低利率來更換房屋貸款，並拿新貸的錢來還信用卡的債，但是利率下降並沒有能刺激投資，因此也挽救不了美國的經濟。從日本十多年和美國近三年的經驗中，可以看到凱恩斯貨幣政策的侷限性。事實上，貨幣政策的侷限性凱恩斯早已經預料到，他認為雖然利率下降可能可以刺激投資，但是當利率繼續下降到很低時，他對投資的刺激效能可能就完全消失了。而且低率也不再會因貨幣供應量增加而降低，凱恩斯把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的陷阱 (liquidity trap)，而今天日本和美國就爬不出這個流動性的陷阱。

二十世紀初，亞洲在上世紀末經歷過危機的國家尚未恢復，拉丁美洲的國家又進入危機，從八〇年代以來，拉丁美洲的大多數國家連續的遭受危機的襲擊，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些國家的危機不但沒有減緩，反而有更加擴大的趨勢，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經歷著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哥倫比亞、祕魯鎮壓不了游擊隊的反叛的戰爭。阿根廷從2001年底到2002年春，換了四個總統。委內瑞拉由美國支持的右派發動的政變沒有成功。在巴西選舉，因為左派可能會當選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造成巴西貨幣貶值的威脅。因此，耶魯大學拉丁美洲學者 Riordan Roett 說：「八〇年代時，我們提出（做為解決危機的）市場改革這個容易的答案，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容易的答案了」（華爾街日報，2002年7月25日，A-1）。Roett 的這段話實際上是承認了二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失敗了，造成了今日後果。面對著這個爛攤子，改革者如今再也變不出新的魔術了。

到了2003年底美國和日本的經濟似乎稍有起色，但是幾個月之後，助長經濟成長的一股氣勢就消失不見蹤影了。貸款的利率儘管低，但引不起投資者的興趣，日本的消費者握緊著錢包就是不肯買東西，美國消費者的債已經淹過了頭頂，加上高失業、低工資的壓力無法持續他們的消費。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在布希任內不斷的擴大，它的貿易逆差直線上升，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在短期內無法撤退，這都增加了今日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因素。

目前世界經濟唯一的一點亮光就是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在中國的經濟開放後，世界的剩餘資本找到了一個新的處女地。以各大資本主義國家為基地的跨國公司，相爭的、不敢落後一步的到中國投資。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以便

在世界市場上增加競爭力；另外就是要佔據中國的市場。中國的經濟在大量外資流入的情況下，維持了高速度的經濟的成長，再加上大批的公共建設和房地產的投機，已經發熱的經濟快要燒了起來，美國的商界又摸著他們的水晶球發出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預言。這樣的預言有可能會準確嗎？這一點在第十章中會再做分析。

第十章

在危機轉嫁中落後國家發展的困境

八〇年代時，我們提出（作為解決危機的）市場改革這個容易的答案。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容易的答案了。

耶魯大學拉丁美洲學者 Riordan Roett，華爾街日報，

2002年7月25日，A-1

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廣闊的土地，有世界上大多數勤奮工作的勞動人民。這些國家中有許多從1930年就致力於脫離資本主義大國的控制，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些（多半在拉丁美洲）國家採用了進口替代的策略來進行工業化，希望建立起獨立的資本主義體系。但是多年來發展（或不發展）的結果，它們與資本主義發達的富有國家的經濟水平差距越來越大。在這些國家中，除了少數達官顯貴外，大多數的人民都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更有十幾億以上的人無法維持最低的溫飽。主流的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將從發達的富有國家擴展到落後的貧窮國家，在一國家之內，財富將會從少數富有的人普及到社會上大多數人。但是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正與這樣的發展相反，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這樣貧富兩極化的發展，並沒有任何可能改變的跡象。我們如果要站在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立場，特別是落後國家的大多數人

的立場，我們就不能依賴著宗教式的信德等待著奇蹟出現，我們只有用我們自己的分析來挑戰這種無法印證的論述，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其它的選擇。

發展落後的國家不是沒有想要學美國和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美國和德國的發展在英國之後，為了趕上英國，它們用進口限額和提高進口稅來保護它們剛起步的工業發展。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也曾嘗試過用保護貿易來發展自己的工業，這一點在第五章中已經談過。二次世界大戰後，有近三十年的時間，不少落後國家都採用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但是到了八〇年代，當資本主義大國在危機中重整國際次序時，這些國家就被迫全盤放棄了這個發展策略。今天仍然有少數人提倡一個國家可以用保護貿易來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這些人應該好好去研究這些國家在戰後進口替代發展的經過，和探討他們失敗的原因。這一章的第一節將對戰後三十年的進口替代發展做總結。

到了八〇年代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發展全盤破產後，國際壟斷資本藉助於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和資本主義列強的協助，用強力的攻勢來打開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迫使這些國家放棄它們保護自己經濟的措施：降低進口關稅、取消對進口的限額、取消對外來投資和資本流動的限制、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及嚴格限制這些國家財政的支出（特別是保健和教育的支出和對貧窮人的補助）。在國際壟斷資本所調動的各方面壓力下，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執政者們紛紛投降，他們在國內進行了相當徹底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盡一切力量將他們的經濟融合在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之內。落後國家的統制者們認識到他們力量的薄弱，因此為了他們本身階級的利益，甚至於他們本身的存亡，必須盡一切力量取得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合作。

在新的世界次序下，除了極少數例外，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執政者都致力於參與由壟斷資本控制下的世界分工，他們想盡辦法在世界市場中找到一個可以參與的小角落。落後國家在世界市場中彼此競爭，以便取得出口的機會，跟過去的台灣、南韓和今天的中國學習，希望用出口來帶動他們的經濟成長。但是就在發展落後國家將它們的經濟開放，把希望寄託在發展出口上的時刻，也就正是世界的生產設備剩餘產能到了最嚴重的時刻。在產能高度過剩的情況下市場競爭極為激烈，增加出口變的非常困難，因此要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困境。這一章的第二節將對在「全球化」全面展開後，用出口帶動經濟發展所面對的困境做分析。

在全世界的市場都滯銷的情況下，靠出口來維持經濟成長的國家，像日本、台灣、南韓、亞洲其它出口國家、和墨西哥及中南美等國都面臨著經濟成長緩慢的問題。但是全世界唯獨中國大陸在大量外資投入下，出口與國民總生產都維持了高速度的成長。因此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發展是否說明了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未必一定會面臨困境？或是說這條路雖然已經面臨困境但是中國是個例外？這是第三節中要討論和分析的。

第一節 高關稅、民族工業 進口替代發展策略破產 ex. 一般第三世界國家

在第五章中談過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前二十多年中，許多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用了進口替代的策略發展資本主義，它們的經濟在這一段日子內得到相當程度的成長。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受到依賴發展理論的影響，這個理論認為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的

原因是它們與先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所造成，在這不平等的關係中，發展落後國家對先進國家在經濟上的依賴，使得它們與先進國家在交換中，剩餘價值被抽走，因此不能發展。這些國家的執政者認為如果能改變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換關係，它們就可以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但是到了八〇年代以後，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這樣的信心和美好的夢想就完全破滅了。

國際壟斷資本經過戰後二十多年的發展力量變得更加強大，代表它們的各資本主義帝國更兇悍了。落後國家的資本雖然經過了二十幾年的發展在經濟上也有相當程度的增長，但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相比之下，卻是非常弱小的。美、歐、日各資本主義強國更進一步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為工具，用外債的壓力來迫使這些國家（多數在拉丁美洲）的統治階級放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

從八〇年代初到八〇年代底的幾年中，在經濟發展落後國家面臨外債的危機時，美、歐、日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措施做為基金貸款的條件，用自由化、私有化來取消這些國家對外來資本的抵制，也同時取消它們對本國資本和對本國公民的一切保護，迫使欠債國剷除一切對國際壟斷資本積累的限制，將它們的經濟全面開放，這一段歷史在第八章中已經做過解說。

到了八〇年代底，國際壟斷資本進入這些國家經濟的每一個經濟領域和層面，逐步將這些國家的經濟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之內。隨著國際壟斷資本的入侵，和世界市場競爭的壓力，這些國家的工農階級進一步被剝奪了他們生活上的依據，使更多的人陷入貧困之中。這些擺在面前的事實就是連右派也都得承認。在八〇年代的十年中，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不但全部停頓，而且人民的生活倒退。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進一步深化中，近

十幾年來，拉丁美洲國家所經歷的危機就沒有停止過。

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

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中，資本、技術、勞動力、自然資源、與市場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相對於國際壟斷資本來說，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資本、技術、和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上，都佔絕對的劣勢，而沒有所謂比較的優勢可言。落後國家所有的是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本國的市場，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想在帝國主義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他們曾經認為可以藉助國家的力量來控制和掌握本國勞動力、資源、和本國的市場，他們也認為一方面可以藉助外來的資本和技術，另一方面國家可以對外來的資本加以限制。

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時，拉丁美洲國家用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因為缺少資本，因此它們就向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銀行借款，它們也在一定的條件下接受外來直接投資。落後國家缺少資本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多年殖民地的經濟結構下，或是與殖民地相類似的發展下，落後國家的出口仍然以農業和礦業為主，它們出口的農業和礦業所能獲得的外匯幾乎完全要以國際市場的價格來決定，在這方面它們完全處於被動。除此之外，它們工業化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和組件等又得依賴進口，在這方面它們又幾乎是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初級農礦產品出口與工業品進口的比價（terms of trade），在1980–1989年之間下降了25%，使得落後國家在這樣不利於它們的貿易條件下損失很大（Coote, 1996: 9）。到底如何將這種扭曲了的殖民地經濟結構糾正過來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但是從戰後落後國家用進口替

代來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來看，這些在戰後（和早前）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並沒有能從它們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扭曲的經濟結構中掙扎出來。

在戰後前期這些希望能獨立發展的國家中的統制階級對外來投資非常抗拒，對外來直接投資有很多限制，包括外資股份只能佔 50% 以下的限制。六〇年代初開始，台灣和南韓正極積地進行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在它們的改革中給外資創造了非常好的投資條件，不但不對外資在企業中所佔的股份加以限制，而且對外資將利潤匯回國的數額也不加限制，除此之外，在稅制方面還給外資各種減免的優待，台灣和南韓還先後設立了加工出口區，在加工出口區內有為外資建蓋好的廠房，並且設立了簡化各種手續的行政管理中心。台灣和南韓歡迎外資的各種措施給國際壟斷資本很多好處和方便，吸引了外來的投資。相比較之下，拉丁美洲國家和其它用進口替代做為發展策略的國家對外資設了各種限制，外來的直接投資當然就不很極積。

但是在進口替代的發展下，這些國家還是依賴進口的工業設備和技術與組件，當它們出口不足支付進口時，它們只好向國外銀行或國際金融機構貸款。第五章中提過，事實上外來直接投資只有在賺到錢時才能將利潤匯出去，而貸款則是不管用貸款所做的投資有沒有利潤可賺，和生產的東西是否能出口換取外匯，每月都必須要用外幣（基本上是美元）支付利息和歸還本金。但是直到七〇年代石油加價之前，這些國家的貸款總額並沒有超過它們的支付能力。到了石油兩次加價後，依靠石油進口的發展落後國家同時遭遇到世界市場上糧價上升，和它們原物料出口價格下降的困境，因此在急需外匯的壓力下，向外國銀行借了大筆的款項。即使這樣也還不足造成他們不能支付貸款的問題。但是到了

八〇年代初，美國因通貨膨脹嚴重而縮緊銀根，造成世界利率普遍的大幅度提高，跨國銀行也就隨著將第三世界國家的借款利率大幅提高。到 1982 年夏，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國家，但也包括南韓和波蘭等國）的外債危機就開始了。

在此後的十年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用逼債做為手段，迫使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放棄一切對本國資本的保護和對外資的限制。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必須得讓出本國的市場，包括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因此要削減關稅和取消進口限額，同時也要取消對外資的限制，包括對外資在一個企業中股份比例的限制，和對外資利潤匯出的限制。為了要削減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力量，國際壟斷資本藉助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迫使國內資產階級同意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再將私有化後的企業由外資收買。

在整個瓦解落後國家獨立發展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用「拯救」第三世界負債國家為名來貸款給它們，使得負債國可以用借來的錢還給跨國銀行，免去了跨國銀行的損失和因跨國銀行破產而引起更大規模的危機。但是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款的國家，必須接受結構性調整措施。這個措施包括國際貨幣基金對負債國的國內經濟政策各方面加以干涉。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內容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已經談過了，從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落後國家被強迫接受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條款內容是越來越苛刻了。

在第八章中已經提過，從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條款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這些條款是要進一步解除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力量，使它們與外資的競爭中更處於劣勢，像取消國家的管制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都有一定的目的，這目的就是要削減這些國

家資產階級的力量，使它們無法藉用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本抗衡。但是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沈重負擔並不是由代表本地大資本的資產階級來負擔，資產階級只要與外資合作，就會得到它們應得的好處。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沈重負擔卻是落在勞動人民和一些小資本的身上，條款中明文規定政府必須要減少教育、保健、食物補貼等項的開支，這就直接影響到落後國家低收入的工人和農民，提高利率則加速小資本的破產。受制於結構調整國家的人民基本生活原料在外債利息的負擔下被剝奪。本國資本並不會因為它們與國際壟斷資本相比來得弱小，就減少它們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相反的，它們卻一再的壓低工人的工資，減少工人的福利。在「全球化」下，落後國家的經濟經過了重整，從以內需為主的生產轉向以出口為主的生產。重整中許多本地的小資本破產，失業人口增加。在農村中，因為農產品進口逐步開放和大型出口農場的發展，導致無數的小農破產，破產後的農民流向城市，更增加了生活失去依靠的都市貧民。「全球化」下，資本可以隨意自由流動，本國資本也不一定要停留在本地，工人則是在失業的威脅下，被迫接受不斷向下調整的工資和更惡劣的勞動條件。

國際壟斷資本除了掌有龐大的資本之外，它們還控制了最先進的技術，在這兩方面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是很難跟他們競爭的，從進口替代發展的事實證明在這樣的競爭中，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徹底的失敗了。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見到第三世界國家從國外進口的新技術，但自己沒有配套，花大錢買的機器和設備不能充分利用，還借了大筆的外債。他們就提出《小就是美》（*Small is Beautiful*）的這種說法。我們可以瞭解這樣的說法背後的道理，即是要強調生產技術必須適合一個國家的生產力，也就

是經濟發展必須要採用適合的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說法。¹

這樣說法背後有一個問題，就是所指的那個國家是否可以獨立的发展它的經濟。這個國家越是已經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越是要在由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市場中競爭，那麼小就一點也不美，因為低技術沒法跟高技術競爭。因此在討論經濟發展的文獻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會不斷的提出技術升級的問題。他們這樣重視技術升級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這樣提法適合資本的邏輯，在整個既存的世界資本主義裡，一個落後國家要加入世界分工，就必須不断的追求技術升級，這一點在下面還要談到。

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從依賴到投降

從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來看，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即使藉助了國家的力量，但是它們還是沒有辦法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從戰後這一段歷史來看，國際壟斷資本不斷的兼并和擴張，相比較之下，落後國家的資本是太弱小無力了，因此造成它們對壟斷資本的依賴，它們不但在資本上而且在技術上和市場上都要依賴國際壟斷資本。在第五章中曾經說過，因為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的軟弱，因此，在它們的領導下也就不可能創出個強而有力的

1.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是 1973 年 E.F. Schumacher 所寫的一本書。其中討論有關適合落後國家發展的技術。有關適合的發展技術的討論在經濟發展的文獻中曾經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談適合的技術是不切實際的，因為在資本主義下的生產到底要用什麼技術是由資本家來決定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增值，對資本來說最能增值的技術就是最適合的技術。

國家來。就是因為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在各方面的依賴，國際壟斷資本就必然對他們施加壓力，使它們不得不逐漸取消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和對外資的限制。事實上，對外資的依賴和取消對外資的限制是互為因果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從經濟上對帝國的依賴，必然會發展到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依賴。同樣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依賴也是互為因果的。

在代表資本主義帝國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壓力下，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對壟斷資本的依賴下必須要對它們做出各種的讓步。我們可以進一步去認識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軟弱，和這個階級並沒有能在進口替代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強大起來。依賴理論的作者只談發展落後國家對資本主義強國的依賴，因此如果能斷絕這樣國與國之間的依賴關係，落後國家就可以獨立自主的發展資本主義。從事實的發展上，我們可以看出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要在各方面依賴國際壟斷資本。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小和弱是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大和強相比較的。落後國家小和弱的資產階級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必須要依賴大和強的國際壟斷資本。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資本上、在技術上、和在市場都必須依賴國際壟斷資本，而且從經濟上的依賴就必然會造成政治上的依賴。而且這種依賴最後就導致這個階級最終向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壟斷資本的帝國投降。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投降就使得發展落後的國家失去它們的國家主權，使得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無法保護本國的勞動人民、自然資源、土地和自然環境。事實上，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

依賴發展理論並沒有對發展落後國家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做分析，因此它不能指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剝削關係。因為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軟弱，所以它們不可能做為一

個階級來領導反帝的鬥爭而達到成功。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不可能要改變它對工農的剝削關係，所以就不可能發動勞動人民來反對帝國主義。因此雖然依賴發展理論好像是站在弱國的立場，但是它不可能成為人民反抗剝削和壓迫的理論的基礎，當然也不能指出解放運動的方向。因此資本主義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

正如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的前任主席 Volcker 所說，到了九〇年代初，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在這次危機中取得勝利。在這個過程中，拉丁美洲的資產階級認識到它們無法用國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它們也同樣認識到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最終必然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結合在一起，因此它們向國際壟斷資本投降了。在上世紀末時，雖然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存在著矛盾，但是矛盾是次要的，而它們之間的利益相吻合是主要的。因此，它們既沒有意願也沒有力量來領導反帝的民族解放鬥爭。

以上對拉丁美洲的分析是過於簡單化了，拉丁美洲有許多國家，每一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歷史，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特殊性，因此這樣的分析是完全不足的，有待進一步對拉丁美洲的每一個國家的戰後歷史做進一步分析。但是這些國家的發展也有它們的一般性，這些國家都曾是歐洲資本主義帝國的殖民地，它們在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取得獨立，在歐洲殖民地勢力從拉丁美洲撤退之前，美國的勢力就已經侵入。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建立了它的帝國，將勢力擴張到拉丁美洲每一個國家。這些國家都有肥沃的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勤奮的勞動人民。在戰後這半世紀中，大多數用進口替代的策略希望發展有自主性的資本主義，而這樣發展策略在每一個國家都全面徹底失敗。

到了八〇年代中之後，國際壟斷資本和代表它們的帝國利用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藉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會，一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在戰後用進口替代發展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完成了它們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在政治上的控制。

ex. 台灣, 韓國

第二節 當今用出口帶動經濟成長國家的困境

上面談到八〇年代底後用進口替代策略發展的國家相繼破產，在破產的過程中，所有的發展落後國家都在國際壟斷資本的壓力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接受了由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國際壟斷資本根據每個國家的技術和資源，來決定它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就只有努力的在世界市場中找它們的出路，致力於將國家的經濟建立在它們能出口到世界市場的商品上。

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就是為了協助壟斷資本的擴張而全力的打擊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在落後國家不得不放棄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後，由列強所控制的這些所謂國際組織就著手進一步消除這些國家中所有對壟斷資本擴張的限制。發展落後國家在極短的時間內做了各種便利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其中包括：開放進口、開放外資、取消對外匯和其它金融的管制、以及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這些國家用徹底的和深入的改革來將它們的經濟轉型，把所有的希望建立在用出口來帶動它們的經濟成長上。

在拉丁美洲國家中，除了智利早在大獨裁 Pinochet 下就進行全面自由化的改革外，墨西哥最快完成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

墨西哥改革的經過在第八章中已經談過了，墨西哥的改革就是將一個以內需為主的較有自主性的經濟，改變成以滿足世界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和更加依賴外資的經濟。前面已經談過，墨西哥的改革雖然帶來了外來資本的投資，在 NAFTA 簽定後，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貿易也得到高速度的成長，但是在 1994–1995 年間這次危機還沒到來之前，墨西哥人民的生活已經從八〇年代初以來每況愈下，到了這次危機發生之後，它的人民生活狀況更是一落千丈。墨西哥從八〇年代初外債危機開始後，在十二年中經過了大規模深入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但是在 1994–1995 的危機後它的人民生活倒退了一個世代。

第九章中談過，當新自由主義改革給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帶來各種無法解決的災難時，跨國資本就直攻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在 APEC 的宣傳和協助下，跨國資本（尤其是日本資本）大量進入了亞洲。但是只在十幾年之內，亞洲的經濟危機就爆發了。亞洲經濟危機的原因在第九章中已做過分析，這裡就不再多說。按理說，亞洲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危機後的災情，應該進一步證實了「全球化」全面展開後，經過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落後國家已經失去了對國際壟斷資本襲擊的任何防禦能力。這種靠出口來促進經濟成長策略在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的二十年中，雖然有台灣和南韓的成功例子，但是到了九〇年代已經不再可行。但是到了今天落後國家的政策決定者仍然不去理會過去二十年的經驗，是他們無法瞭解危機中和危機後人民的疾苦？還是今天落後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只有加入世界分工的這一條路可走？還是他們認為他們的國家可以逃過危機的命運？或者是因為這個階級不能抗拒在與國際壟斷合作中本身可得到的利益？或者是幾種原因都有？

我們該如何去分析和評價落後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的經驗？在八〇年代結束時，落後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夢想已經完全破滅。八〇年代之後，落後國家的統治階級進行了全盤自由化的改革，將它們的經濟納入了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參與了由壟斷資本所策劃和控制的世界分工，致力於發展出口，希望以此來帶動本國的經濟成長。從八〇年代經過九〇年代直到本世紀初，這些國家不斷的遭受到危機的襲擊，它們的人民不斷的承受由資本主義大國所轉嫁過來的危機所造成的災害。現今這些國家為了要在世界市場中爭取出口面對著各種困難，陷入了新的困境。

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如今要根據目前的世界市場來發展出口，到底面臨著什麼樣的困境？這些落後國家面臨了困境的說法在今天可能會受到挑戰，因為在過去幾年中，中國大陸不正就是靠出口來促進經濟成長嗎？在 2001 年世界經濟進入蕭條至今的三年中，各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每次稍有恢復的跡象時，就又停頓下來，甚至於下降。在這烏雲滿天的世界裡，中國成了唯一有陽光的地帶。因此近來美國的各大報章雜誌幾乎每天都有關於中國經濟的報導。在亞洲危機之前，美國的商界稱東南亞的幾隻新的小老虎（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與菲律賓）的發展為奇蹟，並預測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但是到了亞洲危機之後，就再聽不到這樣的預測了。直到近兩年，「二十一世紀是屬於中國的世紀」的預測又再次出現，而且中國這隻大老虎比起那幾隻小老虎的威力似乎只有過而無不及。

在過去四、五年中，中國大陸全力的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它極積的加入世界分工。中國大陸將市場開放，並歡迎外資，現今它成了世界上接納外來直接投資最高的國家，超過了美

國。在 2002 和 2003 的兩年中，它的外國直接投資（尚不包括證券投資和借款）都超過了五百億美元。中國大陸對世界的出口，在四年中增加了 125%，在 2003 年中，中國出口的商品近四千四百億美元，再加上四百多億美元的勞務出口，總共四千八百億美元（華爾街日報，2004 年 9 月 27 日，R1）。中國在出口的快速增加下，帶動了生產的大量增加，國民所得維持了 8% 或更高的成長。² 在 2003 年世界經濟恢復緩慢無力時，中國大陸的高經濟成長率提高了世界經濟的平均成長率，中國製造業的成長擴大了對鋼材和其它生產物料的需求，因此紓解了前幾年鋼材和其它生產物料因為生產過剩而價格低落的問題。

中國大陸近幾年來的發展獲得如此的成果，得到資本主義大國和世界金融貿易組織高度的贊許，中國大陸取代了台灣和南韓成了二十一世紀發展落後國家要效仿的榜樣。因此我們在分析和批判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這樣的發展時，我們必須要能對中國近些年的發展做解釋。我們一方面需要分析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是否真的面臨了困境？如果是，那麼原因是什麼？而且在目前看來，中國大陸的發展似乎尚未進入困境，因此它是否可能成為一個例外的個案？還是即使在表面看來似乎一片美好的情境下，中國大陸的發展背後是否已經埋伏了未來的危機？

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是否面臨困境？我的回答是肯

2. Nicholas R. Lardy 說根據世界銀行和 OECD 以及中國的幾個研究機構的估計，中國真實的經濟成長率要比官方的報導要低。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在 1978 年到 1995 年間中國的平均經濟年成長率要比中國官方公佈的低 1.2%，而高估的百分比在 1986-1995 年間是 1978-1986 年間的三倍。據 OECD 的估計在 1986-1994 年間的成長率平均僅為 6%，比中國官方公佈的數字要低 3.8%。

微笑理論 技術 生產 品牌 (更嚴格要求工人)
266 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提高管理以提升利率
歐美國家掌握技術和品牌, 台灣生產或代工

定的。這些國家（包括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個就是與三十年前相比較，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當今處於更被動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是當今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比戰後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產能過剩的問題將引起世界市場日益激烈的競爭和資本主義大國對進口的抵制，產能大規模過剩更會加深世界經濟不平衡的問題和美國的貿易逆差的難題。經濟發展落後國家要想從出口來取得發展面對著因為上面所提的兩點難以解決的困境，而這兩點又是互相關聯著的，下面就這兩點來做進一步的分析。從對這兩個原因的瞭解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的發展也不可能成為一個例外的個案。在這一章的第三節中將對中國近些年來的發展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依靠出口面臨困境的原因

原因一：當今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

雖然在六〇年代時台灣和南韓用加工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時，它們已經是處於相當被動的地位，因為它們在資本、技術和市場上都必須高度的依靠國際壟斷資本，但是今天與三十年前相比較，跨國壟斷資本掌握了更大的主動權，而經濟發展落後國家所處的地位則是更加被動。在六〇年代時，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尚能控制的一些因素，經過了二十年的「全球化」後落後國家對這些因素也失去了控制。在四十年前，台灣和南韓還可以在一定程度內用控制進口來保護本地的市場，它們也可以對外匯、匯率與本國金融信貸加以控制，對於農業它們可以補貼和保護。它們可以藉國有企業來支持它們的經濟發展，另外，它們在一定的限度內也可以對外資加以限制，包括要求外資在限期內提高它們

生產中本地的自製率。除此之外，它們國內的勞務市場（service sector）並沒有開放給外資，特別是在銀行和其它金融行業，過去台灣和南韓對外資都有嚴格的限制（瞿宛文，2003年，頁116）。

但是在「全球化」後的今天，落後國家對這些因素的控制都幾乎完全消失了，因此今天的國際壟斷資本掌有更大的控制權和更大的自由度，相對的來說，今天落後國家所處的地位就變得更為被動。在此之上，在六〇年代時跨國資本能夠自由出入的，只有台灣和南韓（和香港、新加坡兩個海港）兩個選擇，而今天所有經濟發展落後國家都極積的加入了世界分工的行列，這些國家爭相的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排好隊等著加入世界分工。它們彼此相互競爭來爭取資本和市場，所以國際壟斷資本在今天則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來選擇到哪裡投資、生產、銷售和進口。今天壟斷資本所享有的高度的自由是他們在二十多年「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成果。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它們要在世界資本主義中取得獨立發展已經不可能，因此這些國家的執政者爭相的將自己的主權出讓，它們在經濟上（當然也在政治上）的自主性比起以前更為低落。

與三十年前相比較，靠出口來帶動經濟的落後國家處於更被動的地位，除了上面一段所提出的原因外，另一個原因是今天壟斷資本對一些因素的控制更為加強了，因此在對世界如何進行分工，壟斷資本幾乎掌有絕對的決定權，也就因此使得各別的落後國家處於更加被動的地位。壟斷資本加強了對三個主要因素的控制：即資本、技術、和對世界市場。在這三方面，壟斷資本佔有絕對的優勢，因此他們在這三方面掌握了控制權，這樣的控制權是經由在導論中所說「全球化」中的六個部分來達成的，而且還

在繼續的加強中。

前面提到在今日的世界分工中，一個國家的分工地位決定於它的技術（包括勞動人口的技能與訓練）、資本和自然資源。技術最低和資本不足的，以及勞動力最低廉的國家只能從事最勞動密集的生產，像成衣、製鞋、紡織、和玩具等類，再高一等的就從事一般簡單的家庭電器，像電扇、電燈或是家具等類，以及更複雜一點的收音機、電視、VCR、DVD 放射機等類的生產。再高一等就生產電腦的零配件，像半導體、電腦中的各種記憶體、行動電話機等。除了這些消費品之外，世界分工的範圍還包括了像鋼鐵、造船、汽車組件、機器、和裝備製造業等類的生產。而且因為屬於每一等級生產能力的國家都有好多個，它們之間彼此競爭來給跨國資本提供最有利的條件，而跨國資本不但掌握了要到哪裡投資生產或是從哪裡進口的決定權，它們還可以將一件商品的生產分成好幾個節段，將某一個或幾個節段包給一個國家，將另一個或幾個節段包給另一個國家。因此跨國資本在選擇上有高度的自由，可是生產這些商品的國家卻被限制的緊緊的，談不上什麼選擇，因此在議價時一點討價還價的餘地都沒有。

因為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了資本、技術、和世界市場，因此它們可以根據對它們最有利的核算來選擇和調配世界分工，而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只能在這已經被決定了的世界分工中，來找一個適合自己條件的空隙，在世界各種因素不停的變化中，一個國家的所能掌握的空隙不時的轉變和縮小，需要出口的國家要以很快的速度隨時應變，不能稍有遲緩，因此它們處在極為被動的地位。這一點可以從中國積極參加世界分工後，對台灣、南韓、東南亞國家和幾個拉丁美洲國家所產生的衝擊中看出

來。因為中國的工資低廉，和人民幣與美元兌換的匯率過低，在中國全面開放後，特別是加入了 WTO 後，中國就成了跨國資本的新愛，當跨國資本轉移到中國時，所有依靠出口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衝擊。下面進一步解釋落後國家在資本上、技術上和市場上所處的被動地位，就是因為在這各方面的被動，因此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發展落後國家就必然面臨到嚴重的困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大陸也不可能例外。

在獲取資本上落後國家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今天世界上幾十家大型跨國銀行和證券公司以及在導論中所提到的五百家超級的跨國公司，控制了絕大部分可供投資的資金。根據最近的一篇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在 2003 年美國國內利潤低落時，美國海外的企業所賺的利潤打破新記錄，這些海外的分公司在分發股紅之後還剩下一千一百九十億美元可供投資（華爾街日報，2004 年 10 月 1 日，M1）。這還只是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賺的利潤在分發股紅後可以支配的資本，再加上日、歐跨國公司可供投資的利潤，以及這三個國家（聯盟）可以用發行股票、債券和用貸款所能取得的資金，國際壟斷資本可控制和支配的資本是極為龐大的。

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控制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發展落後國家無論是要借款，或者是要直接投資，或者是要發行股票或債券，都首先要經過國際金融機構的審查。國際貨幣基金就是個國際的借貸信用的評審機構，國際間的私人資本只會在被 IMF 審查合格的國家投資。為了爭取資本，落後國家必須按照 IMF 的指示不斷的在政策上做改革，以便保證投資者的安全和高收益，這樣的改革是為了增加「投資者的信心」。這樣的改革即使與落後國家的利益有衝突，落後國家的執

政者也必須要全力以覆，否則就不能獲得資本。在過去兩年（2002、2003）中國的外來直接投資就都高達五百億美元，這樣大數目的外資到中國投資是和中國加入 WTO 時所簽定的對外資保護的條款有絕對的關係的（南韓也是在經過大規模和深入的自由化改革，外資才大量投入，參見第九章）。除了直接投資外，中國的企業在國外股票市場上市，用發行股票來融資，或是在國外發行債券，都是在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之下。落後國家在獲得資金方面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

在整個由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金融系統下，國際間資本的分配產生了極大的扭曲，就像第七章中所講的近十幾年來，全世界的資本都流向美國，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欠債國，每年欠債額就達五千億到六千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的、日本的、南韓的、台灣的、和亞洲其它出口國家因貿易順差所獲得的外匯幾乎全部又以購買股票或債券的形式回到美國。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從 2000 年開始，落後的國家資本輸出的總合大於資本輸入的總合，也就是說從 2000 年開始，發展落後國家總合起來，在資本上是淨輸出的。這樣的事實揭破了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必須要依靠外來的資本的謊言，落後國家只是在壟斷資本控制下要發展資本主義才要依賴外資。這樣的事實也說明了其實問題的關鍵不是資本來自何處的問題，而是由誰來控制的問題。當今世界上大部分的資本都在跨國金融機構、五百家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組織的控制之下，就是因為這樣，發展落後國家要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就必須依賴國際壟斷資本，中國也不能例外。

在技術上，國際壟斷資本不但控制了世界上現存 95% 以上的專利權，也就是說它們對現存的技術有絕對的壟斷。不但如此，而且它們也掌控了當前絕大部分技術的研發，因此決定了未

來發展的方向。落後國家為了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就要取得新的技術，也必須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它們不但要支付使用專利權的費用，而且常常要以讓出本國的市場以及用合資的方式使外資可以分得很高的利潤。不但如此，掌有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有全權決定是否要將它們的先進技術轉讓。落後國家為了市場競爭而想要技術升級，但是在國際壟斷資本對技術的控制下，它們所進行的技術升級並不可能是要趕上或超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所謂的技術升級最多只不過是要在技術上能夠與其它發展落後國家競爭而已，如果能競爭的過，在某種技術上能比其它落後國家搶先一步，或許可以能夠稍微提升它在世界中分工的地位，或許僅是因為不被別的國家取代而保住他當前在世界分工的地位而已。因此在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中，所謂技術升級只不過是與其它落後國家相較，可以取得一個稍有利基的角落，而且在這小的角落裡，更要不斷的努力來繼續升級，才能在與其它相類似的國家相比較，保持一定的優勢，如此而已。

在市場銷售方面，國際壟斷資本通過它們品牌的創造和銷售網的建立來進行控制。這樣的控制幾乎是天衣無縫，落後國家很難能創造出自己的品牌在世界市場上出售。國際壟斷資本可以用對某些技術的控制來限制落後國家的廠商自行銷售。如果沒有技術上的限制，落後國家的企業即使能夠生產出質量夠高的產品，除了極少數例外，像南韓 Samsung 的汽車和手機，台灣的 Acer 電腦，和中國的 Haier 家電。這些廠商要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國際銷售網是極為困難的，而上面所提到的幾個極少數的例子，它們產品的銷售量也是極有限的，因此並不會對跨國大企業造成威脅。南韓的大型企業在國家的扶持下發展出來的，是落後國家中在世界市場競爭中最成功的，但是在 2004 年 8 月 31 日，世界

最大的一百家上市的跨國公司中，中國只有移動通訊（China Mobile）一家。南韓的跨國公司只有 Samsung 這一家。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和南韓的大型企業在過去曾經得到國家的保護，但是在不斷的「全球化」中國家的保護已經成了過去，而且在九〇年代的亞洲危機中，南韓的大企業中的許多家受到致命的打擊。在第九章中曾經提過，在亞洲危機之後，南韓被迫接受 IMF 的結構調整措施，措施中的條文之一就是要南韓政府協助外國跨國企業收購和兼併南韓企業。

壟斷資本除了上面所說的各種控制權之外，它們還依靠它們基地所在的國家，和由這些國家所控制的金融貿易組織在它們向全世界擴張中給予強力的支持。尤其是在一個發展落後國家在償還外債發生問題時，它們就連國家的一些最基本的主權也喪失了，像國家的稅收和支出、國內的金融政策、對匯率和國際收支（經常帳和資本帳）的控制等，在 IMF 的制裁下都喪失了，更談不上這些國家的個別企業了。

國際壟斷資本在對資本、技術、和世界市場有近乎絕對的控制。這樣的控制權是經由在導論中所說的「全球化」中的六個部分來達成的，因此只要資本主義繼續存在，按照目前的發展壟斷資本在這三方面的控制權是不可能改變的。在國際壟斷資本對資本、技術和市場都掌有高度的控制下，它們享有高度的自由選擇。相反的，發展落後國家被限制在世界分工中的某一個位置，因此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這就是落後國家陷於困境的第一個原因（由於發展落後國家，其中包括台灣這樣的新興工業國，所處的世界分工地位使他們的進一步發展面臨困境，參見附錄五毛遠城對台灣電子業的分析）。

原因二：世界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在這本書中不斷的說明因為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而不斷的發生經濟危機，而且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從七〇年代初開始，經過了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再到二十世紀初，是越來越嚴重了。這一點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已經談了很多。在生產設備大量過剩下，產品要爭取到市場就更加困難。從第七章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當今能夠吸納大量商品進口的國家，就只有美國一個，而美國因大量進口所造成的貿易逆差是靠借債來維持的。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在前面已經說過一些有見解的主流經濟學家也都承認美國靠大量借債來維持的貿易逆差是不可能長久繼續下去，因此在不久的將來這樣不平衡的狀況就必須經過調整，在調整的過程中，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將產生非常大的震盪。在這場大震盪中，對出口依賴度越高的國家所將受到的衝擊也就越大，這些國家的人民所必須要承擔的災難也會更嚴重。從下表中可以看到出

2001 年世界幾個出口國家與美國的貿易與順差

世界各國	美國 對美國出口	與美國 貿易順差 (十億美元)	國民總生產	出口佔國民 總生產比率 %	順差佔國民 總生產比率 %
中國	102	83	1,159	8.8	7.2
日本	127	69	4,149	3.0	1.7
亞洲出口國家	152	54	1,374	13.0	4.4
歐元地區	169	45	6,631	2.6	0.7
墨西哥	131	30	616	21.3	4.9

資料來源：Trade, U.S. Census Bureau, *U.S. Trade by Country*, GDP: IMF, th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Database, April 2002, Richard Duncan, *The Dollar Crisis*, p.201。

口佔國民總生產的比率，墨西哥及中國與日本外的亞洲出口國家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各佔 21.3% 和 13.0%，高過中國的 8.8%；但是以貿易順差佔國民總生產來計算，中國則高於任何主要依賴出口的國家達 7.2%，而在過去三年中這個比例則更高了。

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下，從八〇年代中至亞洲危機到來之前，國際資本（特別是日資）向東南亞國家擴張，這和自九〇年代初，大量的外資（特別是美資）來到中國是很相像的。這些國際資本在它們國內和其它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因產能過剩而找不到好的投資機會，因此向外擴張。² 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日本和其它國家到東南亞投資就把它們的產能過剩問題轉移到東南亞國家，而九〇年代初之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到中國投資，和中國因出口而帶動的本國的投資也同樣引起了中國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問題，其中更以技術低的生產設備的能過剩最為嚴重。這一點將在第三節中進一步解釋。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下繼續投資，新增加的產能中大部分都屬剩餘產能，在未來危機到來時，這些剩餘產能最可能成為被消除的產能中的部分。像在亞洲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急速下降，其中一些國家對日本的出口下降達五分之一以上，這些國家用借外債和利用外資建起來的很多工廠除了虧本出口外，就只有閒置在那邊。

2.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彼此之間沒有相互投資，美、歐、日的資本不停的收購和兼併。但是大量擴充某種產業的投資，卻是因為這些國家存在著的剩餘產能而投向落後國家。

中國拉美化

第三節 中國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也將同樣面臨困境

中國近幾年出口大量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投資。在出口中，來自外資企業的生產佔了一半以上。台灣近年來經濟增長緩慢與加工出口的生產上被中國取代是分不開的，不僅美、歐、日的資本轉移到中國去生產，台灣的資本也同樣的轉移到中國大陸去設廠，而且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資本到中國投資更早於美、歐、日的資本。在中國出口快速增加之下，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出口相對的或絕對的減少。

外資來到中國投資主要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看中了中國廣大的國內市場，在今天全世界都困於產能過剩市場滯銷的情況下，中國的國內市場成了所有跨國企業必爭之地，誰也不肯放過這個機會。跨國資本來中國投資的第二個目的是將它們的生產從它們本國或其它發展落後的國家（多半是亞洲出口國家也有拉丁美洲國家）轉移到中國，目的是在生產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來加強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而這兩個目的又是互相關聯著的，許多為出口生產的商品也同時要進佔中國國內市場。各大國的跨國公司除了到中國投資外，就是向中國輸出它們滯銷的商品，特別是各種機器設備和儀器、特殊的組件、某些產品的原料、和科技方面的硬體和軟體、醫療器材和藥品等。

美、日、歐各地的大汽車公司爭相的到中國投資是屬於第一個目的的最好例子。第九章中已經談過到了九〇年代底和二十一世紀初時，世界汽車業存在著大量的剩餘生產設備產能。在過去三年中，因為美、歐、日各國的汽車市場滯銷的情況嚴重，福特、通用和歐洲的幾家汽車公司都在裁員減產，即使過去在美國

暢銷的豐田和本田的車，如今繼續拓展它們在美國的市場也發生困難，從這些發展中可以看出汽車業產能過剩的問題有增無減。對世界各大汽車公司來說，中國潛在的國內汽車市場是塊可以發展的處女地，它們急迫的要來中國投資設廠。中國參加了 WTO 之後，當政者基本上放棄了發展中國自己的汽車工業的計畫，因此開放市場引進外資，給這些大汽車公司大好的機會。根據西方商業報導的估計，中國有近六千萬的人口（不到總人口的 5%）有所謂中產階級的購買力。當然不是這六千萬人都買得起汽車，若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的人可以購買汽車（佔總人口的 0.5%），六百萬輛汽車也是個了不得的市場（這裡指的是汽車總擁有量，不是每年銷售量）³；而 2003 年，中國的汽車（指轎車）生產量僅七十萬輛，如果中國的經濟不會很快的進入危機，那麼中國的汽車市場就仍有擴張餘地。

但是 2004 年中國汽車生產擴張的速度正在緩慢下來。除了汽車之外，就是其它耐久和非耐久的消費品，從行動電話手機、洗衣機、冰箱、電視到食品及飲料，就連洗髮水和牙膏等，在今日世界市場飽和的情況下，對這些跨國公司來說中國都是塊廣大的市場。更到所謂服務業，從金融、保險、證券交易，到教育與娛樂，更加上零售業（沃爾瑪、麥當勞、肯達基、星巴克）。國際壟斷資本在全世界市場滯銷下，在這大塊市場上的競爭成敗不但決定了它們企業利潤的高低，而且可能決定了它們企業的存

3. 這個數字僅是一個估計的潛在的但不一定能實現的汽車擁有量的總額，不是汽車年銷售量。在一本對中國經濟分析的書（《經濟藍皮書春季號中國經濟前景分析——2003 年春季報告》，2003 年，頁 257）卻非常有想像力的、完全脫離現實的預測說到 2015 年的年銷售量將達一千萬輛，到 2024 年時年銷售量更增加到四千五百萬輛。

亡。在外資大量來到中國的十年中，外資企業在這方面的發展算是相當成功的，而在中國加入 WTO 後的三年中又產生了很大的變化，WTO 有關外來投資的條款給了外資各種有利的保護，這一點下面將再談到。

外國資本來中國投資的第二個目的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樣投資的生產雖然大部分是為了出口，但是為了在中國國內市場擴展，外資也需要靠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上面所提到的在四年之內，中國的出口增加了 125%，而在這些出口中一半以上是來自外國直接投資的企業所生產的。這顯示出跨國企業在這方面的成功，達到了它們來中國投資的這個目的。

中國從資本主義改革開始逐步將經濟開放，到了八〇年代中，它開放的速度加快，到九〇年代末和本世紀初，中國的執政者將貿易和外來投資全部開放，並在 2001 年底加入了 WTO。中國從開始申請加入關稅貿易總協到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之間共有十五年之久，這也正是自 1979 年中國向資本主義改革開始後，繼續深入改革的十五年。中國加入 WTO 的談判很久不能達成協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九〇年代末之前，中國執政者對一些關鍵性的議題不肯輕易的讓步，其中包括削減進口關稅和取消進口限額的問題、取消對外來資本管制的問題、開放國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市場的問題、和保護農業的問題等。中國要求以發展中國家的身分加入 WTO，所以它可以不必全盤放棄它對本國經濟的保護，但是 WTO 主要的會員國不同意。

中國進入 WTO 的談判拖延很久的另一個原因是在 1991 年時，前蘇聯和其它東歐國家相繼解體，西方的列強看到世界的貿易體系可以將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進去而得到進一步擴張的機會。因此這些資本主義強國認為對中國加入 WTO 的條件只能

更加嚴格，而不能放鬆讓步，因為中國加入 WTO 的條件將成為與俄羅斯和東歐國家談判的前例（Lardy, 2002: 63）。

中國的執政者在資本主義的改革中，認識到今天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要與世界市場掛勾，但是他們也瞭解如果在中國資本的實力尚不夠強時就加入世界分工，結果會像其它發展落後國家一樣，只有被動的任國際壟斷資本擺佈的後果，所以在 1998 年之前，他們極積的進行資本主義改革，希望能為進入世界市場做好一定的準備，同時在與 WTO 會員的談判中，中國的代表也盡力不退讓到完全失去對本國資本和市場的保護。但是中國在資本主義的改革中面臨了很大的困難，中國當局在將前社會主義下的國營企業轉變成牟利的資本主義企業的過程中，遭遇到各種的困難和阻礙。到了 1998 年之後，美國和其它先進國家的態度依然強硬不肯讓步，中國的執政者放棄了之前對入會條件的堅持，在達成 WTO 的協議中做出極大的讓步，接受了進入世貿非常苛刻的條件。中國執政者不惜一切的要加入 WTO，說明了他們已經決定要採取對外全盤開放來加入世界分工的政策。這個決策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對外開放和大量引進外資將有助於改變原有的國營企業的經營。中國的執政者這樣的決定正說明了他們二十年來對原國有企業的改革並沒有成功，因此要藉用外國企業的力量來加強市場的競爭，希望用市場競爭的壓力來迫使這些企業轉虧損為盈餘，達成它們為資本增值的任務。

中國執政者最後接受了進入 WTO 的苛刻條件，其中的另一原因是到了九〇年代末，中國的出口和外來投資的增長率急速下降。自八〇年代中以來，特別是到了九〇年代初後，中國的出口和外來投資增長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到了九〇年代底，亞洲經濟危機發生時，出口和外來投資停頓下來。除 1997 年外，1996 年

和 1998 年的出口成長率各為 1.5% 和 0.5%，外來投資在 1992 年和 1993 年時的年增長率曾達 150%，但是 1998 年和 2000 年的增長率減低到 0.4% 和 1.3%，1999 年時更下降了 11.4%。雖然中國在亞洲危機中，因為經濟尚沒有完全開放而相對其它亞洲國家受到較輕的災害，但是中國的執政者還是採取了將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的決策，以便使中國的出口與外來投資不致於繼續陷入停滯。而中國的執政者自資本主義改革開始，就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寄望在外來的資本和歐美的技術上。

中國接受了進入 WTO 的苛刻條件

中國在前社會主義階段的對外貿易是按照計畫進行的，在向資本主義改革中，特別是到了為加入關稅貿易總協的談判開始後，中國作了一系列的與貿易相關的改革。在 2001 年底之前與 WTO 的談判期間，中國進一步將貿易改革，做為加入 WTO 的準備。

在進口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降低進口關稅和取消進口限額和進口執照。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 1982 年的 56% 降至 2001 年的 15%。除此之外，中國還設立了許多免進口稅的項目，像為生產出口需要而進口的原料與組件可免進口稅。另外，為了鼓勵外來投資，外資企業與中外合資企業所進口的生產機器設備大部分都免稅。從 1997 年開始，所有學術研究機構所需的科學器材也免進口稅，到了 2000 年時，進口免稅的項目又將電腦所需的軟體包括進去。因此到了 2000 年的上半年，在總進口額中需要付進口稅的只佔的 40% (Lardy, 2002: 32-36)。在進口數額的限制上（包括需要進口執照）也大量減少，在總進口中受數額限制

佔總進口的比率從 1991-1992 年的 90% 以上，到 1992 年改革後的 18%，到了九〇年代底，這個比率更降到 8.45% (Lardy, 2002: 39)。

出口方面的改革也是從八〇年代初開始，官方首先取消了依照計畫來決定出口的政策，但是出口仍由國家控制。隨後允許外資（獨資或合資）企業設立他們自己的出口管道。1985 年中國外貿局成立了 800 家可以操作貿易的公司。之後，貿易公司的數目不斷增加，到了 2001 年時，貿易公司的數目增加到 35,000 家，其中有 1,000 家是屬於私人的。因此到了中國參加 WTO 之前，由國家控制商品的進出口已經不斷在減少。中國一方面將進出口自由化，另一方面卻被迫與資本主義大國簽定限制紡織品和成衣出口的條約。1980 年中國與美國簽定條約中，中國同意限制六種紡織品的出口。到了 1983 年和 1986 年續約時，受出口限制的紡織品和成衣的項目不斷增加，在 1986 年的條約中，限制的項目佔中國出口紡織品與成衣中的 90%。除了美國之外，中國對歐盟和一些其它國家的紡織品與成衣的出口也受到相同的限制 (Lardy, 2002: 47)。

在 1994 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結束後，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不再僅是包括商品貿易（與之前相比較商品貿易加入了農業），還包括勞務貿易、智慧財產權、和有關外來投資的項目（參見附錄二）。因此，WTO 中的主要會員國與中國談判的範圍也擴大了，將上面所列的其他項目也包括進去。下面就是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所接受的各種讓步。

在進口關稅上，中國同意在加入 WTO 後從 2004 年開始，除了少數例外，將工業的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 15% 下降到 8.9%，將農業的進口關稅的平均稅率從 22% 下降到 15%。中

國的工業進口稅與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四個大出口國相比較要低很多，它們各為 30.9%、27.0%、32.4%、36.9%。在中國進入 WTO 之前，其它會員國很少在農業的進口稅方面讓步，中國不但同意將農產品的進口稅降到比日本還要低，而且它同意稅率一旦降低就不再提高，因此就連與中國談判的美國貿易代表都說：「很少國家做過這樣的讓步」。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很少將自己的進口稅設定上限，如果有的話，也是將上限設得高出規定的稅率很多，以便有必要時可以隨時提高（Lardy, 2002: 75-79）。但是中國這樣的作法，就自動的放棄了未來可以將稅率提高的可能。

中國並同意最遲在 2005 年取消所有進口限額和進口執照等類的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中國在美國的跨國企業壓力下，取消了這些非關稅貿易的障礙，因此特別有利於美國在飛機、醫療器材、烈酒與啤酒、和某些種化肥各方面的出口（Lardy, 2002: 65）。

在勞務貿易上，中國同意在加入 WTO 後，將國內幾項重要的勞務市場開放，其中包括通訊、銀行、保險、證券各種金融行業，和法律、會計、管理的諮詢，並且開放外國的工程師、建築師、都市計畫家、醫療和電腦等專業人員到中國開業。在過去中國對外國商業銀行在中國的業務有很嚴格的限制，因此，在中國加入 WTO 前，外國銀行不但被限制在少數的幾個城市中，而且外國銀行只能進行外幣交易，不能進行人民幣的交易。在中國加入 WTO 之後，從 2005 年開始，中國就必須取消在地理上對外國銀行的限制，再過兩年之後，外國銀行可以進入以人民幣與當地企業的交易，三年後（2008）外國銀行可以接受個人的存款，也可以貸款給個人。五年之後（2010），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本國

銀行同樣的權利（所謂 full national treatment）。另外，在中國加入 WTO 三年後，所有對在中國的外國零售業、批發業、修理與維修等業的限制也將取消（Lardy, 2002: 70, 73-74）。

中國除了做了上面所提到的讓步外，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讓步就是有關進 WTO 後所必須遵守的條規，接受了這些條規之後，在未來發生貿易上的爭執時，WTO 就根據這些條規來做裁判。中國同意接受所有的條規，其中包括最特殊的和最不平等待遇的條規。這些條規中的一個就是中國同意接受在加入 WTO 後的十二年的期間，從中國進口的國家可以用進口的限制來保護它們的市場，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可以設立起限制進口量的 safeguards（Lardy, 2002: 81）。

對進口量的限制是違反世貿精神的，因此一般被世貿允許的安全保護措施（safeguards）在執行上是比較嚴格的。受到傷害的國家必須要經過政府有關部門的調查後證明某一行業的確受到傷害，才能設立安全保護措施，而且設立保護期間以四年為限。但是對中國的這種特殊的安全保護措施（被稱為是過渡時期對某種商品的限制 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s），則不需要經過調查和證明，只要某個進口國家認為它從中國進口的某項商品擾亂了它的市場就可以設起安全保護措施，而所謂對市場的擾亂只是從中國的進口量（絕對的或相對的）增加的太快而已。而且這樣的對中國進口的限制不是一般的四年，而是可以繼續八年之久。另外，在一般的安全保護措施下，被限制出口的國家可以採取報復，而中國被規定在兩年之內不能採取報復。除此之外，另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作法是當一個國家認為因從中國的進口擾亂到它的市場時，它不必要對所有其它國家設立起安全保護措施，它可以只針對中國一國，這所有針對中國的特殊的不平等待

遇被美國的貿易代表稱為特別為中國而設的（China-specific）。Lardy 認為在過去關稅貿易總協和現今世界貿易組織中，這樣對中國歧視的作法是非常不尋常的特例（Lardy, 2002: 82）。

最後要提到的另外一個特別針對中國加入 WTO 所設的苛刻條件。WTO 在廢除多種纖維貿易安排後，達成了紡織與成衣的協定（WTO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這個協定規在 1995 年 1 月 1 日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之間，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須取消對紡織品與成衣所設置的進口限額，但是中國同意對它的紡織品和成衣的進口限額可以再延長四年，到 2008 年的年底才廢除。

在壟斷資本的控制下中國的加工出口的發展與前途

在過去幾年的發展中，中國認識到要從跨國公司獲得先進的技術是非常困難的。在一本中國工業報告（2003）的書中，報告者們這樣寫著：「歐美國家對中國製造業的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還是很弱。首先歐美國家在華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雖高於國內企業，但基本上不是國際上最先進的技術。其次，歐美國家在中國的技術擴散與適度的技術轉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但這種作用非常有限。跨國公司對這些技術轉讓嚴格控制，採取各種措施防止技術在中國擴散。歐美國企業為了使其在以後的投資活動與我國政府和企業談判時始終保持實力上的優勢，以提供先進技術為條件而逼迫我國政府與企業做更多利益讓步，同時又不影響母公司的先進技術向我國出口，必須保持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的技術優勢，所以沒有能夠帶動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中國工業報告》，2003: 56）。這一段話是中國由實際經

驗得出的總結，也正說明了落後國家在技術發展上所處的被動地位，而且中國也不例外。在參加由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國際分工中，目前也看不到這種在技術上的被動地位會有扭轉過來的可能。

中國過去十幾年（特別是最近三年）中的發展導致工業的結構極不健全，中國的製造業雖然增長很快，但是它的生產製造業裝備的能力卻非常的薄弱。在這本工業發展報告中，報告者們這樣說：「我國裝備製造業的生產能力利用率也只有 50% 多，國內市場急需的許多重大技術裝備、專用設備、儀器儀表等技術密集性產品每年大量進口」（《中國工業報告》，2003: 28）。在這一段的註解中，報告者們用兩個例子加以說明：在中國化纖製造設備的進口佔國內市場需求的 80% 以上；石油化工裝備、轎車工業裝備、數控機床等設備的進口佔國內總需求的 70% 以上（《中國工業報告》，2003: 28）。除了裝備方面的技術落後外，中國在許多產品的生產中，許多重要技術和組件都得靠進口。這本報告中這樣說：「我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鋼鐵生產大國，但冷（軋）薄板卻有巨大的供給缺口，自給率僅 65% 左右，不（鑄）鋼的自給率僅 15%」。這本報告更說雖然許多高檔的耐久消費品的生產能力強大，但是在生產中的中間產品、配套產品和一些原料則要依靠進口（《中國工業報告》，2003: 27）。

中國要靠國外跨國資本來提升技術不得成功，所以中國在世界分工中，基本上還是只能站在加工出口的地位，從這一點來看，中國與台灣和其它亞洲出口國家相比較，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只是程度的差別，而在實質上卻是很相似的，在一些加工的技術中，中國還比不上台灣和南韓。中國趕忙的將經濟全面開放，進入了由壟斷資本所控制的世界分工。從表面看來中國成了「世

界的製造業中心」，使得中國在全世界經濟蕭條中還可以繼續成長，但是這幾年來的發展已經遇到問題，像在技術上不能追趕美、歐和日本的問題，對外來資本依賴的問題，和其它在一些發展上不能突破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今天全世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比戰後任何時候都要嚴重，這就是中國未來的發展將走入困境的原因。

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的落後國家在世界分工中的被動地位就註定了它們很難逃出為國際壟斷資本加工的地位，從近幾年的發展看來，中國也不例外。這種結果從中國出口的價格與進口相比較（terms of trade）不斷下降中顯示出來。這種現象與長期以來發展落後國家在貿易中，出口農產品和原物料與進口工業產品的比價持續下降所受到的損失是相同的。在這本中國工業報告中，報告者們也看到了這個現象，並稱之為「量增價減」（《中國工業報告》，2003: 87）。他們認為造成這種結果是因為中國國內企業壓價競爭所帶來的。其實出口和進口之間比價下降並不僅是因為國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而造成的，而且出口價格下降也來自出口同類商品的國家之間的競爭。⁴ 這樣價格向下壓低的情況，在越是勞動密集的產品中就越嚴重。Ross 和 Chan 在〈從北—南到南—南的國際競爭的真貌〉的文章中，談到發展落後國家之間在爭取出口的競爭中，將工人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都往下拉的問題（Ross and Chan, 2002）。中國製的商品充斥在美、歐、日的消費市場上，同類的商品在許多出口國家的競爭下價格持續的下降。在大量供過於求的條件下，價格下降的趨勢特別嚴重。這本報告

4. 報告中提到當前中國的企業因為不同的所有制，所以對社會的承擔的大小有區別，因而造成成本上差異，報告者們認為這是將出口價格壓低的主要原因，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

也提出降低成本的競爭是靠犧牲勞動者的利益而換取來的。

上面提過中國近年來的發展也將會造成與亞洲危機前後東南亞國家生產設備過剩相似的問題。中國在製造業生產率快速上升時，製造業的生產設備的投資增加的也很快，事實上中國的大量生產設備投資是國民總生產以高速度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包括外國資本與本國資本的投資。過高的投資就會造成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和機器設備利用率過低的問題。在這本中國工業報告中，報告者們這樣說：「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1995年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半數產品，其中照像膠卷僅為13.3%，電影膠片25.5%，電話單機51.4%，彩電46.1%，家用洗衣機43.4%，空調器30%，自行車54.5%，內燃機43.8%。國家經貿委2002年上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況調查表明，600種重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佔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佔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中國工業報告》，2003: 27）。在一篇紐約時報雜誌的報導中也強調中國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這篇文章說中國近90%的產業都是供過於求（紐約時報，2004年7月4日，頁30），這樣低的產能利用率幾乎嚴重到美國經濟大恐慌時的程度，特別顯示出中國國內市場的低落。這樣的現實跟今天主流媒體對中國經濟繁榮的報導差距是極大的。除了工業上的剩餘產能外，許多基本建設和像辦公樓等建築的利用率也很低，這使人聯想到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在當年危機剛發生時，日資在馬來西亞興建的大樓和飛機場都空空的見不到人影。同樣的情況在短期內也很可能發生在中國大陸。

中國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會連續遭到各種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世界上美元充斥，美元面臨大幅貶值的今天，中國為了維持出口

和人民幣不升值必須大量購買美元的資產。在 2004 年的一年中，中國購買了相當於本國總生產（GDP）12% 的外國（大多數是美國的）證券，其中包括股票、公司債券和美國政府的公債。因此在全世界產能高度過剩下，中國用借錢給美國來維持它對美國的出口。這種作法是極為扭曲的，也是不能繼續的。

因此在未來的幾年中一方面美國對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繼續加強，另一方面藉著中國在參加 WTO 時所接受的不平等待遇的條款，資本主義大國很可能聯合起來抵制中國的出口。在不久將來中國的出口增加速度必然要緩慢下來，甚至要下降。在這之上，從過去三年美國外債增加的情勢看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不平衡的發展在不久必然要經過調整，在調整中將會給全世界帶來衝擊。從近年來中國對出口市場依賴的情況看來，中國將受到的衝擊是會很嚴重的。

中國大規模的加工出口靠的是廉價的勞工，中國的勞動人民和墨西哥、或其它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一樣，高速度的出口成長對他們來說只是工作的時間和強度都不斷的增加，而不會得到生活的改善。在資本主義的改革中，城市裡大批工人被解雇，原有的社會福利和保險全盤瓦解，使得很多人連最低的溫飽都不能維持，生病求醫都成了最大的奢侈。更有一億以上的農民在農村生活困難而到城市來謀生，他們的生活比起原來的城市居民更加困苦。在這些城市中也同時出現最豪華的旅館和最高級的轎車。中國在「全球化」下參加了壟斷資本控制的世界分工，中國新的達官顯貴分到他們「應得」的權益，而中國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獲得了什麼好處？

這一章總結了八〇年代「全球化」之後落後國家發展的經驗。

世界體系

核心 (有技術和品牌, 資本)

半邊陲

ex. 南韓 → 代工, 發展品牌
↓
做代工, 中小企業

邊陲

中國會在哪?

→ 金 中國拉美化

→ 中國之前因共產, 必須自己生產 → 有技術.

代工 → 有\$ (資本)

人口多 → 擴大內需

第十一章

資本主義危機與「全球化」—— 總結過去展望未來

每一百美元從厄瓜多爾原始森林開採的石油，石油公司拿去七十五元，另外的二十五元中的四分之三必須用來償還外債，剩下的大部分用來做為政府的軍事或其它開支，僅剩下約兩元五角拿來做貧窮人的保健和教育費用。因此，從亞馬遜（Amazon）搶走的每一百美元的石油中，僅有三美元給這些因建水壩、油管和鑽孔採油而受害最深的人。這些人常因食物與飲水供應不夠而死亡。

John Perkins,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2004

在第一章開始時，我就說明了「全球化」是一個被誤用的和濫用的詞，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可以借用這個詞，來對它做我們自己的詮釋。在本書的第二章到第十章中，我嘗試著去對資本主義從上世紀三〇年代以來七十多年的發展做解說和分析。在這論述中我解釋了為什麼資本主義在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中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卻又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繁榮和成長。原因是資本主義大國在戰前存在的剩餘產能在大戰中被完全的和徹底的消毀了。這次大規模毀滅性的戰爭卻給資本主義帶來了新生的機會。戰後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存在著各種新投資的機會，大量的新投資和因新投資而來的技術革新帶給這些國家空前的繁榮和成長。在這二十多年的繁榮中，

因國內與國外的政治情勢，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國家、資本與工會的合作建立起了「福利國家」。使他們的勞動人民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和保障。

除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外，戰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更建立起以美元為中心的金融與貿易體系。這個金融貿易體系促進了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各國之間的貿易和資本的通暢流動更進一步助長了經濟的成長。在戰爭結束到六〇年代底這一段日子，因為各大國內尚不存在著大量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壓力，所以它們之間的市場競爭也還不很激烈，因此這些國家之間可以經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中的管道，用協商來解決它們之間不甚嚴重的矛盾。

大戰結束後在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中，有半數以上的人民經過了革命，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在其餘的落後國家中多數選擇了用進口替代和國有化的政策來發展它們的經濟，它們希望能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取得獨立於列強的資本主義發展。另外台灣、南韓、香港和新加坡選擇了用出口來帶動經濟成長。在戰後的前期（1945-1972），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雖然未能取得獨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它們的經濟得到一定的成長。在這二十多年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雖然沒有公平對待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但是它們的侵略性尚不至於像最近的二十多年那麼強烈。

到了六〇年代底，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再度明顯化，資本主義大國間的競爭也因而激烈起來，它們開始各自設立了非關稅的貿易障礙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到了七〇年代初，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起來。1973年時，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1973年第一次石油加價後，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同時進入了戰後第一次嚴重的經濟蕭條。此

後，美國、西歐各國、和日本都經歷了經濟上的滯脹，也就是經濟蕭條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的問題。經濟滯脹使得戰後用來調節經濟的凱恩斯政策在這時失效。戰後建立起來的「福利國家」與國際金融貿易體系，在新的情勢下不再適應資本積累的要求。經過了幾年的過渡時期，在國際壟斷資本的督促下，由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階級帶頭，做了為適應新情勢的改革。從此開始了「全球化」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這些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做了論述。

第一節 「全球化」帶來了什麼？

在這本書的論述中「全球化」被定義為壟斷資本在危機中新的資本積累策略。這個策略是為了應付七〇年代資本積累的危機，因此資本主義危機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在導論中對「全球化」所作的定義中，說明了這個新的資本積累策略包含了六個相關聯的部分，這六個部分是在「全球化」下建立起來的一套資本積累的機制。在這套整體的機制中，壟斷資本進行積累。壟斷資本「全球化」的策略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在「全球化」的機制下，資本得以突破國界的限制向全世界擴張來進行積累，因此暫時紓解了在危機中資本積累所面臨的困境。在「全球化」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國際壟斷資本進一步集中和擴大。但是因為「全球化」並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因此不可能改變在資本主義下危機不但會重覆，而且在過剩的產能無法銷毀下，未來危機不但要加深，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也會加快。事實上從八〇年代到今天的發展正是證實了這一點。

在「全球化」資本積累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

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策略破產。在「全球化」中經濟落後的國家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內，成為壟斷資本積累中的一個環節。在這個過程中，國際壟斷資本順利的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落後國家，由落後國家的人民來承擔。因此在資本主義的危機中，國際壟斷資本還是可以將危機快速的轉移來繼續完成它們的積累。而一個個落後國家在危機中，就像遭到颱風過境一般，它們的經濟受到了難以復原的創傷，在最強的風暴過去之後，留下來的是關閉了的工廠、失業的工人、農業的破產和逃到城市討生活的貧民。危機後人民的生活常常倒退幾十年。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危機之後，除了本國經濟破產外，更欠下了 IMF 和跨國銀行的外債以及被迫簽定的喪失主權的結構性調整條例。這就是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歷史。

「全球化」——世界市場一元化下的兩極分化

在第十章曾經說過經過了幾十年的所謂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的生活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瞿宛文，2003，頁112）。在發展落後的國家內和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貧富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今天這種因兩極分化所產生的矛盾現象幾乎在世界上每個大城市裡都可以看到。就連貧窮國家的大城市裡也都有非常豪華的五星級旅館，但是在同一個城裡也可以看到極為窮困的貧民窟和帶著全家老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重要的是豪華的旅館和貧民窟是同時的快速發展起來的。一位在基隆坡為城市貧民工作的人對我說：「城市貧民和農村小農破產是一回事，這是今天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的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當今落後國家為了某種農作物的出口，它們的

政府和世界銀行常會援助它們來發展大規模的新式商業性農場。農村的土地就因此集中起來。小農失去土地後就流離失所，只能到城市來謀求一條生路。但是城市裡也找不到工作，因此他們就連最低的溫飽也無法維持。

當一個落後國家的經濟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內，傳統的生產方式就必然會逐漸破產，即使農村的小農還能保留下一小塊土地，他們也無法進行生產。因為一切的生產元素，像肥料、農藥、甚至於種子都變成了商品，都要用現金購買。而這些生產原料的價格使得生產出來的糧食比市場上的價格還要高出許多。因為一方面大規模生產比小農生產要有效率，另外在糧食開放進口後價格就更低（像墨西哥在 NAFTA 之後，從美國進口的玉米將市價進一步壓低）。因此這種小農的生產方式就無法維持下去，到最後還是得破產。一些好心腸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常會建議一些脫離現實的辦法，像用低利貸款來援助這些小農，好像這樣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困境。低利貸款或許可以幫助幾百個或幾千個農民，但是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百萬、千萬和億萬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不但城市的貧民與農村農民破產有直接的關係，近年來大批的跨國界的移住工人也和落後國家的農業破產有直接的關係。今天社會學家們注意到了在亞洲和美洲移住勞工。但是這些研究移住勞工的學者們常常只是孤立的去觀察這些移住勞工生活上的一些細節，而沒有去進一步去瞭解他（她）們從何而來和為何而來。

巴西是今天世界上最大黃豆出口國，也是雞肉的出口大國。1998 年在亞洲經濟危機後，泰國的養雞集團（Charoen Pokhand Group）將雞肉在泰銖貶值之後再降價促銷，因此奪去巴西原來在亞洲（特別是日本）的雞肉市場。當時沙烏地阿拉伯（世界第

五大雞肉進口國)又因為石油降價使得雞肉的需求降低。美國和歐洲國家又一向都抵制雞肉進口。巴西生產太多的雞肉銷不出去,按理說巴西的人就可以有雞肉吃了。但是九〇年代末的亞洲危機這時蔓延到巴西,工人失業、實質工資下降、必需品價格上漲,一般人更吃不起雞肉(華爾街日報,1998年10月2日,A-1)。巴西是個農業出口的大國,但是巴西的兒童有一半營養不良,在聖保羅城很多人靠撿垃圾過活。大量糧食出口和本國人民吃不飽這兩個事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個發展所同時產生的結果。落後國家的農業出口增加的越快,農村的破產也越快,都市和農村的貧窮人口也越多,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也越嚴重。

巴西出口的是黃豆、咖啡、和雞肉,智利出口的是海產和水果,印度和塞內加爾(Senegal)出口的是花生;墨西哥出口的則是水果和蔬菜;哥倫比亞出口的是鮮花。這些國家的出口並不會給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帶來更多的財富,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貧困。當世界市場一元化之後,所有的食品都變成了商品。就好像所有這些商品都集中在一家最大型的超級市場,在這個超市裡的商品琳琅滿目,架櫃上陳列著各式各樣的食品,也擠滿了來自各國的顧客。所有的顧客在選擇了他們要買的東西後,就到櫃檯上去結帳。有錢的人就可以給他們的貓買 Purina 用魚粉做的貓食,歐洲養牛的大企業可以買含有花生的高蛋白質飼料,城市中階層收入的家庭主婦可以買新鮮的蔬菜水果和一束鮮花;但是想買點食物充飢的窮人付不起帳,只好空手出來,他們的孩子必須要忍住飢餓和因營養不良而帶來的疾病。雖然這裡的大超市是想像出來的,但是智利出口的魚用來做 Purina 的貓食,印度和塞內加爾出口的花生做成歐洲養牛的飼料,美國菜市場裡從墨西哥進口的新鮮蔬菜和水果,和來自哥倫比亞越來越便宜的鮮

花，以及這些出口食物國家買不起食物充飢的貧民，卻都是一元化市場下發展出來的現實。

第二節 「全球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全球化」在某個程度上暫時的紓解了國際壟斷資本積累的困境。到了七〇年代之後，在世界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因為生產設備過剩，資本找不到新投資的機會，面臨了資本積累的危機。在八〇年代初後二十多年的「全球化」中，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和資本主義落後的國家中都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中，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壓低了勞動者的報酬，降低了資本對國家管理上的負擔，增加了國際壟斷資本的活動自由度。另外，八〇年代以來的改革使得本來已經進入主導地位的金融資本更加膨脹，進一步要衝破對它的任何限制。在製造業因為生產設備過剩而投資困難的情況下，金融資本進入了各種從前不屬於牟利範圍的經濟活動，像醫療、教育、甚至向政府包下學校和監獄的管理；也進入了各種金融方面的投機，像股票、房地產、和各種期貨的投機。九〇年代中後股票市場的暴漲和 dot com 公司上市帶來的瘋狂，和亞洲許多國家房價和地價的飛飆，正是衝破了管制的金融資本到處亂竄的表現。在股票市場大漲大落下，社會的財富經過了重新分配，向少數人手中集中。

在「全球化」的擴展中，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戰後前期的進口替代發展破產，這些國家想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夢破碎，它

們一個個被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內，爭先恐後的進行了一波波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給壟斷資本提供了向世界各地擴張各種有利的條件。這樣的改革是為了爭取外來投資和在世界分工中搶一個小的角落。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給國際壟斷資本提供了向外擴張的好條件。它們在八〇年代的危機後就從拉丁美洲的國家擴張到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也同時擴張到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從 1979 年中國的資本主義改革開始，國際壟斷資本看到向中國擴張的機會。跨國資本在過去的十年中，特別是在 2001 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大陸。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壟斷資本大量進入發展落後國家暫時紓解了壟斷資本的積累困境。

在「全球化」下國際壟斷資本不斷的擴張，隨著壟斷資本的擴張，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也就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擴張到世界的各個國家。之後，危機也就隨著過來。這一點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都已經談過了。在第十章中也講到中國的國內市場現今已經趨近甚至超過了飽和，它的大多數製造業生產設備的產能都大量過剩。雖然中國的出口在近四年來增加的很快，但是在很近的將來一定會緩慢下來。自從 2001 年日、歐、美的經濟進入蕭條後，至今也恢復不起來。日本的剩餘生產設備在過去十幾年投資緩慢中解決了一部分，但是還是產能過剩。大規模的新投資在日本無法進行，因此它的經濟欲起又落（Sakakibara, 2003: ix）。美國的經濟在所謂復原中，但是就業人數增加的極慢，被稱為不增加就業的復甦（jobless recovery）。在歐盟中，像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在戰後快速成長的景氣一去不回，它的失業率高達 10% 以上。歐盟中其它的國家經濟成長也是緩慢。在所謂經濟恢復中的 2004 年，日本經濟再度負成長。資本主義各大國（日本、歐

洲和美國)的主要耐久消費品都面臨市場滯銷的困境。

今天世界產能雖然已經極端過剩，但是大規模危機尚未爆發，原因之一是美國還是不斷的用借債來支付它在貿易上大量的入超，而美國的大量進口使世界的剩餘產品暫時有個去處。但是從第七章和第十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來，美國這種長期靠借債來支付貿易逆差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美元在過去一年中的貶值就是反應了美國長期貿易逆差的問題。但是美元貶值的幅度和其它相應的調整尚不足能解決它的國濟收支不平衡的問題。

因此，「全球化」雖然暫時舒緩了壟斷資本積累의困境，但是卻無法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做為資本它必須要不斷的投入生產才可以增值，但是由投入生產所增加的生產設備卻因為市場的限制而無法充分利用，因此才有產能過剩的問題。世界的幾個大汽車公司一窩蜂的到中國大陸投資，幻想著中國有個買得起汽車的中產階級。不到三、四年的時間就顯示出這個中國可以購買汽車的中產階級可能並不存在，或是它們突然之間像泡沫一樣的消失了（亞洲華爾街日報，2004年11月24日，M1）。在各大汽車公司爭先恐後的投資中，加速了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也同時使中國的汽車業堆積起來與市場相比較大量的剩餘產能。

當勞動人口的收入陷入長期停滯或下降時，他們的生活需要無法通過購買力而成為市場的需求。因此，生產設備產能過剩是相對於市場需求而言，不是相對於人的需要而言。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增值，不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和人的生活需要不能得到滿足的矛盾就不可能解決。而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除了靠戰爭來銷毀外，就只有在長期的危機中才能將剩餘的生產設備逐漸的銷毀。只有在剩餘產能銷毀後才能再次創造新的投資機會。日本在

八〇年代的剩餘產能經過了九〇年代初至今十幾年的時間，還有不少的設備沒有被銷毀而閒置在那裡。因為各個產業中有閒置的產能，所以即使銀行用近於零利率的貸款也沒法刺激起資本家投資的興趣。

因此，「全球化」雖然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協助了壟斷資本向全世界擴張，暫時延緩了資本積累的困境，但是「全球化」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全球化」下，跨國資本不但將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帶到世界各地，「全球化」也把資本主義的危機蔓延到世界各地。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更到九〇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危機也就隨著「全球化」連續不斷的蔓延和加深。在危機的蔓延和加深中，國際壟斷資本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後的國家，由落後國家的人民來負擔。

第三節 「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

當列寧在 1917 年寫《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本重要著作時，他看到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中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而擴大了生產的規模。列寧進一步分析生產資本如何在工業的蓬勃發展中進一步集中在大規模企業中，而且資本集中的速度越來越快。他根據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和批判來進一步解釋當時的這個現象。他分析了資本主義如何從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以及金融資本如何在這發展中與生產資本結合而形成壟斷。列寧從這樣的分析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壟斷的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且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列寧從他的分析中得出資本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資本改變了它在世界範圍內資本積累的方式。列寧認為在十九世紀末之前，資本主義屬於競爭階段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輸出以商品為主。到了 1880 年後，資本經過兼併而集中，生產和分配都集中在大的壟斷資本手中，這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以商品輸出為主轉為以資本輸出為主。列寧從資本主義的這樣的轉變中來分析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之間的關係，和這些國家們與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他的分析使他得出了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壟斷階段時，落後國家在反帝的鬥爭中可以得到解放。

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像依賴發展理論只從交換關係中來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列寧是從資本積累來分析在資本主義競爭階段和在壟斷階段之間的差異。列寧不但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做階級分析，而且對當時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像俄羅斯）做階級分析。最後得出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內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反抗帝國主義的結論。由無產階級來領導的革命就只能以達成社會主義為目的。歷史的發展證明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分析和由這個理論所指出的行動方向是正確的。俄羅斯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毛澤東繼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和對中國具體情況的分析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它的目的是走向社會主義。

蘇聯和中國雖然革命成功，但是它們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嘗試都失敗了。它們向社會主義過渡失敗的原因有待我們深入的分析 and 檢討。蘇聯和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失敗，使得由美國領導的帝國主義勢力可以橫行全世界。他們宣佈「歷史已經終結」和

「除資本主義外無它選擇」的狂言。像這樣資本主義全勝的宣言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宣傳的起點。資本主義日益深化和蔓延的危機的現實就被這壓倒一切的新自由主義的宣傳淹埋了。事實上在美帝國宣佈資本主義全勝時，也就是資本主義正陷入了更深的危機的時刻。

從列寧的分析到今天這將近一個世紀中，資本主義是否又進入另一個階段？或者是進入了帝國主義中的一個新的時期？這是左派今天必須要嚴肅的思考和研究的課題，這裡無法對這麼重要的問題做回答。這裡提出來對「全球化」的分析不但不是要質疑列寧的分析是否仍然適用於今天，事實上這本書中的分析正是要說明「全球化」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我在分析資本主義危機時，今天資本主義的危機與一個世紀前的危機和上世紀三〇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的危機，在本質上並沒有不同。這裡對「全球化」的分析只是要指出在過去三十年中，壟斷資本在危機中，改變了它在戰後前一時期資本積累的策略，如此而已。因此最多也只能說從資本積累的策略來看，在戰後可以分為前期和後期，而「全球化」是指後期。資本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仍然是屬於列寧所分析的帝國主義的理論和架構中的。

因為列寧的分析是根據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分析而得來的，我並不認為在這將近一個世紀中，資本主義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從量的變化上來看，在資本主義的帝國中，資本比之前更為集中，壟斷資本的力量也更大。同樣的，在資本輸出方面，資本輸出的量也比一百年前更加龐大，資本輸出的方式也有所改變，但是這些量的改變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的本質。所以我的結論是「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

第四節 落後國家人民解放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從這本書的分析中，我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在過去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深化而且更加頻繁，而下一場危機爆發只是遲早的事。資本主義的危機是推動「全球化」的力量，前面各章說明了「全球化」是國際壟斷資本在近二十年來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危機連續到來中，壟斷資本要用「全球化」來繼續舒解它積累的困境將是未來發展的前景。

在「全球化」下，落後國家已經被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落後國家的經濟已經與世界資本主義緊密的接連在一起，所以當資本主義的危機到來時，一定會波及到所有的國家。而且根據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經驗，在「全球化」的機制下，發展落後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衝擊和災害遠超過資本主義的各大帝國。「全球化」使得發展落後國家進一步失去了抵抗危機的能力，使得它們在危機中要承受各大帝國轉嫁過來的災害，而危機帶來的災害，在落後國家中是由廣大勞動人民承受著，他們被逼迫過著越來越艱苦的生活。

因此，我們今天要談落後國家的未來發展時，我們必須要考慮到資本主義的危機仍將持續和擴大。從這本書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在戰後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嘗試與努力在「全球化」下完全破產。這進一步證明了在帝國主義下落後國家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因此由它們統治的國家就很難抵抗國際壟斷資本的攻擊，這個階級從之前對國際壟斷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依賴，在「全球化」中更進一步對國際壟斷資本做了退讓，它們接受了 IMF 所加諸在落後國家身上的各種喪失主權的條件，這都說明了這個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取悅

於國際壟斷資本。

「全球化」發展到了今天，我們舉目看來發展落後國家中的站在統治地位的大多數已經認識到獨立自主的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和他們的幕僚們只是眼巴巴的望著這個日益擁擠的世界市場，想找到能夠容納下他們國家出口的一個夾縫，因此他們也就無暇顧到人民生活的困苦，或是本國資源的浪費、流失，和本國環境的摧毀。

落後國家的執政者彼此相互競爭的取消了一切對國際壟斷資本擴張的限制。它們大幅降低了工業和農業產品的進口稅、取消了對農民的補貼、取消了對外資的管制、給予外國投資者國民待遇、給予壟斷資本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允許外資的服務業（包括金融業的銀行、保險、證券交易，也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樂、交通、通訊、資訊、零售等業）進入本國市場。除此之外，並將原國有企業私有化，再將股份在國際證券市場上出售。在簽定結構性調整條例的同意書時，許多國家的執政者還承諾要將本國的勞動市場彈性化來給跨國公司更大的便利。並壓低工資與取消對貧窮人的食物、醫療和教育的補貼。

過去近十年來的反「全球化」的運動就是世界上各地的人民直接的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各種災害，聯合起來對「全球化」抵制的運動。¹參與反「全球化」的許多人都親身經驗到在「全球化」下他們能夠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農民失去了世世代代賴以生活的土地，或者即使還保有一塊小土地，在廉價農產品進口下也不再能生產。工人的生活也因資本不斷的移去而使得工資、福利和工作環境經歷著一輪又一輪的下降。在這樣的發展下，國際壟斷資本掌握了所有的有利條件，勞動人民失去了最低的生活

保障。談什麼自由選擇？談什麼自由競爭？談什麼自由貿易？

過去近十年來的反「全球化」運動還只是在抵制「全球化」在各方面的進攻。但是在反「全球化」的運動中越來越多人瞭解到只靠抵制是無法逆轉國際壟斷資本和各大帝國不會終止的進攻，也有更多的人瞭解到「全球化」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一塊遮羞布。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帝國主義就存在一天，所以如果要反壓迫、反剝削、求生存、求解放就只有反對帝國主義，對世界大多數的勞動人民來說沒有其它的選擇。

就像第一章導論一開始所說的「全球化」是一個被誤用了的名詞，「全球化」常會被看為在貿易交易上的頻繁或貿易自由的程度，因此反對「全球化」就是要閉關自守，或是在貿易上採取保護的貿易政策。根據我在導言和本書其它各章中對「全球化」的分析，「全球化」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而是包括了國內的階級關係。而且除了帝國之外，還有控制世界經濟的大型跨國公司，和協助壟斷資本擴張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在導論中所談的「全球化」的六個組成部分是一體的，那就是帝國主義。因此，反「全球化」就是反帝國主義。

要反對「全球化」不是要回到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只是對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如果只用保護貿易來反對「全球化」，我們可能會陷入資產階級的狹隘國家主義。美國工會的領

1. 反「全球化」的正式揭幕應該是 1996 年在菲律賓舉行的反 APEC 大會。這次的反 APEC 大會由菲律賓的群眾組織 BAYAN 所發動和組織的。BAYAN 以工農為主，聯合了國內的各個階層，包括進步的議員、天主教的主教、教師、醫療人員、學生、新聞記者等，並邀請了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各個國家的進步人士。這個反 APEC 的大會在三天的會議中對「全球化」中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取消對跨國資本的各種管制做了嚴厲的批判。最後一天遊行到 Subic Bay（APEC 開會的地方）去抗議。

導人反對中國參加 WTO 不是考慮中國工人在入 WTO 之後所將受到的剝削。他們是站在美國資本的立場來反對，認為中國參加 WTO 後美國多了個競爭對手。但是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公司在中國加入 WTO 後將生產移到中國，因為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工而變得更有競爭力。而美國的一些政客們也只會表面上對工會的這樣的抗議略表同情而已。這說明了各國的勞動人民不能站在他們本國的資本的這一邊來彼此抵制。資本打破了國界，我們並不要重新用國界來阻礙各國人民的聯合。只有在各國勞動人民的團結下才有力量來對付大型的跨國資本。

面對著「全球化」的六個組成部分，我們要反對「全球化」時目標就應該清楚起來。我在下面將我認為的反帝運動應採的方向做解釋，而反帝運動的具體策略則是要根據各地客觀的條件來決定。

當今美國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帝國，美國依仗著它在世界上霸權的地位為所欲為。美國是全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最大的威脅者。美國依仗著它在武器上的絕對優勢而橫行獨霸。美國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反對而進侵伊拉克。但是這場戰爭也充分的暴露了它侵略伊拉克的真正目的與反恐無關，而是為了能有效的控制伊拉克的石油。美國不顧伊拉克人民的生命、財產及文化，在伊拉克繼續了它從九〇年代以來殘酷的侵略戰爭，更充分的顯示出美帝國的狂妄。在這一年多的戰爭中，殺死了十萬個伊拉克人民，但是美國的這種狂妄的行為也暴露了它即使擁有再高科技的武器，它也無法征服伊拉克的人民。而且越來越多的美國士兵開始醒悟他們不願再用他們的鮮血來換取石油和石油公司的利潤。美國的侵略戰爭也證實了不管美國的軍事武力有多龐大，它將會陷於左右不能兼顧的泥淖而不能自拔。這說明了美國不可能用武力來爭服世

界。

美國在政治上的霸權表現在對有關人類未來存亡和安全的大問題上，傲慢的拒絕與其它次級帝國的合作或協商。像世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遏止環境進一步惡化而達成了 Kyoto 協議，美帝國卻漠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拒絕簽署。美國在政治上的霸權也表現在它在世界各地對主權國家內政上的干預。美國在委內瑞拉支持它的右派反 Chavez 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在戰後的幾十年中，同樣的例子，包括美國在世界各地顛覆合法的政府的例子多不勝舉。與美國軍事霸權相結合的政治霸權威脅到了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和人類未來的存亡。所以在反帝的鬥爭中，我們就必須要反對美帝國在軍事上和在政治上的霸權。

美國在經濟上利用美元是世界貨幣的地位，和其它國家對它的市場的依賴用借債來持續它在國際貿易上的逆差。美國用去全世界可供經濟建設資本的四分之三來支持它龐大的消費與政府開支。因為美國外債的擴張更引起了全世界金融資本的膨脹，以及近在眼前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對於美國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霸權，其它次級帝國看在眼裡氣在心裡，但是這些帝國的利益已經與美國密切的牽連在一起，它們不會也不能對美國的霸權積極的反對。但這也不是說將來在矛盾激化後不會有改變。

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霸權使得它能把它在軍事上的暴行和它在經濟與政治上的霸權合理化。它以「自由世界」的領導者自居來把它的橫行霸道說成是對「自由世界」的保護。但是在 2001 年 911 事件後，美國以反恐為藉口的各種行動越來越得不到其它國家和人民的支持。美國想用「反恐」來取得它過去在「反共」中的領導地位的企圖與伎倆並沒有成功。

這本書的著重點在於對經濟範疇的分析，但是在整個反帝的運動中我們要特別重視意識形態的鬥爭。美國在長期的反共和反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它對意識形態的製造和宣傳的操作不但是非常熟練而且是非常有技巧。美國設立起表面像是民間的組織來宣傳「民主、自由」（像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和 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但實際上是完全由美國國務院撥款支持的政府機構。另外，全部經費由美國政府支持的「美國之音」，對事實做各種曲解來幫美國做宣傳。

除此之外，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更用大筆經費在許多國家中來支持各種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 NGOs）。目前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這樣的 NGOs 有五萬個之多，僅在印度一個國家內就有兩萬三千個，它們每年接受來自各國的共十億美元的援助（WSF: Dissent or Diversion? 2003: 19）。這些 NGOs 與當地的群眾組織競爭來吸納帶有理想的青年，以便混淆當地國家社會運動的目的。這樣的作法在社會運動本身就搞不清方向時最有效。

在導論中說過世界上 500 家最大的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一個主要部分。這五百家跨國公司是國際壟斷資本的代表。「全球化」是它們過去二十多年來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下它們藉助於帝國和金融貿易組織的協助以「自由貿易」為名，進一步控制了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是它們在推動 WTO 中的保護它們的投資法，是它們要用智慧財產權法來控制科學技術的發展。在它們以謀求最高利潤為投資、生產、銷售的唯一目標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永無止境的來剝削勞動力、掠奪自然資源、和污染環境。在國際跨國資本的快速的擴張積累中，經濟發展落後國家人民的生存空間急速地在縮小。

在反帝的鬥爭中我們要揭露並反對這些跨國公司的惡行。在反對 IMF 和 WTO 的運動中我們要認清這些世界金融貿易組織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關係。

當然在反帝的運動中，我們必須要看清本國的統治階級和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關係。在反帝的鬥爭中我們必須反對本國執政者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保護、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對本國資產與資源的掠奪、和對本國自然環境的摧毀。

如果說資本國際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反對資本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與壓迫，保護未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與環境更是一股不可逆轉的趨勢。壓迫越深反抗也就越強，這是必然的道理。

在反帝的大方向下，世界各國深受「全球化」災害的人民正策劃著在具體的行動中如何聯合。在導論中說過的帝國主義的力量是極強大的，但是也是極脆弱的。今後反帝的鬥爭將是一條漫長的和艱苦的道路，其中將經過無數的挫折，但是在反帝的運動中會有更多的人認識到他們所受的痛苦和災難的根源來自何處，因此他們能發揮出來的力量將是極為龐大的，是真正不可阻擋的，在今天這個烏雲滿布的天空裡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光明的未來。歷史沒有終結，它正在向前邁進。

帝國主義 [新] 英法以船尖砲利殖民其他國家
 WWII後 民族國家興起
 [舊] 國際建置、文化、意識型態
 ex. IMF
 → 建立另一種價值觀來抵抗？

附錄一 美國在貿易上的單方制裁

八〇年代以來，因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它們用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的花樣也越來越多，其中美國所用的方法最具侵略性。美國靠著美元是世界貨幣的優勢，和許多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及它在政治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它隨意的使用單方制裁的方法來保護自己的市場。第七章中談到美國貿易逆差到了八〇年代後更加嚴重，為了紓解它的貿易赤字問題，美國除了用政治手段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外，並且以單方制裁的攻擊手段來打開別國的市場。

在保護本國市場方面，美國國會在 1974 年通過貿易和關稅法，這貿易和關稅法中的第 301 條授權給美國總統，使他在必要時對出口商品到美國的國家採取報復性的制裁。這條法律經修正後，變成 1984 年貿易法中的 301 條到 306 條和 1988 年貿易和競爭力大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 中的第 301 條到第 310 條 (Bhagwati and Patrick, 1993: 1-3)。到了 1988 年的貿易和競爭力大法通過之後，美國在單方使用 301 條來制裁它的對手時，它完全以本國某個工業是否受到外來競爭的威脅做為決定的根據，而不管對方國家是否違背了關貿總協的規定。美國單方面決定在某一限期內，對方國家必須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否則美國就用報復行動來制裁對方。制裁的辦法之一就是提高來自該國進口商品的進口稅。這裡值得提起的是，這條大法的 301 條授給美國私人企業主動權，由它們向美國國家貿易代表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提出在它

的那行業中，所受到的來自外國企業的「不公平的競爭」。國家貿易代表收到這樣的申訴後，必須做調查，如果認為申訴有理就開始採取制裁。在此同時，美國貿易代表也特別選出一些國家，專門收集這些國家的貿易資料以準備做未來報復之用（Bhagwati and Patrick, 1993: 2-3）。

在擴張出口方面，美國經常施加壓力來迫使對方（特別是對日本、南韓、台灣）保證它們在一定期限內，要增加從美國進口某一商品的一定數額。美國和日本在半導體貿易糾紛就是一個例子。日本和美國在半導體貿易的糾紛從七〇代就開始了，到了八〇年代中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更加嚴重後，它對日本和其它國家所施加的壓力也就更加強了。美國的電子業因為在國防軍事上的重要性一向受到國家的保護，電子業除了資本有一半來自國防部外，在研究經費上也得到政府大量的支持，所以美國這個工業的技術在世界上一直遙遙領先。但到了八〇年代，美國的電子業碰到日本這個勁敵，在國內和國外市場上都受到日本的挑戰。為了對付日本的競爭，美國就用政治壓力迫使日本和美國簽定了半導體貿易協定，這協定規定在 1986-1991 年有效期內，日本不但要停止繼續對美國「傾銷」電子產品外，而且必須保證把日本國內半導體市場的 20% 讓給美國的進口（Irwin, 1994: 54-56）。

美國也同樣對台灣施加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壓力，迫使台灣增加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在 1990 年時，台灣已經從美國進口近六十億美元的農產品，進口額以個人平均來算，高達一百零一美元，佔所有從美國進口農產品國家中的第一位，但是美國還是不斷施加壓力，美國這一切作法不是靠市場競爭使貿易更通暢，而是用政治手段來保證貿易的一定結果。目的是為了解決美國貿易上巨額逆差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

資本。

美國這種可以不顧國際協定，單方制裁競爭對手的作法專門用來對付其它國家。一方面美國看準了這些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因此，只要美國做出制裁的警告，在還沒採取制裁行動之前，這些國家就已經先屈服。另外，就是美國靠著它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和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來協助它的跨國資本，因為這些受到制裁的國家往往都是在美國的軍事保護網之下，所以它們是無法真正與美國對抗的。

在一篇討論台灣與美國貿易衝突的文章裡，文章的作者認為美國因為要減少它在貿易逆差，而通過了 1988 年的貿易和競爭力大法，他並且認為這條法不但改變了前一時期美國的貿易政策，也改變了美國對外貿易的程序，他把這樣的改變總結成下面幾條（Chou, 1993: 206）：

- 增加政府對貿易的支持。
- 政府用更快和更強的行動來對抗與其它國家的貿易進行方式。
- 制定美國在世界貿易新回合（即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目標。
- 在美國與日本談判中，用日本希望取得阿拉斯加的石油和煤氣為條件來迫使日本在貿易上的讓步。

在同一篇文章的附錄中，作者列出了從 1970 年到 1989 年之間，美國國會通過的有關貿易的條文或決定。並列出在實施這些條文和決定時，絕大多數都是向對方國家施加壓力。到了八〇年代後，施加壓力的措施的次數更加頻繁，從 1985 年到 1989 年的

四年中就有四十八次之多 (Chou, 1993: 215-227)。另一點我們注意的是：在美國國家單方面用強制的手段來保護它本國的市場和本國的跨國資本的同時，它卻大力的提倡新自由主義，要其他國家取消一切國家對貿易的管制、干預與保護的政策。

到了八〇年代中，在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矛盾更加深化後，為了使關稅貿易總協不完全解體，這些國家同意再嘗試做一次談判。這就是 1986 年開始烏拉圭回合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從 1986 年開始到 1994 年結束，進行了八年之久。這次談判不但拖延的久，而且曾經幾乎破裂，這個事實一方面顯示了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矛盾之深，另一方面也說明到了八〇年代中以後，資本主義大國之間以及它們與落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已經遠超出了貿易上的關係。到了 1994 年底，資本主義列強終於達成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協議，協議中的一個決定就是在次年成立一個永久性的世界貿易組織。1995 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與它所替代的關貿總協有所不同，它不再侷限於用降低關稅來促進貿易增長，而是包含了貿易之外的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經濟關係（參見附錄二）。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國也從關稅貿易總協六〇年代肯乃迪回合談判的 48 個國家，增加到 117 個國家。

WTO 成立後，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爭執並沒有減少，美國單方制裁的行為也沒有改變。2002 年 3 月美國布希總統將鋼鐵進口稅提高 30%。兩個月之後布希又經過立法將農業的補貼提高 80% (DuBoff, 2003: 5-7)。

附錄二 世界貿易組織與關稅貿易總協相異之處

世界貿易組織（WTO）與關稅貿易總協（GATT）相比較範圍要廣得多，只就貿易上來說 WTO 不僅包括工業品的貿易，而且包括農產品和服務業的貿易。除了貿易之外，WTO 還包括了許多有關國際間投資的條例。除了貿易和投資之外，WTO 的條款還涉及有關智慧財產權的規定。下面就解釋 WTO 與 GATT 相比較不同的幾點：

第一點就是關稅貿易總協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國際組織，它只有在要解決國與國之間貿易問題時才聚在一起開會談判。每一回合談判相隔好幾年。每個回合的談判在取得協議後就結束。這些協議就成了在下一回合談判前，用來約束達成協議國家應該遵守的條例。但是因為總協不是永久性的組織，所以在發生貿易爭執時，無法即時制裁違犯協議的國家。而且關稅貿易組織對違犯協議的會員國也沒有真正的制裁能力。當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爭執越來越頻繁時，它們之間的爭執就不可能只靠幾年才進行一次的談判來解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是資本主義大國認為它們需要一個永久性的解決貿易爭執的仲裁機構。所以成立世界貿易組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想要解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越來越困難的、越複雜的、和越頻繁的貿易爭執。

第二點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範圍擴大，到 1995 年它成立時會員國有 117 個國家，之後有更多的國家參加，到 2004 年 10 月時，會員國的數目增加到 148 個。因此，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變成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而且每一個國家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時必須全盤接受這個組織所有的規定，不像在關貿總協時，落後國家還有一些選擇的餘地，不一定要接受總協的所有的條款。世

界貿易組織對會員國的強制力量大過總協。從這一點看來，世界貿易組織不同於關稅貿易總協，因為關貿總協在戰後成立時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而世界貿易組織除了要為解決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外，更重要的是要打開新興工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商品和資本市場。

第三點是世界貿易組織所包含的貿易項目不再只限於工業品的貿易，國與國之間的農產品的貿易也被列入烏拉圭談判的範圍。將農業貿易列入談判範圍的主要原因，是為解決資本主義大國的農業生產持續增加，和它們本國市場滯銷的矛盾。在第四章中談過一些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在 1992 年成立前為歐聯）和美國在農業貿易的爭執（參見附錄四）。美國和歐盟因為對農產品的價格補貼，而造成它們財政上的沉重負擔。所以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時，資本主義大國都迫切希望用農業貿易的協議來解決它們由農業補貼而帶來財政負擔的困境。世界貿易組織除了要降低農業貿易關稅外，並且規定各國政府要取消它們對農業的補貼。美國和歐盟因為無法根本解決它們本國的農業的生產過剩的問題，而政府對農業補貼的開支負擔越來越沉重。1986 年美國政府農業的補貼開支高達三百億美元，是 1980 年時的十倍。1991 年時，OECD 二十四個國家對農業的補貼達一千七百七十億美元，補貼額佔生產的比例高達 45%，歐聯是 49%，美國是 30%。

農業貿易的初步協議是要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的國家減少政府對農業補貼（包括直接給農民的補貼或農產品價格的補貼），並且要在一定限期內達成一定的目標。按資本主義大國自己的計算它們在 1995 年就已經達成減少補貼的目標，所以主要是要求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和台灣也包括在內）遵守個這規定來減少補

貼。雖然談判中牙買加代表提出不同的方案，亞買加代表認為對農業的補貼問題應該分別對待，在農產品生產過剩而必須將農產品出口的國家應該限制和取消補貼，但是世界貿易組織應該允許第三世界國家在達成糧食自給自足的過程中給予農民補貼。但這方案受到農產品出口國一致的反對，而且又得不到其它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聯合支持，而沒有通過。這樣硬性削減第三世界國家對農民的補貼，將會對這些國家一般人民的糧食自給問題有深遠影響（Coote, 1996: 198-199）。因為第三世界農民一方面失去政府的補貼，另一方面又要面對因降低關稅而增加進口廉價的糧食，使得他們生產糧食更加困難，也就使得這些國家更依賴糧食的進口。這個問題關係重大，所以第三世界農業補貼的問題到今天還沒有解決。

第四點不同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對資本主義大國在貿易和投資中智慧財產權的保護（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 TRIPS）。資本主義大國的跨國公司掌握了全世界 95% 以上的專利權，這條對國際貿易中智慧財產權的規定要求第三世界國家的專利權法，和美國與歐洲國家對專利權的保護期限一樣（Coote, 1996: 201）。將這一點列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中，是為了保護近年來資本主義大國的壟斷資本在電子資訊、軍事武器、航空工程、生物工程、藥品、電腦軟體、和電影音樂各方面發展的成果。用智慧財產權來限制新興工業國在這幾方面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大國可以保證它們的資本在這些產業中新發展出來的技術壟斷。這點對新興工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世界貿易組織中對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條文都是由大型跨國公司聯合起來寫成的。

從世界貿易組織對智慧財產的保護可以看出來發展落後國家

如何受制於國際壟斷資本。在歐洲國家和美國發展它們的經濟時，它們對專利權的保障只限於本國的發明，並不包括對外國發明的保護。它們的理由是為了經濟發展它們必須要抄襲和拷貝別國的發明（《經濟學人》，2002年9月14日，頁75-76）。也就是說，美國可以抄英國的或抄德國的技術。因此，在資本主義大國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國家對專利權的保護（是否要保護外國發明）是以本國的利益為考慮來決定的。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了一個階段，本國的新發明越來越多時，這些新發明需要別的國家保護時，這個國家才會以保護它國專利權作為交換。美國是在它的發明需要歐洲國家保護時，才對歐洲的專利權給予保護。但是對目前的發展落後國家，它們已經接受了世界貿易組織中所規定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條文，這個條文制定了世界性的對智慧財產權法律保護的最低標準。到2006年時它們就必須要按著這個條文來保護所有外國的專利權（《經濟學人》，2002年9月14日，頁75-76）。這就是在表面看來似乎平等的條文，是完全不平等的（Reddy, et. al, 2002: 108-118）。

第五點不同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增加了有關外來投資的新條例（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簡稱TRIMS）。八〇年代中期後在「全球化」下，美、歐、日的資本輸出不斷地快速增加，這些投資要求保護，新增的投資條例是為了要取消過去第三世界國家對外資所做的一些規定和限制。根據WTO的這些投資條例，接受外資的國家不能像以往一樣要求外資在生產中必須用一定成分的本地材料，也不允許它們要求外資企業將產品的一部分出口，或對外資進口零組件有任何限制（Coote, 1996: 202-203）。這一條例取消了接受外資國家對外資限制的主權，使外國資本享有本國資本同樣的權益。事實上，外資比本地資本更

能得到減免稅金和其它的優惠。壟斷資本所要求的對外來投資的保護範圍比上面提到的要更廣也更深，目的是要外國投資享有國民待遇。在第八章討論 NAFTA 和 MAI 時對外資的國民待遇有解說，請做為參考。

最後，世界貿易組織不同於關稅貿易總協的一點是有關國內服務業市場的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 GATS），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下，參加的會員國必須開放它們國內服務業的市場。允許外資進入廣告業、銀行業、保險業、醫療業、電訊、教育業和娛樂業等。這些服務業對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民生影響重大，因此過去幾乎都是由國有企業經營，或者是由私有企業經營但要受國家保護和規定。在 WTO 之前幾乎所有國家對外資要進入這些行業不是禁止，就是加以嚴格限制。但是，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之後，不但要將這些服務業向外資開放，並且還要取消對外資限制的規定。這一點對發展落後國家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壟斷資本等著第三世界國家將一些重要企業，像銀行、醫療和教育等私有化之後，它們就可以在這一條例的保護下進來收買。

在 1995 年 WTO 成立時，它與關稅貿易總協的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上面幾點。另外在 WTO 的協議中資本主義大國同意廢除多種纖維貿易安排，並達成了紡織與成衣的協定（WTO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這個協定規定從 1995 年 1 月 1 日開始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為止，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必須對取消紡織品與成衣的進口限額。

1995 年之後每次 WTO 開會時，資本主義大國繼續代表以它們為基地的跨國公司來對發展落後國家施加壓力以獲取更多的權益。其中包括資訊技術，和通訊及金融服務業的協定。在 WTO

未來的會議中，發展落後國家將會持續的受到壓力來把它們的國家再進一步開放。

附錄三 對國際收支帳目的解說

從一個家庭的收入、支出、資產與負債談起

一個家庭的一筆帳（這裡暫時借用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與資本帳的用詞）

經常帳是記一個家庭的收入和支出

收入：工資收入、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房子出租的租金等。

支出：日常食物、衣飾、房租支出、購買大件消費品、或支付房貸利息等支出。

資本帳是記一個家庭的資產和負債的增加或減少

資產：銀行存款、房屋、汽車、家具、首飾、股票等。

負債：房屋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欠額等。

收入大於支出時：剩餘部分可以用來增加資產或減少負債。

收入小於支出時：不足部分可以用減少資產或增加負債來補足。

國際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s）

國際收支平衡表是一個國家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支付帳目，其中又分為：經常帳（current account）和資本帳（capital account）。

經常帳是記一個國家在某年度內外匯的收入和支出

外匯收入包括：

- (1) 商品出口：出口商品的外匯收入。
- (2) 勞務出口：包括航運、空運、觀光旅遊（外來遊客）、保險和外移勞工匯回國的外匯等項外匯收入。
- (3) 在外投資的收入：包括利潤、利息、專利和其它收費等外匯收入。
- (4) 其它收入。

外匯支出包括：

- (1) 商品進口：輸入商品所付的外匯。
- (2) 勞務進口：包括航運、空運、觀光旅遊（國人到外國旅遊）、保險，和支付外籍勞工等項外匯支出。
- (3) 支付外資在本國投資所得的利潤、利息、專利和其它費用。
- (4) 其它支出。

資本帳是記一年內資本的外匯流入與流出

資本的流入包括：

- (1) 外資到本國的投資：包括外來的直接投資和股票投資。
- (2) 從國外借到的貸款：包括短期和長期貸款，包括在國外發行的債券。

資本的流出包括：

- (1) 本國到外國的投資或外資撤走。
- (2) 本國對外國的貸款或償還外國貸款。

國際收支的經常帳在一年中收入大於支出時（順差），資本帳可以支出大於收入。換句話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經常帳中有順差，順差的部分就可以用來增加它的外匯儲存、對外投資（包括購買外國股票或直接投資）、或增加它的對外貸款，以上這幾項都是資產的增加。一個國家經常帳順差時也可以用來償還外債，也就是減少負債。

相反的來說，如果一個國家的經常帳支出大於收入（逆差）時，它的外匯儲存會減少，如果外匯減少尚不足支付經常帳的逆差時，這個國家的逆差可以由外來投資（包括外資購買本國股票或直接投資）、或向外國借款（銀行借款或發行債券）。外匯減少和外來投資增加都是本國的資產減少。向外國借款則是負債增加。

國際收支是一個國家與世界其它國家之間的支付帳目。其實它跟一個家庭的收支帳目沒有甚麼不同，一個家庭如果開支超出收入，先用自己的儲蓄來補足，再不夠就必須得賣掉資產或借債。一個國家如果經常帳有逆差也必須靠外匯儲存和資本的輸入來支付，也就是說靠外資或外債。一個家庭若是因收入不夠開支而借了債，之後，這個家庭每月的開支就會因為要支付利息和償還本金而更增大，就可能需要借更多的債，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債越借越多。不但要本上加利還要利上加利。一個國家也是一樣，像第三世界國家的外債就是因為利上加利而越滾越大。

一個國家在經常帳上發生逆差時，除非有外來投資來補足就一定要借外債。唯獨美國不一樣。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成為世界貨幣，美國因此享有特權。美國在經常帳和資本帳都可以同時有逆差，也就是說美國在貿易上有逆差還可以繼續對外投資和對外貸款，不足的部分，它只須用美元支付就可以了。在戰後以美元

為中心的世界金融貿易體系內，所有國家都接受美元做為貿易上的支付媒介，美元也是各國中央銀行內的外匯儲存，因此美國可以不斷的輸出美元，這些在美國國外的美元實際上就是美國的外債。

在 1971 年前美國國外的美元可以要求向美國兌換黃金，但是在 1971 年美國宣佈不再兌換有黃金後，美元就只是美國這個國家的紙幣而已。美國的貿易逆差自八〇年代來擴大，在最近的三、四年中它的經常帳的逆差增加的速度進一步加快，到 2004 年的經常帳逆差達六千億美元。所有與美國在貿易上有順差的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台灣和其它亞洲出口國家等）拿到美元後就拿美元去購買美國的股票和債券（包括國家公債和公司債）。有關這方面的解說和討論，請見第七章和第十章。

瞭解國際收支帳目才能瞭解國際金融中的各種問題，像外債問題、美元貶值問題、和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等問題。

附錄四 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對世界農業的衝擊以及對全世界工人和農民的剝削

1997年7月菲律賓世界農業大會發表

金寶瑜 著 陳信行 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的農業生產和分配出現了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是帝國主義國家國內生產和出口政策導致農業剩餘產品的不斷增加；第二種趨勢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壟斷資本對農業產品生產和分配的控制在不斷增強。這兩種主要的趨勢的存在危及了第三世界國家農民的生產與生活，而且使食品這種人類最重要的需要，對於貧窮國家的大批貧困人口來說變的越來越難以得到。始於1986年結束於1994年的關稅和貿易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第一次將農業貿易的自由化做為目標。1995年4月，117個國家簽署了烏拉圭多邊貿易協議的最後法案，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們將從下面的分析中看到，這些協議的目的是鞏固帝國主義國家和全球的壟斷資本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的收益，並且為了贏得更大的收益而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控制。如果讓他們得逞，就會導致上億人蒙受更深重的苦難。

上面提到的主要趨勢之一源自於大蕭條時期的農業危機以及後來的羅斯福新政的農業政策，這些政策或者類似的政策主要為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和西歐國家所採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採用侵略的手段來為這些政策帶來的大量的剩餘產品開闢市場，並將它們從原來六〇年代的主要糧食淨進口國變為八〇年代中期的主要糧食淨出口國。根據一位學者的研究，「在六〇年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佔了世界糧食進口的60%和世界糧食出口的50%強。

然而到了八〇年代中期，這些國家只佔世界糧食進口的 40%，和世界糧食出口的 70%」(Tyers, 1992: 21)。同一時期，第三世界國家變成為依賴糧食進口才能養活自己人口的國家。¹

另一個主要的趨勢是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分配的商業化。大型的跨國農業綜合企業將農業生產的每個步驟都結合進他們的資本積累過程中。大型的石油、化工、種子和農業機械公司控制了農產品生產的原料，而大型的食品加工公司控制了產品的加工和成品市場。在這裡我將討論這些發展趨勢，並揭示：為什麼說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所訂立的規則是在保護全球壟斷資本的利益，同時是建立在損害第三世界國家工人農民利益的基礎之上。

帝國主義國家農業政策對農業貿易的影響

二十世紀三〇年代，資本主義陷入空前深重和持久的危機。美國的農業生產出大量的食品 and 原物料，但是上千萬的人因為貧窮而買不起他們所需的食物。農產品價格一落千丈，農場主們不能賣出他們的產品；許多人因此而破產並失去了自己的農場。這時，羅斯福總統提出了新政的農業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以圖找到解決當時危急情況的方案。新政農業政策包括以下幾點：一、通過限制土地的耕種面積來控制農產品的生產；二、通過提高農產品的價格保護來扶持農場主。其中限制土地耕種面積的方法未能奏效，因為農民捨棄了貧瘠的土地而種植較為肥沃的土地並且

1. 1983-1986 年間，發達國家擁有全球 90% 的小麥出口，80% 的世界粗糧出口，和 95% 的奶製品出口。同一時期，發展中國家佔有 58% 的世界小麥進口，43% 的粗糧進口，和 35% 的奶製品進口 (Tyers, 1992: 24)。

增加施肥量，所以生產出的產品仍在繼續增加。美國政府通過購買市場中的剩餘產品來保持農產品價格較高的水平，但是這種措施鼓勵了農民的生產，導致農民生產的產品更多。儘管這在二戰中或者二戰一結束時並未成為大問題，但美國政府在五〇年代的大量剩餘農產品決定了美國保護國內市場同時侵略性地開發海外市場的政策。為了保護本國市場，政府對各種農產品實施進口控制以及徵收關稅。1950年，美國對奶製品施加了第一個進口限額（Braga and Vasconcellos, 1990: 258）。為了能輸出本國不斷積累的剩餘產品，美國政府第一次推動以援助的名義將產品賤賣給第三世界國家，而當第三世國家變的得依靠糧食進口時，美國轉向了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剩餘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

在西歐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中恢復元氣之後，美國失去了出口的主要市場。之後，歐洲國家也採取了與美國類似的農業計畫，也同樣導致了過量生產和產品過剩。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簡稱CAP）通過在經濟共同體間削減關稅和對從共同體外的國家進口進行控制和提高關稅來保護其成員國。在八〇年代後期之前，農業的貿易保護政策在美國和西歐間時常引起貿易爭端和互相的威脅，然而儘管如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很合作的。如一位作者所提到的，美國支持歐洲的大麥和奶製品的保護政策，而做為回報，歐洲共同體解除「共同農業政策」所規定的對進口美國的玉米和大豆的控制（Friedman, 1993: 35）。正是因為美國和歐洲共同體都採取了保護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措施，關貿總協定中一開始沒有設立關於農業的貿易自由化協定。1951年，美國國會修改了1933年的農業調整法案中第22款，修改的法案確立美國實行進口限額的權利。並且「美國所簽訂的國際間協議（現存的或將來簽定的）

都不得限制此法案中該章節的條款」(Braga and Vasconcellos, 1990: 259)。這表明關貿總協定根本就不是恪守自由貿易的原則；恰恰相反，貿易只有在對帝國主義國家有利時才是自由的。因此，歐洲國家和美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如貿易配額）限制了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工業以及其它主要產業產品的輸出。

限制進口的同時，美國必須為在「價格補貼計畫」下積累的小麥和其它剩餘產品尋求出口渠道。根據一位作者的研究，美國480號公共法（Public Law 480）之下的「食品援助計畫」本來是做為二戰後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的一部分而制定的，後來也推廣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其中的區別在於，在對歐洲進行援助時，執行者很小心的避免將美國的剩餘產品向歐洲傾銷（以比國內低得多的價格銷售），其目的在於避免阻礙歐洲的戰後農業復興；但是在對第三世界國家援助時則是進行毫無忌憚的傾銷（Rau, 1957）。美國的這種政策最終結果是：在很多國家中，進口的廉價小麥逐漸的替代了本國生產的糧食作物，即使在世界許多地方小麥並不是傳統食品的一部分。於是，「……整個第三世界變成了世界小麥市場中主要的進口需求來源。進口政策使得在二戰結束時本來還是糧食自給自足的國家，在二十年之內變成了糧食依賴型國家」（Friedmann, 1993: 38）。

接著，1973-1974年世界糧食危機爆發了，因為蘇聯大量購買小麥導致世界的小麥市場價格猛漲。與食品價格上漲同時發生的還有石油價格的上漲。因此，既要依靠糧食進口又要依賴能源進口的第三世界國家必須為兩者支付更高昂的費用。與此同時，這些國家中的多數由於傳統的出口熱帶作物及其它初級產品價格的降低受到了出口收入的損失。這恰恰就是第三世界國家債務危機的開始的重要原因。

美國和歐洲各國國內的農業政策一直持續到八〇年代末期，直到農業補貼計畫成為過重的財政負擔時才開始考慮改變它們的農業政策。因此，在烏拉圭回合的關貿總協定會議中，農業的貿易自由化才變成一項談判內容。下面將對此進行更多的討論。

壟斷資本對全球農業生產和分配的控制及其影響

二次大戰後的幾十年中的第二個趨勢就是壟斷資本在全球範圍對農業生產和分配越來越強的控制。壟斷資本主義獲得了對農業生產過程的一頭一尾的更多控制，也就是所謂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農業產品分配的商業化。

農業產品的工業化生產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徹底的改變了農業耕種方式，這並不僅限於二戰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已開始的耕種機械化。所謂的「綠色革命」，就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一個早期的例子：石油公司研究培育出特殊的種子，而這類種子需要大量的化肥。當帝國主義國家在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綠色革命」時，那裡的農民為此吃盡了苦頭。這些高產量的種子需要佔用大面積的土地、高資本投入和用來購買化肥的現金。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方，「綠色革命」使許多小農破產，因為他們沒有能力與裝備齊全的大農場互相競爭。此外，過去的二十年中，壟斷資本家通過對生物技術研究的控制，也在農業投入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控制。在農作物生產中，大型化工跨國公司採用生物和化學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開發和控制新的作物品種及其生長所需的特殊化肥、除草劑和殺蟲劑。大型的石油、化工、製藥和穀物交易壟斷公司擁有附屬種子於它們的公司。這些公司兼併促成了有關生物和化學研究的進行，研製出的新品種需要特殊配方的化肥、除草

劑和殺蟲劑。1988年世界上共有十家最大的殺蟲劑公司，它們共擁有一百五十億美元的銷售額，並且控制了1988年世界殺蟲劑市場75%的份額。從八〇年代末開始，龐大的化工公司加強了在生物技術上的研究，而且在過去的幾年中已經開始了從他們的研究成果中獲得好處。華爾街日報1996年10月的一篇文章報導了跨國化工公司孟山都（Monsanto）如何大獲其利，其妙訣就是控制新研製的「捕捉」牌除草劑（Roundup），這種除草劑能殺死任何綠色植物。孟山都又同時控制了特殊培育的大豆種子和棉花種子，這些大豆和棉花種子被從基因上做了手腳，使其對「捕捉」牌除草劑有抵抗力。購買了新型基因的大豆和棉花種子的農民同時必須同意孟山都公司來進行檢查，以防止他們將當年收成的一部分收成留做來年的種子。孟山都公司的這種措施使它能够對每袋種子持續地要價二十美元，其中有五美元是所謂「技術費用」，「孟山都公司宣稱這種附加的費用就好像計算機軟件的知識產權保護一樣」。這種知識產權理所當然地受到了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植物品種保護法案」（US Plant Varieties Protection Act）的保護（Dickson, 1985; Goodman et al. 1987: 113）。²在同一篇文章中，評論家認為新型種子和除草劑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值得擔心的。化工公司沒有去研製需要較少的殺蟲劑和除草劑的種子，相反，而是研製出了需要更多殺蟲劑

2. 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有法律保護「作物品種權」。在1987年，「與美國不同，在歐洲作物新品種不能立即獲得專利，儘管其所有權是受法律保護的若對此有所改變，則必須對1973年的「歐洲作物公約」做較大的修正。如果這真的發生的話，傳統的品種培育者將面對更大的困難，因為大的跨國農業企業會認為：為了保障它們的研究開發有較高的回報，有關專利不但應保護研究出的新型基因，而且應保護與之相結合的作物」（Dickson, 1985; Goodman, et al., 1987: 114-115）。

和除草劑的新型種子。科學家們擔憂長期種植這種作物會加速產生出抵抗力更強的害蟲和雜草品種。與此同時，孟山都公司已經兼併了其它一些種子公司，並且準備在 1998 年銷售它們研製能抗「捕捉」的玉米和蕃茄種子。孟山都公司的股票在 1995 年上升了 74%，在 1996 年的前十個月又上升了 71%（華爾街日報，1996 年 10 月 24 日，A-1）。

這些跨國的大公司不但繼續而且擴張它們在「綠色革命」中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做的一切。農村社會學家肯尼認為：「普遍公認：商業化高產農作物品種向第三世界農業的大量輸入，代價巨大；高產品種取代了傳統的作物品種，加深了單一栽培的作法，從而實質上導致了傳統作物中包含的基因信息無法挽回的損失。這種結果實際是一個在基因意義上的共同悲劇」。他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將會越來越多地發現自己從國外公司購買的專利種子實際包含的基因本來是來自自己的國家的作物」（Kenny, 1983）。

除了對農作物（和其它植物）生產的控制之外，壟斷的農業綜合企業通過他們對生物技術研究的壟斷還控制了新品種的家畜和家禽。它們改變了家畜和家禽的基因構成，使它們需要特殊配方的飼料和新的疾病防治方法，而這些飼料配方和疾病防治方法只能從這些壟斷公司購買（Goodman, 1987: 48-54）。這些近來發展，全都來自帝國主義國家，並以提高效率為藉口，使得壟斷資本完全控制了農業生產所需的工業投入。

農業綜合企業（agribusiness）還控制了農業終端產品的一切，包括屠宰、冷凍和儲藏、食品加工和包裝、運輸以及推銷。其結果導致了美國的農民大部分的獨立地位已經喪失。生產糧食作物的農民依賴大公司來獲得生產原料同時依靠大的糧食公司銷

售他們的產品；養牛和養雞的農民實際是做為壟斷的農業綜合企業的承包者，從這些企業購買原料，同時把自己的產品賣給這些企業。由於買價和賣價都是由壟斷企業所控制的，農民失去了對自己產品的控制，而被壓榨的很慘。與此同時，農民們還要對農業所需的器具進行投資並且要承擔生產中可能出現的所有風險。那些大的壟斷公司對本國的農民所做的一切，又都拿來對付第三世界國家。世界貿易組織新的貿易條款正是針對那些新興的工業國家，像台灣和南韓，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而制定的，在這些國家裡壟斷的農業綜合企業能大打出手。

在農業生產的產出方面，跨國的食品公司諸如「尤尼賴佛」(Unilever)、「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該煙草公司購買了「一般食品」連鎖店(General Doods)和「克克福特」(Kraft)公司是世界三家最大食品公司)〕，再加上許多快餐連鎖店，諸如麥當勞、漢堡王(Burger King)、肯德基炸雞〔(百事可樂公司擁有漢堡王、肯德基炸雞、必勝客比薩餅和塔科·貝爾(Taco Bell)快餐店)〕、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飲料公司可口可樂，它們通過食品的加工、包裝和大規模的廣告，控制了巨大的食品供應來源。不僅在西方，而且也在東方，這些壟斷公司通過樹立形象以及對大眾媒介的操縱，已經的的確確改變了我們的飲食習慣。因而，它們能夠提高食品的價格來增加利潤。上面所提的世界上最大的三家食品公司的年營業額都在數百億美元以上，淨利潤在幾十億美元以上。這三家食品公司的經營範圍超過八十個國家，員工達到幾十萬人。其中雀巢公司在馬尼拉的工廠虐待菲律賓工人，並且在去年一月份將工人趕出工廠。菲律賓工人們繼續堅持鬥爭，同時世界各地的人民通過抵制雀巢的產品來聲援菲律賓的工人們。

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和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

本世紀八〇年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不斷地加深。美國、歐洲共同體和日本都積極地為超過本國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製造業和農業的產品）尋找國外市場。因而，它們之間的貿易衝突激化了。關貿總協定從 1947 年開始，到 1979 年東京回合（第七回合）的結束，削減了製成品的關稅，然而帝國主義國家建立了許多非關稅貿易壁壘（NTBs）來保護它們的本國市場。其中一些非關稅貿易壁壘是直接針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比如「多種紡織協定」（Multi-Frebre Arrangement）和出口自願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m，簡稱 VERs）卻是為第二世界國家而設置的。據估計在「多種紡織協定」生效的期間，發展中國家每年的損失都在 500 億美元（Coote, 1996: 197）。

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緊張具有引發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為了避免貿易戰的發生，新的一輪貿易談判因而展開。烏拉圭回合的談判開始於 1986 年，直到 1994 年才結束，這種不尋常的持久貿易談判，以及中途幾乎談崩的狀況，說明了談判的關鍵各方矛盾衝突的嚴重程度。可是，考察烏拉圭談判的協議，我們發現：當帝國主義國家需要給各自的跨國公司撐腰，索取新的條款以在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擴大經營時，它們就毫不猶豫地變得完全一致了。

烏拉圭回合簽定的協議範圍比前七回合要廣泛得多。除了和以前相同的製成品方面的貿易協定外，烏拉圭回合還達成了農業和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協議〔世界貿易組織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而且協議並不像前幾輪一樣僅僅侷限於削減關稅，而是擴展到其它與貿易相關的內容，如「貿易相關知識產權」

(TRIPS) 和「貿易相關投資準則」(TRIMS)。同時烏拉圭回合還建立了一個永久性的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做為監督和執行新產生的貿易規則的機構。到1996年的2月份，世界貿易組織已經有119個成員國，任何申請加入該組織的國家，必須「一攬子」接受烏拉圭協議的全部內容。從這一點來說，與關貿總協定有很大的不同，因為關貿總協定中的許多條款是自願遵守的準則(Coote, 1996: 197)。

有關農業貿易方面，世界貿易組織的新條款一方面是為解決帝國主義國家的剩餘農產品問題而精心設計的，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他同時是為了保護跨國農業綜合企業和大型食品公司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的收穫、並進一步增加他們的收穫。以下的討論將解釋：為什麼說，如果烏拉圭回合協議得到實施，將對世界農業生產和分配產生嚴重的衝擊，而且也將說明這種衝擊如何給全球壟斷資本帶來利潤，同時損害農民和工人的利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於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國家國內的農業計畫，在前幾個回合的談判中農業始終被排除在外，美國和歐洲共同體為了保護本國的農業，對進口徵收關稅，對一些農產品實行進口限額，與此同時，他們還對國內農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實行貼補政策。美國和歐洲共同體(1992年後成為歐盟)之間的貿易保護措施(關稅和非關稅的貿易壁壘)的競爭不斷升級。一則統計數據表明，在1979-1981年間，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七個成員國政府對農業的資助從政府開支的29.3%增加到38.2%；在1984到1986年間，經合組織的九個成員國對農業的援助從政府開支的34%增長到51%(Rayner et al., 1990: 5)。到八〇年代末，美國和歐洲共同體都面臨不斷增長的剩餘產品、疲軟的國內需求市場和對農業進行補貼計畫的巨大耗

費等問題。大量的剩餘產品導致了混亂的交易，因為美國及歐洲共同體都在瘋狂地尋找市場。它們之間的競爭降低了世界農產品的價格，這對壟斷資本來說是很不利的。同時，補貼計畫的高昂耗費加重了它們國內的財政赤字問題。

烏拉圭回合在農業貿易談判上的一個目標就是削減補貼（價格補貼和出口補貼）並以此減輕帝國主義國家的財政負擔，與此同時為不斷增加的剩餘產品減輕尋找市場的壓力。減少補貼包括：補貼總量減少 21%，以及出口補貼減少 36%（Coote, 1996: 199）。由於估算時年份選取的不同，美國和歐盟都可以對外宣稱他們的義務已經完成了，因此不必再進一步地削減補貼了（Coote, 1996: 199）。

但是，削減補貼卻要強加到「新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即使這些國家尚未能生產出足夠的食品來養活它們的人口。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期間，牙買加的代表試圖說明為什麼將削減補貼條款強加到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是不公平的。牙買加的代表將生產過量國家的補貼和生產不足的國家的補貼加以區別，並講到：「擾亂了正常的貿易的補貼確實需要加以糾正，但是在那些根本沒有農業生產或產量不足的國家中，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全國鼓勵生產……來增加自給自足的比例，而另一種情況是：在超過了國內的消費需求水平之後，仍採用補貼以增加產量和出口，我們認為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Coote, 1996: 199）。Coote 認為如果牙買加的提議得到了那些正在為糧食自給自足而掙扎的國家的支持，「它的提議就能構成為反對美國和澳大利亞尋求的全球市場自由化而團結一致的時機。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的主食生產部門也具有同樣的意願，它們也在爭取保護自己的糧食體系的權力。不過，這些國家的政府更為重視出口商因擴

大貿易而來的利潤，而不太重視對防止缺糧的問題」(Coote, 1996: 199)。

「貿易相關知識產權」協議在它執行所及的範圍之內，將對農業生產和分配產生嚴重的衝擊。本文前面提到，大型跨國農業綜合企業使用新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出新型種子品種，以及在種植新型種子的過程中所必需的化工產品投入（化肥、殺蟲劑、除草劑等等）。它們藉助擁有種子和相關化工產品專利的優勢，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在帝國主義國家中控制了一系列農作物生產的投入領域。它們在牲畜品種上也同時進行類似的開發，這些大型跨國公司控制了改變了基因的牲畜，以及飼養它們所需的飼料配方和醫療手段。因此，這些大型的跨國公司對於向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張它們對作物和牲畜生產的控制具有強烈的興趣。這些公司所擁有的專利將得到世界貿易組織最新的貿易知識產權條款的保護。事實上，它們向全世界擴張市場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例如台灣，其島內雞的品種早已接近滅絕，而被進口的品種所替代了。進口的品種必須用特殊的飼料配方來飼養，而這些配方為一些大的穀物公司所擁有，比如卡基爾（Cargill）。於是，國際市場的自由化，與強化的知識產權法這一世界貿易組織最新的貿易規則相結合，將增加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對進口原料投入的依賴性。一些小農因為缺乏購買這些投入產品的資本就會被淘汰，連他們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被剝奪。

根據「貿易相關投資準則」，發展中國家政府不能再對外來投資加以限制，例如為國內產品設立標準，或者要求外國公司將一部分產品出口銷售。而根據「服務業貿易總協定」(GATS)，各國政府不得不開放它們的服務行業，而這在以前服務業是只對

國內資本開放的。服務行業包括非常廣泛，從銀行、保險到醫院（和其他醫療服務設施）、學校、餐廳、廣告和其它零售業。有了這兩個協定，外國投資者就可以用來打開第三世界國家的廣闊領域，並從它們的人民那裡攫取無數的利潤。

這些新的貿易和投資條款結合在一起，對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和分配產生嚴重的衝擊。貿易自由化使那些跨國大財團（指擁有石油、石化、醫藥、種子和穀物交易子公司的企業）有能力推銷靠生物技術研製出的種子、化肥、牲畜和飼料的一攬子搭配。這些公司能夠以為農民「提供服務」的名義，建立他們的推銷網絡。大型的跨國食品公司，如能夠將它們的生產更多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並在那裡打開更大的市場。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大型超級市場和餐廳連鎖店將抓住在食品零售方面的機會。

即使在世界貿易組織之下的「貿易相關投資準則」和「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已經極大地開闊了全球壟斷資本穿越國界的自由，但仍然不能滿足跨國公司攫取利潤的貪婪胃口。當這些協定的簽字墨跡未乾時，經合組織國家又在為新的準則進行談判了。他們從 1995 年 5 月就開始在秘密地磋商「投資多邊協議」（MAI）。本來預定將在 1997 年 5 月 26 日結束談判，而現在延長到 1998 年 5 月。經合組織的談判不但將第三世界國家排除在外——第三世界國家將在準則實施後蒙受直接的重大損失，而且對它們本國的公眾也秘而不宣。「投資多邊協議」的目的在於使外國投資者跨越國界移動資產更為方便。它在有關「國民待遇」部分，要求各國對外國投資和投資者與國內投資者一視同仁（Sforza, et.al., 1997: 9）。在「國民待遇」條件下，舉例說，各國不得對外國投資者能夠擁有的產權種類加以限制，同時也不得制定僅僅使國內公司受惠的經濟援助項目。更進一步，不得要求外

國公司雇用一定比例的當地人進入管理層。僅就目前經合組織已經達成的協議內容來看，對於外國公司具有區別待遇的法律，無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都將被禁止（Sforza, et.al., 1997: 9）。協議還禁止各國對利潤轉移作任何限制，或通過任何可能造成外國投資者損失的宏觀調控性法律。如果這些規則被違反了，外國公司有權控告當地政府賠償他們的損失（Public Citizen Preamble MAI Information Packet, 1999）。

很明顯，經合組織成員國正在進行的「投資多邊協議」談判是為全球壟斷資本建立理想的投資和貿易環境。協議中的條款將使各國的主權完整變成一紙空文。在條款的規定下，將不再是由主權國家，而是由外國公司來決定通過的法律為依據。³

伊瑟爾（Ethyl），一個在加拿大設有子公司的美國公司，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十一章投資者與國家關係條款，起訴加拿大政府對該公司造成的損失，這個例子顯示了一個外國公司所擁有的凌駕於一個國家政府的權力。據環球郵報（1997年4月15日）報導，伊瑟爾公司專門製造汽油的添加劑 MMT，該公司起訴加拿大政府，為其在加拿大的子公司被關閉所造成的損失而索取三億五千萬美元的賠償；關閉的原因是由於渥太華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各省進口和交易 MMT，以減少它對人體健康造成的傷害。伊瑟爾公司是北美唯一生產 MMT 的廠家，它聲稱政府的禁令相當於對伊瑟爾加拿大子公司的未加賠償就加以沒收。該公司還認為加拿大政府違反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的國民待遇標準，將禁令的矛頭專門對準伊瑟爾公司，因為該公司

3. 作者註：「投資多邊協議」因為各帝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和一些民間組織的反對沒有達成協議，但是在壟斷資本的督促下，「投資多邊協議」中的重要條文將被列入 WTO 的談判中，一步步成為外來資本所享有的權益。

是加拿大唯一一家製造和銷售 MMT 的公司（環球郵報，1997 年 4 月 15 日）。如果伊瑟爾公司在這場官司中獲勝，加拿大的納稅人將不得不為此支付賠償費用。「投資多邊協議」中的「國民待遇」就賦予了外國公司在各簽署國中具有和伊瑟爾同樣的權力。

經合組織國家秘密進行「投資多邊協議」談判的實際情況很少公諸於眾，柯林頓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談判中的得到「直通」（fast track, 即總統的談判結果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但不能討論或修改）的授權地位，這顯示了全球壟斷資本的巨大權力，以及這種權力是怎樣被用來操縱政客們以達到它們的目的。全球壟斷資本的戰略似乎是：首先在經合組織國家中達成協議，然後將「投資多邊協議」向其它國家推銷。由於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都在為獲得外國的投資而互相競爭，它們都可能很快地向新的「投資多邊協議」規則讓步。「投資多邊協議」最令人憤慨的地方是：本來應是由東道主國家向外國投資者酌情批准的特權，現在名正言順地變成了外國投資者的權利，本來應是各國政府的自主權之內的保護自然環境和國民健康的法規，僅僅因為這些法規會減少它們的利潤為理由，而遭到外國公司的反對。

柯林頓政府推動「直通」授權地位，是為了準備「投資多邊協議」談判的最終完成，時間預計在這個春天。儘管「直通」授權由於取消在美國眾議院投票而未被通過，但也沒有被徹底否決。國際壟斷資本還將會繼續努力，去摧毀任何阻礙它自由流動的法規，同時還將建立保護它的利益法規。第三世界的工人和農民除了奮起反擊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工人和農民必須督促本國政府負起責任，保護自己國家的主權、保護工農的基本權利與做人的尊嚴。最近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的經濟

崩潰，日本的危機仍在持續，在亞洲其它地區以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即將發生的危機。證明我們一再重覆的觀點——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正在深化。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只能給工人和農民帶來更大的苦難。上面提到的這些國家，當它們的經濟瀕臨崩潰時，外國資本和買辦資本飛快地逃走避難，而由廣大人民留下來承受一切痛苦的後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將以挽救這些國家經濟的藉口，對他們的人民施加了新的、更為苛刻的結構性調整計畫。

因此，我們應當團結起來去鬥爭，不僅要抵抗，而且要摧毀帝國主義全球化所強加給我們的最殘酷、最不人道的統治！（「投資多邊協議」在 1998 年談判破裂，參見第八章，作者註）

附錄五 台灣電子業發展問題

毛遠誠 著

台灣的電子代工產業的發展起源，是 1964 年美國通用電子在台北新店設立電視機的生產工廠，這是全世界第一個在美國本土以外的工廠，在此之前，美國，甚至全世界的電子業者，都沒有在海外設廠的經驗。

促成這個創舉的背景，是全球性的電視機生產過剩

當時的背景是，電視機業者看好 1964 年的東京奧運商機，於是大量擴充生產線，其中，又以日本廠商最為積極。然而業界對於電視機的產能過剩情形卻相當擔憂，美國業者評估日本廠商的產能擴充計畫後，認為日本國內電視機生產量，將在奧運之後超過市場需求，而生產過剩的日本電視機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以低價銷售到美國。

美國的廠商開始思考應對的策略，最後決定要到美國本土以外設廠，以更低的價格迎戰日本電視機業者的挑戰，於是，通用電子擔任開路先鋒，在新店設廠，繼通用電子之後，美國的電視機廠商也陸續到台灣設廠，¹促成了台灣電子產業開始發展。

1972 年，台灣在高雄設立全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後，這

1. 關於通用電子設廠的過程，參見李國鼎〈通用器材公司來台投資的故事〉收錄於《台灣的對外技術合作與外資利用》一書，資訊工業策進會出版，99-101 頁；另外，陳信行，〈打造第一個全球裝配線：台灣通用器材 1964-1990〉，《批判與再造》，2004 年 8 月，則說明了這個過程。

樣的生產模式也出現在歐、美、日等國家所設立的工廠當中。之後，為了更進一步的降低生產成本，這個模式也從零組件、原料由歐、美、日等國家運到台灣組裝的方式，逐漸轉變成在台灣就地採購。

甚至發展出，由台灣的工廠接單生產的代工模式。生產的產品則從消費性的電子產品，延伸到資訊電子產品。

電視機生產線由美國移轉到台灣的經驗，經過發展與修正最後發展成七〇年代的加工出口的模式，經過發展與修正之後，成為我們所熟知的代工模式。

目前，資訊電子產業產值佔台灣的製造業產值的 35.9%，² 包括主機板，筆記型電腦各項產品在全世界也有相當高的市場佔有率。此外，由資訊電子產品領域所延伸出的半導體晶圓代工，佔全世界半導體代工的 73%；³ 液晶顯示（LCD）面板的產值也佔全世界的 31%，和南韓、日本相當。⁴

台灣電子業的發展，固然是台灣以低成本的優勢為基礎，經

台灣主要資訊電子產品全世界市場佔有率（%）

產品 項目 年份	筆記型 電腦	桌上型 電腦	主機板	伺服器	液晶 顯示器	顯示器	光碟機	數位相機	投影機
2002	61.2	23.9	74.2	30	60.8	52	38.8	32.9	8.8
2003	67.2	26.8	79	32.9	65.4	54.5	42.3	37.6	17.5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ITIS 計畫（2004）。

2. 數據為 2002 年的資料，參見《2003 半導體工業年鑑》。

3. 數據為 2002 年資料，參見《2003 半導體工業年鑑》。

4. 依據光電工業協進會（PIDA）與市場調查機構 Display Search 的數據，參見 2004 年 6 月 7 日工商時報第 13 版。

過多年的努力後，才達到現有的成果。但是，從更大的範圍來看，生產線從美國、英國、德國等國家外移到台灣等亞洲地區，是資本主義體系對利潤率下降的反應。⁵此外，台灣電子產業的運作型態，也和整個資本主義的結構有密切關係。

依照擴大再生產（Scheme of Expanded Reproduction）的推論，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大，是建立在生產設備、原料供應的增加，而消費性產品的價格，則必須讓勞工的薪資能負擔的起，整個生產的循環才能持續下去。⁶

對於從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外包到台灣生產的產品而

-
5. 在此所提到的利潤率，是依照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整體經濟的利潤率可以從 GDP、貿易額等統計資料進行估算。雖然學者所發展的計算方式略有不同，然而，所得到的結果仍然呈現出大致相同的趨勢，資本主義的利潤率在二次大戰後開始上升，到 1964 年左右達到高峰，之後逐漸下降，在 1980 年代中期達到谷底，然後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回升，但是這一波的回升也只達到 1960 年代中期最高峰時的一半水準。有關於利潤率的估算方式，以及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討論，參見 Fred Moseley (1999),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Entering a New Era of Prosperity?*, *Capital and Class*, 1999 Spring, 25-45; Gérard Duménil, Mark Glick & Dominique Lévy (2001), Brenner on Competition, *Capital and Class*, 2001 Summer, 61-77; Edward N. Wolff (2001), The recent rise of prof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3 (2001) 315-324; Gérard Duménil & Dominique Lévy (2002), The profit rate: where and how did it fall? Did it recover? (USA 1948-2000),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4 (2002) 437-461; Edward Wolff (2003), What behind the rise in the profitability in the U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27, 479-499。
 6. 參見資本論第三卷中《擴大再生產》的相關章節，以及 Pierre Sraffa 的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所引發的利潤率轉換的討論。

言，最主要的消費者還是在資本主義先進國之內。然而，西方國家在 1960 年代後期進入經濟不景氣、工人失業，再加上社會福利制度瓦解，使得西方國家民眾的消費能力降低。

個別廠商的期望透過生產外包，用更大的生產規模、更低的生產成本來面對經營困境的思維，在這種結構性的生產過剩，卻顯得螳臂擋車。更大的生產規模只是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而在購買力不足時，外包所降低成本也因此而被抵銷。

因此，從整體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類似台灣這樣的外包生產地的利潤，在結構上就是處在被擠壓的狀態。

我們可以在台灣的電子產業的例子，看到這樣的結構

台灣電子業主要是起源於七〇年代早期，在台灣從事加工出口的美、日、歐洲電子廠商，一開始的作法，是只將製程外包（outsourcing），由原廠提供所有的零組件、機器設備，只利用本地的低成本勞動力組裝產品，而為了更進一步的降低生產成本，才開始在台灣採購設備、零組件。而伴隨著這個模式，台灣的電子產業才奠定了發展的基礎。

早期的台北中華商場的電子零組件供應商，甚至高雄大發廢五金工業區的拆船舊貨，就是為了適應這樣的生產模式，而發展起來的經營方式。這樣的模式所提供的少量、多樣的電子零件，顯示早期產業做為替代國外生產設備的特性，而藉由這樣的管道所取得的儀器、零件，不但是生產電子產品的來源之一，也是工程師藉以觀摩技術，甚至受到激發而開始摸索、學習新技術的路徑。

這個模式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末期、1990 年代初期。在此

之前，由於台灣製造業的利潤微薄、不易積累資本，這使得技術的研發，就無法比照國外的大型業者，用長期投入大量的資源，由專門的研究部門來進行技術的累積，以及生產機具的開發。

在這樣的情形下，台灣的電子產業只能將西方、日本等國的大型、跨國廠商的研發、生產的結構，壓縮在由工程師兼勞工的方式來完成。於是，我們所最熟悉的台灣技術人員的典範，是在長時間工作之後，還在工作以外的時間持續吸收新知。

這樣具有一部分的目的性，又帶有一部分純粹興趣的技術發展體制，配合產業在資本積累上的限制時，讓台灣在面對一個發展比較成熟的产品、技術時，能夠很快的學習、模仿，甚至有某種程度的創新，更進一步的，還能用低成本的優勢，威脅到原有的領先廠商；但是，一旦產品的競爭進入更深入的技術、資本競爭時，台灣的廠商就會面臨瓶頸，甚至退出競爭。

包括國外的電子業者，以及許多學者對於台灣電子產業的彈性專業化，卻又不善於進行持久的競爭，都有很深刻的印象。追根究底，台灣不善於進行長期的產業競爭，和整個產業在國際分工當中所處的位置，以及產業的結構有關係。

而這樣的產業結構，在進入需要更多資本、技術投入的產業時，例如半導體、液晶顯示器，就面臨發展的瓶頸。這些被歸類為高科技產業的技術來源，主要不是來自於操作人員、工程師的經驗，而是依靠生產設備的開發。

於是，我們在 1980 年代以前看到的「黑手變頭家」、「工程師變成大老闆」的現象，就越來越少出現了。這不僅是因為要成立公司的資本門檻變高，也是因為技術的研發已經不是工程師個人的努力，就可以完成。

儘管政府曾經主導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也在相關科技產業的

人才培育投入大量的資源，但是，相對於高科技產業需要資本家長期投入資源進行研發的模式，台灣在 1990 年代以前，以個人化的方式從事技術累積的結構，就力有未逮。台灣的半導體與 LCD 產業的設備自主率分別為 7% 與 9%；⁷ 這使得台灣高科技的資本支出在世界當中名列前茅，與台灣在整個世界的產值相比，顯得相當的不對稱。

一般而言，建置一座 12 吋晶圓廠或是一條液晶顯示器 (LCD) 面板生產線的資本，都在二十億美元以上，而勞動力在半導體以及 LCD 面板的製造成本，分別為 10% 與 6%。⁸ 如果再參照台灣在這個領域的固定資本支出程度，我們可以看到，以現有的國際產業分工而言，台灣的產業運作的結構，仍然是由資本主義的先進國提供設備、上游原料，然後在台灣生產消費性的產品。

而由於生產設備、原料主要還是來自於歐、美、日等國，利潤的獲取相當困難，在機器設備、原料相對於勞動成本極高（資本有機組成高）的情形下，利潤的獲取，就只能用更高的勞動生產力來達成。

然而，對於一個幾乎已經自動化的製程而言，提高勞動力的效率所能提高的利潤相當有限，這也是台灣的科技業員工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超時工作的現象。我們雖然用「敬業」、「打拼」等正面性的語言來描述這種現象，但是從台灣的資訊電子廠商在近幾年大喊「全球微利化」時代來臨時，美國卻是整體利潤率呈

7. 參見 2004 年 4 月 11 日工商時報第 3 版，〈拉抬兩兆產業設備自給率，經部出招〉。

8. 半導體的資料參見 2001 年 11 月 12 日工商時報〈輸入登陸鬆綁，無助於晶圓代工廠〉，LCD 產業資料參見 2004 年 5 月電子時報。

現回升的狀態，兩相比較，更凸顯了台灣科技產業在全球分工的尷尬位置。

這種現象並不是因為「技術沒有自主性」，或是「製造的利潤不如品牌、行銷」所造成的，而是來自於台灣在全世界所處的分工位置有關。

附錄六 評《全球化陷阱》與《碰撞》

漢斯·馬丁·哈拉爾特·舒曼 合著

《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

德文原著：Rowohlt Verlag Gabh, Reinbek bei Hamburg, *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中國中央編譯社出版，1998年

韓德強 著

《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

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八〇年代末，蘇聯解體，中國在「改革」十年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已成定局，此時，保守右派在宣傳上採取了攻勢。他們放出了「資本主義全勝」與「人類歷史已經終結」這一類的狂言。到了上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深化，這時囂張的右派比較收斂起來了。隨著世界壟斷資本以「全球化」為名放肆的在世界橫行，給世界上廣大的勞動人民帶來了難以解決的生活上的困境。這時反「全球化」的運動在世界各地展開，跟著也出現了一些反對「全球化」的言論。

這些言論的發言人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災害研究和調查後，並做有系統的整理與報告，他們在工作上的認真和努力是值得我們敬佩的。特別是近年來知識界的主流都在高呼「全球化是全人類的希望，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時，他們站在弱者的立場來質疑「全球化」的真理更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只可惜的是這些言論雖然可以使我們有吐一口心中悶氣的快感，但是因為他們

的分析不明確，因此沒有觸及到「全球化」背後的根本動力，所以會造成讀者對「全球化」的誤解。這裡要評的兩本書就是這種言論的代表。

1998年，中國的中央編譯社出版了德國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同著《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一書。到了2000年，中國又出版了由韓德強所著的《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目前雖然用中文出版的有關「全球化」的書和文章很多，但是這兩本書在有關「全球化」的論述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在這裡提出討論。

這兩本都敘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全球化」會普遍的給所有人帶來幸福的論點提出挑戰。《全球化陷阱》所談到的範圍較廣，兩位作者從資本主義發展先進國家談起，再談到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在「全球化」下所受到的負面影響。韓德強的《碰撞》則加重「全球化」對中國重要企業所產生的傷害，以及中國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可能受到的衝擊。在這之前的十幾年中，中國和台灣的知識界齊聲高唱市場至上和競爭唯一的歌聲，這兩本書對「全球化」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提出質疑，因此，引起了對這個議題關心人的注意。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同的《全球化陷阱》

《全球化陷阱》在書的第一章中就對「全球化」對德國的負面影響這樣的形容著：「1996年的德國：有600萬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勞動職位——數目之多是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淨收入近五年以來持續下降」。他們接著說：「在未來十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150萬勞動崗位被

繼續消滅掉」(第7頁)。這兩位作者更說：「(德國未來的)失業率可能從當前的9.7%上升到21%」。除了德國之外，他們對歐洲聯盟各國的就業情況都很悲觀。而美國則是更遭，美國的工人在近些年來不但大批失去固定的工作，使他們變成了臨時工、合同工，而且遭受到工資不斷的下降，和福利不停的削減，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勞動貧民」。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更對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而氣憤，他們舉證來說明不但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越來越兩極分化，而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在書中，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對在1995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前後做了詳細的敘述，並且分析了這次由墨西哥披索貶值所引起的金融危機如何導致世界金融系統瀕臨崩潰。他們談到今日世界金融資本和跨國企業的龐大，因此現今國家根本無法對它們有所限制和約束。

在對「全球化」給世界勞動人民帶來猛烈的衝擊做了深入的報導後，這兩位作者並且有力的批判了「自由貿易」和新自由主義。但是使人不解的是：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卻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國家與壟斷資本的合作看成是件很新鮮的事。而且，他們似乎認為當前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是萬不得已才屈服在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之下。在書的第153頁，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這樣說：「生產和資本越是可以無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說是巨人般的組織就越是強大和不可戰勝，這些組織使各國政府和它們的選民都感到心驚肉跳和被奪去權力」。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兩位作者把選民和政府看成一體，他們錯誤的認為政府和選民同時感到巨大的跨國資本所造成的威脅，他們沒有看出他們所說的政府正

是代表這些巨大的跨國資本的利益。他們有這樣的看法也不奇怪，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缺乏深刻的認識，因此戰後在歐洲的一段「福利國家」的歷史，使他們誤認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國家代表著人民的利益，而且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下選民和政府是一體的。

《全球化陷阱》這本書的兩位作者不瞭解壟斷資本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們看不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是來自壟斷大資本的支持，並非來自選民的支持。在戰後的前一階段由於各種原因，「福利國家」的政策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到了六〇年代底和七〇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戰後危機後，資產階級國家在國內向工人階級進攻，在國外協助壟斷資本打開世界各地的市場。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事。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職責是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使資本積累得以順利進行。只有把國家的職責誤認是保護全民利益的人，才會為這樣的發展而心驚肉跳。

這兩位作者難道看不見每一次七個超級大國（G-7）開會時，都在協商如何進一步取消各國對跨國資本限制的事宜嗎？他們難道看不見每年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開會時，超級資本主義大國在這兩個金融貿易組織內，如何利用它們的特權來迫使欠債的落後國家屈服於國際壟斷資本的宰割嗎？他們難道看不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這些大國如何聯合起來迫使落後國家放棄最後僅存的一些保護嗎？這兩位作者一方面唱著前一時期國家對國民的保護不再的哀歌，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向世人警告「全球化」是個大陷阱，但是，為什麼他們卻完全看不到代表資本主義強國政府就是策劃「全球化」的主謀之一呢？

我想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對「全球化」下廣大的受

害人群是同情的，但是他們反對「全球化」是不徹底的。他們認為：「市場經濟要取得繁榮，就無論如何都需要有企業界的自由」。他們只是覺得在「全球化」下企業界的自由太多了一點，需要有一些節制，要能像西方戰後一段日子在國家的管制下達到「恰當的均衡」就好了（311 頁）。

這兩位作者認為美國雖然有能力重整世界次序來達成這個「均衡」，但是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卻不會這樣做，所以這兩位作者就把希望寄託在統一的歐洲上。在 21 頁上他們這樣的說：「不要建立歐洲壁壘，而是要做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充滿力量的歐洲式選擇來代替那種具有破壞性的、盎格魯－薩克遜式的市場激進主義」。他們接著說：「（歐洲）藉共同的幣制、多災多難但已成過去的共同歷史組成一個政治聯盟，會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不遜色於美國及未來的強國中國與印度。經濟上的強大是世界市場上唯一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來美國的貿易戰略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看不到所謂「全球化」實際上就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在全世界擴張的「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他們不滿美國稱霸的帝國主義，他們看到統一歐洲有未來在世界稱霸的可能性，他們對歐洲稱霸的帝國主義抱滿了希望，認為到了那時，將會能達成有國家管制的均衡式的「全球化」。近年來歐洲不管是保守派還是社會民主派當政，他們同樣的、毫不猶疑的銷毀了前一時期「福利國家」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對一般人的保護，這是有目共睹的，並且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在書中也講到的。難道他們真的如此天真的要我們相信，歐洲牌的帝國主義真的比美國牌的帝國主義要好嗎？

韓德強的《碰撞》

韓德強是個愛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當權者領頭，知識分子大力響應，把資本主義的新自由經濟政策推捧到神聖的地位時，他在《碰撞》提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而且，一個年輕人能認識到中國從 1949 年到 1979 年的建設為當前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韓德強花了很多時間和很多精力調查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行各業所受到外資的衝擊，顯示出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關心和愛護，他在這些方面的努力都很令人佩服。可惜的是韓對資本主義認識不夠深，因此他看不出今天世界上的「全球化」背後的動力。這個一再被濫用的「全球化」其實就是壟斷資本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各大帝國為資本積累找出路的必然結果，就是帝國主義。

因為韓德強對資本主義的認識不夠，所以他不可能對資本主義做出批判，因此他只能針對中國這些年來由當政者所提倡的，受學界菁英所推崇的，經媒體所宣傳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做文章。韓德強提出「撤除競爭神話，破除市場迷信」，他提出反對市場浪漫主義，但贊成市場現實主義這樣的說法。韓德強對市場浪漫主義和市場現實主義有這樣的區分：「的確，十幾年來市場浪漫主義已經深入人心，成了市場經濟的正宗解釋，以致離開了市場浪漫主義，人們都不知道還有什麼理論可以指導經濟實踐。其實，問題並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非市場即計畫，非開放即閉關鎖國，非競爭即壟斷，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而是有許多中間狀態，有計畫的市場，有保護的開放，有壟斷的競爭，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與這些中間狀態相對應的理論，即市場現實主

義」(160頁)。

要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找一個中間地帶或「一種中間狀態」的說法或理論，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總是有社會上的好心人士，因為不忍心看到因資本主義無計畫生產所造成的浪費，或是他們看不慣由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社會上的兩極分化，以及工人階級因為時常被解雇和工資的低賤而造成生活的不穩定，從相對的貧窮化到絕對的貧窮化。但是，這些人認為資本主義的這些缺陷可以在資本主義體制內找到補救的辦法。

十九世紀末的伯恩斯坦和他的追隨者，雖然並不認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個中間地帶，但是他們相信在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改革可以漸進到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的這個嶄新的社會是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歷史事實證明不但他們沒有成功，而且，在漸進的過程中，把要向哪裡漸進的目標也改變了——大戰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派已經把他們追求的目標，從改革的社會主義轉向到改革的資本主義。在轉向的過程中，社會民主黨派也就除了與資產階級共謀國事外，別無其它的選擇，他們於是致力於找一個界於殘酷的資本主義和他們為不可能實現的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就是戰後歐洲的「福利國家」。

在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時，在西歐一些國家中，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戰後的前二十多年中，西歐的當權者在社會民主黨派的影響下，用凱恩斯的政策來維持在經濟上的繁榮，用國家的力量來設立各種福利。同時在戰後二十幾年中，美國的民主黨也在工會的壓力下提出對工人比較有利的政綱。在這戰後的二十多年中，工人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社會上的所得分

配比較平均，一般人的生活比較有保障。因此，如果我們只看這一段歷史，社會民主的確有它的吸引力，使人覺得改革的資本主義很夠人道。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今天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還沒有放棄對社會民主黨派的期望。

但是到六〇年底和七〇年初時，資本主義面臨了大戰後第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歐國家和美國的統治階級都開始對前一時期政策做修正。1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1980年，美國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戰後最保守的政治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取消了工人階級在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福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公民基本權力的保護，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們一上台就用一連串的立法來把前一時期對人民較有利政策一一推翻，並且由國家帶頭來打擊工會。

1980年美國雷根總統當選後，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首先從以削減聯邦政府赤字支出為藉口，大幅度削減國家的福利支出，與此同時大量增加軍事支出。1981-1982年，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人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作法給各大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1984-1985年柴契爾鎮壓了英國礦工大規模的罷工，礦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一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來。

到九〇年代，美國柯林頓總統就任後，就延續這共和黨的保守政策。1994年，貝萊爾（Tony Blair）繼約翰·斯密思（John Smith）成為英國新工黨的主席。1997年，英國新工黨在大選中得勝，英國貝萊爾以新工黨為號召當選為首相，社會學家安東

尼·紀登斯是隨著湯尼·貝萊爾當權而紅起來的。貝萊爾出任首相，紀登斯和約翰·格唯（John Gray）就成了新工黨的智囊和它的政策的鼓吹者，安東尼·紀登斯寫的《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為新工黨的政策提出了所謂學術上的依據。英國新工黨所提出的第三條路，事實上已經脫離了前工黨的社會民主的政綱。新工黨的第三條路就是要在前社會民主和英國保守黨柴契爾的新自由主義（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之間找出一條路。但是新工黨的政策和做法卻很難跟過去保守黨的政策區分出來，它同樣的要爭寵於英國的壟斷資本，在國際政策上它對國際壟斷資本是徹頭徹尾支持的。2003年美國發動的侵略伊拉克戰爭時，湯尼·貝萊爾不管英國人民的反對而全力支持美國，更顯示出新工黨已經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

詹母斯·培徹斯（James Petras）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對最近一波的第三條路中，歐美這個支派有這樣的批判：「這個支派的第三條路是由英國的貝萊爾清晰的表達出來，由美國的柯林頓總統和德國及一些其它西歐國家的首相跟著推行的。他們將右派的政治做了漂亮的修飾，但是他們所做的是延續柴契爾－雷根老右派的教條，其中包括：私有化和促進資本集中（這可以從在這些政權下，大型企業大規模的兼併看出）。雖然他們以代表勞工和社會民主黨自居，但是第三條路在政治實踐上，他們跟老右派反勞工和由國家來提倡供給面的經濟政策沒有區別。更重要的是：這些以第三條路為號召的政權，遠比老右派更熱衷於促進和助長跨國公司和銀行在全世界的擴張，與此同時，他們警告（本國的）工人必須要接受福利的削減和工資的降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增加跨國公司的競爭力（利潤）」（Petras, *Monthly Review* 2000年3月，頁30）。

這是歷史現實，而《碰撞》和《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們都不去正視這個現實，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還對西歐資產階級的政權寄予無限的期望，希望它們能在那一天會清醒過來保護西歐的人民。而韓德強還在尋找他的「中間狀態」。

大約七、八年前，就聽到在台灣社會運動中有些朋友中提出一些接近社會民主黨政綱的主張。像「福利國家」和「北歐經驗」等等。隨後在1999年，《第三條路》的中文譯本也在台灣出版。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台灣要晚，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民主也同樣會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吸引力，所以將來有必要對社會民主在戰後的興起和近年來的退敗做進一步的探討。

星格·丹尼爾（Daniel Singer）在他過世之前，完成了一本書，這本書用一個很醒目的書名：《下一個一千年，是他們的還是我們的？》（*Whose Millennium: Theirs or Ours?*），這本書的第四章的標題是：〈社會民主的葬禮〉。丹尼爾在這一章中敘述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從戰後前三十年的興盛，到近二十年的衰退。到了二十世紀末，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在右派的壓力下完全投降，如果用丹尼爾的書做參考，那麼社會民主都在舉行埋葬典禮了，台灣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若是再提出類似社會民主這類的主張做為社會改革的目標，那麼這些提倡者就落在形式之後不只是好幾步了。

在韓德強的市場現實主義下，他正確的看到中國不能迷失在市場浪漫主義之下，輕信自由競爭的萬能，他指出在自由競爭之下，強欺弱、大吃小的事實和道理，因此弱的和小的必須要保護自己。但是他在分析上犯了幾點錯誤，而這幾點錯誤是相互關聯的。

甚麼是韓德強的市場現實主義呢？韓德強的市場現實主義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曰競爭論；二曰貿易保護論；三曰中心外圍論」（160頁）。首先，韓德強在競爭論和貿易保護論的分析中，他主要說明一個落後國家要發展資本主義，必須要採用進口替代的策略。因此，他用李斯特的保護貿易來反駁李嘉圖的自由貿易，他用美國在十九世紀用保護貿易來發展經濟成功的經驗來說明保護貿易政策的正確性。在他的分析中，韓德強看不到十九世紀初美國所面對的與今天落後國家所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不知道或是不去理會戰後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選擇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國家，幾乎都採用了進口替代的策略，用保護貿易來發展它們國家的工業。（參見第五章）到了八〇年代，所有這些曾經想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徹底失敗，完全屈服在帝國主義之下。韓德強卻迴避了這段歷史，因此，也就不可能去分析這些國家失敗的原因。

二次大戰之後，選擇用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落後國家清楚的知道它們的工業發展落後，無法和資本主義強國競爭。所以，它們一方面用提高進口關稅來保護它們的弱小工業，另一方面用國家的力量將一些重要的工業和企業國有化來對抗強大的外國資本。在這樣的保護政策下，大戰結束的前期，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時，這些落後國家的工業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經濟也在穩定的環境中得到快速的成長。但是到了七〇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面臨戰後危機時，壟斷資本的資本積累必須要進一步擴張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代表壟斷資本的帝國，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逐步的摧毀了這些國家前一時期所設立的保護政策，這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壓力下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並且取消一切對資本的管制，因此，更削減了國家抵制外來資本的力量（參見第八章和

第九章)。我要提出的是，我們不能不去分析歷史的現實，就不負責任的提出一套許多國家在近年來曾經嘗試實行過，卻已經徹底失敗了的政策。

韓德強認為一個國家應該依照自己國家的利益來制定貿易政策，這並沒有錯。他建議中國應該保護它目前沒有把握與外來產品競爭的企業，而將已經有實力的企業開放，並參與世界市場的競爭。但是他的這個建議完全沒有實現的可能性。這樣的政策在1979年之前，中國在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下是可能的，改革開放之後的二十多年中，中國從社會主義和平轉變到資本主義，放棄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中國的當權者一步步將中國的經濟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之中，盡其可能將中國變成依附在世界資本主義上的一個環節。二十多年具體政策實施的結果，使得今天中國在資本上、在技術上、和在市場上都越來越依靠國際壟斷資本。

國際壟斷資本到中國投資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國的經濟，它們眼睛盯著中國將來有發展前途的，但目前尚經不起一擊的產業，就是硬要中國開放這些產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與國際壟斷資本的談判中，中國除了退讓之外，能夠爭取到的自主性的空間是很狹小的，像2002年中國將航空業進一步讓出給外資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取消了本來在飛機場（原來外資被限制在49%以內）和航空公司（原來外資限制在35%以內）對外資的限制，將航空這個有未來發展可能的大企業讓給了外資（華爾街日報，2002年，7月2日，A14）。韓德強就是擔心在中國加入WTO時對世界各大列強過度的讓步，但是他所擔心的事卻一步步的發生了（參見第十章）。

韓德強的市場現實主義中的第三點是中心外圍論，他用中心

一外圍論來分析落後國家經濟不能發展的原因，中心—外圍論也就是依賴發展理論。中心外圍論說明了中心國家（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對外圍國家（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的剝削關係，因為中心國家從外圍國家抽走了剩餘價值。中心國家得到了剩餘價值有助於它們的發展，落後國家的剩餘價值被抽走了所以不能發展。因此，中心國家的發展和落後國家的不發展是一體的兩面，都是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七〇年代曾經流行一時的中心外圍的發展理論，今天已經隨著拉丁美洲自八〇年代以來的發展而破產了（參見第五章和第八章）。

在韓德強調「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但實際上他所提倡的市場現實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沒有所謂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而且壟斷時期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韓德強認為在他所提的資本主義中，可以實現「以國家為最高利益主體」這樣的理想。韓德強這樣的主張和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國家中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發展政策幾乎完全相同，這個發展的綱領也提出以國家的利益為前提。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丁美洲國家中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很強烈的要擺脫資本主義強國的控制，獨立的發展資本主義的意願。1948年，在拉丁美洲國家推動下，聯合國成立了隸屬在經濟社會理事會下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on Latin America，簡稱ECLA）。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在拉丁美洲國家和拉丁美洲這個區域內發展資本主義。

中心—外圍論在這時就成了拉丁美洲國家資產階級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理論依據。因為如果落後國家不發展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在交換關係上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抽去了剩餘價值，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應該集中在改變它們與列強之間的交換關係上，而不

必牽涉到落後國家或先進國家內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換句話說，按照這樣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是，只要落後國家可以排除資本主義列強的干預和影響，它們就能順利的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不管這些依賴理論學派理論家的原意如何，這樣的分析所得的結論就正迎合了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內資產階級的意願，成了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礎。因為如果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是不發展的原因，那麼改變依賴關係就應該可以使這些國家順利發展。於是，這些國家就一面用提高關稅來保護它們的本國工業，另一方面用對外資的管制來避免外資對它們企業的控制。這些國家同時將一些有關民生重要的經濟部門，像交通、電力、石油、鋼鐵等，收歸國有，以使用國家的力量來抵抗外來的壓力（參見第五章）。

事實證明，這些保護的政策並不能使它們抗拒來自列強的壓力。到了八〇年代中期後，拉丁美洲在外債的壓力下，被迫完全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意願。而在這整個發展過程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對瓦解拉丁美洲資產階級的力量有很大的貢獻。拉丁美洲戰後三十多年的歷史經驗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民族資產階級雖然有反帝的進步性的一面，但是他們與國際壟斷資本相比，是極為弱小的。歷史的現實說明了，他們要發展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從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到最後向國際壟斷資本投降。這一段歷史也說明了，拉丁美洲國家戰後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運動不是要解決階級之間的剝削，因此，工人階級和農民不可能在反帝運動中得到解放，成為反帝的主力軍。

韓德強並不反對由美、歐所推動的「全球化」，他和崔之元一樣，他們主要是憂慮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機不夠成熟，

他們要中國等到實力更強時，再加入這樣的組織，那時就可以與世界壟斷資本展開競爭。他們並不反對現今由壟斷資本和資本主義帝國所塑造的世界次序，他們只要中國也能建立起來抵得過競爭的強大資本，所以中國也可以與世界帝國平頭並立。果真如此，韓德強就必須放棄他站在弱者立場，為弱者抱不平的一面。因為如果中國真能成為帝國之一（目前看來完全沒有可能），中國的大資本家也不會比歐美的大資本更有慈悲心，也不可能改變這個強欺弱、大吃小的世界，也不能改變全世界大多數勞動人民（包括中國的勞動人民中的很大部分）難以維持溫飽的殘酷的現實。韓德強有與其他兩位德國作者相同之處，韓德強要中國成為世界一霸，那兩位作者要歐盟取代美國成為帝國之首；這三位作者提出這樣的看法是他們的自由，這都沒有問題，只是我們要認清這三位所提出的論點到底是站在誰的立場。

最後要提的一點是韓德強這本書的結論——第七部分：〈美國霸權戰略與中國外交空間〉，在這結論中韓德強認為中國可以在美國稱霸的世界中有技巧的找到一個外交的空間。在這一章中特別明顯的是韓德強只看到世界的列強外交，看中國要和哪一個強國聯合才好。他完全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看不到只有人民才是反帝最強大的力量，只有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團結的站起來的時候，帝國主義才能被打倒。

參考書目

英文部分

- Amin, Samir,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Amsden, Alice H., *Asia's Next Giant -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abson, Steve, *Working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aran, Paul A.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 Barlett, Donald L. and James B. Steele, "Corporate Welfare," *Time*, November 9, 1998.
- Barlow, Maude,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of Lawyers Guild's National Convention in Detroit, October 22, 1998.
- Bello, Walden and Stephanie Rosenfeld, *Dragons in Distress*,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1990.
- Bhagwati, Jagdish and Hugh T. Patrick, ed., *Aggressive Unilateralism, American 301 Trade Policy and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Birch, Melissa 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1990s," Chapter 5 in *Priv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New Roles for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edited by Werner Baer and Melissa H. Birch, Praeger, 1994.
- Bottommore, Tom,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Braga, Carlos Alberto Ptimo and Geraldo M. "Vasconcellos, Agricultural Trade, the GATT and LDCs," in *Global Protectionism*, 1992.
-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Burbach, Roger and Patricia Flynn, *Agribusiness in the America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 Calder, Kent E. "Japan's Crucial Role in Asian's Financial Crisis," *Japan Quarterly*, April-June, 1998, p. 4-9 .
- Cardoso, Fernando H.,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Left Review*, July - August, 1972.
- Chang, Kowie, 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1968.
- Chou, Chi-chu, "Trade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n D. Gale Johnson and Chi-ming Hou, ed., With Yu-kang Mao, Chaw- hsia Tu, Tracy C. Miller, and Chi-chu Chou,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US. - Taiwan Trad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Press, 1993.
- Clarke, Simon, *Marx's Theory of Crisis*, St. Martin's Press, 1994.
- Coote, Belinda with Caroline LeQuesne, *The Trade Trap*, new edition, An Oxfam Publication, 1992 and 1996.
- David, Wilfred L., *The IMF Policy Paradigm: The Macroeconomics of Stabiliza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eger, 1985.
- Dasgupta, Biplab, *Structural Adjustment, Global Trade an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Zed Books, 1998.
- Delhaise, Philippe. *Asia in Crisis—The Implosion 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e System*, John Wiley & Sons, 1998.
- Dore , Elizabeth and John Weeks, "Class Alliances and Class Struggle in Peru: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ssue 14, Vol. IV, No. 3, Summer 1977, p. 2-17.
- Du Boff, Richard, "U.S. Hegemony Continuing Decline, Enduning Danger," *Monthly Review*, December, 2003, p. 1-15.
- Duncan, Richard, *The Dollar Crisis - Causes, Consequences, Cures*, John Wiley & Sons (Asia) Pre Ltd, 2003.
- Foster, John Bellamy. "Book Review,"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97, p. 51 - 62.
- Friedman, Harri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od: A Glob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1993, 197:29-57
- Frank, Andre G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 Press, September, 1966.
-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92
- George, Susan, *Th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2.
- Gilpin, Rober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oodman, D. E., Sorg B. and J. Wilkinson, *From Farming to Biotechnology: A Theory of Agri-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sil Blackwell, 1987.
- Green, Duncan, "Flexibility and Repression: The Chilean Model Explained," in Fred Rosen and Deidre McFadyen edited,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5.
- Guttman, Robert, ed., *Reforming Money and Finance –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Flux*, M. E. Sharpe, Inc., 1989.
- Hart-Landsberg, Martin, *The Rush to Development, Economic Change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South Korea*,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3.
-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Blackwell, 1990.
- Ho, Samuel, "South Korea and Taiwan: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roblems in the 1980s," *Asian Survey*, December, 1981.
- Irwin, Douglas A., *Managed Trade, the Case Against Import Targets*, The AEI Press,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4.
- Johnson, Authur M. ed., *The American Economy –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the 1970's*,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4 .
- Kapstein, Ethan B., *Governing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eesing, D. B., and Martin Wolf, *Textile Quotas Against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Trade Research Center, 1980.
- Kenny, M., et al,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Agriculture Socioeconomic Aspects of

- Biotechnology- R and D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IOTECH* 83, Northwood, UK: On-line Publications.
- Keynes, John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A Harbinger Book, 1936.
- Kilpin, Rober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orner, Peter, Gero Maass, Thomas, and Rainer Tetzlaff, *The IMF and the Debt Crisis, A guide to the Third World Dilemma*,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Paul Knight, Zed Books Ltd., 1986.
- Kuczynski, Pedro-Pablo “Latin American Debt,”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83, p. 344-364.
- Krugman, Paul,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W. W. Norton & Co., 1999.
- Lenin, V. I.,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5.
- Leon, Robert Salinas, Mexico, *Markets and Multilateral Aid in Perpetuating Poverty,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edited by Doug Bandow and Ian Vasquez, G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4.
- Marcel, M. (1989) Privatización de finanzas públicas: el caso de Chile 1985-1988, *Colección CIEPLAN*, no. 26 (June), as reported in Mellor, Patricio, *Review of the Chilean Privatization Experienc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Property Rights, Privatization and Regulation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Illinois, November 19-20, 1992, Mimeo.
- McNally, “David The Liberalization on Tri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in East Asia,”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98, p. 1-14.
- Moaddel, Mansoor, “State-Centered vs. Class-Centered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ase of U. S. and British Participation in the 1953 Coup Against Premier Mosaddeq in Ira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mmer 1989, vol 24, no.2, p. 3-23.
- Moreno, Juan Carlos and Jaime Ross, “Market Reform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State in Mexico: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 6 in Amitave Krishna Dutt, etal.

- ed., *The State, Markets and Development, Beyond the Neoclassical Dichotomy*, Edward Elgar, 1994.
- Naim, Moises, "Latin America the Morning Aft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 p. 45-61.
- Nelson, Brian and David Roberts, and Walter Veit,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the 1990s, Economics, Politics, Defense*, St. Martin's Press, 1992; Chapter 6: "Rosewarne, Stuart, Toward a New European Regim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 Ogawa, Alice, "Japan's Banks More Vulnerable to Competition from Abroad," *Japan Quarterly*, April-June, 1998, p. 10- 14.
- Orme, William A. Jr., *Understanding NAFT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 Petras, James, *The Third Way: Myth and Reality*, Monthly Review, March 2000
-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Revisited," *Monthly Review*, November, 1999.
- Quinlan, Joseph and Marc chandler, "The U.S. Trade Deficit: A Dangerous Obsessi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1.
- Rae, John,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G. K. Hall & Company, 1985.
- Rau, Alan,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4-56: A Study of Conflicting Policies*, Grnrva, 1957.
- Rayner et al., *Agriculture in the Uruguay Round: Prospect for Trade Reform*. Oxford Agrarian Studies 18, 1990.
- Reddy, D. Narasimta, et al., *Political Economy of WTO Regime*, Rainbow Publishers, 2002.
- Robonson, William I., *Promoting Poly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Ross, Robert F. S., and Anita Chan, "From North-South to South-South, the True Face of Global Compet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 8-13.
- Sakakibara, Eisuke, *Structural Reform in Japa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3.
- Saunders, Frances Stonor,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 Schumacher, E.f.,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Harper &

- Row Publishers, Inc. 1973 (original published by Blong & Briggs Ltd., 1973).
- Sforza, Michelle, Scott Nova and Mark Weisbrot, "Writing the Constitution of A Single Global Economy," *A Concise Guide to 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 Supporters' and Opponents' Views*, Preamble Briefing Paper, May 20, 1997.
- Singer, Daniel. *Whose Millennium: Theirs or Our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 Soloman, Ro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1980-1993*, St. Martin's Press, 1994.
- Stiglitz, Joseph E.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 Stoker, Gerry, "The Privatization of Urban Servic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Privatization of Urban Services in Europe*, ed. by Lorrain and Gerry Stoker, Princeton, 1997.
- Tansey, Geoff and Tony Worsley, *The Food System - A Guide*,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1995.
- Thurow, Lester C.,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How Today's Economic Forces Shape Tomorrow's World*. Wm. Morrow & Co., 1996.
- Tyers, Rod. et al., *Disarray in World Food Market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Tyers, Rod. and Kim Anderson, *Disarray in World Food Market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spect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54, August, 1974.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73.
- Volcker, Paul,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s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 1992.
- Wachtel, Howard, *The Money Mandarins*, Pantheon Books, 1986.
- Wachtel, Howard, "The Global Funny Money Game, 1987-1988 in Robert Guttman," ed., *Reforming Money and Finance -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 Flux, M. E. Sharpe, Inc., 1989, 261-265.
- Wade, Robert, *Governing the Markets: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ilfred L. David, *The IMF Policy Paradigm: The Macroeconomics of Stabiliza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eger, 1985.
-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SF: Dissent Diversion? New Delh: New Vistas Publicitims. (2003)
- Yoffie, D. B.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5, no. 4, December 1981.
- Zeiler, Thomas W., *American Trade and Power in 1960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部分

- 《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3）——世界分工體系中的中國製造業》，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管理出版社，2003。
- 《中國經濟前景分析——2003年春季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王春根，〈論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變動〉，《台灣思潮》，（上）第二期，頁38-42；（下）第三期，頁3-9。
- 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鄭武國譯，聯經出版社，1999。
- 谷浦孝雄編著，劉進慶等共著，《台灣的工業化：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中譯，雷慧英，人間出版社，1988。
- 趙剛，〈為什麼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四期，頁49-116。
-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台灣社會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頁48-63。
- 鍾望如，〈是恩賜還是剝削？評王春根的庸屬發展論〉，《台灣思潮》，第四

期。

劉進慶，涂照彥，谷三喜男：《台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
中譯：雷慧英、吳偉健、耿景華，人間出版社，1995。

韓德強《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2000。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同著《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
(德文原著：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Die
Globalisierungsfalle)，中國中央編譯社出版，1998。

巨流新書介紹——

ISBN : 957-732-218-2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南韓轉型（1993-2003） 政黨輪替與政經體制的轉變

本書主要研究的議題有兩個：首先是南韓是從 1987 年開始進入政治民主化的階段，為何同樣是民選總統的金泳三在 1993 年至 1998 年執政期間卻無法達成經濟改革的目標，而金大中卻反而能夠做到？其次是南韓真正進行政治及經濟改革是在 1993 年金泳三上台之後，而真正有大刀闊斧的具體改革措施則是在 1998 年金大中上台之後，而從 1993 年至今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南韓的政經體制是否有明顯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對於南韓政府、大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係會產生何種影響呢？本書將從政府與大企業當中的執政黨—大企業—銀行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分析 1993 年之後南韓政經體制的轉變。

作者簡介：蔡增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2001），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巨流新書介紹——

ISBN : 957-732-204-2
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公司

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本書最初的計畫是要作為李約瑟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七卷其中的一個分冊，他計畫將中國的發展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作一個比較。本書的論述有一個清晰的軌跡：開始於歐洲的獨特性，結束於中國的特殊性。

直到晚近，西方世界才體認到，在世界的歷史經驗中中國歷史與西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書最為重要的主題，是在探討資本主義的概念與理解中國的理念之間的歷史關係。資本主義的概念是西方知識分子用來界定他們所身處其中的社會構成(formation)。此本共同合作下的書，目的在於檢視這資本主義的經驗如何成為一種歐洲的社會構成，以及如何形塑關於中國的知識的世界體系。此外，這本書也意圖建立新的基礎，進而提出一個有關中國社會的理論，避免以歐洲中心主義的詞彙來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

編者簡介：Timothy Brook，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

Gregory Blue，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譯者簡介：古偉瀛，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郭慧英，Binghamton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宋家復，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李榮泰，芝加哥大學歷史所肄業，現任輔英科技大學講師。

費絲言，史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邱澎生，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

這本書對「全球化」提出了與主流不同的論述與分析，本書作者認為「全球化」是壟斷資本在面臨資本主義危機時所策劃的新的資本積累策略。「全球化」為剩餘資本在世界各地尋找低價自然資源、廉價勞動力、開闢新投資機會、和擴大剩餘商品的銷售市場，以便紓解資本積累的危機。

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即是國際壟斷資本，和美國、歐盟、及日本之間的共識，再將它們之間的共識由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在它之前的關稅貿易總協)等金融貿易組織所策劃的具體政策來執行。

「全球化」暫時的紓解了資本積累的危機，但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因此資本主義的危機不但要繼續而且要加深。在此同時，「全球化」將資本主義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由這些國家的人民來承擔。

ISBN 957-732-221-2



9 789577 322210